中国史学思想通论

·历史文献学思想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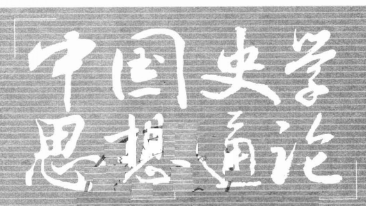


◎ 吴怀祺 主编
◎ 王记录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责任编辑　史霄鸿　魏清荣
◎ 装帧设计　陈培亮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

·历史文献学思想卷·



◎ 吴怀祺 主编

◎ 王记录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文献学思想卷/吴怀祺主编；王记录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1

ISBN 978-7-211-06203-4

Ⅰ.①中... Ⅱ.①吴... ②王... Ⅲ.①史学史：思想史—中国②史籍—文献学—中国 Ⅳ.①K092②G257.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2918号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文献学思想卷

ZHONGGUO SHIXUE SIXIANG TONGLUN · LISHI WENXIANXUE SIXIANG JUAN

作　　者：吴怀祺　主编　王记录　著
责任编辑：史胥鸿　魏清荣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211@fjpph.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76号　　**邮政编码**：350001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铜盘路278号　　**邮政编码**：35003
开　　本：730mm×990mm　1/16
印　　张：23.50
插　　页：2
字　　数：343千字
版　　次：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6203-4
定　　价：4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题　记

吴怀祺

进入21世纪，振兴民族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任。我们要深入研究、总结民族史学思想，同时吸收外国史学的精华，以推动当代史学研究，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深入研究中国民族史学思想，对世界史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代西方学人，绝大多数都承认中国历史典籍丰富，是历史大国，但却无人重视这些典籍在思想上的重大意义。我们在《中国史学思想通史》中，已经通过史学思想发展的事实，作了回应。仅此还不够，我们还要从民族文化的特点，从史学思想的要素上，彰显中国民族史学思想的理论价值。《中国史学思想通论》这套书即是为此而作，本卷是其中的一本，重视从思想上总结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成就和具有的理论上的价值。

20世纪60年代，白寿彝先生就论说了对历史文献学的认识。① 20世纪80年代初，白寿彝先生敏锐地感受到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发表了诸多文章，其中，《谈历史文献学——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② 和《关于历史

① 见《谈史学遗产》，载《学步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29～154页。

② 《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

文献学问题答客问》[①] 这两篇文章，为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立打下了理论基础，也为总结中国历史文献史学思想，寻找到一个切入点。

一般说来，历史文献学是文献学的组成之一。对于文献学涵盖哪些部分，历史文献学与文献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学界有不同的理解。要清晰理解有关争论，应当讨论文献与历史、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之间关系的问题，进而阐明文献学思想与历史文献学思想等一系列问题。白寿彝指出：

> 我们所谓历史，实际上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指客观存在的历史，这是历史的本身。另外一个意思，是指人们写出来的历史，这是关于历史本身的记录，但不能说就是历史的本身。我们平常总是把这两个意思混淆起来。为什么会把这两个意思混淆起来呢？这是因为客观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拉回来加以考察。我们研究客观历史，主要是依靠历史记录。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就很容易地把这两个意思混淆起来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必须要研究历史文献。既然要研究文献，就需要建立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历史文献学可以帮助我们搜集、分析，并正确地运用历史文献，使我们的历史工作在文献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这就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用处。

这是白先生在《史学史研究》1981 年第 2 期开篇的论说，概而言之：

一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是历史本身。

一是“人们写出来的历史”，是“关于历史本身的记录”。

他指出这两者不能混淆，研究历史离不开历史文献，但不是说理论不重要。他认为：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按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去做，反过来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地理解，而不下工夫去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后来，他在《史学概论》等著作中，不断强调这样的观念。应该说，这就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立打下理论基础。

从宽泛意义上说，历史文献学近于文献学。文献产生与“史”的产生，有直接的联系，《隋书·经籍志》说：“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

---

① 《文献》1982 年第 4 期。

是一个典型的说明，从文献产生说出历史文献学与文献的特殊因缘。

历史文献与历史文献学又不能等同。这就是："历史文献指的是历史文献的本身，历史文献学是关于历史文献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历史文献的方法。"这就界定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由此，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的任务，也就明晰了。

白寿彝认为，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这样几个方面：即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另外，还包含有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等。在《关于历史文献学问题答客问》中，他从另一角度，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每一部分又作了具体的说明。将两篇文章的论点相结合，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白寿彝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思想。

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除探索有相关根本理论外，还要研究这些内容的思想与方法论。深入研究这些方面，就可深刻体会到我们民族史学思想之丰富，从一个重要方面展示出中国史学思想的体系之宏伟、中国史学思想具有魅力之所在。

有两个重要问题，应当做进一步说明。这两个问题，一是历史文献的多样性，二是历史文献的民族性。

古代史学家就重视历史文献的多样性，马端临说到《文献通考》的编修，说：

>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①]

关于历史文献的多样性，在《关于历史文献学问题答客问》中，白寿彝先生作了系统的说明，后来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第一卷中，再一次

① 《文献通考·自序》。

提到这一问题。

历史文献多样性是指：

> 第一，是说一种历史文献总是反映一定的历史现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把不同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联系起来，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从而观察规律性的东西。这就超出了一个一个的具体历史记载的范围以外了。这种性能不一定是文献本身所固有的，往往是史学工作者所赋予的。第三，文献不一定是死的东西，其中有不少是一直到现在还有生命力的东西。我的意思包含两点：历史文献，从内容到形式，有不少东西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还产生着影响，这是一点。历史文献中的具体记载在一般的政治资料以外，还有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科技资料等等。在这些资料中，也是有一些值得我们现在还可以学习的东西。这是又一点。

文章说，对于历史文献学的专业工作者来说，考订文献可以说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但思想活跃一些、视野开阔一些、联系的方面多一些，对一个文献工作者来说，可能是有更多好处的。

这几个方面是说到了历史文献学研究客体与主体、求真与索理、古与今的辩证联结。

历史文献内涵的丰富性是历史文献多重性的根据。但另一方面，历史文献作为历史资料，具有局限性，[①] 这也应当重视。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民族性是一个重大问题。这里只能简单说几点。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也是民族史学特有的性格、风格。

掌握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知识应当是历史文献学研究者的基本素养，这和民族书写文字特点联系在一起。六书理论同样是文献思想研究的方法，因而也是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的内容。江沅推崇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本义明而后余义明，引申之义亦明，借假之义亦明。形以经之，声以纬之，凡引古以证者，于本义于余义，于引申，于假借，于形，于声，各指所之，罔不就理……孔子曰'必也正名'，盖必形声义三者正，

①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295页。

而后可言可行也；亦必本义明而后形声义三者可正也。”① 王国维把清代经学、史学的成就，归结为“小学”，说：“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陵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② 观堂先生看到这一层是有道理的。他治史，把文字的训释和史事、制度的考察结合起来。“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③ 有此底蕴，可以评价其古史研究之成就，历史文献学思想的民族性，也因而突显出来。

创新理念成为历史文献学思想的一种自觉，是民族历史文献学思想的闪光点。章学诚批评部分史书的编纂墨守程氏，失却创新精神，说：“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④ 纪传体成了如同科举八股文的公式，也就变成没有活力的形式。这就要以变通的思想思考史书编纂上的更革，所以章氏说，“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史的编纂，应当有创意，做到“有例可守，而不为例所拘”。

各类史书编纂与文献考订，在方法论上，都有创新的要求。刘知幾说：“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⑤ 又如陈垣先生治史特点是“探求史源，区分类例”，而他的

---

① 江沅：《说文解字注后序》，《说文解字注》（下册），成都古籍书店 1981 年版，第 835 页。

② 王国维：《周代金石文韵读·序》，《王国维经典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0 页。

③ 《观堂集林》卷六《毛公鼎考释序》，《王国维经典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2 页

④ 《文史通义》卷五内篇五《答客问上》。

⑤ 《史通》卷四《编次》。

校勘四法，也在学术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历史文献学的社会功能，包括道德垂训的意蕴、经世致用的追求、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是治学的原则，也是历史文献学思想的积极的因素，更是其民族性的体现。《文心雕龙·程器》篇说："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因此，记时书事，也不忘通过运用"笔法"、"义例"，以表达对时局的看法。

总之，历史文献学的研究，直接影响到历史学的发展。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应当推动当代史学的发展。

王记录教授所著的《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文献学思想卷》，是有创意的著述。正如作者说的，以文献学思想命名的著作，还没出现。因此，以历史文献学思想的著作同样是没有出现。因而，这卷书的撰写的立意，是可嘉的。

本书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实际出发，总结和挖掘中国文献学思想各个方面，评述中国历史文献学的优良传统和思想，多有创新。书中梳理了文献典藏、分类、校勘、辨伪、注释、考证等方面的传统，探讨了文献典藏的理念、价值论和方法论，归纳了文献分类中所蕴含的思想，发掘了文献校勘的理论和方法论，分析了疑古辨伪思想的成就、特点和方法体系。发覆释疑，见微知著，所作的结论令人信服。本书还注意研究金石学在文献考证中的作用和特点，颇有自己的见解。应当指出的是，本书以阐释学的方法，分析历史文献传注的特色，阐发新见。本书的最后部分论及数字化与古籍整理的关联，意识到数字化对古籍整理、历史文献研究，带来的多重影响，从而使本书透出时代的气息。白寿彝先生的历史文献学思想，为后来者所继承、光大。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的历史文献学思想的研究，都会不断出现新的课题，这就要求学人与时偕行，为我们民族文化振兴作出贡献。希望在作者和同道者的努力下，进一步推进历史文献学思想的研究。

目录

绪论：史学思想视野下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1

一、中国历史文献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1
二、中国历史文献学思想的特点及理论贡献　21

第一章　文献、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思想　35

第一节　文献与文献传承　35
第二节　文献学的发展与历史文献学的架构　42
一、中国古代的文献整理与校雠学　43
二、文献学的提出及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论争　47
三、历史文献学的架构与思想趋向　53
第三节　历史文献学思想的内容　57

第二章　“信而好古，广收博采”：文献搜求和典藏的思想　63

第一节　文献搜求与典藏的理念　64
一、“读书为乐”的意识　64

二、“遗金满籯，不如一经”的观念　66
三、“藏书私秘，世代永保”的心态　68
四、“以传布为藏”的思想　70
五、其他一些藏书心态　74
第二节　文献典藏的价值论　76
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典藏与资政教化　77
二、“欲读书者，必先藏书”：典藏与读书治学　81
三、“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典藏与文化传承　86
第三节　文献搜求与典藏的方法　91
一、“盛聚”与“大厄”：对文献典籍聚散规律的总结　92
二、求书之道　96
三、措理之术　101

第三章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文献分类叙录的理论　108

第一节　“盖有目录，以为纲纪”　109
一、弘道设教　109
二、崇经重儒　113
第二节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116
一、“剖判条源，甄明科部”，“辨其真伪，核其异同”　118
二、“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　120
三、“类例既分，学术自明”　123
第三节　“审正旧疑，详开新制”　125
一、总结得失，评判优劣　126
二、损益旧制，另开新篇　128

第四章　“实事求是，订误存真”：文献校勘的观念　138

第一节　对文献致误原因及形式的认识　139
一、对文献致误原因的分析　139
二、对文献致误通例的归纳　142
第二节　丰富的文献校勘理论　147
一、对校勘目的及校勘重要性的认识　148
二、实事求是的校勘原则论　152
三、段顾之争的若干问题及乾嘉时期校勘理论的发展　160
四、对校勘家的要求　169
第三节　文献校勘的方法与方法论　176
一、“求古”与“求是”相统一的版本价值观　177
二、校勘的方法及方法论　181

第五章　“疑古惑经，正讹考信”：文献辨伪的思考　188

第一节　中国古代疑古辨伪思想的发展　189
一、“考信于六艺”与“疾妄求实”　189
二、“疑古惑经”　192
三、“考信求真”　195
第二节　中国古代疑古辨伪的思想成就　198
一、对伪史、伪书等产生原因的论述　199
二、对作伪手法、作伪类型以及辨伪原则的分析　203
三、对伪书范围、类例及复杂性的认识　206
四、对伪书价值的评判　209

第三节 作者、文本及流传：中国古代文献辨伪的方法体系 212
一、作者 214
二、文本 216
三、流传 220

第六章 "传注训解，疏通疑难"：文献阐释的特色 224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献阐释的发展及特点 225
一、"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 225
二、"言意之辨"与"疏不破注" 231
三、义理阐发与训诂考据 234
四、中国古代文献阐释的特点 238
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献阐释的理论 240
一、文献阐释的必要性 240
二、文献阐释的目的 242
三、文献阐释的可能性 244
四、文献阐释的原则 247
第三节 中国古代文献阐释的方法及方法论 255
一、以训诂注疏为主的文献阐释方法 256
二、以义理发挥为主的文献阐释方法 260
三、训诂注疏和义理发挥两种方法的融合 264

第七章 "求实致用，证经考史"：金石学与文献考证的成就 268

第一节 金石分类的思想 270
一、对金石学研究对象的认识 270
二、对著录体例的探讨 273

三、对金石分类的探索　277
第二节　金石义例之学　280
一、金石义例的重要性　280
二、关于历代金石义例的论争　284
三、对金石义例的探求　287
第三节　与经史相表里　292
一、金石与文献考订　292
二、金石与教化经世　300
三、金石与文字正定　305
第四节　金石证史的观念对20世纪历史文献研究的影响　307
一、金石证史、考古资料与二重证据法　308
二、简帛佚籍与文献研究的新局面　312

第八章　数字化时代古籍整理的理论与方法　316

第一节　数字化：古籍整理的新方式　316
一、古籍数字化成为古籍整理的必然趋势　317
二、数字化时代古籍整理方法的变革　322
三、古籍数字化需要注意的问题　329
第二节　数字化时代古籍整理观念及相关学科的新变化　332
一、古籍整理观念的新变化　333
二、古籍数字化与文献学相关学科的发展　339

主要参考文献　348
后　记　362

绪论：史学思想视野下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中国人重“史”，记录历史，总结经验，整理文献，传承文明，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殷周时期的人们，就已经非常重视古人的经验，并把它们当作自己行事的准则，诸如“古训是式”[①] 的意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②] 的看法等，都反映了这一点。春秋时期，孔子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③] 的思想。到了汉代，河间献王刘德又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④] 的观念。这种珍重文献遗存、重视历史经验和遵循文化传承的心理，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价值取向。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心理驱使之下，中国古人才以“文献之传”为己任，自觉保存文献，传承文明。可以说，重视历史经验，对历史怀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正是历史文献学繁荣发展的民族心理基础和文化基础。

① 《诗经·大雅·烝民》。
② 《诗经·大雅·荡》。
③ 《论语·述而》。
④ 《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

一、中国历史文献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中国不仅有浩如烟海的内容丰富的历史文献典籍，还有整理、研究这些典籍的悠久历史，并在具体的文献整理中形成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学思想。中国历史文献学思想的发展同中国社会的发展、学术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同中国史学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不仅具有继承性，而且富有创新，表现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

（一）先秦时期：社会变革、百家争鸣与文献整理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天子大权旁落，势力日益衰微，诸侯、大夫纷纷崛起。诸侯与天子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军事冲突连续不断，社会剧烈动荡，许多旧有的礼仪典制都遭到破坏，所谓"礼崩乐坏"是也。各国史官也因社会动荡无常，其掌管的官方文献多有流散，官府掌管学术文化的局面开始遭到破坏。王官之学散裂，学术下移，诸子崛起。诸子因政治立场、学术渊源、为学方法等皆有不同，于是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派林立，学术文化异常活跃。

社会剧变、百家争鸣，给历史文献整理带来巨大影响：

其一，由于诸侯纷争，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文献典籍流落民间，出现了私家整理前代文献的情况，代表人物便是孔子。此前，王官之学兴盛，文献典籍集中在官府，由相应的官吏（主要是史官）掌握，文献校勘整理自然也由这些人完成。春秋后期，情况大变，孔子为了教授学生，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首开私家讲学以及私家整理文献之先河。孔子不仅在教授学生的过程中对六经进行了校释整理，还积极访求文献，对文献进行讲解和简明扼要的点评，形成了自己的文献学思想，为后世文献整理立则。孔子整理六经，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形成与发展，贡献至巨。孔子以降，整理古籍蔚为风气。

其二，思想文化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不仅活跃了思想，而且扩大了文献整理的范围，显示了文献整理的政治、思想功能。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批驳对方的言论，各家不得不求助于文献典籍，或推演资料，托古立说；或援引前人，支撑己见；或引述典籍，以资利用；或曲解文献，

攻击他人；甚至伪托古书，以资取胜。诸子在相互论争的过程中，不断对文献进行改造利用、考释诠解。这种对文献的利用和考释，明显是为自己的某种政治主张和思想意识服务的。

其三，诸子百家的兴起，引发了人们划分学派，并对学派进行评判的兴趣，基于其上的文献分类意识随之产生。《庄子·天下》、《尸子·广泽》、《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都论及各个学派，虽各家所举学派各异，不尽科学，但划分学术流派的自觉意识显露无遗，由学术流派的划分与评判，进而涉及文献分类，"体现了诸子对文献的认识及分流别派，在历史文献学上仍是值得重视的"[1]，可以说开了辨章学术之先河。

其四，三传对《春秋》的解释，形成了后世文献注释（诠释、解释）的两种传统。《春秋》经孔子整理以后，影响很大，为之作注的文献随之产生，那就是《公羊传》、《穀梁传》和《左传》。三传注释《春秋》，走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公》、《穀》重视发掘圣人微言大义，偏重义理发挥；《左传》重视名物训诂，偏重史实补充。三传因注《春秋》而彰显于学术史，又因不同的注释方式对后世文献注释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产生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其一，文献整理蕴含明确的政治目的。孔子因鲁史而整理编纂《春秋》，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 明确指出孔子借《春秋》而抒心志的特征。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有时还曲解古文献原义，作出符合自己思想的解释，其解《诗》就有此特点。战国时期，孟子发展孔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已"[3] 的思想，把文献典籍的整理当作捍卫先王之道、排斥杨墨等学派的斗争阵地，所谓："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

① 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6页。

② 《孟子·滕文公下》。

③ 《论语·为政》。

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①] 利用文献来卫道，成为孟子文献研究的核心。除此而外，墨家、法家等引述古代文献，也都是为了政治目的，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

其二，提出了文献整理的原则。孔子要求用审慎的态度对待古文献，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②]；又如排斥虚妄，以理性的态度整理古文献，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③] 等等。与孔子一样，孟子也提出了文献整理的原则，如主张在理解、训释文献时“以意逆志”，即“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④]。又主张在研究、整理文献时“知人论世”，即“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⑤]。孟子还强调用怀疑的态度对待文献，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⑥]。这些都成了后世文献整理所必须遵循的法则，影响深远。

先秦文献整理，诞生于乱世，研究、整理文献不是为了消遣，也不是为整理文献而整理文献，而是要为解决现实人生和社会政治问题服务。其文献学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入世意识和经世色彩。孔子整理六经是为了教授学生，传播儒家“仁道”，政治指向明显；诸子引述、改造经典，是为了树立己说，排斥异己，同样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三传对《春秋》进行解释，蕴含的是崇经的观念。可以说，文献学思想产生之初，就怀有强烈的经世思想。历史上那些所谓不问时事而只“钻故纸堆”，去从事文献整理的做法显然违背了中国文献学的传统。

（二）两汉时期：经学的倡导与文献学思想的特点

秦始皇焚书，对文献典籍是一场浩劫。秦末战乱，文献保存更是雪上加霜。西汉建立，封建国家进入一个相对安定发展的时期，为文献整理提

---

① 《孟子·滕文公下》。
② 《论语·为政》。
③ 《论语·述而》。
④ 《孟子·万章上》。
⑤ 《孟子·万章下》。
⑥ 《孟子·尽心下》。

供了较稳定的社会条件。

就两汉而言，学术文化方面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经学的发达。汉初，天下残破，百废待兴，虽“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1]，但效果并不明显，文化事业不发达。直到汉武帝时期，国家强盛，统治者才真正重视文化的发展。汉武帝刘彻广搜天下图书，“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2]。与此同时，又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并在官方设立五经博士，整理、传授经学。统治者的提倡，为经学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成为汉代学术的核心。汉武帝之后，汉宣帝于甘露三年（前51年）召开石渠阁会议，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东汉章帝于建初四年（79年）仿石渠阁旧事，召开白虎观会议，考论经义异同。东汉灵帝于熹平四年（175年）诏诸儒正定经书文字，刻于石碑。所有这些官方对经义的审定，都使得经学以无所取代的姿态占据学术文化的首位。

图书的聚集，经学的发达，使得汉代文献学逐步走向成熟，出现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献学家和文献学名著。首先是刘向、刘歆父子，他们为后世图书校勘提供了榜样。他们撰作的《别录》、《七略》，对图书进行分类编目、撰写叙录，影响后世目录学发展甚巨。其次是《汉书·艺文志》的撰作，开史志目录撰写之先河，后世正史，接续者多，使得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都能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地予以总结性的著录。再次是郑玄注经，兼采今古文经说，把训诂与阐发文意结合起来，基本奠定了古籍注释的模式。另外，董仲舒、司马迁、许慎等人也都程度不同地为文献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经学的传授过程，实际上就是对经书文献不断整理的过程，不仅以皇帝为首的官方进行考校整理，学者们在传授时也分散整理。在这样的学术思潮激荡下，通过对经书文献的整理，产生了“崇经”的文献学思想。这一文献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经书及经学地位的高度评价。“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

---

①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②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源"①。"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②。经书和经学都具有统天地、著善恶、明吉凶、通人道的功能，这是任何文献和学问都比不上的。六经中的《春秋》，因为是孔子所作，得到的评价更高，"《春秋》，义之大者也……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③。"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④。在汉人看来，孔子褒贬当世，为后王立法，既体现了天意和王道，又包含着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经验，意义深远。

二是在图书分类叙录中将经书排在首位。《七略》，首为《六艺略》，把六经的地位突出出来。班固继承《七略》的做法，稍加改造，在《汉书·艺文志》的分类系统中依然把六艺放在首位，其后才是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图书分类绝不是简单归类，它蕴含着对图书重要程度的认识，经书文献放在第一的位置，充分反映了汉代文献学思想中的崇经意识。此后，无论是六分法、七分法、四分法还是十二分法，经书都永远居于首位。可以说，开启于两汉时代的崇经的文献学思想与专制社会相始终。

（三）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玄学兴起与文献学的多途发展

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及文献学思想的特点，必须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动荡，二是玄学兴起。正是政治、学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使这一时期的文献学思想带有不同于前代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王朝像走马灯一样，旋生旋灭。

---

①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② 《汉书》卷八十一《匡衡传》。
③ 《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见《董仲舒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④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少数民族政权频繁南下，民族融合加快。由于时局动荡，王朝更替频繁，图书典籍散而复聚，聚而复散，聚散之间，丧失殆尽。大量图书文献的流失，对文献的整理、研究都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同时，也正因为时局动荡，统治者忙于征战，对思想的控制减弱，学者们有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思想空间，反而会出现学术上的繁荣和创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主流，两汉时期的学术主流是经学，魏晋时期的学术主流是玄学。玄学是知识阶层针对现实社会问题对儒学不断进行反思、批判的结果，其基本特征是崇尚玄远，其学术内容是会通儒道，旁及名法诸家学说，采取哲学思辨的方法，探讨有无、本末、体用、言意、动静以及自然、名教诸问题，赋予天人关系以新的内涵。玄学在著述文字方面强调“玄论”和“玄注”，对于这一时期的文献学思想有直接的影响。

动荡的社会环境和玄学思潮的兴盛，使得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学呈现出多途发展的趋向。

其一，在文献分类、注释、编纂等方面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气象。在图书分类方面，出现了荀勖的《中经新簿》、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以甲、乙、丙、丁四部来划分文献典籍，自此，以经、史、子、集为核心的四分法逐渐战胜六分法、七分法，占据目录学的主导地位。在文献注释方面，出现了义疏、集解等新形式，义疏体的代表作是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开唐疏之先河。皮锡瑞云：“汉学重在明经，唐学重在疏注。当汉学已往，唐学未来，绝续之交，诸儒倡为义疏之学，有功于后世甚大。”[①] 集解体的代表作是何晏的《论语集解》、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等。由于“乱世多史”，私家修史之风很盛，为史书作注蔚然成风，出现了裴骃的《史记集解》、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等史注名著。由经注到史注，反映了文献学发展的新趋向。此外，为子书作注也成为文献研究的新现象，《老子注》、《庄子注》之类的著作甚多。在文集编纂方面，编订了大量的别集、总集。由于佛教传播的兴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130 页。

盛，不仅出现大量佛经的译注，还编纂了第一部佛教总集《弘明集》。凡此种种，均体现了这一时期文献学研究的求新趋向。

其二，南北分裂的长期存在，造成了文献研究南北不同派别的差异。魏晋经学，本来就存在义理之学和训诂之学并存的局面，这种情况发展到南北朝，因南北分裂而形成南北学风的差异，从而影响到南北文献研究的不同。对于南北学风的差异，时人即已察觉，所谓“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①。《北史·儒林传》云：“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② 不同的学风在文献研究上自然会出现不同的风格。北朝士人治经，更多继承了汉儒训诂之学的传统，郑玄等人治理经书文献的思想和方法受到重视。南朝士人治经，受到玄学和佛教解说佛经的影响，喜谈义理。当然，我们说南北文献研究方法不同，也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南北相互借鉴融通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北方重视章句训诂而不尚玄言，但绝不是死守汉儒章句之学。南朝虽推崇玄学，但亦重视郑学。

其三，文献学理论和方法受玄学影响很大。魏晋玄学对文献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献注释方面。汉代，对经典文献的理解主要靠章句训诂，及至魏晋，受玄学及佛教讲经说法方式的影响，义疏之学兴起。义疏即疏通其义，它不仅解释词义，而且串讲句子的意义，甚至阐发章旨，申述全篇大意，并对旧注作进一步的阐发和解释。义疏是介于义理和训诂之间的新型注释形式，是经学研究从单纯注释向注释、考据相结合逐步发展的重要标志。义疏的讲解显然是受了玄学的影响，但因保留了训诂释词的因素，所以在玄理阐发的道路上走得不远。再者，文献的解释出现了新的原则，即“得意忘言”、“得言忘象”、“以求其意”等方法，超脱文献的字面意思，借题发挥，加以附会。此由王弼开其端，发展成魏晋崇尚玄学之士诠

① 《世说新语校笺》卷上《文学》，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7页。

② 《北史》卷八十一《儒林传》序。

释古代文献的通则。汤用彤曾说："汉代经学依于文句，故朴实说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后，学尚玄远，虽颇乖于圣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汉人所习曰章句，魏晋所尚者曰'通'。章句多随文饰说，通者会通其意而不以辞害意。《左氏传》杜注曰：'诗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论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传》引《诗》不皆与今说《诗》者同，后皆仿此。'（隐公元年）不以文害意（文本《孟子》），盖亦源于寄言出意之旨，而为魏晋玄学注解之通则也。"① 他还指出，"魏晋注疏恒要言不烦，自抒己意"，虽然这种注疏方式目的在于总论书之大旨，渗透着注释者的主观见解，但同样，"随文作注，亦多择其证成己意处会通其旨略。未必全合于文句"②。非常精到地指出任何对文献的注释都可能是注释者根据时代需要和个人见解而作出的判断。

尚需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玄学对文献注释的影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很多注释，尤其是史注，依然上承汉代余绪，并继续发展，玄学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

（四）隋唐时期：一统局面与文献学的反思总结

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分裂割据，隋唐时期，统一的王朝又建立起来，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统一局面的形成，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学术分立的局面，实现了南北学术的统一。与此同时，国力强盛的唐王朝还把文献整理、史书编纂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如唐太宗诏颜师古考定五经，诏孔颖达等撰定《五经正义》，设立史馆修撰前朝史书，等等。唐代君臣对文献整理非常重视，据《唐会要》载，贞观二年（628年），魏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乾封元年（666 年），唐高宗因"四部群书，传写讹谬，并亦缺少"，诏"集儒学之士刊正，然后缮写"。唐睿宗时，诏学识渊博之人"分行天下，搜检图籍"。唐玄宗也多次下诏"整比四部书"。③

王朝一统，南北学术统一，封建君主垄断各种文献的整理，凡此种

①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0 页。

②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0 页。

③ 以上均见《唐会要》卷三十五《经籍》。

种，都使得隋唐时期的文献学研究处于守成的状态，反思总结多，创新发展少。孙钦善认为“隋唐时期古文献学的特点是因循、集成，而较少开创”①，庶几接近历史事实。

隋唐时期文献学反思和总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官方组织人员，编纂、整理大部头的文献著作。如编纂了《隋书·经籍志》，最终确立了四分法，继隋志之后，又撰成《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两部官修目录。类书编纂成就很高，《艺文类聚》、《初学记》等都是奉诏而修。影响巨大的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也是奉诏而作，这些都带有集大成的意味。另外，隋唐统治者特别注意搜集图书，藏于秘府，藏书数量超过以往各代，所谓“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②。文献的大量聚集也为官方大规模整理文献准备了条件。

二是提出了对于文献价值的理论认识。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对文献价值的认识早已有之，但提到理论高度进行系统论述，还是在隋唐时期。《隋书·经籍志》总序以及四部小序，从不同角度对文献的价值进行了阐释，颇为系统。在隋志看来，经部文献的价值是“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史部文献的意义是“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子部文献的价值是“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集部文献的作用是“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③。最后这样表述文献的价值和意义：“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④ 总之，文献对治国安邦具有参考借鉴的价值，对总结历史经验具有启迪思想的意义，对营造良好世风具有移风易

①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 页。

② 《宋史》卷二百二《艺文志一》。

③ 均见《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

④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总序。

俗的作用，是做人处事的准则，律己正身的依据，作用之大，无物可比。

三是对前代文献整理工作进行历史地梳理与反思。隋代，牛弘上书请开献书之路，考察了历史上文献的聚散、盛衰，[①] 把政治动乱与文献盛衰联系起来看，总结出政治稳定文献必聚、政治动荡文献必散的规律。唐初修撰的《隋书·经籍志》更加深刻地论述了唐前各朝在文献整理上所作的努力，并对历代文献整理的得失进行评论，如论汉初文献整理，有“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缺陷；荀勖所著《中经新簿》，对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王俭《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卷首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阮孝绪《七录》“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词义，浅薄不经”。如此等等，均直指要害，见解深刻。

如果从孔子整理六经开始算起，到隋唐时期，文献整理工作已历经千余年。其在社会、人生中的作用已经彰显无遗，对其进行反思、归纳、总结，亦是文献研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

（五）宋元时期：文献学研究的繁荣与创新

陈寅恪先生曾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 宋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繁荣时期，影响后世甚远。仅就历史文献学成就一项而言，就足以让后人自豪不已。与宋朝同时的辽、金和其后建立的元朝，同样为中华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文献学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第一，图书分类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宋代图书分类，有史志目录、综合目录和专科目录。官修书目如《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私家书目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史略》等专科目录，都是目录学史上的名著。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目录学领域明显分为解题目录和非解题目录两大流派。所谓非解题目录，即《汉书·艺文志》开创的传统，只著录作者、书名、篇卷数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

---

① 见《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

②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都是继承这一传统。解题式目录开创于刘向《别录》，对书籍内容进行介绍，《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以及《文献通考·经籍考》继承这一传统，成为后世解题式目录的样板。

第二，类书和丛书的编纂超越前代。宋代做了很多规模宏大的文献汇编工作，出现了三部大型官修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以及王应麟的《玉海》。从书编纂起于宋，是宋代对文献学发展的一大贡献，著名的丛书有《百川学海》等。另外，宋元时期还编纂了许多大型的文集，如《文苑英华》、姚铉的《唐文粹》、吕祖谦的《宋文鉴》和苏天爵的《元文类》等。

第三，考证学方面的成就非常突出，刊误、纠谬、考异的专书出现。刊误的代表作有刘攽的《两汉书刊误》、吴仁杰的《两汉书刊误补遗》等；纠谬的代表作有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等；考异的代表作有司马光的《通鉴考异》等。另外，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汉制考》、《通鉴地理考》等，在历史考证方面贡献巨大，梁启超说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为清代考证学先导，故清儒甚重之"[①]，足见其影响深远。

第四，疑古辨伪之风盛行。宋元大儒，几乎都有辨伪之作，王安石、李觏、司马光、苏轼、欧阳修、王柏、郑樵、朱熹、吴澄等均对六经传注提出怀疑，进行考辨，为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扫清障碍。宋元人的疑古考辨之风，直接开了清代考辨文献的先声。

第五，文献注释开出新天地，打破了唐代"疏不破注"的陋习。刘敞的《七经小传》是率先冲破这种"多守章句注疏之学"[②] 的沉闷学术局面的著作，开启了不墨守古注、勇于创新的新风气。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不迷信古注，大胆创新，彻底打破了后人对汉唐传注的迷信。朱熹同样如此，其整理古籍的一贯原则就是不迷信古人的注疏，但也不完全否定古人，而是择其善者，为我所用。总之，宋人注经开启了一代新学风，这种学风不再一味死钻训诂，而是在解释前人著述的同时，大胆地阐述自己的

---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02 页。

② 《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四《七经小传五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3 页。

见解和主张。

第六，校勘学向规范化、理论化发展。宋代文献校勘是历史上校勘成果最丰富的时代之一，馆阁校勘、私家校勘均取得很大成绩，并出现了藏书校、刻书校、学术校三个并立的系统，每个系统都产生了自己的校勘条例，总结性的类例之书也出现了，校勘学向理论化发展的趋向特别明显。

第七，金石学产生，文献研究的范围扩大。金石学是宋代兴起的一门新学科，出现了《集古录》、《金石录》、《隶释》、《宣和博古图》等名著，而且对金石考史的价值进行了阐述。

第八，文献普及开新篇。宋元文献学有一个特点就是文献普及做得好，让更多的人能接受经典。宋人解经，打破旧注繁琐考证的桎梏，力求通俗易懂，扩大了经典的传播范围。元人因文化程度较低，就需要对儒家经典进行通俗易懂的诠解，以利于其接受汉文化。许衡适应时代要求，作《大学直解》、《中庸直解》，加快了儒学的传播。

总之，宋代在目录学、校勘学、注释学、辨伪学、考证学、金石学、图谱学、辑佚学、版本学、小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①] 是文献学发展史上的繁盛和创新时期。

宋元文献学富有创造性，不仅在具体研究领域取得极高成就，而且在理论上富有创新：郑樵的校雠学理论、“类例”的思想及图书分类序录的观念是目录学史上的宝贵遗产；《韩文考异》中的校勘凡例、廖莹中的《九经总例》、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辨证》等，则是对校勘工作的理论总结；在注释学领域，朱熹的经典注释成为后世注释之学的典范之一；在辨伪方面，在辨伪理论上多有建树，在辨伪方法上多有开创；在考证方面，总结出一系列考证理论与方法。

宋元是理学发达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文献学思想自然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为了打破隋唐儒学僵化的局面，宋初的学者即已开始对旧日传注表示不满，重新注释疏解经书。随后，疑古辨伪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一股思潮，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

① 详见张富祥：《宋代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① 当时，疑古思潮波及整个学术界，包括程颐在内的一大批学者对经、传、注的内容提出质疑。"排《系辞》谓欧阳修，毁《周礼》谓修与苏轼、苏辙，疑《孟子》谓李觏、司马光，讥《书》谓苏轼，黜《诗》序谓晁说之。此皆庆历及庆历稍后人，可见其时风气实然，亦不独咎刘敞、王安石矣"②。宋儒怀疑儒家经典，实际上是为了重建儒学体系，他们以理学的眼光审视儒家文献，开始重新注释，靠注释这一形式来阐发义理，以旧瓶装新酒。其方法就是"不取传、注，其言简而义详……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治乱之迹，故得经之意为多"③。朱熹的文献学研究最能体现理学与文献学的交融，"疑古辨伪和辨明道统、阐发义理结合起来……他的疑古辨伪是为建立理学体系的一种清理地基的工作，而建立理学体系则是他的文献学工作的宗旨"④。疑经、辨伪、考订、校勘等文献学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发明经旨"，为了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宋元人治学，往往是先用汉学方法进行考据辨伪，然后用宋学方法探求义理。正因为考据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义理，故宋元时期的文献考辨不繁琐、不细碎，而是通达明识，气势恢弘，且注重理论建树。

(六) 明时期：与心学纠结和对立的文献学

明代历史文献学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的领域成就很高，有的则成为后世笑柄，形成强烈反差。二是文献学思想有所发展，出现了传之后世的文献学理论。三是因心学的影响，文献学思想中出现了矛盾的现象。

先看第一点。就图书典藏领域而言，明代社会稳定，商品经济发达，印刷术兴盛，为藏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私家藏书发达，

① 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引陆游语。

②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6页。

③ 《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三《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

④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金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339页。

出现了范钦天一阁和毛晋汲古阁等著名藏书楼。周少川先生指出，明代私家藏书具有“合藏书、校书、抄刻为一体”的特点，[1] 这就势必促进文献版本、校勘的发展。就辨伪考证领域而言，宋濂作《诸子辨》、梅鷟作《尚书考异》，都是辨伪学上的名著，胡应麟考辨群书，更有不凡的建树。就文字音韵学领域而言，杨慎重视小学和考据，力斥心学空疏，颇通文字、音韵、训诂，在古文献音释上多有创获，精于校勘。焦竑也同样重视文字、音韵、训诂，长于订误和校勘，注重文献考证。陈第则发展了考证古音的科学观点，彻底打破叶音之说，无征不信，考证严谨。

以上是明代文献学领域引人注目的成就。与之形成反差的领域也不少，如明代经学研究及经书整理成效甚微。官修《五经大全》，试图通过官方力量对经书进行整理，结果全是因袭元人之作，抱残守缺，了无新意。私家治经之作，成绩也极为平庸，皮锡瑞说：“论宋、元、明三朝之经学，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宋儒学有根柢，故虽拨弃古义，犹能自成一家。若元人则株守宋儒之书，而于注疏所得甚浅……明人又株守元人之书，于宋儒亦少研究。如季本、郝敬多凭臆说，杨慎作伪欺人，丰坊造《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以行世，而世莫能辨，是明又不及元也。”[2] 再如校刻古书，多有窜改。明代刻书极多，但改窜之风颇盛。顾炎武说：“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3] 顾广圻也说：“明中叶以后刻书，无不臆改。”[4] 改窜古书无疑是对文献的破坏。另外，明代辨伪取得成就的同时，造伪亦复不少。

再看第二点。明代的文献学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辨伪学领域。宋濂、梅鷟在进行辨伪时，就已经注意总结运用各种有效的方法从事辨伪活

---

① 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

②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5页。

③ 《日知录集释》卷十八《改书》，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72页。

④ 顾广圻：《顾千里集》卷二十一《广弘明集十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47页。

动，宋濂还总结出作伪的规律，归纳出作伪的两种类型，即“有所附丽”和“凿空扇虚”。胡应麟更是系统地总结了辨伪的方法，即著名的“辨伪八法”。这些都是中国文献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

最后看第三点。明代阳明心学兴盛，心学崇尚“顿悟”，探究“心性”，基本观点是“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王阳明鄙弃训释考证，认为是“支离”之学，认为通过对语言文字的训释以及对名物制度的考证，无法探究文献的思想内容。这种哲学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由此，就与注重求实的文献学纠结在一起，存在冲突和矛盾。比如宋濂，一方面，他在辨伪领域成就很高，注重证据，实事求是，另一方面他又鄙弃章句和考证，表现出对训诂考证的否定，主张以心去体验圣人义理。① 这实际上是心性之学在他思想中的折光。心学让他在具体的文献活动和对这种文献活动的价值的认识之间产生了矛盾。此外，焦竑身上也有这种矛盾的现象。

（七）清时期：文献学发展的鼎盛与嬗变

明清易代，历史进入到清朝，学术思潮又出现了新气象。清初，鉴于宋明理学空谈性理的流弊，注重实事、事功的实学思潮高涨，诸大家汉宋兼采，重义理又重征实。乾嘉汉学鼎盛，更重求真求实。嘉道以后，汉宋合流，征实与义理又统一起来。征实求真始终是清代学术的主流。这一主流自然影响到历史文献的整理和文献学思想的发展。

对中国传统文献的系统整理和研究是清代最有成就的方面。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用了四章的篇幅总结、论述清代学者在文献整理、研究方面的成绩，内容涉及经学、诸子、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天文历算学以及其他一些学科。② 这种整理、考订与研究古文献之风的盛行，一是由于古代文献在长期的流布刊刻过程中，错讹百出，亟待整理；二是清代经济发展较快，特别是康乾鼎盛局面的出现，为整理、研究古籍提供了

① 见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0～421页。

② 详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三至十六部分，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政治与物质保证；三是学术自身发展理路的作用，汉学崛起，考证学风涌动。

清代考据之学，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许多学者，精通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金石之学，他们穷一生之精力，通过校勘、辨伪、辑佚、考订、注疏、补苴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重要文献，进行了一番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的清理工作，使很多错讹遍布、难以卒读的文献基本恢复了本来面目。可以说，如果没有清代考证学者的整理与研究，近现代学者要想探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不知要耗费多少精力，走多少弯路。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清代学者名垂史册。

清代学术，纵向来看，表现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王国维曾指出清代学术有三变，"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①。横向来看，表现为地域性学术及学派的发达，如浙东学派、扬州学派、常州学派以及吴派、皖派等等，这些分法未必合理，但却反映了清代学术发展的地域性特征。从层次上看，官私学术都取得极大成绩。官方整理、修纂大量文献典籍，甚至编纂出《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这样的巨型文献汇编，前无古人。私家撰述更是超过前代，经史整理、考校之作远迈前人。如此丰富多彩的学术研究风貌，如此非同一般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很难在此一一评述其成就。

清代文献学思想丰富多彩：文字音韵训诂领域，不仅诸大家人人精通，对文字、音韵、训诂本身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把它们当作手段，对经史等文献进行考证，并对文字音韵训诂在学术研究上的地位和价值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极富理论创见；目录版本学领域，《四库全书总目》的图书分类叙录思想内容博大精深；校勘学领域，顾广圻、段玉裁的校勘之争直接推动了清代校勘理论的发展；考证学领域，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历史考证学成就、理论、方法都堪称一流；辨伪学领域，阎若璩、姚际恒、崔述的辨伪成就及辨伪理论直接开启了20世纪的新历史考证学；辑佚学领域，章宗源、王谟、严可均、马国翰、黄奭等辑佚大家不仅辑出大量佚文

---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4页。

献，而且总结出辑佚的方法；金石学领域，是继宋代以后金石学发展的又一高峰，在金石证史等方面极富理论建树；文献编纂领域，经、史、子、集等众多文献得到官府以及私家的整理，编辑刊印，得以传播。如此等等，成绩显赫，形成了影响后世甚远的文献整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20世纪文献研究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正是因为从事这一工作的主干力量，多是把握了乾嘉考据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的优秀学者”①。

一般而言，文献学家反对任意褒贬、横生议论，主张实事求是，言必有据。他们不妄发议论，而是在考证中议论，以考证为基础，说学术、论史事、评现实，发表卓见。他们重视考辨证据，重视由证据而得结论，反对没有史实依据的思想发挥。这正如潘耒所言：“有一异义，反复参考，必归至当；有一独见，援古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② 文献学家的这种“反复参考”、“援古征今”以得出“独见”、表达思想的形式，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在研究文献学思想时给以恰当的评价。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研究史上，历史考证学者一直遭受着“埋头故纸”、“不问世事”、“博古而不通今”、“为考据而考据”的诟病，这实在是大大冤枉了他们，因为连他们自己都不这样认为。实际上，潜心学术研究与关心社会、从事考证与经世致用并不是对立的，不仅不对立，而且统一在一起。恰恰是这种统一，使得中国文献学思想具有了自己的民族特点。研究学问以经世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清代文献学家将这一传统继承下来，并继续发扬。钱大昕提倡“明道致用”，认为“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③。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特别留意对米价、赋税、常平仓、钱制、兵制、地方行政、中枢官制、边政、民族等实际问题的考证和议论。一生从事考信辨伪的崔述作《考信录》，除辨古史虚实真伪外，还究治理得失，考历史盛衰，以为经世之用。他作《周政盛衰通考》，目的是要探讨“周室盛衰之故”，考察周由创业、守成到失败的“治乱兴衰

① 王子今：《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② 潘耒：《日知录序》，见《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版。

③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世纬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页。

之故"。[①] 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也都是以高扬经世致用大旗著称的学者。其他如段玉裁、凌廷堪、汪中、王念孙父子、朱筠、纪昀、王昶、毕沅、郝懿行、孙星衍、钱塘、黄丕烈、顾广圻、臧庸等文献学家都有学以致用、经史经世的言论。

(八) 西学东渐背景下文献学的转型及历史文献学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献学发展至近代，在学术转型的大背景下，逐步完成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辨伪、注释、辑佚、藏书等研究纷纷成为专门学科，学理上的研究逐渐展开，理论专著开始大量涌现，既有通论性的文献学理论专著，又有文献学分支学科的理论专著，显示出文献学科近代化过程中学科理论建设的应有气势。

首先，西学东渐使得传统校雠学向文献学转变。中国古代，有文献学之实，无文献学之名，有的只是"校雠"和"校雠学"。第一个提出"文献学"这一概念的人是梁启超。1920 年，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最早使用"文献学"一词，其后又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论著中多次使用"文献学"，并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做了简单勾画。受梁氏影响，1928 年郑鹤声、郑鹤春出版了第一部径直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中国文献学概要》，这部著作，传统痕迹很明显。这一时期，沿袭传统校雠学之名的著作依然存在，如胡朴安《校雠学》、杜定友《校雠新义》、张舜徽《广校雠略》等。这些著作，未以文献学命名，讲的却是文献学，旧瓶装新酒，反映了学术转型时期新旧学术纠葛的真实情况。这一时期，构建文献学分支学科的专门著作也纷纷出现，如版本学有钱基博《版本通义》、柳诒徵《中国版本概论》；目录学有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程千帆《目录学丛考》；校勘学有陈垣《校勘学释例》；辨伪学有张心澂《伪书通考》等。这些研究无论从内容到方式，都还相当传统，但毕竟是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下对文献学各分支学科所作出的理论总结。

其次，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展开，对文献学内涵的变化产生了很大影

---

① 崔述：《丰镐考信别录》卷一《周政盛衰通考》，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27～336 页。

响。在新文化运动冲击下，西方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被逐步介绍到中国，现代中国图书馆学开始发展，逐步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20世纪初期的图书馆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社会教育机构，其主要功用就是提供馆藏，让大众使用。这种变化，使得传统藏书楼以及建立在藏书基础上的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理论也发生了变化，其实用性变得越来越重要，更多学者可以利用图书馆来进行文献学研究。图书馆的情报信息功能促进了图书目录学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一门独立学问，而与传统意义上的目录学大相径庭，目录学的实用性彰显了出来。

第三，整理国故直接推动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广泛展开。整理国故是20世纪上半期一场影响很大的学术运动，倡导者有章太炎、胡适等人。章太炎提出"国故"概念，撰写《国故论衡》一书，强调中国文化有其独立的价值，提倡研究中国过去的一切文化历史。胡适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亮出"整理国故"的旗帜，号召"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①。尽管章、胡的宗旨不同，② 但国故的载体是文献典籍，无论是批判传统文化还是赞美传统文化，都必须搜集、整理、研究古籍。整理国故客观上促进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展开和文献学研究的深入。不仅如此，整理国故还催生了科学整理方法的运用。胡适特别强调整理国故的"科学方法"，他推崇西方的科学方法，借助于清代考据学的传统，对文献整理所产生的影响，波及至今。

第四，古史辨运动促进了现代辨伪学的发展。顾颉刚的疑古工作，不仅引起人们对古籍辨伪的广泛关注，而且对于历史上的辨伪学家如郑樵、崔述、姚际恒等人，也给予关注，并展开研究。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心澂《伪书通考》一书，其编纂最初就是受了《古史辨》第一册的启迪。

---

①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

② 陈平原认为章、胡两人整理国故的策略不同，章氏重在发掘"中国特别的长处"，胡氏则是为了"捉妖"、"打鬼"；章氏强调体会古人（中国）立说的苦衷，胡氏则突出今人（西方）思想的合理；章氏主张"守旧"而后"出新"，胡氏则认定"破旧"方能"立新"。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页。

从此，疑古思潮一直影响了20世纪中国学者治学的思路。

第五，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直接促进了文献研究的进步。中国科学的考古发掘兴起于20世纪，大量考古新资料的发现开阔了文献学研究的视野，改变着人们对文献学功能及学科特性的认识。考古发现使得一些传世文献可以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这对于全面深入认识中国文献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考古收获还对传统文献辨伪产生巨大影响，对于人们重新审视古籍的价值提供了参考。借助于出土文献，"对古籍辨伪从方法论到具体结论，进行一番科学的检讨，使我们对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发展"①。由此，李学勤还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昭示着与顾颉刚疑古思想不同的文献研究新观念的出现。另外，考古发现还使文献研究开拓出新领域，诸如简帛学等，丰富了文献学学科的内容。

以上是我们对中国历史文献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所作的简要梳理，皮锡瑞曾说："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② 我们联系社会环境、政治变迁和学术思潮，考察每一时期文献学思想的特点，亦从不忽视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相反，任何一种学术现象的产生，都是外部环境和内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国文献学思想的发展也是如此。"随世运为转移"，是因为时代造就了它，它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不尽随世运为转移"是因为文献学有自身的价值体系，它并不完全受时代思潮支配，相反，它有时会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时代思潮。

二、中国历史文献学思想的特点及理论贡献

在文明初期，先人们就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文献记载、保存和管理的制度，使得中国的文献保存有着制度化、规范化的传统。殷商时期，设立史官，负责记事、占卜和祭祀。其中的记事就为我们保留下来了最早的文献。到周时期，记注和保存文献的制度更加完善，当时的史官负有记注史事、掌管文献、宣达王命、占卜祭祀等职责。此后，政府部门设立专门机

① 李学勤：《新发现简帛与秦汉文化史》，见《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页。

②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5页。

构来保存图书文献，文献管理的制度不断得到发展。不仅官方重视文献保存，私家对文献的保存也极其重视，形成了中国文献学史上公、私典藏共同繁荣的局面。这些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制度系统。

除了具有完善的文献记载和保管制度外，中国古代还有完善的文献采辑制度。从殷商时期的“采诗”，到以后各朝各代自觉地采辑图籍，世世相继，绵延不断。我国历史上几乎每代成功的帝王都有征求天下图书的举动，使得政治动乱导致的散落文献重新积聚，为文献的有效保存提供了方便。正因为有这样的记载和保管文献的制度，才使得我国古代文献虽因政治动荡和自然损毁而屡遭劫难，但都能散而复聚，愈积愈多，成为世界罕见的文献大国。

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心理和文献保存制度之下，形成了中国文献及文献学思想的特点。

（一）中国古代文献的特点

其一，连续性。中国古代文献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记述整理的连续性。自文字出现以来，中国就有了连续不断的文献记载，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自然现象的种种变迁。绵延不断的文献记载不仅清晰地勾画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而且形成了数量浩繁的文献典籍。中国古代文献记述整理的连续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历史的记载连续不断。自司马迁作《史记》，以通史的方式记述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以来，从班固《汉书》开始，每个朝代都有一部正史，一直到清末，记载了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体裁的断代史、通史、专史、地方史、人物传记等等，其撰述从未中断，形成了连续不断的、有系统的、多角度、多层面的历史记载和历史文献典籍，纵向涵盖了每一个时期的历史，成为世界史学上绝无仅有的壮举。这首先是中国历史连续性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中国人重视历史经验的民族心理驱使的必然结果，更是古代文献学家珍视文化传承的文化自觉意识的必然产物。

二是对文献的整理注释连续不断。以《春秋》以及《春秋》三传——《公羊传》、《穀梁传》和《左传》为例，自它们产生以后，对它们的整理

和解读就没有停止过，出现了大量的著作。汉代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何休的《公羊解诂》，郑玄的《左传注》①，贾逵的《春秋左氏解诂》、《春秋训释》，服虔的《春秋左氏传解谊》等名作。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经学衰落，但春秋学依然兴盛，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徐彦的《公羊传疏》等，流传至今。隋唐时期，编《五经正义》，有《春秋左传正义》的编纂，陆德明《经典释文》对《春秋》三传进行注音和释义，另外有啖助的《春秋集传集注》，赵匡的《春秋阐微纂类义统》，陆质的《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辨疑》，杨士勋的《穀梁传疏》、殷侑的《公羊春秋注》、卢仝的《春秋摘微》、刘轲的《三传指要》、陈岳的《春秋折衷论》等，均为影响深远之作。宋元明时期，不仅王安石以及程颢、程颐、朱熹对《春秋》及其三传有各种评价，专门研究《春秋》及其三传的名著还有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刘敞的《春秋权衡》，胡安国的《春秋传》，王晳的《春秋通义》，孙觉的《春秋经解》，苏辙的《春秋集传》，崔子方的《春秋本例》，萧楚的《春秋辨疑》，叶梦得的《春秋考》、《春秋传》，高闶的《春秋集注》，陈傅良的《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吕祖谦的《春秋集解》、《左氏类编》、《左氏博议》，张洽的《春秋集传》，黄仲炎的《春秋通说》，吴澄的《春秋纂言》，程端学的《春秋本义》、《春秋三传辨疑》、《春秋或问》，黄泽的《三传义例考》、《笔削本旨》等，掀起一股整理、诠解《春秋》经传的热潮。清代依然名作频出，有顾炎武的《左传杜解补正》，朱鹤龄的《春秋集说》，魏禧的《左传经世》，万斯大的《学春秋随笔》，陈厚耀的《春秋长历》，高士奇的《春秋地名考略》，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惠栋的《左传补注》，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李富孙的《春秋三传异文释》，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李贻德的《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沈钦韩的《春秋左氏传补注》、《左氏地理补注》，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孔广森的《公羊通义》，焦循的《春秋左传补疏》，刘文淇的《左传旧疏考正》，刘逢禄的

① 关于郑玄《左传注》一书，王利器认为郑玄完成了一部《左传注》（见王利器：《郑康成年谱》，齐鲁书社 1983 年版，第 240 页），赵伯雄认为郑玄《左传注》并没有完成（见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4 页）。

《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廖平的《公羊解诂十论》等，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由此可以看到，历朝历代对《春秋》及三传的整理、诠释从来没有中断，尽管整理诠释的角度不同，结论各异，但由于这些整理诠解的存在，就形成了自古及今绵延不断的春秋学史。对其他典籍的研究整理也是如此。正是因为有连续不断的文献整理和研究，才保证了文献不至于散佚，文化得到了传承。

其二，广博性。所谓中国文献的广博性，一是指文献数量浩博；二是指内容覆盖面广，博综世间所有事物，横向囊括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来看一下古代文献典籍的浩博及内容的丰富。《四库全书总目》把古代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分易、书、诗、礼（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训诂、字书、韵书）10类；史部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诏令、奏议）、传记（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史抄、载记、时令、地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职官、政书（通制、典礼、邦记、军政、法令、考工）、目录（经籍、金石）、史评15类；子部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推步、算书）、术数（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谱录（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家（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杂事、异闻、琐语）、释家、道家14类；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类。据统计，《总目》著录的文献典籍，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3461种，79309卷，存目中的有6793种，93551卷。[①] 二者相加，图书超过1万种，卷数达到17万多卷，所涉及的内容更是难以用数字来说明。

据有的学者统计，在中国古代，曾出书18万部，230多万卷。[②] 就是

① 《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② 苑柏华：《从统计数字看中国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图书情报工作》1981年第1期。

现存的古籍也约有十一二万种。[①] 如此浩繁的典籍记载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彪炳千古，垂示来者。

其三，多样性。所谓中国文献的多样性，主要是指古籍整理体式的多样性。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丰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经过历代学者第相整理才流传至今的，因此中国的古书实际上大都是以古籍整理著作的形式存在的。古籍整理体式是古籍整理的外部表现形式，在几千年的文献发展史上，中国古籍整理体式不断创新，不断丰富，辩证发展，从而使我国古籍整理工作越来越完善。整理体式的多样性反映了文献内容以及外部需求的多样性。

据冯浩菲研究，中国古代古籍整理体式主要分编辑类、校释类、目录类和类书类四大类，每类下面又有众多体裁。以编辑类和校释类为例，编辑类下分集编体和从书体两种，集编体又有全集体、诗集体、文集体、诗文集体、诗选体、文选体、诗文选体、专集体等，从书体又有杂编体、辑佚体、类编体等。多样的体式反映了人们对多种文献汇编的需求，保证了各种文献汇编的完成，为保存文献提供了保证。校释类的古籍整理体式更是丰富多样，仅注释体就有传、故、说、训、解、记、义、序、注、笺、疏、证、音、章句等，另外还有故训传、训诂、音义、校注、注译、疏证、考辨、通释、广补、读本、表注、集解、纂辑、释例、图解、考证等，[②] 可谓体式多样，风格各异。这些古籍整理体式的产生，往往是在旧有的基础上，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而不断发展的，比如疏体，又称讲义体、口义体，以疏解原文大意、阐发思想内容为任务。此体实际上是由先秦传体流衍而来，两汉今文经学家的部分经说是该体的前身，到魏晋时期受到佛家义学的影响，出现了讲疏、疏注、义疏、条辨等疏体。可以说，疏体的出现既是中国注释体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影响所致。另外，各种不同的文献整理体式在运用、发展中还存在着相互补充和综合的趋势，比如故训传体、音义体、校注体等，都是由两三个单用体互相结合为用的综合体式，这样的体式越来越符合文献整理的要求，显示

---

① 谢玉杰、王继光：《中国历史文献学》，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② 以上均详见冯浩菲：《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了中国文献整理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当代文献整理的发展中，它们依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二）中国历史文献学思想的特点及理论贡献

整理文献，传承文明，是中国士人的自觉的文化意识。在文献整理的过程中，人们从来没有把这一工作仅仅看作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高悬其目标，提出了许多富有理论创见的思想观念。这里我们主要归纳一下中国古代文献学思想的总体特点。

其一，对文献典籍的敬意。中国古代学者在整理文献典籍的过程中，对古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充满了敬意，对文献典籍自身的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从而赋予文献整理工作以极其高尚的品格。

在古人看来，文献典籍的作用无所不包。袁宏说："故记载废兴，谓之《典》、《谟》；集叙歌谣，谓之《诗》、《颂》；拟议吉凶，谓之《易》、《象》，撰录制度，谓之《礼》、《仪》，编述名迹，谓之《春秋》。然则经籍者，写载先圣之轨迹者也。"①《隋书·经籍志》说："夫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② 毋煚云："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③ 胡广等人纂辑《五经大全》，其中《书经大全》云："文献者，为治之大要也。"④ 李东阳则说："夫世之有文献，大者关天下，次者关一乡，而小者关一家。其政行风教可考而知也，故国有史册，乡有传记，家有谱乘，又往往见诸制作。"⑤ 乾隆皇帝为《重刻十三经》作序云："传曰：'经籍者，圣哲之能事，其教有适，其用无穷。'……自今津逮既正，于以穷道德之阃奥，嘉与海内学者笃志研经，敦崇实学。庶几经义明而儒术正，儒术正而人才昌，恢先王之

① 《后汉纪》卷十二"袁宏曰"。

②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总序。

③ 《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上》引毋煚语。

④ 胡广等：《书经大全》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二十六《青岩诗集序》。

道，以赞治化而宏远猷。"[①] 文献包含着如此丰富的治国安邦的经验和垂示教化的思想，整理这些文献自然就是一件有裨于治道的大好事。这是文献整理者的自觉意识，显示了文献整理者自觉传承这份文化遗产的强烈愿望。

其二，崇经的思想。中国古代文献学从一开始产生，就与儒家结下不解之缘。孔子整理六经，提出一套整理典籍的理论原则，成为古代文献整理的开拓者。汉代儒学独尊，自此以后儒家六经成为专制国家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当然也就成为天下士子的必读之书。孔子及其六经不断被神秘化、神圣化。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古代文献学理论中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就是经学中心的观念。

这种崇经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中国古代图书的分类叙录中，不管是什么分类方法，也不管是官方书目还是私家书目，总是把经书放在第一位。以四分法为例，经、史、子、集，经居首位，而其他各部都是从经而来。如史籍是六经之支流，源出于《尚书》、《春秋》，记前言往行，是治世之资鉴，与经相配，可以成为治理国家的相辅相成的"道"和"器"。所谓"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②]。子部内容庞杂，但也都是圣人之教，所谓"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③] 只要能折之中道，就可以达到"兴化致治"的目的。集部源于《诗经》，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可据以"观风俗，知厚薄"，也关系到专制政治的盛衰。所谓"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④]。可以说，史、子、集都源于经，这是整个古代社会知识阶层的共同认识。在史部，正史排第一，因为"正史体尊，义与经配"[⑤]。在子部，儒家总是排在

---

① 鄂尔泰等：《国朝宫史》卷三十五《重刻十三经御制序》，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70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子部总叙》。

③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总序。

④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总序。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正史类小序》。

第一，因为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①，“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与经史旁参”②。在集部，诗文是正宗，所反映的依然是以经书为中心的思想观念。

可以说，自《七略》以后，经始终被列于目录的首位，其目的就是充分肯定儒家思想在政治教化和人伦纲常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是儒家思想在整个专制社会中正统地位稳固的表现。

二是人们在思想上对经的极度崇拜。经书不仅是统治者政治治理的依据，也是普通人做人行事的准则。在很多人眼里，六经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③。“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④。“六经者，先王之遗烈，圣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习性文身哉!”⑤“六经者，圣人之言，孔子所发明，天人之极也。《史记》道成败得失，亦足以鉴，然谬于是非，非六经比”⑥。“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⑦。“《易》、《书》、《诗》、《礼》、《春秋》，圣人所以经纬天地者也。上之可以淑世，次之可以治身，于道无所不通，于义无所不该”⑧。六经乃圣人精神之所寄，是“万世之极则”。现实生活中的崇经心态和图书分类叙录相呼应，形成了中国古代文献学思想中的崇经观念。

---

①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子部总叙》。

③ 《汉书》卷八十一《匡衡传》。

④ 《文心雕龙·宗经》。

⑤ 《魏书》卷八十四《常爽传》。

⑥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四《薛戎传附薛放传》。

⑦ 《东原文集》卷十《古经解钩沉序》，见《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77页。

⑧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一《抱经楼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36页。

其三，文献整理与义理阐发相统一的观念。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所谓考据与义理之争。今古文之争、汉宋学之争等等，实际上都是考据与义理之争的具体反映。而考据和义理，则是文献整理和思想阐发的具体体现，二者共生并存，既有争斗，更多的则是相互融合，不可分割。文献整理是思想阐发的基础和依据，思想阐发是文献整理的目的和归宿。对此，古人不仅有实践，而且有认识。

段玉裁评述戴震的学问之道云："先生之治经，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间，惑矣。"[①] 论述了戴震考证文献与精通义理相统一的治学风格，并指出戴氏进而施政利民、垂世立教的思想境界，批评了那种认为戴震治学斤斤于一事一物繁琐考证的不正确认识。

在文献学研究领域，人们对文献学家文献整理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关注很不够，甚至有人认为文献学家有为整理而整理、为考据而考据的倾向，这种看法很不全面。文献学家自己就指出考据与义理、文献整理与思想阐发是相互需要的。王鸣盛曾把学问分为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四类，认为义理最为重要，是根，考据与义理不可分割，是干。他说："孰为重？义理为重。天下未有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能长久者也。虽然，豫章之才，刈其干而徒存其本，可乎哉？执滥氐而曰江尽是，执泑泽而曰河尽是，岂不为大愚乎？是故义理之与考据，常两相须也。"[②] 在王鸣盛看来，义理是高高在上的理想境界，但这种义理不是凭空得来的，是通过考据等文献整理的手段而获得的，义理不能脱离文献考证而独存，义理阐发和文献考证相互需要，不能断为两截。这是绝大多数文献学家的观点和看法。阮元、钱大昕也都对文献考据和义理阐发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

① 段玉裁：《经韵楼集补编》卷上《戴东原集序》，见《经韵楼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70页。

② 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二十五《〈王慧思先生文集〉序》，续修四库全书本。

钱大昕说："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①] 阮元也说："训诂不明则圣贤之语必误，语尚误，遑言其理事乎。"[②] 事实上，就是历史上那些鄙视文献整理的学者，在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时依然离不开对文献的疏解，不做文献的工作而径直构建自身思想体系的学者是没有的。

由此可见，文献学家们有着很高的理想，他们把探求义理、阐发思想、构建思想体系悬置于学术最高地位。但这种构建又是以文献考证、训诂、校释、疏解等为基础的。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一系列的考证、训诂、校释、疏解等文献整理的手段，才能彰显经籍中的义理，从而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报效国家，淑身自立。

其四，文献整理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意识。经世致用是文献学家从事文献整理研究的终极目的，他们把文献工作和崇高的理想信念联系在一起。孔子感到"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所以决心"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③]，整理三代文献，达到"复礼"的政治理想。宋代林亿在校勘《黄帝内经素问》时特别强调校勘工作的社会意义，指出经过校勘，"舛文疑义，于是详明。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施于有政，可以广生于无穷"[④]。清代全祖望七校《水经注》，原因就是《水经》及注乃是一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著作，校理《水经》及注，就是为了经世致用。他在"五校本题词"的结尾，引朱郁仪《〈水经注〉序》中之语，说"有国有家者，使能因是《水经》之理，引申触类，以施于政，何患不地平而天成乎"！而要想把《水经》经世致用的作用发挥出来，首先必须有一个

---

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75页。

② 阮元：《研经室一集》卷一《释门》，见《研经室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3页。

③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④ 林亿：《校正黄帝内经素问序》，见《黄帝内经素问》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善本，由于当时“《水经》今亦无善本”，导致“读误本《水经》而不知正”[1]，有鉴于此，全祖望才尽其所能，通过校理《水经注》，为世人提供一个善本，以便应用。整理文献以经世的思想，在典藏、辨伪、目录等领域，都有所表现。

和私家文献整理相比，官方整理文献的政治目的更加明显。唐太宗时期，高度重视儒学在巩固统治秩序中的作用，为此，统一儒学经典的文本，进而统一这些经典的经义，就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于是就有了《五经正义》的颁行。把五经写成定本，统一解释，“令天下传习”，借以统一思想，政治目的非常明显。清雍正时期，官方编纂《诗经传说汇纂》，雍正皇帝序云：“朕惟诗三百篇，先王所以明劝惩而行黜陟，盖治世之大经。而后世文人学士，乃以风云月露之辞，自托风雅。学经者又溺于训诂词章之陋习，乌在其能明先王之道也。我皇考指授儒臣，勒为是编，期以阐先王垂教之意，与孔子删诗之旨，学于是者，有得于兴观群怨之微，而深明于事父事君之道，从政专对，无所不能，则经学之实用著，而所谓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者，亦于是乎行焉。”[2] 很明显，官方汇纂的目的是为了资治，让人们“深明于事父事君之道”，从而达到“以化天下”的目的。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更是“资治理”、“昭文治”的重大举措，“方今搜罗遗籍，汇为《四库全书》……特于文华殿后文渊阁弆之，以充策府而昭文治”[3]，“稽古右文，聿资治理”[4]。“另刊《简明书目》一编……嘉与海内之士，考订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5]。除了政治目的外，还有学术目的，乾隆皇帝说：“至于四库所集，多人间未见之书，朕勤加采访，非徒广金匮石室之藏，将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

[1]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四《水经砾溪帖子柬慎甫》，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53 页。

[2] 《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雍正序，见《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一日上谕》。

[4]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上谕》。

[5]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上谕》。

也。"① 学术目的因政治目的而衍生，二者相辅相成。无论是政治目的还是学术目的，其最终都是"资治理"。

再就经学来讲，整理、训释、注解、研究经书，无疑要对经典作出自己的解释，这种解释往往和政治教化联系在一起，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由于对于经书的解说，直接关系对儒家圣贤的思想及伦理教化的体认，因此，历史文献学便成了思想斗争中有力的武器，并被涂上了浓重的政治和伦理的色彩。"② 事实正是如此，由于儒家经典的尊崇地位，许多思想家都以阐述儒家经典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政治观点。又由于古代学术与政治总是纠结在一起，因此，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乾嘉考据学等的互为反动，一个取代另一个，无不与文献学的研究密切相连。就是同一时期的学派之争，诸如汉代经学中的今古文之争，宋明理学中的朱陆之争等，也无不与文献阐释有密切关系。

其五，求真求实的文献整理观。求真求实是中国文献整理的优良传统。实事求是，言必有据，是文献学家恪守的准则。比如辨伪考信，首要目标就是要恢复古籍的本来面目。孔子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司马迁的"疑则传疑，盖其慎也"，王充的"疾妄求实"，刘知幾的"疑古"、"惑经"，欧阳修的疑古辨伪，朱熹的辨伪思想，胡应麟的辨伪理论，清代的阎若璩、姚际恒、崔述等的辨伪活动，虽立言有异，角度不同，但都是为了求真，是为了探究历史的真实。王充在《论衡·对作》中说明他作《论衡》的目的："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雕文饰词，为奇伟之观也。"又说自己所从事的是"订其真伪，辨其实虚"的工作，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一日上谕》。

② 杨燕起、高国抗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

之化日以孳矣"[①]。叶适也说："考索必归于至实。"[②]

文献校勘的目标也是求真。颜师古在注《汉书》时，对《汉书》进行了必要的校勘，提出要通过"曲核古本"，达到"归其真正"、"克复其旧"的目的。[③] 自此以后，凡校勘文献者，均以此为目的。到清代，段玉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深入论述："夫校经者，将以求其是也。"[④] 把校勘当作求得经书之"是"的手段。段玉裁的"是"既有经书文字形式上的正确无误，也有经书内容及思想的正确无误，但不管怎样，在段玉裁看来，校勘的第一步就是首先求得底本的正确。黄廷鉴也指出，古人校勘，目的是为了正本清源，恢复古籍的原貌，所谓"注存旧本，不没其真"[⑤]。"归其真正"、"克复其旧"的看法一直被文献学家所接受。他们坚信，只要"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⑥]，就能够复原古籍面貌，为人们研究历史提供一个可靠的本子。这一思想被后世学者继承下来，胡适就说："校勘之学起于文件传写的不易避免错误。文件越古，传写的次数越多，错误的机会也越多。校勘学的任务是要改正这些传写的错误，恢复一个文件的本来面目，或使他和原本相差最微。"[⑦]

文献整理的过程就是复原文献真实的过程，而恢复文献的原文和作者的原意，是为了保证被记载的历史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保证作者真实思想在后世的传递，从而使后世之人不被错误的历史或思想所欺骗和愚弄。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求真求实的文献整理观常常和统治者的政治目的相抵牾。在专制制度的强权之下，求真往往会被置于实用的刀俎之下，

---

① 《论衡·对作》。

②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九《春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7页。

③ 颜师古：《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④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十一《答顾千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98页。

⑤ 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卷一《校书说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⑥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中国书店1987年影印本。

⑦ 胡适：《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见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七）·说儒》，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

求真的观念不得不大打折扣。乾隆间修《四库全书》，对“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①]，此乃政治目的扭曲求真思想的最好的注脚。带着政治的有色眼镜从事文献纂辑，求真还能从何谈起呢？

张元济曾说：“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②] 文献承载的是国家民族的精神，家国存亡，旧邦新命，都与文献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文献学思想内涵丰富，与古代史学、哲学、经学、文学等思想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构建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总体风貌。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在从事具体的文献整理活动的过程中，“道不离器”，对自身工作进行了多层面的理论反思。但是，由于文献学家从事的大多是文献考证、校勘、辨伪、辑佚、注释、汇纂等琐碎的文献整理的工作，其精辟的思想见解很容易湮没于看似零散的具体的文献考校之中，他们所阐扬的求真求实、推求义理、经世致用、尊经重史等思想，大多隐藏在繁琐的文献研究的背后。我们要想窥知其思想精华，首先必须摒弃那种将文献考证与思想阐发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把零碎而琐细的文献考证与考证背后所闪现出来的思想精华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揭示文献整理研究背后蕴涵的丰富的思想内容，这恐怕是进一步认识中国文献学思想的价值与贡献的需要，更是深入认识中国文献学思想的民族特点的需要。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② 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张人凤编：《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857 页。

第一章
文献、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思想

研究历史文献学思想，首先碰到的是对文献、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思想的理解。尽管古往今来，文献研究硕果累累，但是，什么是文献，文献学的内涵究竟如何，历史文献学思想的特点是什么，这些都是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古代文献学遗产的基础上，谈些自己的看法。

第一节　文献与文献传承

文献学研究的对象是文献，文献的界定涉及文献学的本质内涵。考辨文献含义的演变，对阐明我们的研究对象，确定文献学的本质及文献学思想的特点，都有极大的帮助。

自古迄今，对“文献”一词的理解一直存在很大差异，或指典籍，或指典籍与口耳相传的资料，或指典籍与贤才，或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文献学思想的探

讨与总结，因此需要进行仔细梳理，认真辨析。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出现“文献”一词的是《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① 可以印证这段话的是《礼记》的记载，《礼记》云：“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② 这段话虽然没有提到“文献”二字，但《夏时》、《坤乾》皆为古代典籍，所指更为明确。

对于《论语》中的“文献”一词，后世学者不断有所诠解。汉代大经学家郑玄注释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③ 在这里，郑玄以“文章”与“贤才”来诠释“文”与“献”。从此，文献指典籍与贤人的含义广为流传，为学者所熟知。何晏《论语集解义疏》云：“文，文章也；献，贤也。言杞宋二君无文章贤才，故我不足与成之。云足则吾能征之矣者，若文章贤才足，则吾岂不与成之乎？故云足则吾能征之矣。”就是秉承了郑玄的旨意，把“文”释为“文章”，“献”释为“贤才”。

颜师古在解释《汉书·艺文志》中引孔子的那段话时这样说：“征，成也。献，贤也。孔子自谓能言夏殷之礼，而杞、宋之君，文章贤材不足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礼也。”在颜师古这里，“文献”为“文章贤材”。宋代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这样解释“文献”：“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④ 朱熹释“献”为“贤”，此“贤”为贤才还是贤才的言论，不甚明了。

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在其所编《文献通考》一书中对文献的解释与郑玄有所不同，他把史书记载中的叙事和论事分开，指出与叙事对应的是

① 《论语·八佾》。
② 《礼记·礼运》。
③ 引自何晏：《论语集解》，见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④ 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88页。

“文”，与论事对应的是“献”：“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① 在马端临看来，“文献”显然包括以下几种含义：一是正式印行的典籍，即经史、历代会要、百家传记等，此即“文”；二是未正式结集印行的官僚名士的零散章奏、诗文、谈话记录、采访笔录等，此即“献”。无疑，郑玄与马端临对“文献”一词的理解是不同的，分歧主要在于对“献”的诠释不一样，郑玄释“献”为贤才，马端临释“献”为贤才的论议记录。但是，当今很多学者在使用“文献”一词时，并未很好地辨析马端临与郑玄的不同，人们习惯于首先叙述郑玄的诠释，然后归结为马端临的定论，至于“献”的确切含义是什么，郑玄之论与马端临之说谁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则很少有人做认真的辨析。

清代学者刘宝楠《论语正义》云：“文谓典册，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子贡所谓‘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皆谓贤也。”此说比郑玄只把“献”泛泛释为贤人的说法更为具体。近代学者刘师培认为郑玄“其说似非”，马端临的说法也是“歧中之歧”。他列举了《虞书》、《周书》以及汉碑、大传等的记载，从文字学的角度指出：“仪、献古通……文献即文仪也，书之所载谓之文，即古人所谓典章制度也；身之所习谓之仪，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刘师培还进一步指出：“仪字之谊，与容止同。礼之揖让、周旋、进退、屈伸，乐之有舞，诗之有颂，均该于仪。”由此，刘师培云：“一代有一代之礼，即有一代之仪。身之所习，躬之所行，莫非仪也。若夫有条目可稽，有定例可循，则谓之文，如象魏所悬、太史所掌、内史所柄是也。仪之与文，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周语义文之制也。《礼记·礼器》篇：‘义理，礼之文也。’义即仪字，以文该仪，所谓散文则通也；《论语》‘文献’并言，则见于典册者为文，见于习行者为仪，所谓对文则异也……孔子言夏、殷文献不足，谓夏、殷简册不备，而夏、

① 《文献通考·自序》，中华书局1986年版。

殷之礼，又鲜习行之人也……若郑注训‘献’为‘贤才’，则因三代礼不下庶人，习礼之人必系故族，古以知礼不知礼判贤愚，故以知礼者为贤，实即献字引伸之谊。后世以降，凡书之详列乡邦人物者，均曰‘献征’，若兼载诗文人物，则曰‘文献录’，不惟昧于献字之本谊，即古代之文章亦兼该典制言，非仅指文词，盖误承郑氏之说者也。而马端临作《通考》，亦以‘文献’为名，以臣僚奏章、诸儒评论为‘献’，则又歧中之歧矣。”① 刘师培从语言文字学角度把“献”解释为熟悉并能够演示礼仪制度的贤士，即“习行（礼仪）之人”，此说与刘宝楠近似，比郑玄说得更加明白。

刘师培等人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后世之人对“文献”的理解依然存在不少的分歧。当代文献学家王欣夫指出：“（郑玄）用文章二字解释‘文’字，是容易理解的。用贤才二字解释‘献’字，是根据《尔雅·释言》：‘献，圣也。’圣之与献，是同一意义。于是‘文’与‘献’有不同的内容。据《春秋公羊传》卷一疏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可以推知，《八佾》和《礼运》所载孔子之言，是在修《春秋》时有感而发的。周有百二十国宝书，这就是‘文’，使子夏等十四人求之，这就是‘献’，周代的‘文献’都备，不能不感叹到夏殷‘文献’的不足了。”② 在王欣夫看来，“文”就是文献记载的资料，即“百二十国宝书”，“献”就是人们搜求得来的资料，即“使子夏等十四人求之”。他还指出：“孔子所谓‘文献’是对‘礼’而言的，‘礼’是什么呢？它的涵义很广……凡是一切典章制度、历史文化，无所不包。这些范围极广，积累极富的东西，要靠文章来记录。而写这些文章的，当然要靠学问渊博，熟悉典故的贤才。这辈贤才又是创造或研究典章制度、历史文化的。所以文之与献是不可分割的。因而后来凡是历史性的材料都称之曰‘文献’。”③

---

① 刘师培：《左庵集》卷三《文献解》，见《刘申叔遗书》（下），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22～1223 页。

② 王欣夫：《王欣夫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 页。

③ 王欣夫：《王欣夫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 页。

张舜徽则秉承马端临的说法，直接把“献”理解为“耆旧言论”，包括世代相承的许多传说和文人学士的一些评议等。① 董恩林与张富祥对文献则有另外的解释，董恩林指出：“‘献’有献进之义，古有‘贡献’、‘膳献’、‘羹献’等说法，‘文献’之‘献’即古代祭祀荐进之物中的‘献进之文’，子夏等得百二十国宝书进献给孔子亦属其类，故孔子有‘文献’之谓。”② 张富祥的解释更为详尽，他说：“今由甲骨文推之，‘文’的本义实指纹身，故可转指一切花纹，包括‘错画’成体的文字。‘献’的本义，按《说文》的解释，大概在初是指祭祀活动中的犬牲献，亦代指一切牺牲的进献；及祝词颂语或其他与飨荐相关的内容形于文字，写于简牍或缣帛之上献于祖宗神灵（如甲骨文的‘贡册’），则按之事物之名义，当称之为‘文献’。如是，则久而约定俗成，凡一切可成章句的文字记录，以及进而汇编成册的成文资料，也就都可称之为‘文献’。”③

由此可见，汉代以来的学者在对“文献”的解释上呈现出各不相同的情景。在他们看来，“文”指文章、典册等各类记录下来的典籍资料，没有异议。“献”或指贤才，或指贤士大夫的议论，或指熟悉并能够演示礼仪制度的贤士，或指献进之文等，说法各异。但无论“献”有多少种解释，也都离不开文字记录。所以，“献”应该是典籍之外社会贤士留下来的论议、言谈、诗文、章奏等文字资料，“文献”最终必须落实到贤人自己写下来或别人录其口述的文字资料上来。因此，“文献”应该是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文字资料。

如果进一步翻检和考察古代典籍中对“文献”一词的使用，我们对其含义的理解会更准确。自汉至唐，“文献”一词只用于人物谥号，未作它用，宋元以降的史书经常出现“文献”一词，庶几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接近。《宋史·戚纶传》云：“诏馆阁官以旧文献。”《宋史·綦崇礼传》云：“旧录修定，欲乞访求故臣之家文献事迹参照。”吕祖谦说：“昔我伯祖西

① 参见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② 董恩林：《传统文献学几个理论问题再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③ 张富祥：《宋代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垣公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而之南。"[1]《宋史·陈傅良传》曰："（傅良）及入太学，与广汉张栻、东莱吕祖谦友善，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条序。"《宋史·赵蕃传》云："丞相周必大与蕃契，屡加引荐，蕃竟不受，宰之言曰：文献之家，典刑之彦，岿然独存，犹有以系学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文天祥自称"负宇宙之志，出文献之传"[2]。谢枋得亦云："愚忝中原文献之传，颇知大节，得安定（胡瑗）体用之学，不事空谈。"[3]《元史·苏天爵传》云："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辨，虽老不倦。"以上所言"文献"者，图书文籍、圣人风教、先贤遗说，尽在其中，与马端临所言"文献"之范围是一致的，而那些饱读诗书、学识渊博、熟悉掌故的文化望族，更被看成是"中原文献之传"、"任一代文献之寄"，寄予了中华民族文化及其精神衍传不绝的深刻内涵。圣贤之言寓寄文献之中，文献承继不绝，文化传统就不会中断，联系中华民族数千年赓续不绝的文化传统，才能充分解读"文献"之真义。

明清两代，"文献"一词已成通用语汇，一是自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后，以"文献"命名的书籍屡见不鲜，而且《明史》还记载《永乐大典》这部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最初也是以"文献"命名的，称《文献大成》。[4] 二是史书记载依然大量使用"文献"一词。清代考据学发达，文献整理兴盛，因此"搜辑"、"甄考"、"刊刻"文献的记载增多。这里的文献当然是包括经史百家、山经地志、稗官野乘、图籍谱录等在内的各类图书资料。另外，此时的文献除指称图书资料外，还指称博学多识之人，如明人解缙说："而鲁之阙里，仍建叔梁纥庙，赠以王爵，而以颜路、曾皙、孔鲤配。一洗历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献，岂不盛哉。"[5]《清史稿·白奂彩传》云："同知郝斌式庐，聆奂彩论议，退而叹曰：'关中文献也！'"此处的"文献"都是指博闻多识的士人。正是这些人，保持了中华文化的

① 吕祖谦：《东莱集》卷八《祭林宗丞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卷九《除湖南宪通交代李楼峰》，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谢枋得：《叠山集》卷三《代干丞相免追箅功赏钱粮启》，四部丛刊续编本。

④ 《明史》卷九十八《艺文志三》。

⑤ 解缙：《文毅集》卷一《奏疏·大庖西封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绵延不断。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文献内涵的理解差异更大，关于文献定义的讨论非常热烈。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信息时代的来临，文献载体及传播形式增多，以往所没有的磁盘、光盘、电子图书等纷纷出现，载体形式的变化使人们对传统文献含义中的纯粹的文字记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二是受到国外信息传播和情报学的影响，加上我国自身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的迅速发展，使得文献交流、文献管理、文献利用、文献处理等一系列问题变得复杂，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也不只局限于古典文献或历史文献，所有新型的文献形式都是文献学研究的对象。三是图书情报学界的专家学者在文献工作的基础上参与到文献理论的探讨中来，他们大量运用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现代文献及文献工作，打破了以往文史学界独揽文献研究的局面。在此情况下，人们更多地注重研究现代文献的传递交流和文献信息的开发利用，开始从不同角度考察文献的本质和内涵，对文献重新进行定义，直接推动了文献学研究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文献概念研究的立说很多，谢灼华、朱宁等人曾根据学者的研究，将其归纳为最有代表性的五个方面[①]：

其一，材料论。即认为文献是具有使用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具体材料，单柳溪等人持这一说法。[②] 其二，图书文物资料论。即认为文献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邵胜定、洪湛侯等人持这一观点。[③] 其三，载体论。即认为文献是一种信息和知识载体，严怡民、周文骏、黄宗忠等人持这种说法。[④] 其四，信息知识论。即认为文献是一种信息记录，高崇谦、

---

① 谢灼华、朱宁：《20年来我国文献学理论研究综述》，《晋图学刊》1999年第3期。

② 单柳溪：《文献诠释》，《文献》1986年第1期。

③ 分别见邵胜定《说文献》（《文献》1985年第4期）、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④ 分别见严怡民《情报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6页）、周文骏《文献交流引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黄宗忠《文献信息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朱孟杰、贺修铭等人持这一观点。[1] 其五，结合论。即认为文献是载体形式与知识内容的结合体，朱建亮、高家望等人有这种看法。[2]

以上有关文献的五种定义，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传统文献涵义基础上的扩展，材料论与图书文物资料论即属此类，文史学界的学者多持这一观点；一类是受图书馆学、情报信息学影响的现代文献的概念，载体论、信息知识论、结合论即属此类，图书情报界的学者多持这一观点。二者侧重点不同，看法自然有很大差异。

可以说，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文献载体的不断增加，人们对文献需求方式的不断变化以及图书馆学、信息学、符号学、情报学等理论对文献学研究的不断渗透，人们对文献的物质属性、信息属性和社会属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现代信息社会的大背景下，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文献是一切信息（information）的载体，信息是一切文献的内容。更有一些著名学者甚至预言世界将要进入无纸化社会系统，这些都是刺激人们重新界定文献内涵的原动力。我们说，文献学必须与时俱进，文献的含义也一定要反映时代的内容，我们不能将现代文献与传统文献割裂开来，也不能忽视二者之间的区别。实际上，传统文献学内涵极其丰富，无论技术层面还是思想层面，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总结。

第二节　文献学的发展与历史文献学的架构

中国古代文献整理与研究起源甚早，但一直只有“校雠学”的说

---

① 分别见高崇谦、朱孟杰《文献检索基础》（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 页）、贺修铭《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教程》（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 页）。

② 分别见朱建亮《论文献观》（《图书情报工作》1986 年第 6 期）、高家望《文献的认识论及其定义》（《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88 年第 1 期）。

法，没有“文献学”这一称谓，“文献学”一词产生于近代，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也是在近代。随着文献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论争也一直没有停止，使这门古老的学问不断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一、中国古代的文献整理与校雠学

从逻辑上讲，有了文字，就应该有了用文字记载的文献，文献与文字是同时产生、相随发展的。有了文献，就应该有了对文献进行搜集、整理、研究和利用的文献学。而实际上，尽管汉字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仰韶时期陶器上的简单文字，但见于历史记载的文献，也只能追溯到夏商时代，所谓“有夏商之嗣典”[①]，“惟殷先人，有典有册”[②]。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我国最早的文献，也只能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了。关于文献整理的记载就更晚了，史载，我国最早的文献整理家是孔子的先人、周宣王时宋国大夫正考父，《国语·鲁语下》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可见，由于文献典籍在流传中难免发生散佚错乱，对文献的整理便自然而然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但正考父的校理方法如何，提出了什么样的文献整理思想，不得其详。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献学产生于孔子。孔子不仅整理六经，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与文献整理相关的观点和方法，因之被称为古文献学的开拓者。[③] 自此以后，搜集、整理、研究、考证、编纂、注释等文献整理活动蔚然成风，涌现出了众多文献大家，绳绳相继，史不绝书。他们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总结了有益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启迪后人的思想和观念，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按照现今通行的学科定义，尽管中国古代文献整理之风甚盛，但并没

① 《国语·晋语四》。
② 《尚书·多士》。
③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有“文献学”这一概念。[①] 张舜徽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②] 校雠，又称雠校，起于刘向校书，“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③]。刘向时代，校雠已有“学”的因素，因为刘向的校雠方法不仅包含校勘，诸如备众本、订讹误、删重复等，还包括目录，诸如定书名、分部类、叙源流、撰叙录等，只是他没有进行系统理论总结而已。

校雠学真正成为一门学问，还是自宋代的郑樵开始。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系统阐述了校雠学理论，总结了校勘、辨伪、目录、典藏等文献整理的方法。可以说，校雠的含义从校勘扩大到文献学，与郑樵对校雠概念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郑樵的校雠学理论涉及求书、校书、分类和编目等内容，吴怀祺先生曾把郑樵校雠学的内容归纳为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搜求图书的认识和方法。（二）校订书籍的要求。（三）书籍著录的写作。（四）编次图书，写成书目。”[④] 郑樵治学，最重会通，所谓“会通之意大矣哉”[⑤]。也正因为此，郑樵校雠学的诸方面内容都是相通的，自成一个系统。

搜求图书是郑樵校雠学的重要内容，在《通志·校雠略》中有多篇论

---

① 明代有“文献之学”的说法，如宋濂在《文宪集》卷二十三《进贤朱府君碣》中云：“梦炎通历代文献之学如指掌，礼乐家赖之。”俞汝楫在《礼部志稿》卷五十一《尚书朱梦炎列传》中也说：“梦炎博学善记，通历代文献之学如指掌，朝廷稽古、议礼、审学，皆有力焉。”谢铎在《中书舍人孝庄王先生墓表》中则说：“忠文公之祖南棱先生，实得晦翁再传之学于叶通斋由庚，以授黄文献公溍，至忠文公又得文献之学而益显。”（见《明文海》卷四百三十）这里的“文献之学”含有历代文献图籍、掌故典制的意思，与前面提到的“文献之传”有相通之处，并非作为一门学问的“文献学”。

②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③ 《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

④ 吴怀祺：《郑樵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⑤ 《通志总序》，见《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

述涉及书籍的散佚及求书的方法。在这些篇章中，郑樵首先讨论了亡书的存在状况：一是"有虽亡而不亡者"，即"名虽亡，而实不亡者也"；二是"有不出于当时而出于后代者"；三是"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郑樵对散亡之书存在状况的分析，"其见甚卓"[①]。在此基础上，郑樵主张政府要专门派遣求书之官求书，"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②]。此外，郑樵还总结出"求书八法"[③]，并强调"当不一于所求也"，即不能拘泥于一种求书方法，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方法求书。郑樵的求书理论成为后世辑佚学的理论依据之一。求书是第一步，校勘是第二步，"求书之官不可不遣，校书之任不可不专"[④]。由于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很少直接提到校正字句篇章的讹误，于是有的学者就认为郑樵的校雠学不包括狭义的校雠，即校勘。[⑤]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当时雕版和活字印刷术比较盛行，书籍中文字的脱、衍、误、倒等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对这些错讹文字的校勘也就颇为流行。郑樵"考证之勤"，当然包括文字校勘。郑樵的校书在校勘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把传统的狭义校雠学传下去，发展成为独立的校勘学。校勘之后是分类编目，郑樵认为，书籍的分类编目，关键是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谓"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⑥] 分类编目明学术源流，是郑樵的一贯主张，他说："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⑦] 他的这种分类编目的思想就成了目录学理论的基础。由此可见，郑樵的校雠学实际上包含辑佚、校勘、目录等多个文献学分支，"郑樵打

① 《校雠通义通解》卷一《补郑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3 页。

②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1812 页。

③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1813～1814 页。

④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1812 页。

⑤ 如姚名达就认为郑樵"转弃狭义之校勘，而直以广义之求书、分类、编目等项为校雠学之主要任务"。见《中国目录学史·叙论篇》，商务印书馆 1998 年影印版，第 7 页。

⑥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1804～1805 页。

⑦ 《通志总序》，见《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破校雠的狭义封域，把它推衍到包括求书、校书和分类编目在内的广义范畴，直至后世将之发展到与文献学同义的概念"①。

清代章学诚的校雠学理论是最为系统的，可以称其为古代校雠理论的集大成者，《校雠通义》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章学诚对校雠学的源流和实质进行了深刻论述，指出："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实有窥见，特著校雠之略，而未尽其奥，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辩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② 章学诚认为校雠学是一门包括校订字句、排比篇卷、叙例同异、推见大体的学问，这些内容恰恰是校勘、版本、目录、编纂等在内的文献学体系。章学诚的校雠学思想精见迭出，如在图书分类方面提出"互著"与"别裁"，强调"序录"的重要，在校勘方法上提出了系统的"校勘条理"，在版本方面提出广储副本、采辑补缀、书掌于官等观点。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古代的文献学思想，是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最为重要的是，章学诚提出校雠学的目的和任务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推阐大义"，"宣明大道"。他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记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③ 章学诚的这一看法，对于我们今天的文献学研究仍是极富启发的。

另外，有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献学流派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古代"校雠学即文献学"的说法并不全面，中国古典文献学分为校雠文献学、目录文献学和广校雠文献学三大流派，三派均源于孔子的整理典籍。校雠文献学注重文献的鉴别与整理，有版本校勘学、会通校雠学、义例校雠学、考

---

① 谢贵安：《郑樵校勘学特点论要》，《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② 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卷一《信摭》，见《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页。

③ 《校雠通义》自序，见《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证学、辨伪学等，校勘是其中心；目录文献学注重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揭示与利用，有藏书目录学、史志目录学、佛藏目录学、版本目录学等，图书分类是其中心；广校雠文献学重视文献的阐释与整理、编纂，有注解正义和文献编纂整理两个方面，学科是其中心。[①] 实际上，无论把古代文献学分为几个学派，其范围都没有超出郑樵、章学诚所论定的内容，所谓的各学派对文献的研究只是有所侧重而已。

总之，中国古代虽无文献学之名，却有文献学之实，其主体就是文献整理，校勘、版本、目录成为古代文献学的三个基点。不仅如此，经过历代文献学家的发展，积淀了丰富的文献学思想遗产，特别是郑樵、章学诚等人有关校雠学的理论思考和阐述，使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古代文献学的精华。

二、文献学的提出及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论争

“文献学”一词的最早提出者是梁启超，也就是从梁启超时代，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被正式提出。1920 年，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云：“其后斯同同县有个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②] 这是中国典籍中第一次出现“文献学”这一概念，其后，他又在《治国学的两大道路》、《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法讲义》、《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多次谈及文献学，甚至提到“中国文献学”这一概念。

尽管梁启超没有给文献学下一个定义，但他对文献学的内涵进行了基本的界定。首先，梁启超认为，文献学就是广义的史学，属于国学最主要的部分，他说：“这种学问，我们名之曰文献学，——大部分是历史，但比普通所谓历史的范围更广……我们所提倡的国学，什有九属于这个范围。”[③] 又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

---

① 柯平：《论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流派》，《郑州大学学报》2002 年第 2 期。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 页。

③ 梁启超：《读书法讲义》，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55 页。

文献学。"[1] 梁氏还指出历史、文字学、社会形态学、古典考释学、艺术鉴评学等都是属于文献学的范围，并进一步指出"以上几件，都是举其重要者，其实文献学所包含的范围还有很多，就是以上所讲的几件，剖析下去，每件都有无数的细目"[2]。由以上罗列可以看到，梁启超的文献学体系还是非常粗疏的，他对文献学学科性质的界定相当模糊，对文献学内容的划分还极不准确，但是他毕竟在中西学术交汇的20世纪初期，提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文献学概念，并试图赋予它丰富的学科内容，功不可没。其次，阐释了文献整理的原则和方法。梁启超认为："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3] 对于如何搜集资料，如何鉴别资料，梁氏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谓"用怀疑精神去发现问题"、"用耐烦功夫去搜集资料"、"用冷静头脑去鉴别资料"、"用细密技术去整理资料"、"用谦虚的态度去判断问题"。[4] 梁启超的文献学思想在中西会通的学术大背景下，既充分吸纳了西方文化的新理论、新方法，又继承了乾嘉考据学在文献整理上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传统校雠学向文献学转型的重要人物，影响后世甚远。

梁启超之后，构建中国文献学新体系的重要著作是郑鹤声、郑鹤春两人于1928年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郑氏受马端临关于文献定义的影响，提出自己对文献学的认识："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制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5] 郑氏文献学有自己的体系，所谓"典籍结集为文献学上最重大之事业，故首及之。然结集而不施以审订，则无以取精用宏，择要而弃微，故审订又次之。既审订

---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

②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2页。

③ 梁启超：《读书法讲义》，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页。

④ 梁启超：《读书法讲义》，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1364页。

⑤ 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例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矣，而不能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则结集、审订皆虚事，仍不能发扬其光辉，故讲习又次之"①。由此可见，郑氏的文献学有一个环环相扣的较为严密的逻辑体系，全书共分六章，即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印制，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古籍整理的流程。郑氏还对文献研究的价值提出了看法。20 世纪初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弃本国文化如糟粕的风习出现，对此，郑氏深为忧虑，针对国人对本国文献之要略"不知所对"的情况，提出"典籍者，思想之结晶，学术所由寄也"，"中国文化之完备，世界各国殆莫之享，此为中国文明之特色，即典籍之完美也"。② 中国有丰富的文献，记载着中国灿烂的文明和光辉的历史，绝不可妄自菲薄。整理研究文献，就是要发掘文献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更为可贵的是，郑氏还提出"中国文献之世界化"的命题。在他看来，中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文化灿烂，对人类文明贡献巨大，舍弃中国文化而言世界文化，是极不全面的。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整理与研究不予注意，那么要西方文化界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研究，自然是困难的。其编纂《中国文献学概要》，就是要达到"考文献而爱旧邦"的目的，这种维护传统优秀文化的精神令人敬仰。今天看来，该书的文献学体系依然有很多的缺陷，但作者对文献、文献学诸多问题的看法，仍然富有新意，代表了当时人们对新旧文献学的认识水平。

与此同时，史学大师陈垣先生在进行史学研究的同时，结合自己历史研究的实际，充分吸收乾嘉考据学的文献考据的经验，用科学的方法系统总结了具有法则和范例的、可以操作和传授的文献学的各门专学，其中尤以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最为典范，出版了《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史源学》等著作，从而不断丰富了文献学的学科内容。

20 世纪 30 年代左右，以"校雠学"命名的著作也有不少，代表作有刘咸炘的《校雠述林》、《续校雠通义》，杜定友的《校雠新义》，胡朴安、胡道静的《校雠学》，一直到 1945 年，张舜徽还撰写了《广校雠略》。这些

---

① 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例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 页。

著作的内容与梁启超、郑鹤声等人所提倡的文献学的内容没有太大不同，只是沿用了古代校雠学的名称，属于“旧瓶装新酒”。

20世纪上半叶，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文献学家，除上述人物外，还有史学大师王国维、顾颉刚以及罗振玉、孙毓修、刘纪泽、姚名达、汪辟疆、余嘉锡、陈登原、蒋伯潜、钱基博、蒋元卿等人，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典藏学等领域另开新篇，丰富了文献学理论，为我们今天的文献学体系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由于古籍整理成绩斐然，[①] 直接推动了文献学学科理论的发展。1982年，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及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接着，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罗孟祯的《古典文献学》以及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新编》等书先后出版，对有关古文献的源流、分类、考证、注释、版本、校勘、流通、辑佚、辨伪、编纂等作出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为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随后，又相继出版了一批文献学著作，[②] 这些著作对于扩展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促进文献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文献学研究的展开，使得文献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也有了飞速发展，在目录

---

① 20世纪后半叶古籍整理的主要成就有：《四库全书》系列，二十五史系列，综合性丛书系列，历代诗文的整理，十三经系列，诸子系列，理学系列，佛道系列，少数民族古籍等。另外还有数千种古籍单行本的点校出版。

② 主要著作有倪波主编《文献学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王燕玉著《中国文献学综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玉勤等著《实用文献学》（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陈界、张玉刚主编《新编文献学》（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熊笃、许廷桂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潘树广等著《文献学纲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杜泽逊著《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版），刘青松著《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要》（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牟玉亭著《中国古典文献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董恩林主编《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学研究[①]、版本学研究[②]、校勘学研究[③]、辨伪学研究[④]、辑佚学研究[⑤]、出版史研究[⑥]、藏书史研究[⑦]、文献学史研究[⑧]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

① 代表作有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 1981 年版），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编《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罗孟祯《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重庆出版社 1983 年版），昌彼得《中国目录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86 年版），彭斐章《目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周少川《古籍目录学》（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高路明《古籍目录学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齐鲁书社 1998 年版）以及大量的专科目录学、地区及单位古籍目录、专题目录、目录学史、目录学理论等方面的著作。

② 主要有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中华书局 1962 年版），屈万里、昌彼得《图书版本学要略》（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9 年版），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戴南海《版本学概论》（巴蜀书社 1989 年版），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齐鲁书社 1998 年版），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以及版本鉴定等方面的著作。

③ 主要著作有戴南海《校勘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钱玄《校勘学》（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王云海《校勘述略》（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管锡华《校勘学》（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林艾园《应用校勘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齐鲁书社 1998 年版）等。

④ 主要著作有郑良树《古籍辨伪学》（台湾学生书局 1986 年版），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司马朝军《文献辨伪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等。

⑤ 主要著作有曹书杰《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等。

⑥ 主要著作有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2 年订补本），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 1984 年版），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以及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等。

⑦ 主要著作有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典藏编》（齐鲁书社 1998 年版），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 2001 年版），傅璇琮主编《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出版社 2001 年版），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等。

⑧ 主要著作有王余光《中国文献学史要略》（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 1994 年版），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等。

成就，成果丰硕，盛况空前。[①] 与此同时，因古籍整理工作的迅速开展，对古籍整理理论与方法进行总结的著作也不断出版，黄永年的《古籍整理概论》，冯浩菲的《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来新夏的《古籍整理讲义》，刘琳、吴洪泽的《古籍整理学》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讨，古典文献学由最初的目录、版本、校勘三方面的内容逐渐扩大到版本、目录、校勘、注释、整理、鉴别、流传、辨伪、辑佚、典藏、编纂等多方面内容，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知识体系渐趋成熟。

就在古典文献学的学科知识体系渐趋成熟的同时，其理论建设也引起专家学者的注意，周少川先生率先提出"文献学概论"的设想，指出文献学概论以古典文献学（即广义历史文献学）的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只探讨理论方面的问题而不作基础知识的阐述。比如在论述文献学研究的历史发展时，要把视角放在探讨文献增长演变与社会需要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上，去摸索文献与文献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规律。同时要把文献学研究的历史发展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考察传统文化的土壤如何发生、发展了文献研究，考察文献研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影响和作用。[②] 周少川先生所提出的文献学理论建设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研究传统文献学思想，总结几千年文献学思想的成就，富有启发意义。

随着文献学研究队伍的扩大，图书情报工作者纷纷加入文献研究领域，学科角度的不同导致人们对文献学学科体系认识的不同。有学者把 20 世纪以来的文献学研究划分为古典文献学、现代文献学、专科文献学和综合文献学四大部分。[③] 其一，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其代表人物除了 20 世

---

① 详见蒋宗福：《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研究综述（1978—2005）》，《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 年第 4 期。

② 周少川：《浅谈建立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五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82～383 页。

③ 详见王余光、汪涛、陈幼华：《中国文献学理论研究百年概述》，《图书与情报》1999 年第 3 期。

纪上半叶的郑鹤声、陈垣之外，主要有张舜徽、吴枫、王欣夫、罗孟桢等。这一体系认为文献学是以图书分类、目录、版本、校勘、注释、辨伪、辑佚等为研究对象。各家虽有所侧重，但大同小异，基本上是在继承传统校雠学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成。其二，现代文献学学科体系。其内部有着众多的分支体系，诸如图书馆文献学体系、情报文献学体系、文献科学系统论、文献结构论、文献工作体系论、文献交流体系论等。这些分支体系实际上是适应现代图书档案情报的各种活动而构建的。其三，大文献学理论体系。其主要的特点是将各种专科文献学纳入文献学理论体系中，其体系包括文献生产学、文献流通学、文献整序学、文献利用学等。其四，专科文献学体系。主要有历史文献学体系、古典文献学体系以及各种专科文献学体系等，[①] 诸如实用文献学、理论文献学、简帛文献学、文献传播学、文献计量学等，名目繁多，让人眼花缭乱。

各家学说，相互争论，盛况空前，但是，在貌似学术繁荣的背后，我们也应看到，这样的探讨似乎陷于越来越混乱的状态之中，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内容越来越庞杂，分类越来越模糊。

三、历史文献学的架构与思想趋向

鉴于学术界讨论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混乱，我们有必要对我们的研究对象作一番辨析，以利于研究的展开。在本书中，我们所讨论的文献学是历史文献学，所总结的文献学思想也是历史文献学思想。文献学学科体系讨论中的古典文献学[②]庶几与我们的讨论对象相一致。至于现代文献学，由于现代文献多渠道产生、多功能转换及迅速传递、直接产生社会效用的特点，与历史文献有根本的区别，所以我们把现代文献归入图书情报学的范畴，把它与历史文献区别开来，不在我们的考察之列。

---

① 详见陈光华：《关于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研究综述》，《图书馆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② 周少川先生认为古典文献学就是广义历史文献学，见《浅谈建立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五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2页。

较早对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进行理论探索的是白寿彝先生。白先生首先论述了历史文献学学科建立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研究历史，必须要研究历史文献。既然要研究文献，就需要建立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历史文献学可以帮助我们搜集、分析并正确地运用历史文献，使我们的历史工作在文献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由此他提出建立“科学的历史文献学”①。其次，白先生阐述了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及内容。白先生认为，历史文献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历史文献的研究是史学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但也只是史学的一部分”②。对于历史文献学的内容，白先生认为可以包含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③ 按白先生的论述，理论的部分包括历史和历史文献、历史学和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作为史料的局限性、历史文献的多重性、历史文献和有关的学科等；历史的部分就是“对历史文献学的进程及其规律给予总结，对其优良的传统和成果予以继承和发展”④；分类学的部分，“是如何就历史文献本身的各种不同的性质、特点进行分类的学问，是从文献本身出发的，而不是从前人目录书出发的”⑤；应用的部分，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这和我国传统的校雠学研究范围大体相同。白先生所厘定的历史文献学的四部分内容，实际上就是对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论述，这一体系突破了传统的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的范围，而作了更加宏阔的思考，对历史文献学科发展影响深远。

---

① 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见《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7～508页。

② 白寿彝：《再谈历史文献学》，见《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14页。

③ 白寿彝：《再谈历史文献学》，见《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58页。

④ 白寿彝：《再谈历史文献学》，见《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1页。

⑤ 白寿彝：《再谈历史文献学》，见《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8页。

继白寿彝先生之后，刘乃和先生对历史文献学的价值、意义、内容及理论建设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进一步完善了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她指出："文献的研究在文史研究中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的。无论研究文学，还是研究史学，文献学都应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的、必须掌握了解的学问，不是可有可无。为什么这样呢？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做文史研究必须掌握文献学，因为它是文史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二是对文献本身的研究就是文史研究工作中的一部分。"刘先生特别提到建立文献学理论体系的问题，她强调文献研究有纵横两个方面的内容，就纵的方面讲，"历史文献本身，也有其自己的发展变化的过程。文献学科自身，由小到大，由无到有，由浅及深，由简及繁。文献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人类文化史、文明史发展的重要一页"；就横的方面讲，"历史文献学包括的内容极丰富，有些人认为应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注释、考证等等"。一纵一横，构成了历史文献学的内容体系。对于当时学术界所争论的历史文献学和古典文献学的区别，刘先生有通达的看法，她说："这里我先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各种文献，都可称之为历史文献，不必分为历史文献和古典文献。为了工作上方便，这样说自然也无不可。其实文史本身就是相通的，学历史的不能不通文学，文学资料同样也是重要的历史资料。而且古人写东西时，也没有分为这是历史文献，那是古典文献。为了工作可以有所侧重，不能截然分开，分得过细，使用时就不易相通，局限性太大。章学诚所说的'六经皆史'，表达了他对文史、文献认识上的卓见。"[①] 历史文献学和古典文献学，除了一个侧重整理历史文献，一个侧重整理文学文献外，在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手段等方面都没有什么不同。因此，遵循刘先生的看法，我们在总结文献学思想时，就不再作此疆彼界的区分，而是放在一起讨论。

就在白、刘两位先生讨论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时，一批历史文献学著

---

① 以上均见向燕南：《刘乃和教授谈当前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史学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

作先后问世，[1] 这些著作虽风格各异，但从它们所涉及的范围，可以看出历史文献学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文献学史，即对中国历史文献研究进行“史”的梳理和总结；二是对文献整理方法的研究与总结；三是对历史文献的归纳与分析，即探讨历史文献的编纂、价值、类别、体裁等；四是对历史文献分支学科，诸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等的探讨。

与此同时，有关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人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冯浩菲撰文指出，文献学是一门具有边缘性、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由于文献学的交叉性特征，在根据文献学上所规定的研究范围、方法、理论等分别研究各门学科的文献时，就出现了专科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曾经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献学，但随着专科文献学著作的不断出现，历史文献学的专科文献学性质和地位逐渐形成定局。[2] 张子侠也撰文指出，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一门以历史文献及其整理研究工作为研究对象的，以复原、求真和致用为主要任务的专科文献学。它从属于历史学，具有综合性、基础性和实践性的突出特点。[3] 赵振则撰文指出，由于“历史”一词的含义具有模糊性，既可指时间概念，又可指历史学科，这是导致人们对历史文献学学科地位认识不一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主张在学科概念上使用“历史”一词，所谓“历史文献学”应该指“史学文献学”或“历史学文献学”，这样才能与专科文献学的内涵相一致，与文学文献学、经济文献

---

① 重要的有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张家璠、黄宝权《中国历史文献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杨燕起、高国抗《中国历史文献学》（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张大可《中国历史文献学》（陕西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谢玉杰、王继光《中国历史文献学》（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学苑出版社 2001 年版）等。

② 冯浩菲：《中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学术界》2000 年第 4 期。

③ 张子侠：《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基本理论的几点认识》，《安徽大学学报》2005 年第 4 期。

学等等并列。[1]

迄今为止，有关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及学科定位的讨论依然没有停止，这些讨论对于推进文献学学科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认识古代文献学的思想内涵具有启发意义。

第三节　历史文献学思想的内容

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对历史文献学思想的发掘。中国有着丰富的文献典籍，有着几千年整理文献典籍的历史。在文献典籍的整理、研究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文献学思想。正是这些思想又进一步指导了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那么，历史文献学思想包含哪些内容，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体系，就成了我们在开展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之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历史文献学思想内容丰富，归纳起来，有两个大的部分：一是文献学家（包括史学家、思想家等）对文献本身的认识，二是对文献学活动及工作的认识。

其一，对文献本身的认识。这部分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诸如对文献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和作用的认识、对文献史料价值的认识、对文献之间重要程度的认识、对文献外部形式（编纂体裁、体例、版式等）的认识等。

比如对文献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和作用的看法。文献典籍既是对自然世界、人类社会的描述，又是人类思想的结晶，因此古人对文献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和作用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前引《隋书·经籍志》云："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

---

① 赵振：《试论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及教材建设》，《河南图书馆学刊》2006年第2期。

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就是对文献典籍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和作用的深刻论述。

再如对文献史料价值的认识。文献典籍不仅具有社会意义层面上的作用，它还有学术层面上的作用，即具有史料价值，包含着历史事物的各种信息。不仅经史文献如此，一些“偏记小说”也如此，刘知幾曾言：“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纪。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① 在刘知幾看来，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讲，所有的文献都是有用的。

又如对文献之间重要程度的认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文献之间并不存在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各类文献的价值都是平等的，只是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而言，有些文献史料价值高些，有些史料价值小些。但是，中国古代文献研究有崇经的心态，在图书分类中，六经永远居于首位，经乃学问正道，经书俨然成了第一等书籍。所谓“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原因就是“经禀圣裁，垂型万世”。② 经书的重要程度非任何书籍可以比肩。在史部，正史的地位又是最尊贵的，“正史体尊，义与经配”③，其价值又绝非野史所能比。

还有对文献外部形式的认识。如对文献典籍编纂风格的评价，对各种体裁优劣的比较，对各种版本价值的认识等等。

以上只是通过举例方式对文献学思想的第一部分进行了说明，关于这方面的见解，内容极其丰富，且系统完备，值得总结。

其二，对文献学活动及工作的思考。这部分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文献整理工作价值的认识，包括对文献整理工作的目的的看法、文献学史的思想、利用文献的态度、文献学家的修养等。二是对具体文献学工

---

① 《史通笺注》卷十《内篇·杂述》，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53 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正史类小序》。

作的认识，诸如对文献学分支学科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注释学等的认识，这其中又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每种分支学科的价值、所遵循的原则、所使用的方法及方法论。

（1）对文献整理工作价值的认识。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文献学家从来都不是为了整理文献而整理文献，他们整理文献总是有很高的目标，是为了宣扬圣道、推行教化、经世致用。

古人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总是不忘反思前人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隋初牛弘在建议征集天下图书时论述了文献聚散的历史，深刻总结出唐以前图书典籍的“五厄”[①]，着眼于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考察文献聚散的历史，实际上是在提醒统治者，政治动荡对文献的破坏非常严重，后世应当吸取教训。《隋书·经籍志》堪称名作，其总序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唐以前各代在文献整理上所做的努力，并对前人所做的工作进行了评述，最后明言，《经籍志》的编纂就是吸收前人经验并加以创新的结果：“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虽未能研几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②]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研究有一个不断积累前进的过程，值得珍惜。

对于利用文献的态度问题，古人有丰富的思想见解，其核心是“博采”、“慎择”、“善思”，[③] 就是要广泛占有，谨慎利用。这已经成为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学问家对待资料时必须遵循的原则。

对于文献学家的修养，古人也有相当深刻的见解，这种修养既包括文献学家的道德修养，又包括学识修养。自古及今，论者甚多。

（2）对具体文献学工作的认识。中国历史文献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出现了诸多分支学科，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注释学等。相关的思想、原则、方法等也应运而生，成为文献学思想宝库中

---

① 《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

②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总序。

③ 分别见《史通笺注》内篇之《采撰》、《杂述》，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重要的宝藏。在发掘这一部分的思想时，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由于每一分支学科研究对象不同，其思想、方法也各有侧重，存在一些差异。分析其差异，窥知其精髓，是文献学思想研究的重要方面。二是由于目录、版本、校勘等具体的文献学工作是以具体的文献整理为基础的，很多精辟的思想往往隐藏在琐碎的文献分类、考校、辨别、注释等活动中，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发掘隐藏在表面文字背后的思想精华。

迄今为止，以“历史文献学思想”命名的论著还没有出现，对文献学思想的发掘与梳理是历史文献学研究最薄弱的环节，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文献学研究只有具体操作，没有理论指导。这是妄自菲薄的言论。本书试图以专题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揭示中国历史文献学思想的丰富内涵。

研究历史文献学思想，除了遵循一般的历史研究方法之外，以下几点也是我们特别注意的：

其一，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侯外庐先生在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时，提倡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吴怀祺先生亦强调史学思想的研究要与社会政治、哲学思潮的研究相结合，[①] 历史文献学思想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在文献学领域的折光。历史文献的产生、聚散、整理、考校、传播等都与社会形势密切相连，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密不可分。离开社会政治、文化谈历史文献学思想，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揭示出中国历史文献学思想的精髓。当然，我们不仅要考察社会政治文化对文献学思想的影响，还要考察历史文献学思想对社会政治文化的作用。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其二，将历史文献学思想放在整体学术思潮的发展中进行考察。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潮往往会影响到此一时代各种思想的发展，使之带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历史文献学思想同样也会受其影响。以往的文献学研究，往往只讲具体的文献整理过程，诸如校勘、注释等，很少结合整体学

① 见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1992年版。其后，吴先生反复强调这一研究方法的重要，见《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总论先秦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

术思潮的变动再作进一步分析，同样，学术思潮的研究又往往忽视文献整理的思想内涵，二者互不干涉。实际上，每一时代文献整理内容的变化，诸如分类、校勘、注释等，都反映了时代思潮的变化，历史文献学思想恰恰就是学术思想的一部分。没有对特定时代整体学术思潮的考察，就不可能给特定时代历史文献学思想一个恰当的定位。没有历史文献学思想的“加盟”，任何学术思潮的研究都是不全面的。

其三，在总结历史文献学思想时，注意考察这些思想的流变。中国古代学术发展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强调继承，然后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几乎没有抛却前人另搞一套的现象。历史文献学思想更是如此。由于历史文献学思想是从千百年来人们从事文献整理活动的基础上抽绎出来的，而文献整理的法则又明显相通，故而我们有可能归纳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历史文献学思想体系。但是，任何思想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考镜源流，弄清楚同一命题在不同时代思想内涵的变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我们秉承的原则。

其四，考察历史文献学思想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历史文献学思想由前述两大部分组成，而事实上，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联系密切，很难断然分开。文献学家在从事文献整理与研究时，并未有意识地区分二者的不同。因此，研究历史文献学思想，必须把各部分联系起来考察。

历史文献学思想体系结构表

<table>
<tr><td rowspan="17">历史文献学思想</td><td rowspan="5">对文献本身的认识</td><td>对文献的社会意义和作用的认识</td><td></td></tr>
<tr><td>对文献史料价值的认识</td><td></td></tr>
<tr><td>对文献之间重要性差异的认识</td><td></td></tr>
<tr><td>对文献外部形式的认识</td><td></td></tr>
<tr><td>……</td><td></td></tr>
<tr><td rowspan="12">对文献活动及工作的认识</td><td rowspan="6">对文献整理工作的价值的认识</td><td>文献整理的目的</td></tr>
<tr><td>文献整理的原则</td></tr>
<tr><td>文献学史的思想</td></tr>
<tr><td>利用文献的态度</td></tr>
<tr><td>文献学家的修养</td></tr>
<tr><td>……</td></tr>
<tr><td rowspan="6">对具体文献学工作的认识</td><td>分类叙录（目录学）的目的、原则、方法等</td></tr>
<tr><td>版本校勘的目的、原则、方法等</td></tr>
<tr><td>辑佚辨伪的目的、原则、方法等</td></tr>
<tr><td>文献典藏的价值、原则、方法等</td></tr>
<tr><td>文献注释的意义、原则、方法等</td></tr>
<tr><td>……</td></tr>
</table>

第二章
“信而好古，广收博采”：文献搜求和典藏的思想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创造了各种类型的知识体系，记载这些知识体系的历史文献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成就和发展历程。古往今来的有识之士，无不视文献典籍为修身立命、继往开来的根本。

对于史学研究来说，文献是史学工作的基础，除了亲见亲闻和实物材料外，史学要依据文献资料来进行工作，于是司马迁作《史记》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①，广泛搜求各种文献资料。刘知幾在《史通》卷五《采撰》篇中也说：“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因此，关于文献的搜寻、典藏与传承的历史也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文献学史与中国史学史的重要内容。吴晗曾对古代先贤搜求、典藏文献典籍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称“其有裨于时代文化、乡邦征献、士夫学者之博古笃学者，至大且巨”②。历代先贤在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② 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第1～2页。

搜求、典藏文献典籍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思想，他们的典藏观以及有关文献搜求的理论和保护经验，成为文献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第一节 文献搜求与典藏的理念

中国古代的文献典藏观念和心态既反映了古代先贤对文化遗产的挚爱，对知识的追求，也反映了其他一些收藏动机。其中既有积极的、正面的因素，也有消极的甚至是变异的因素。对古代文献典藏观念及心态多样性、复杂性的思想内容进行分析，将有助于人们对古代文献收藏活动的不同行为表象及内涵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一、"读书为乐"的意识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历来有以读书为乐、求知为乐的强烈意识。那么，读书之乐，又乐在何处呢？

首先，人们把读书看作是人生路程的起步和认识历史与社会的途径。早在南北朝时，颜之推就在他的家训中用浅显的例子告诫子弟，说明了"不读书，难为人"的道理。他形容那些不念书的"白丁"，"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他说，旁边看到的人，都为之羞愧，恨不能"代其入地"，与其这样长受一生愧辱，何不勤学数年，享用读书之乐呢？① 到了唐朝，诗人韩愈已把知书看成做人的根本，他在《符读书城南》诗中说："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宋代文学家苏轼把书籍与金银珠宝、草木丝麻等进行了比较，他说："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

---

① 《颜氏家训集解》卷三《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页。

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① 书籍既然有这么多好处，读书便是人生最大乐趣，所以苏东坡说：“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② 将读书向学看作圣人和学子必经的共同路径。南宋毛开认为读书可以滋养身心，他说：“识天道之精微，揆人事之终始，穷物理之变化者，其唯书乎！故六艺立言之训，九流经世之要，传注之学，辞赋之宗，技巧之方，姓名之考，齐谱之志，丘里之谈，虽云殊途，皆有可用。诚应世之先务，资身之大本欤。”③ 在毛开看来，人们要想应对社会、提高修养，首先必须读书，领略书中所蕴含的道理。到了明代，藏书家祁承㸁更是搜罗汉宋之间以读书为乐的人事二十三则，辑为《读书训》，用以教诫子弟。

读书乐，还由于书中凝聚了古往今来人文精神的瑰宝，爱书人可以通过读书品味个中情趣，怡心悦目，陶冶情感。明代藏书家高濂把读书比作跨越千古，与古圣贤哲对面交谈。他说：“常景耽书，每见新异之典，不论价之贵贱，以必得为期，其好亦专矣。故积书充栋，类聚门分，时乎开函摊几，俾长日深更，沉潜玩索，恍对圣贤，面谈千古，悦心快目，何乐可胜？古云开卷有益，岂欺我哉。”④ 这种在读书中超越时空局限，使主体达到升华的境界，确实不是一般乐事所能比拟的。明代藏书家徐𤊹也曾自述读书之乐曰：“余尝谓人生之乐，莫过闭户读书。得一僻书，识一奇字，遇一异事，见一佳句，不觉踊跃。虽丝竹满前，绣罗盈目，不足喻其快也。……余友陈覆吉云：居常无事，饱暖读古人书，即人间仙岛。旨哉言也。”⑤ 徐𤊹的读书乐，是一种增长见闻的快乐，是一席精神的盛宴。“虽丝竹满前，绣罗盈目，不足喻其快也”。正因为书籍蕴含了古往今来人文

① 《苏轼文集》卷十一《李氏山房藏书记》，见《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81页。

② 《苏轼文集》卷十一《李氏山房藏书记》，见《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81页。

③ 毛开：《遂初堂书目》序，见李希泌等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页。

④ 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论藏书》，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68页。

⑤ 徐𤊹：《徐氏笔精》卷六《读书乐》。

精神的瑰宝，清代藏书家孙从添认为书籍是“人身中之至宝”：“夫天地间之有书籍也，犹人身之有性灵也。人身无性灵，则与禽兽何异？天地无书籍，则与草木何异？故书籍者，天下之至宝也。人心之美恶、世道之得失，莫不辨于是焉！天下惟读书之人，而后能修身，而后能治国也。是书者，又人身中之至宝也。”①

蕴含在文化传统中的这种读书意识，是一种不含功利的、自然的“天欲”，它不计较任何功名利禄的得失，故能淡泊俗欲，一往无前地追求高尚的精神情趣。南宋学者许棐隐居梅屋，安贫爱书，以藏书读书为乐，他的《梅屋书目自序》颇能说明这种淡泊名利、以读书为乐的传统精神。序曰：“余贫喜书，旧积千余卷，今倍之，未足也。肆有新刊，知无不市；人有奇编，见无不录，故环室皆书也。或曰：‘嗜书好货均为一贪，食书而饥，不若食货而饱；食书而劳，不若食货而逸。人生不百年，何自苦如此？’答曰：‘今人予不知之，自古不义而富贵者，书中略可考也，竟何如哉？予少安于贫，壮乐于贫，老忘于贫，人不鄙夷予之贫，鬼不揶揄予之贫，书之赐也。如彼百年，何乐之有哉！’”由此见得许棐真知读书乐趣。在“贪”书和贪钱之间，弃钱而择书，在物质生活贫乏和精神生活贫乏之间，宁可承受物质生活的贫乏，而以精神生活的丰富为自豪。他认为正是因为藏书读书，有了丰富的知识和高尚的情趣，所以世俗的人们不会因其贫穷而轻视他，阴间的鬼神也不会因其贫穷而讥笑他。我们说，正是这种追求图书的“天欲”，这种以读书为乐的传统精神，造就了中国古代藏书事业一代胜似一代，不断繁荣发展的局面。

文化的认同心理和以读书为乐的意识是古代文献典藏的基本思想，是推进文献典藏事业不断繁荣发展的根本的驱动力，也是古代学人可贵精神之所在。

二、“遗金满籯，不如一经”的观念

《汉书·韦贤传》载：“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这一思

① 孙从添：《藏书记要·购求》，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4页。

想，也是古代一些藏书家藏书的出发点。他们认为，与其传给子孙大批钱财，不如传给子孙求知长进的书籍。

这种观念的产生，既有中国封建社会孝慈伦理观的烙印，又有读书做官、望子成龙心理因素的影响。首先，在封建的宗法制度下，"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是天下之常道，但反过来君、父、夫也对臣、子、妇负有伦理道德上的义务。在父子这对关系上，子对父孝，父对子慈，慈不仅体现在有所养，而且还要有所传。在封建社会里，大自父死子继的皇位相传，小至田地财产的家业相传。随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价值观念的形成，家业相传增加了新的内容，不仅要传钱财，而且要传书，甚至认为传书胜于传钱财，因为读书有望做官。

唐初李袭誉在江南为官时，常以俸禄雇人抄书，蓄书数车，他对子孙说："吾近京城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内有赐桑千树，蚕之可以充衣；江东所写之书，读之可以求官。吾没之后，尔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羡于人？"[①] 江东所写之书即指江南抄书，因唐初尚未有雕版印刷，藏书皆为写本、抄本。这段话明白交代了藏书作为衣食之外的第三份家产，是传与子孙读书做官的。李袭誉传书时还是和田产等相提并论，宋代以后，轻财重书，"遗金满籯，不如一经"的观念越来越强烈。北宋藏书家李畸实承先人遗业，扩充藏书至万余卷，他说："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亲既以是遗我，我复以是遗子，子子孙孙用之不竭，况万卷之多乎？庶知我之富者在此而不在彼也。"[②] 他自豪的是"我之富者在此不在彼也"，而且很明显，在他看来藏书之富要远胜于钱财田产之富。清代有些藏书家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例如丘晋昕在他的《九十九峰草堂文钞·藏书记》中说："今世士大夫好积财帛，以厚子孙，心醉目营，甘为牛马，未几华屋山丘。以不义之籯金，供不资之挥霍，家破名裂，卒为世笑……转不如油素缥缃，方愚益智，后人能读，可为保世滋大之基。即不能读焉，无所于恶。"他认为传书优于传财，过多的钱财会使子孙沉湎于享乐之中，反生祸害，而书籍却能使之益智，进而"保世滋大"，建立功名，是有益无弊的。丘晋

① 《旧唐书》卷五十九《李袭志附袭誉传》。

② 邹浩：《道乡集》卷三十六《李季侔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昕的话详细阐明了为何"遗金"不如"遗经"的道理。又如广东藏书家梁廷枏，平日食用俭朴，不敢多有所耗，而买书却不计费用，他以为藏书"可长守勿失，以是贻子孙，俾获耳目濡染于博雅之林，胜于奢靡服食者远甚"①。梁氏以书籍相传，希望子孙耳濡目染，虽不能为官，或可跻身于"博雅之林"的想法，也是这类藏书心态的体现。

"遗金满籝，不如一经"的典藏思想进则可望子孙读书做官、保世滋大；退则可防子孙因财产而奢靡衣食、家破名裂。因此，这类藏书家把藏书看作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遗产。

三、"藏书私秘，世代永保"的心态

历代藏书家都渴望自己的文献收藏能"子子孙孙，世代永保"，这种渴望自然是缘于绝大多数藏书家得书之不易与藏书之艰辛。于是许多藏书家都有告诫子孙继承先志、保存藏书的家训、族训。唐开元时藏书家杜暹藏书万卷，为了教育子孙保护典籍，他在每一部书都题上家训："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② 这是最早可考的藏书家所立的训诫。

宋代以降，藏书家关于保护藏书的禁约渐次增多，但主要内容不外是杜暹提到的"鬻及借人"两个方面：一是禁将图书售换财物，一是禁将图书借与外人。元代学者赵孟頫就曾在藏书卷末题辞曰："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勿宁舍旃。"③ 赵氏虽贵为文人雅士，显名当世及后代，但因爱书心切，出言亦不顾温文尔雅了。他不仅严诫子孙，不能卖书作禽兽行，而且还警告他人，"取非其有，勿宁舍旃"，不要对赵家藏书有非分之想。这种严禁子孙鬻书的戒约在传世的明清藏书印文中还可以找出许多。

---

① 何多源：《广东藏书家考》，《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第1～2卷。

② 周辉：《清波杂志》卷四《借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34页。

③ 转引自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藏书家印记之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告诫子孙禁售图书是古代藏书家祈求藏书永保心态的反映。又有一些藏书家不仅禁止图书出售，还禁藏书出借。为保藏书永存，他们甚至椟藏典守，扃其楼钥，使举世不得寓目。此时，他们的心态已经发展为藏书私秘的心态。明代范氏天一阁一开始就立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训。这些禁戒确实为避免图书流失发挥了作用，但往往也禁锢了图书的传布。清代私家藏书关于“藏书不出户”的规定也很多，海源阁杨以增就训示子孙，要让藏书“变世相传，珍秘逾恒”。石笋馆主人杨继振也在他的长篇印文里告诫子孙“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总之，明清之际，私家藏书以深藏为旨的风气有愈演愈烈之势，他们对待图书“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也”。“故入常人手犹有传观之望，一归藏书家无不绨锦为衣，旃檀作室，扃钥以为常。有问焉，则答无。有举世曾不得寓目，虽使人致疑于散佚，不足怪矣”。[①]

从直接原因上看，藏书私秘心态是出于藏书家保守图书的目的。从根本上看，是专制社会私有制经济形态的产物，特别是受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封闭的生产模式的影响，私家藏书极易形成藏书珍秘、家业世守的心态。

古代藏书家总是希望图书“久传后世，津逮子孙”，甚至企图通过藏书私秘来确保图书的安全。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生产力的落后，以及封建王朝改朝换代不断发生的政治动乱，因此藏书家永保藏书的愿望都难以实现，正如清末叶德辉所说的：“诸人皆眷眷于子孙，究之藏书家鲜有传及三世者。”[②] 这就使藏书家们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随着收藏的逐渐丰富、珍贵而与日俱增，甚至认为对某些珍本善本的收藏，是冲撞了鬼神，所谓“自家而言，一聚此物者，必然败去，岂非物之美者，人心所在，鬼神临之，大有大异，小有小异”[③]。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在他的题跋中

---

① 曹溶：《流通古书约》，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5 页。

②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藏书家印记之语》，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8 页。

③ 郎瑛：《七修类稿》卷十八，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5 页。

也说："俗人以余好收古书，动以泄天地奇秘为戒。忆春初遭大儿之变，亲友劝余勿再收藏，然余反藉此消遣，故校此书时，犹在大儿七中。夏秋以来，心绪略定，不谓九月下旬，又值伯兄去世，伦常间多不如意事，造物之忌，其果然耶？"① 于是，明清不少藏书家在痛感人力不济之余，祈求冥冥之中的神灵保佑。如明末清初藏书家毛晋就在藏书印上刻写"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的祈语，清代藏书家张蓉镜则在藏书中血书"佛"字，希望藏书无水火蠹食之灾。这种在藏书活动中祈求鬼神保佑图书的心态，折射出古代文献典藏聚书难，藏书、守书更难的客观情况，这是藏书家们一种无可奈何的精神寄托。

四、"以传布为藏"的思想

文献典藏是应深秘封闭还是公开借阅，历来是藏书史上两种不同的典藏态度和价值观。在藏书史上，私人藏书公开借阅的现象最早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如三国西蜀的向朗藏书丰富，他"开门接宾，诱纳后进"，藏书供人阅览。《晋书·儒林传》记载："（范平）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他的孙子范蔚还为来读书者筹办衣食。《南齐书·文学传》也记崔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

宋代以后，藏书私秘的情况渐多，甚至还出现了所谓"借书一痴，还书一痴"的恶习，为书林中有识之士所不齿。金元之际学者刘祁，曾指斥借书不归的荒谬，他说："昔人云：'借书一痴，还书亦一痴。'故世之士大夫有奇书多秘之，亦有假而不归者，必援此。余尝鄙之，以为君子惟欲淑诸人，有奇书当与朋友共之，何至靳藏，独广己之闻见？果如是，亦狭矣。如蔡伯喈之秘《论衡》，亦通人之一蔽，非君子所尚，不可法也。其假而不归者尤可笑。君子不夺人之所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岂有假人物而不归之者耶？因改曰：'有书不借为一痴，借书不还亦一痴也'。"②

---

① 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六《茅亭客话（明钞校宋本）》，见《黄丕烈书目题跋》，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② 刘祁：《归潜志》卷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5页。

刘祁不仅针砭借书不还的做法，同时也鄙夷藏书私秘的狭隘心态，他主张“有奇书当与朋友共之”，表达了学界书林中要求流通藏书、公开私秘的呼声。

明清两代，虽然私秘的风气不减，但藏书公开的观念也在不断深入人心，成为不少藏书家积极的藏书心态。首先，一些藏书家意识到图书是天下公器，把私秘图书、禁锢学术看作一种罪过。比如明季江阴李如一就以传播遗书秘册为己任，以慷慨借书为美德，钱谦益说他“好古嗜书”，“每得一遗书秘册，必贻书相闻，有所求假，则朝发而夕至”。李如一认为：“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古人以匹夫怀璧为罪，况书之为宝，尤重于尺璧，敢怀之以贾罪乎?”钱谦益将此称为“达言美谈”，并为之赞叹不已。[①] 与李如一同时的福建藏书家徐𤊹在批评“斗奇炫博，乐于我知人不知，宝秘自好而不肯传”的私秘心态时，则提出了“以传布为藏”的观念，[②] 同样主张藏书家以传播图书、传播文化为己任。

其次，藏书家认识到藏书私秘的结果只能使典籍悄然湮没，互相封锁的结果于人于己都不利。明末清初的曹溶就十分反对封锁图书的做法，他认为，虽然书不借人“无可尽非”，但“我不借人，人亦决不借我，封己守株，纵累岁月，无所增益，收藏者何取焉?”他有鉴于私秘藏书易使图书形踪永绝的危险，在《流通古书约》中提出了一套互通有无，抄录相易的方法，并呼吁有财力的藏书家刊刻典籍，为古书“续命”，以广流传。这种互利互惠，促进古书流通的思想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乾嘉时学者张金吾、宋咸熙提倡藏书公开，无偿提供图书借阅甚至赠书的行为和思想，又比曹溶更为先进。张氏指出：“若不公诸同好，广为传布，则虽宝如球璧，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于予又何裨?”因此他抱着“乐与人共，叩必应”的态度，对外从不吝借图书。[③] 宋咸熙则继承先父宋大樽传布藏书的遗风，他的《借书诗序》曰：“藏书家每得秘册，不轻示人，传之子孙，未尽能

① 钱谦益：《牧斋杂著·牧斋集再补·跋草莽私乘一卷》，见《钱牧斋全集》（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25页。

② 徐𤊹：《徐氏笔精》卷六《藏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引自缪荃孙：《艺风堂藏书续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

守，或守而鼠伤虫蚀，往往残缺，无怪古本之日就湮没也。先君子藏书甚富，生时借抄不吝。熙遵先志，愿借于人，有博雅好古者，竟赠之，作此以示同志。"① 宋咸熙认为，是藏书私秘加速了古书的湮没，因此他要公开藏书，使图书得到更好的传布和保存，《借书诗》中有"能抄副本亟流播，劫火来时庶不湮"的诗句，表达了他的心志。

其三，藏书家还认识到，图书深椟珍秘，只是藏而不读；相反，只有流通藏书、传布藏书，才能有利于自己读书，达到"散于人转以聚于己"的效果。对于这一点，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有深切的体会。袁枚藏书达四十万卷，在乾隆时四库馆征书期间，他将藏书散出，"传抄稍稀者，皆献大府；或假宾朋，散去十之六七"。他在《所好轩记》、《散书记》、《散书后记》、《黄生借书说》等文章中多次表达了传布藏书的思想，说："凡物恃为吾有，往往庋置焉而不甚研读。一旦漓然欲别，则郑重审谛之情生。予每散一帙，不忍决舍，必穷日夜之力，取其宏纲巨旨，与其新奇可喜者，腹存而手集之。是散于人，转以聚于己也"。"良田千畦，食者几何耶？广厦万区，居者几何耶？从来用物宏，不如取精多。删其繁芜，然后迫之以不得不精之势，此予散书之本志也"。② 袁枚藏书善用，以公开藏书、传布藏书而利己、利人、利书，这是达观向上的藏书心态。

其四，以公开藏书嘉惠学子，真正造福后人，是许多藏书家开放藏书的心愿。比如，清道光间学者孙衣言，与其子孙诒让辛勤聚书，其家玉海楼藏书达八九万卷。孙衣言主张藏书致用，他不仅督促子孙读书，还鼓励乡里学子到他的藏书楼念书。他在开放玉海楼藏书时，专门通告曰："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③

清光绪年间学者国英藏书二万余卷，为表明不私秘图书的态度，将藏书楼命名为"共读楼"。国英开放藏书的愿望也是为了嘉惠学子，培养人

① 宋咸熙：《思茗斋集·借书诗》，清道光五年刊本。

②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九《散书记》，见《袁枚全集》（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页。

③ 孙衣言：《逊学斋文续钞》卷三《玉海楼藏书记》，续修四库全书本。

才。他说：“愿嗜古者，暇辄往观。果就天性之所近，谙练其才，扩充其识，将可以济时局，挽颓俗，储经邦济世、安民正俗之学，为异日报国资，是则余之厚幸而切望也夫。”[①] 他寄厚望于开放藏书，培育学人，为国家储备济世安邦人才，其观念又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藏书公开的心态和观念经过一批藏书家的倡行推广，逐步形成了一种思想倾向。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乾隆时期山东学者周永年，更把这种藏书观念发展为完整的公共儒藏理论。周永年认为古来藏书“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究其散失的原因，在于私秘而不能公开。因而在明人曹学佺“儒藏”之议的基础上，借鉴释藏、道藏的藏经传播方法，著《儒藏说》十八篇。《儒藏说》以“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为目的，批驳了一些孤陋庸妄的说法，提出了组织公开阅览的藏书室，为天下好学之士提供方便的公共儒藏思想。他具体地规划了公共儒藏的建设方案，拟成“儒藏条约三则”：一是选择地点，建义学设义田，有书者出书，有钱者捐钱，形成一个公共藏书点，然后编定《儒藏未定目录》，依目求书，由少而多，逐步积累。二是“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而藏书之处则宜择“山林间旷之地”，以避水火之灾。三是利用义田田租的收入作为公共藏书阅览点的费用，并推举“一方老成三五人，经理其事”。其经费可以适当接济前来求学的贫寒之士，“免其内顾之忧”，余款“仍贮存之，以为置书增田之费”。在公共儒藏思想的指导下，他身体力行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首先，他相约同乡好友桂馥，一起出资买田地，设立公共儒藏“借书园”，并将自己辛苦收集的五万卷图书放在借书园中，供四方学人阅览传抄。其次，他四处奔走，给师友写信，宣传儒藏乃“艺林中第一要事”，是“万世之利”，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公共儒藏的建设。

当然，由于社会生产力与观念形态的制约，周永年这种接近于近代公共图书馆的藏书设想，在当时是行不通的，但是，他创立的公共儒藏理论，以及开放藏书的可贵实践，在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楼向近代公共图书馆

① 国英：《共读楼书目序》，见李希泌等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9～60页。

的过渡性进程中，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他的《儒藏说》是中国藏书史上重要的文献，他提倡的公共儒藏学说，反映出中国古代藏书家自我反省和自我意识的增强，说明他们已经具备利用藏书为社会文化事业和学术研究服务的自觉意识和使命感，中国古代的私家藏书至此已经进入了一个自觉向着公共藏书发展的新阶段。

五、其他一些藏书心态

在古代文献典藏观中，还有一些藏书心态虽然也可以找到其相应的行为事象，但这些藏书心态在文献典藏思想中，往往处于附属的位置，或者说，完全以这种心态作为藏书动机的人很少。以下说的就是这些代表性不甚广泛的藏书心态。

第一，附庸风雅的藏书心态。这种心态可以看作是读书乐心态的变异。书籍既然是知识学问的象征，藏书自然就形成了儒雅的一种外观表象。在历史上，儒雅作为传统人文精神的化身，是内在美和外在美的结合。因此，一些达官贵人，乡绅富贾，尽管他们并不真正以读书为乐，但是他们在社会和潮流面前，不愿意充当无知者与落伍者，于是要附庸这种风雅。附庸风雅的藏书心态，是文化上的顺从心理，这种心理往往伴随一种社会思潮或文化现象的流行而在一些呼应者的身上形成。特别是清代，由于朴学学风盛行，不仅士人言必称考据，对书籍的收藏考订极感兴趣，就是官方也动员了巨大的财力、物力编纂各种丛书、类书以及其他“钦定”的书籍。藏书习尚蔚然成风，吸引了各阶层人物的投入和参与，其中自然有一些是随波逐浪的人物。应该说，藏书文化在潜移默化中确曾将一些原本并不真正爱书的人造就成真正意义的藏书家，但也应指出，有些人的藏书永远只是附庸风雅、装点门面而已。例如清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嘲笑的昆山县令王安定，蓄宋本而深椟秘藏，只为炫奇夸珍，并不知所用，就是突出的代表。

第二，藏书消闲的心态。这种心态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古代学者的收藏活动中。有些藏书家在治学之余，观赏书籍，品味楮墨，在清雅之中，寻找一种美的享受，这不仅是无可厚非的，其雅致也令人思慕。但有些藏书

家则专以藏书作为无聊消遣的对象，这样的心态无疑是消极颓丧的心理状态，是不可取的。以清代藏书家而言，其消闲心态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为了躲避清廷文字狱的祸害，寻求一个与世无争的“避风港”；有的是领教了官场的倾轧而绝意仕宦，无所事事之际，以藏书观赏作为消遣的良法；有的则是由于科举失意，仕途无望，转而以藏书校书排遣胸中郁闷。这种藏书心态，在一些藏书家的题跋、诗文乃至藏书印章中都得到了反映。清末学者叶德辉在他的“校书八善”中所反映的无聊消遣的意味，就很有代表性。如第一善曰：“习静养心，除烦断欲，独居无俚，万虑俱消，一善也。”第七善曰：“长夏破睡，严冬御寒，废寝忘餐，难境易过，七善也。”[①] 可以看出，八善中的这两善，就是将藏书和校书作为解闷消遣的方法，借藏书打发寂寞无聊的时光。

第三，藏书养老的心态。叶德辉在《后买书行》中曰：“赍斧倘有余，罄作收书费。问汝欲何为，老至谋生计。刻书复鬻书，较胜食租税。远法荛圃穷，近贪玉简利。”[②] 他在这段诗句里，表达了藏书目的中的一项，就是“老至谋生计”。并且还举了两个例子，一例是黄丕烈（荛圃），在年老拮据时，以卖书维持生活；一例是罗振玉（玉简）在日本买书卖书，颇获其利。应该说，有些藏书家为生活所迫，在穷困潦倒之际，出卖自己的藏书来维持生计，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收书伊始，就打着奇货可居、买卖获利的主意，就未免有些市侩的俗气了。清代藏书家中有些人虽不是书贾，但也颇有这种市侩气。

第四，为封建文化卫道的心态。许多藏书家在收聚图书，或者清理前人遗藏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那些“离经叛道”、“不登大雅之堂”的图书排除在收藏范围之外。最为典型的是清代有位藏书家石韫玉，自觉成为封建文化的卫道士，为铲除异质文化图书不遗余力。他曾对人说：“我辈著书，不能扶翼名教，而凡遇得罪名教之书，须拉杂摧烧之。”据记载：

---

① 叶德辉：《藏书十约・校勘》，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0 页。

②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九《都门书肆之今昔》，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6 页。

“（石韫玉）家置一纸库，名曰‘孽海’，盖投诸浊流，冀勿扬其波也。一日阅《四朝闻见录》，拍案大怒。急谋诸妇，脱臂上金跳脱，质钱五十千，遍搜坊肆，得三百四十余部，投诸火。”① 此公迂腐可笑，人建书楼为藏书，他建书楼为焚书。想见他那为销毁典籍急不可耐，必斩草除根而后快的样子，不仅可笑，而且可恶。

古代文献典藏观念及心态的发展变化，是与传统文化的积淀、物质生产力及社会经济环境紧密相关的。对不同典藏观念及典藏心态的剖析，是历史文献学研究不断深化的需要。其意义在于通过对不同收藏动机的考察，认识中国古代文献典藏思想的主流和支流，确认其应予继承或扬弃的对象，以利于当代历史文献学及图书文化的发展。

第二节　文献典藏的价值论

中国人一向对文献典籍充满了崇敬之情，在他们看来，先王之道、历史经验、人伦道德以及治国安邦之术、读书治学之法等等，都存在于书籍之中。离开书籍，后人将无法从前朝吸取历史经验，无法传承先王之道。墨子云：“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② 书之为用，大矣哉！正是因为看到文献典籍的这些作用，人们才热衷于文献搜求与典藏，无论官府、书院，还是寺观、私家，自古及今，藏书之风甚盛。人们不仅仅把藏书看作简单的图书收藏，还把典藏与资政教化、读书治学、文化传承等联系起来，对文献搜求与典藏的功用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典藏价值观。要言之，藏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藏书是治理国家、资政教化的参考，此其一；藏书是读书治学的前提，此其二；藏书是文化保存与传播

① 法式善：《槐厅载笔》卷十四，续修四库全书本。

② 《墨子》卷十二《贵义》。

的手段，此其三。

以下分述。

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典藏与资政教化

在古人看来，文献典籍与资政教化密切相关。《礼记·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孔颖达疏：“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言文王、武王为政之道，皆布列在于方牍简策。”[①] 可知，在《礼记》创作的时代，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周文王、武王的为政之道，就存于方牍简策之中。

正是认识到文献典籍在政治治理中的作用，历代统治者均重视图书的搜集和典藏。在他们看来，典藏图书，实际上就是保存统治经验。

魏晋南北朝时期，孙惠蔚看到国家藏书机构——东观所藏图书极少，于是上疏要求访求图书，充实东观，他论藏书的重要性云：“六经、百氏，图书秘籍，乃承天之正术，治人之贞范。是以温柔疏远，《诗》、《书》之教，恭俭易良，《礼》、《乐》之道。爻彖以精微为神，《春秋》以属辞为化。故大训炳于东序，艺文光于麟阁。斯实太平之枢宗，胜残之要道，有国之灵基，帝王之盛业。安上靖民，敦风美俗，其在兹乎。”[②] 在孙惠蔚看来，充足的图书收藏，是国家盛世的标志之一，典藏图书，是“安上靖民，敦风美俗”的好事。隋初，牛弘上《请开献书之路表》，同样对藏书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他说：“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③] 在牛弘看来，经邦立政，必先典藏图书，而且藏书必须完备，决不能私家有收藏，而官府却没有收藏。总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但凡大臣上疏请求朝廷收集、典藏图书，均从藏书与资政教化的关系入手来论证藏书的重要性，这种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古代士人的一般看法，非常具有代表性。

帝王对文献搜求和典藏的重要性也有深刻的认识。宋太宗认识到收集

---

① 《钦定礼记义疏》卷六十七《中庸》第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魏书》卷八十四《儒林·孙惠蔚传》。

③ 《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

典籍图书是达于治道的先声，指出："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①] 他说："国家勤求古道，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宜在询求。致治之先，无以加此。"[②]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宋太宗视察秘阁，看到藏书丰富，非常高兴，史载："帝登阁，观群书齐整，喜形于色，谓侍臣曰：'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③] 千古治乱之道，尽在藏书之中，这几乎是古代统治者的一致看法。明太祖云："古先圣贤立言以教后世，所存者书而已。朕每观书，自觉有益……盖读书穷理于日用事物之间，自然见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谬，书之所以有益于人也如此。"[④] 正因为书籍有益于人，于是明太祖命修治国子监旧藏书版，"今国子监旧藏书版多残缺，其令诸儒考补，仍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益于学者"[⑤]。清代的康熙、乾隆稽古右文、大兴文治，对于藏书的政治作用有着更全面的认识。康熙说："自古经史书籍，所重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览详求，始成内圣外王之学。"[⑥] 对图书收藏还有自己的要求，他说："今搜访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乃为有用，其他异端诐说，概不准收录。"[⑦] 在他看来，凡有益于专制统治的图书，一概搜讨，凡不利于专制统治的异端邪说，一概不准收录，其政治指向非常明显。乾隆对图书典籍的政治作用认识更加清楚，他在《文渊阁记》中阐述自己的观点："礼乐之兴，必藉崇儒重道，以会其条贯。儒与道，非文莫阐，故予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五，太宗雍熙元年，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② 《宋会要辑稿》卷一七四二《崇儒四》之十六。

③ 程俱：《麟台故事辑本》卷一《储藏》，见《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38 页。

④ 《礼部志稿》卷一《兴学之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礼部志稿》卷一《兴学之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十二，康熙二十五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十二，康熙二十五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胥于是乎系。"①

历代统治者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文献收藏对国家治理的重要，而且现实政治生活中也积极地实践着。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汉代萧何搜集秦朝图籍对高祖刘邦制定政策所具有的参考作用。《史记·萧相国世家》云："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② 刘邦进咸阳，依靠萧何收集的秦朝的律令图书，了解国情、民情，采取了恢复农业生产、休养生息等一系列措施，使汉初政治很快稳定下来。唐朝统治者利用官府藏书所进行的考定五经、统一解释的工作，对于巩固自身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③ 到清代，乾隆皇帝为了显示文运之胜，巩固自身统治，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他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五月十七日的诏书中说："方今文治光昭，典籍大备，恐名山石室，储蓄尚多，用是广为蒐罗，俾无遗佚，冀以阐微补阙，所有进到各遗书，并交总裁等，同《永乐大典》内现有各种，详加核勘，分别刊钞，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讹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此采择《四库全书》本指也。"④ 乾隆修纂《四库全书》，广搜天下图书，政治目的非常明确：一方面稽古右文，彰显文治；另一方面凡对统治者不利的图书，一律予以去除，特别是明末清初一些野史笔记，更在销毁之列。乾隆说："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

---

① 《御制文二集》卷十三《文渊阁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

③ 《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上谕》。

办。"[①] 在康熙、乾隆看来，藏书不仅影响到政治生活，而且成了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换言之，文献的收藏、汇纂成了他们推行某项政治策略的手段。

由于历代明主圣君都重视对文献图书的收藏，故图书典藏的丰富与否，可以折射出一个王朝的兴盛衰亡，所以胡应麟有这样的话："图籍废兴，大概关系国家气运，岂小小哉。"[②] 真乃至理名言。

除了帝王将相对藏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之外，一些封建士大夫也从政治角度来认识藏书的作用，并自觉利用藏书来教育、培养子孙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颜之推云："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③] 在颜之推看来，只要懂得藏书、读书，即使出身卑微，也能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否则，即使"千载冠冕"，也难以摆脱跌落社会底层的命运。陈基为西湖书院重整书目写的序言说："夫经史所载，皆历古圣贤建中立极、修己治人之道，后之为天下国家者，必于是取法焉。传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不可诬也。"[④] 只要认真阅读这些藏书，就能够学会治国安邦之术。其实，藏书干政与读书做官，在思维上是一致的，都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们的理想。正因为此，士大夫对于有关家国大政的书籍，特别喜爱，想尽一切办法搜罗在手。

随着时代的变化，文献典藏的内容及资政功能也会发生变化。人们往往会根据时代的变迁来谈论藏书，以使藏书能适应时代要求。晚清，时局大变，西学东渐，典藏特别强调经世致用、救困济时。如《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会章》云："今之聚书，务使人士知中国圣人穷理之学，讲求实用，无所不备……今拟合中国图书陆续购钞，而先搜其经世有用者。西人政

①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上册，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年版。

② 胡应麟：《经籍会通》一，见《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③ 《颜氏家训集解》卷三《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页。

④ 吴昌绶辑：《松邻丛书》甲编《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卷首。

学，及各种艺术图书皆旁搜购采，以广考镜而备研求。”[①]《武昌质学会章程》云：“今拟广搜图书，以飨学友。中书局外，兼购西书。凡五洲史籍，格致专家，律例章程，制度政典，皆储藏赅备，用资他山。”[②]《常德明达学会章程》云：“本会拟择中国书籍，先购其经世有用者，制造局、同文馆所译西书甚多，均采购之。”[③]《皖省藏书楼开办大略章程十二条》云：“本楼购置图籍，凡属有益经世之学，无论古今中外，均须随时增购，以供众览，庶几讲求实学，转移风气之用。”[④]《苏学会简明章程》云：“本会所购之书分为六门，曰史学、曰掌故学、曰舆地学、曰算学、曰农商学、曰格致学，其余训诂词章概不备。”[⑤] 综而论之，随着晚清时局的变化，各机构的藏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就藏书内容来讲，西书成了藏书热点，就价值来讲，注重经世有用之书的收藏，目的是为了“讲求实学，转移风气”，为适应晚清变局提供智力帮助。

总之，中国古代统治者、士大夫、藏书家都把藏书提高到事关国家兴亡的高度来看问题，把文献典藏看作是资治的手段和从政的参考。

二、“欲读书者，必先藏书”：典藏与读书治学

读书治学，离不开丰富的藏书。从中国学术史来看，任何一个富有成就的学者，都是博览群书的人，任何一部名垂青史的学术著作，都是在参考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以后写作而成的。司马迁作《史记》，大量利用“石室金匮”之书，班固作《汉书》，充分占有东观兰台之藏。学术发展

---

① 《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会章》，见李希泌等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04 页。

② 《武昌质学会章程》，见李希泌等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05 页。

③ 《常德明达学会章程》，见李希泌等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05 页。

④ 《皖省藏书楼开办大略章程十二条》，见李希泌等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08 页。

⑤ 《苏学会简明章程》，见李希泌等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02 页。

的实际让学者们认识到丰富的藏书可以为读书治学创造良好的条件。

清代大藏书家张金吾云："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者，无他，学不学之所致也。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① 张金吾的话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对藏书与读书治学的关系的普遍看法。人们要致力于学问，就必须大量读书，要读书就必须依靠丰富的藏书，丰富的文献典藏是做学问的根本，舍此，人们不可能做出像样的学问。

很多藏书家都论述过藏书对治学的好处，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余无他好，而中于书癖，家藏卷帙，不下万数，虽极贫，不忍弃去。然圣贤之道，非此不能考证。数年以来，或持橐以载所见，或携簏以志所闻，念兹在兹，几成一老蠹鱼矣。"② 藏书成了孙从添考证圣贤之道的有力助手。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像孙从添这样以藏书资治学的情况相当普遍。魏晋时期，博物学家张华善藏书，史载张华"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几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③。宋代大藏书家宋敏求"家藏书三万卷，皆略诵习，熟于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议，必就正焉"④。

藏书以读的思想还体现在一些藏书印中。周少川先生曾对中国古代藏书印的内容及其意蕴进行过深入研究，在"以箴言警句入印"部分指出："明代项元汴的'神游心赏'，毛晋的'开卷一乐'，清徐乾学的'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席鉴的'学然后知不足'，鲍廷博的'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劳格的'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等印章，表达了这些学者潜心学问

①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自序，见李希泌等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54 页。

② 孙从添：《藏书记要》自序，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

④ 《宋史》卷二百九十一《宋绶传附宋敏求传》。

的态度。”[1] 除此之外，明代藏书家顾瑮有“怀烟阁读书记”印章，[2] 清代藏书家季振宜有“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的十字长印，[3] 所表达的都是潜心读书的思想。

对于藏书与读书治学的关系，元代学者方回和明代学者胡应麟的认识最为深刻。

方回在《丛书堂记》一文中对藏书与读书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在他看来：“藏而不读，不如不藏；读而不精，不如不读。”[4] 藏书的目的是为了读书治学，如果不是这样，藏书也就没有多少价值。他说：“多藏书而不善读，虽万卷吾以为不足；善读书而不多藏，虽一卷吾以为有余。”[5] 从此出发，他提出“多藏不如善读”[6] 的观点，非常明确地把藏书的落脚点放在读书上。

方回的观点得到胡应麟的认同。胡应麟坚持藏书是为了读书，对于藏书而不能读书的人，胡应麟认为和没有藏书没有什么差别。“博洽必资记诵，记诵必藉诗书。然率有富于青缃而贫于问学，勤于访辑而怠于钻研者。好事家如宋秦、田等氏弗论，唐李邺侯何如人，天才绝世，插架三万，而史无称，不若贾耽辈之多识也。扬雄、杜甫诗赋咸征博极，而不闻畜书，雄犹校雠天禄，甫僻居草堂拾橡栗，何书可读？当是幼时父祖遗编长笥胸腹耳，至家无尺楮，藉他人书史成名者甚众，挟累世之藏而弗能读，散为乌有者，又比比皆然，可叹也！”[7] 胡应麟指出，藏书是为了读

① 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②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二《顾瑮孝柔》，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③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季振宜诜兮》，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311页。

④ 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五《丛书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五《丛书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五《丛书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胡应麟：《经籍会通》四，见《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书，有的人富有藏书，但却不读，结果藏书虽多，却史书不载，沉沦无闻。而那些没有什么藏书的人，如扬雄、杜甫等，却因为善读书、有成就而名垂青史。对于那些藏书丰富而不能读书的人，胡应麟表示了极大的遗憾。

胡应麟还把藏书家分为"好事家"和"赏鉴家"两大类，认为那种藏书而不读书的就是"好事家"，所谓"列架连窗，牙标锦轴，务为观美，触手如新，好事家类也"[①]。由此，胡应麟进一步指出："夫书好而弗力，犹亡好也……夫书聚而弗读，犹无聚也……夫书好而聚，聚而必散，势也，曲士讳之，达人齐之，益愈见聚者之弗可亡读也。"[②] 聚书而不读，等于不聚，藏书而不读，等于不藏。任何藏书都有流散的时候，藏书而不读，一旦书籍流散，一切均会化为乌有。

明代王世贞对胡应麟"聚而能读"的思想非常赞同，说："世有勤于聚而倦于读者，即所聚穷天下书，犹亡聚也。有侈于读而俭于辞者，即所读穷天下书，犹亡读也。元瑞既负高世之才，竭三余之晷，穷四部之籍，以勒成乎一家之言，上而皇帝王霸之猷，贤哲圣神之蕴，下及乎九流百氏，亡所不讨核，以藏之乎名山大川，间以余力游刃，发之乎诗若文，又以纸贵乎通邑大都，不胫而驰乎。四裔之内，其为力之难，故不啻百倍于前代之藏书者，盖必如元瑞而后可谓之聚，如元瑞而后可谓之读也。噫！元瑞于书，聚而读之，几尽矣。"[③] 对胡应麟能够利用藏书进行读书治学赞赏有加。

清代学者江藩对聚书不读的现象也提出批评，认为"近日士大夫，藏书以多为贵，不论坊刻恶抄，皆束以金绳，管以玉轴，终身不寓目焉"[④]。藏书只是为了炫耀于人，这是江藩最反感的。他指出："夫欲读书，所以

① 胡应麟：《经籍会通》四，见《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6 页。

② 胡应麟：《经籍会通》四，见《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2 页。

③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六十三《二酉山房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江藩：《炳烛室杂文·石研斋书目序》，见《江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9 页。

蓄书，蓄而不读，虽珍若骊珠，何异空谈龙肉哉！”[①]

既然大多数人都认为读书治学是典藏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典藏的标准应该是“有裨于学术治道”。张金吾曾说：“藏书不易言矣，著录贵乎秘，秘籍不尽可珍；椠本贵乎宋，宋椠不尽可宝，要在乎审择之而已。夫所谓审择之者，何也？宋之旧椠，有关经史实学，而世鲜传本者，上也。书虽习见，或宋元刊本，或旧写本，或前贤手抄本，可与今本考证异同者，次也。书不经见，而出于近时传写者，又其次也。而要以有裨于学术治道者为断。”[②] 在张金吾看来，秘本、宋版固然好，是藏书的首选，但这还只是书籍的外在形式，就其内容而言，如果是“有关经史实学”的宋版书，那就是典藏的上品。不管怎样，“有裨于学术治道”的书籍是典藏首先要考虑的选择。

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中，经一直居于首位，其次为史，读书治学，也必以研修经史为主。这样的知识体系就使得藏书，尤其是私家藏书，在各具特点的情况下又有一个几乎一致的政治和学术价值取向，即都重视经史之书的搜求和典藏，乾隆云：“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于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③] 在乾隆看来，经世、载道、立言、牖民是文献典籍之“大义”，如果用水流来比喻这些典籍的话，那么经居于首位，是所有文献之源，史、子、集都是从经这一源头分离出来的。因此，乾隆提出贮藏四库之书，首重经书。乾隆的观点代表了古人读书治学的共同取向，也代表了注重读书治学的藏书家藏书的共同取向。如孙从添说：“藏书之道，先分经、史、子、集四种，取其精华，去其糠秕，

① 江藩：《炳烛室杂文·石研斋书目序》，见《江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9 页。

②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自序，见李希泌等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54 页。

③ 《御制文二集》卷十三《文源阁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经为上，史次之，子、集又次之。”[1] 叶德辉也说：“置书先经部，次史部，次丛书。经先十三经，史先二十四史，丛书先其种类多、校刻精者。初置书时，岂能四部完备，于此入手，方不至误入歧途。”[2] 孙从添、叶德辉的言论与乾隆如出一辙，他们所秉承的藏书标准就是正统的封建学术的标准。在古人看来，读书治学就是要学习圣人之道，而圣人之道主要蕴藏于经史之书中，故而藏书的范围自然是经史为主，为人们阅读、研究圣人之道提供方便。

三、“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典藏与文化传承

中华民族有着历久弥坚的文化认同心理，这种文化认同的心理促使人们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而注重保藏、传承文化典籍便是这种文化心态突出的行为表象。从古代藏书史来看，尽管历代藏书家藏书的目的和情趣各不相同，但他们却对文化典籍怀有一样的敬意和热爱，这种敬爱的根源，就是人们对于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的认同和对于文化传承的执著。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闻名于世，绵延五千年的历史从未间断，表现了这一伟大文化所具有的罕见的传承力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念中，“历史”既是知识的渊薮，又是社会价值标准的来源。它不是僵死的过去，而是富有生命力，并对现实仍有巨大影响的事实。因此殷周时期的先贤们就教育人们要“古训是式”[3]，“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4]。文字产生以后，书籍作为记载“前言往行”等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自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和热爱。春秋时期，孔子“信而好古”，为了“追迹三代之礼”，他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传之七十弟子。于是书籍的产生和发展，便与人们对传统的承继

---

① 孙从添：《藏书记要·鉴别》，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5 页。

② 叶德辉：《藏书十约·购置》，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3 页。

③ 《诗经·大雅·烝民》。

④ 《周易·大畜》。

意识建立了最密切的关系。人们通过书籍追寻文化传统，承继和发扬文化传统，《隋书·经籍志》著录四部典籍，在纵论书籍传承文化的重要性时说：“夫经籍也者……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①] 周少川先生说：“这段话，概括地说明了书籍作为凝聚传统文化的结晶，是千千万万学子承袭人文精神，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依据。因此，保藏书籍就是保存文化、保存传统。这种文化心理被不断强化而固定了下来。它成为古代文献典藏最基本、也是最崇高的文化心态。”[②]

古代藏书家关于典藏与文化传承的关系的认识，一体现为“藏”，二体现为“刻”。藏，是为了保存中华文化的载体——文献典籍；刻，是为了使更多的人看到这些典籍，传播文化。没有藏，便没有古代典籍的存留后世；没有刻，便没有古代典籍的传之后世。

藏书家之藏，是基于对书籍的极度热爱和对保存典籍的高度自觉。在中国古代，藏书、读书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和慰藉，杨万里作《益斋藏书目序》，记载尤袤对书籍的极端热爱，尤袤说：“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以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③] 和尤袤一样，明代胡应麟热爱藏书、读书也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诵之可以当韶濩，览之可以当夷施，忧

①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总序。

② 周少川：《文化情结：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心态探微》，《图书馆学研究》2002年第6期。

③ 杨万里：《诚斋集》卷七十九《益斋藏书目序》，四部丛刊本。

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①] 明代藏书家杨循吉的《题书橱》诗更淋漓尽致地把读书人嗜书如命的心情表达出来：“辛勤十余载，购求心颇专。小者虽未备，大者亦略全。经史及子集，无非前古传。一一红纸装，辛苦手自穿。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恃此用为命，纵横堆满前。当时作书者，非圣必大贤。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②] 在这样的观念驱使之下，倾力典藏就成了藏书家的自觉行动。

在中国藏书史上，不惜一切代价购书、抄书以藏书的记载史不绝书。[③] 宋代，文天祥的父亲文仪“虽贫，浩然自怡，有未见书，辄质衣以市。得书，注意钻研，又以授天祥”[④]；袁翼“闻有未见书，辄奔走求之，往往并金悬购，以必得为快，手披口吟，穷日夕不厌”[⑤]；李清照、赵明诚夫妇为了购书，“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辙市之，储作副本”[⑥]。元代，张思明“平生不治产，不蓄财，收书三万七千余卷”[⑦]；申屠致远“清修苦节，耻事权贵，聚书万卷”[⑧]；同恕“家无担石之储，而聚书数万卷”[⑨]。明代，杨循吉“性最嗜书，家本素封，以购书故，晚年赤贫，所藏书十余万卷”[⑩]。胡应麟更是遇到好书，不惜破产以求，王世贞在《二酉山房记》中说：“余友人胡元瑞，性嗜古书籍，少从其父宪使君京师，君故宦薄，而

---

① 胡应麟：《经籍会通》二，见《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 页。

② 杨循吉：《题书橱上》，见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四百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对此，周少川著《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有详细论述。

④ 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卷十六《先君子革斋先生事实》，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 文征明：《莆田集》卷三十二《袁飞卿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见《金石录校证》，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5 年版。

⑦ 《元史》卷一百七十七《张思明传》。

⑧ 《元史》卷一百七十《申屠致远传》。

⑨ 《元史》卷一百八十九《儒学一·同恕传》。

⑩ 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 页。

元瑞以嗜书故，有所购访，时时乞月俸不给，则脱妇簪珥而酬之，又不给，则解衣以继之。元瑞之橐，无所不罄，而独其载书，陆则惠子，水则宋生，盖十余岁而尽毁其家以为书，录其余赀，以治屋而藏焉。"[①] 清代，祁承㸁在《澹生堂藏书约》中也说自己聚书艰辛："凡试事过武林，遍问坊肆所刻，便向委巷深衢，觅有异本，即鼠余蠹剩，无不珍重市归，手为补缀。十余年来，馆谷之所得，饘粥之所余，无不归之书者。"[②]

除了购书外，他们还拼命抄书，按周少川先生的研究，宋、元、明、清，历代大学者、藏书家为搜求图书，皆不辞辛劳，四处抄书，充实自己的藏书。[③]

总之，藏书家节衣缩食，倾其所有，购买、抄录图书进行收藏，都是出于对先贤圣哲的崇敬，对文献典籍的热爱。

藏书家之刻，则是由于文化传播的需要。对大多数藏书家来讲，他们为传承文化，首先通过收藏保存典籍，接着就是翻刻典籍，使之再生，广泛流通，从而更有效地保护了典籍。

对于刊刻藏书的意义，清代大藏书家张海鹏有精辟的论述，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视区区成就一己之业者，其道不更广耶！"[④] 在张海鹏看来，读书只能丰富自身学养，刻书却可以更大范围地传播知识，嘉惠他人，实现文化的传承，这是比成就一己之事业更大的"道"。张海鹏之侄张金吾秉承叔父意愿，多有刻书，对其价值和意义，阮元有一番评论，可以代表藏书、刻书在文化传承方面所具有的意义，他说："虞山张氏金吾，世传家学，代有藏书，不但多藏书至八万余卷，而撰书至二百余卷，不但多撰书，抑且多刻书至千数百卷。其所纂著校

①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六十三《二酉山房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自序，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详见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117 页。

④ 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卷四《朝议大夫张君行状》，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刻者，古人实赖此与后人接见也，后人亦赖此及见古人也。”[①] “古人实赖此与后人接见也，后人亦赖此及见古人”是对文化传承的生动描写。对于张氏叔侄的藏书以刻书的思想，周少川先生说：“这种想法可以视为当时藏书家从藏书到校书到刻书的普遍的思想倾向，即从一般的藏书为己所有、为己所用的藏书意识上升到保护文化遗产，传延后代，繁衍学术的使命感。”[②]

晚清，张之洞有《劝刻书说》，号召藏书家刻书，传播文化知识，认为这是“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把藏书与文化传承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论述，他说：“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其书终古不费，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者乎。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③] 在张之洞看来，刻书是万古不朽的事业，尤其是刊刻详校精雕的秘本，更是人随书寿，鲍廷博、黄丕烈、伍崇曜、钱熙祚等人就是如此。而且刻书还可以“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

张之洞的话得到叶德辉的认可，叶氏认为刻书可与积金、积书、积阴德媲美，他说：“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是固然也。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④] 刻书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有利于文献传承。

总之，“古代许多学者、藏书家正是基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以及对弘扬传统文化的巨大热情和责任感而收书、藏书、校书、刻书，把

---

① 阮元：《研经室续集》卷三《虞山张氏诒经堂记》，见《研经室集》（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72页。

② 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

③ 《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页。

④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总论刻书之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古代文献典藏事业不断推向了高潮”①。

第三节 文献搜求与典藏的方法

中国古人在具体的藏书实践活动中进行理论思考，总结出一系列文献搜求、贮藏的方法，值得关注。

隋代牛弘在《请开藏书之路表》中，不仅论述了藏书的重要性，还提出了著名的图书“五厄”论，对文献典籍自秦始皇到梁元帝时期所遭受的厄运进行了总结。宋代是文献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与典藏相关的理论成果颇多，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分析了历代典籍散亡的原因，说明搜访典籍的必要性，并系统提出了“求书八法”，被后代奉为圭臬。洪迈的《容斋随笔》、周密的《齐东野语》也论述了“书籍之厄”。明代的典藏理论有了更大的发展，丘浚的《大学衍义补》、高濂的《遵生八笺》、张萱的《西园闻见录》等都有相关篇目论述藏书。胡应麟、祁承㸁的成就最大，胡应麟的《经籍会通》一书，在藏书史、求书之法、收藏标准、藏书鉴定等方面进行总结，有着较为深入的理论思考。祁承㸁的《庚申整书小记》、《澹生堂藏书约》则对购书、鉴书、整书的方法进行了总结，第一次对私家藏书措理之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到了清代，对文献典籍保管之术的研究更加深入，孙从添的《藏书纪要》、叶德辉的《藏书十约》是两部极有影响的藏书方法专著。《藏书纪要》对图书的购求、鉴别、抄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曝书等八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藏书十约》对图书的购置、鉴别、装潢、陈列、抄补、传录、校勘、题跋、收藏、印记等十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两部书都对古书的收藏作了精辟的阐述，所言皆为古人典藏古书之要旨。另外，程俱的《麟台故事》、陈骙的《南宋

① 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馆阁录》等著作分别论述了宋代国家藏书机构的沿革、建制、职能、典章等。古代一些目录著作的序言，也有不少涉及文献搜求与贮藏。凡此，都对中国文献典藏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成为我国文献学发展史上重要的思想遗产。

一、“盛聚”与“大厄”：对文献典籍聚散规律的总结

中国文献典藏丰富，自古及今，有识之士均注重搜求文献。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中国历史上，文献典籍的散佚也相当严重。宋末元初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序》中就指出：“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书籍，到《隋书·经籍志》中，就已经亡佚了十分之六七，《隋书·经籍志》中记载的书籍，到《宋史·艺文志》中又亡佚了十分之六七，实在令人痛心。清代曹溶在《流通古书约》中则谈到宋以来文献典籍的散佚情况：“自宋以来，书目十有余种，粲然可观。按实求之，其书十不存四五。”[①] 面对如此严重的文献典籍亡佚的事实，历史上很多文献学家开始对文献典籍聚散的规律进行总结，对造成文献亡佚的原因进行分析，并逐渐深入，形成了系统的理论。

(1) 文献学家们用变化的眼光看待书籍的聚散，充满辩证色彩。

李清照在谈到赵明诚的藏书时，非常感叹：“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②] 把文献典籍的聚散看成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周密也说：“世间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书为甚。”[③] 明代胡应麟说：“第凡物盛必有衰，聚必有散，即前代帝王名公巨儒，竭天下之力畜之，而一旦且散佚而不能保。”[④] 罗伦在谈到刘氏墨庄藏书的散佚时说：“牙签锦轴扬为飞尘，化为烈烬。几聚而几散矣，况他物乎！聚必有散，隆必有替，治必有乱，

---

① 曹溶：《流通古书约》，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②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见《金石录校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书籍之厄》，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6页。

④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三《二酉山房书目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盈必有亏，天之道也。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况于人乎。”[①] 徐𤊹针对有的藏书家只知“秘惜为藏”，不知“传布为藏”的情况，批评他们“不知世变靡常，聚必有散，一旦三灾横起，流烂灭没，无论藏者，且累著作姓名，一并抹煞”[②]。黄宗羲看到历史上图书亡佚的严重现象，也指出：“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③] 秦恩复亦认为图书“有聚必有散”，有效的做法就是编纂藏书目，“以志云烟之过眼”[④]。周密等人都对历代典籍的聚散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书籍聚散就像盛必有衰、隆必有替等社会、自然现象一样，是一种规律，只聚不散，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是一种客观而又通达的看法。

(2) 对文献典籍的散佚历史进行梳理，分析造成文献散佚的原因。

文献典籍的散佚，古人称为“书厄”，也就是图书所遭受的厄运。最早对历史上图书所遭厄运进行系统梳理的是隋代的牛弘。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指出前世藏书的五厄，即五次大的劫难：秦始皇“下焚书之令”，使得“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为一厄；“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公室图籍，并从销毁”，此为二厄；董卓之乱，图书典籍“一时燔荡”，此为三厄；西晋刘、石乱华，“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为四厄；南朝梁末“周师入郢”，萧绎焚烧典籍，“所收十才一二”，此为五厄。[⑤] 牛弘所梳理的情况，贯彻着一个非常明确的主线，即政治禁毁、兵燹之灾是文献亡佚的主要原因。牛弘把典籍聚散与王朝兴亡联系起来考察的做法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后世学者考察书厄问题的主要视角。唐代封演在牛弘的基础上，又对书厄问题进行探讨，指出北朝的尔朱之乱、周武灭齐以及后来的唐朝灭隋，都造成了严重的书籍破坏，尤其是唐在灭隋的过程中，“尽收图书，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十

---

① 罗伦：《一峰文集》卷二《天宝刘氏族谱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徐𤊹：《徐氏笔精》卷六《藏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南雷诗文集·记类·天一阁藏书记》，见《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④ 《炳烛室杂文·石研斋书目序》，见《江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⑤ 《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

存一二"[①]，把水患纳入到书厄的范围。宋代洪迈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禄山之乱，尺简不藏"，"黄巢之乱，存者尽渺"以及"靖康荡析"三次书厄，并论及私家藏书的散佚情况，指出宋敏求家富藏书，但"元符中一夕灾为灰烬"，晁说之家族同样藏书甚富，然"政和甲午之冬火亦告谴"，明确把火灾纳入书厄之中。[②] 周密《齐东野语》也考察了书厄的情况，特别详尽地梳理了两汉至宋代重要的私家藏书的情况，并指出子孙不肖也是造成图书散亡的原因之一。到了明代，胡应麟、谢肇淛等人对于文献典籍的聚散有了更为系统的分析。胡应麟提出图书十厄的看法，即在牛弘五厄之后，又有五厄："大业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通前为十厄矣。"[③] 大业即隋末之乱，天宝即安史之乱，广明即唐末之乱，靖康即靖康之难，绍定即南宋之乱。胡应麟还在封演等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古今书籍，人知其厄于火而不知其厄于水者"，并列举了历史上书籍厄于水患的例子来说明问题。[④] 徐𤊹则主要论述了藏书家后世子孙不肖对典籍散亡的影响，他指出，田产屋宇及尊罍彝鼎，子孙多能"保守不失"，因为它们可以提供衣食和把玩欣赏，"惟蓄书籍图画多者，子孙虽贤，未必保守不失，何也？非深知笃好者鲜不屑越也。余见保产业之家多至六七代，而保书籍者不过一二代耳"[⑤]。与胡应麟等人不同的是，谢肇淛超越单独罗列事实来论述文献典籍聚散的局限，开始从性质相近、归纳类比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他在《物聚必散》一文中说："大凡尤物，聚极必散。毋论财货，即书画器具，裒集甚艰，而其究也，或厄于水火，或遘于兵燹，或败坏于不肖子弟，或攘夺于有力势象。"近人陈登原作《古今典籍聚散考》，就承袭了谢氏的观念，在该书"叙引"中说："若以

① 封演：《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二《典籍》，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页。

② 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五《书籍之厄》，见《容斋随笔》，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70页。

③ 胡应麟：《经籍会通》一，见《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④ 胡应麟：《经籍会通》一，见《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⑤ 徐𤊹：《徐氏笔精》卷六《保守书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性质相近，比属而论，默推典籍聚散之故，盖以①受厄于独夫之专断而成其聚散，②受厄于人事之不臧而成其聚散，③受厄于兵匪之扰乱而成其聚散，④受厄于藏弆者之鲜克有终而成其聚散。”陈登原分政治、兵燹、藏弆、人事四类讨论文献聚散，把焚书、禁书、文字狱、篡改抽毁等归入政治类，把历代兵火及外来入侵等归入兵燹类，把藏书家的个人失误、子孙不肖等归入藏弆类，将水淹火烧、鼠啮虫蛀等归入人事类。陈登原依文献散佚的类型所作的分类，概括恰当，科学合理，自成体系。

从人们对文献典籍散佚的历史梳理以及对散佚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古代学者深刻认识到文献典藏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从牛弘开始，封演、洪迈、周密、胡应麟、徐㶿、丘浚、谢肇淛等人不断梳理书厄的线索和历史，勾画出了中国文献典籍散佚史的主线。在这条主线上，社会动荡、政治禁毁、兵燹之灾一直被当作文献散亡的主因。学者们对这种破坏文献典籍的政治事件的责难，彰显出深刻的批判现实的精神。

其二，对文献亡佚原因的分析，从单一到多元。早期的文献学家在分析文献亡佚原因时，只注意到兵燹，其后才注意到水患、火患、藏书家个人保存不善等，认识愈来愈全面。

其三，对文献亡佚原因的概括，由具体到抽象。早期的文献学家总是从非常具体的问题出发来谈论文献散亡，热衷于罗列现象。明清时期的文献学家则逐步上升到较为抽象的高度，在较为宏观的层面上思考问题。这也反映了文献学家抽象思维能力的逐步提高。

（3）对文献典籍的“盛聚”进行研究。

文献典籍既然有“大厄之会”，就必然有“盛聚之时”。牛弘的《请开献书之路表》以及《隋书·经籍志》在对各代典籍散佚进行分析时，也都对典籍的聚集进行了梳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胡应麟提出了书籍聚集的“八盛”论，他说：“春秋也、西汉也、萧梁也、隋文也、开元也、太和也、庆历也、淳熙也，皆盛聚之时也。”① 胡应麟所说的这几个时期，实

① 胡应麟：《经籍会通》一，见《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际上都是帝王重视文献典籍的搜集且政治环境相对安定的时期。春秋时期，虽列国纷争，但百家争鸣，诸子蜂起，藏书由此导源。西汉至武帝时，天下承平日久，国力强盛，经学发达，自帝王至士大夫均雅好图籍。南北朝萧梁时期，“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①]，江左文献，于此为盛。隋文帝括平海内，为典藏创造了安定的社会条件。唐朝开元时期，玄宗命马怀素等人校书编目，推动了公私藏书的发展。太和时期，唐文宗在安史之乱后访求遗文，公私藏书又出现繁盛局面。庆历、淳熙是宋代公私藏书的两个高峰。由此可见，社会稳定、政治相对清明的时期，公私藏书均不断发展，是文献的“盛聚之时”。古代文献学家无论是考察文献亡佚还是考察文献聚集，都自觉和政治环境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与此同时，古代学者还认识到文献的“易散难聚”，并特别指出帝王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徐𤊹在《帝王好书》一文中历数历代帝王聚书的事迹，予以表彰，并指出明朝“国家事事可侔前代，独好文之主稍逊”[②]，进行了批评。丘浚在考察了汉代帝王“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的情况后，号召“后世人主有志于道艺而留心于载籍者，尚当以汉世诸帝为法”。[③] 丘浚还指出，万事万物被损毁以后尚可“稍复其旧”，只有图书典籍，一旦亡散，古人思想观念均随之消失，无法恢复，“是以古先圣王莫不致谨于斯，以为今之所以知昔，后之所以知今者之具，珍藏而爱护之，惟恐其损失也，讲究而校正之，惟恐其讹舛也”[④]。在丘浚看来，文献典籍不可再生，一旦亡佚，就无法恢复，故而帝王必须重视聚书，保护好这份文化遗产。

二、求书之道

搜求图书是藏书的前提，由于历代文献典籍佚失严重，流传日少，再加上自然、社会等条件的限制，而且，对于藏书家来说，藏书都有非常明

---

①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总序。

② 徐𤊹：《徐氏笔精》卷六《帝王好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九十四《图籍之储》，京华出版社1999版，第802页。

④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九十四《图籍之储》，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04页。

确的目的，并非贪多滥收，因此，访求图书并非易事。也正因为此，宋代的郑樵、明代的胡应麟和祁承㸁都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求书之法”，其中还蕴藏丰富的方法论思想。

首先，对求书之难的看法。对于求书中存在的重重困难，藏书家有着较为清醒的看法。明代学者谢肇淛列出求书五难，即古书泯灭无传、尚未表章、藏家秘而不宣、厄于财力坐失良机、眼光不同未能访求。[①] 和谢氏同时代的陈贞铉则列出求书十难：“聚书有十难，学无渊源，一难也；家少承书，二难也；不生通都大邑，三难也；乏慧鉴，四难也；隋唐以上书不多见，五难也；携带跋涉，易致触损，六难也；检曝之劳，病于夏畦，七难也；近无善本，校雠斯苦，八难也；家贫购书，九难也；片时不阅，便供蛀虫，十难也。”[②] 到清代，孙从添又提出聚书六难，他说：“知有是书而无力购求，一难也；力足以求之矣而所好不在，二难也；知好之而求之矣，而必欲较其值之多寡大小焉，遂致坐失于一时，不能复购于异日，三难也；不能搜之于书佣，不能求之于旧家，四难也；但知近求，不知远购，五难也；不知鉴识真伪，检点卷数，辨论字纸，贸贸购求，每多缺轶，终无善本，六难也。有此六难，则虽有爱书之人，而能藏书者鲜矣。”[③] 从人们的论述来看，无论是五难、十难还是六难，无非讲了主客观两个方面的问题。就主观来讲，由于聚书之人受到学识、眼光、财力、爱好等条件的限制，无法求得更多的书籍。就客观来讲，由于受到生活环境、学术环境、书籍流传等条件的限制，同样使人们无法求得更多的书籍。其实，古人所论求书之难，恰恰从困难的角度提出访书过程中可能碰到的一些规律性现象，可为访求者所注意和克服。

其次，对求书方法的探讨。明代学者谢肇淛说：“求书之法，莫详于郑夹漈，莫精于胡元瑞。”[④] 郑夹漈即郑樵，胡元瑞即胡应麟，二人求书均

① 谢肇淛：《五杂组》，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4～265 页。

② 徐𤊹：《徐氏笔精》卷六《聚书十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孙从添：《藏书记要·购求》，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3 页。

④ 谢肇淛：《五杂组》，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4 页。

有一套有效的办法，深得后世学者赞赏。

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有多篇论述涉及书籍的散佚及求书的方法，它们分别是《书有名亡实不亡论》、《编次失书论》、《见名不见书论》、《收书之多论》、《阙书备于后世论》、《亡书出于后世论》、《亡书出于民间论》、《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求书之道有八论》。在这些篇章中，郑樵首先讨论了散亡之书的存在状况：其一，“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有的书确实亡佚了，而有些书看似亡佚了，实际上它的很多内容存在于其他书中，“名虽亡，而实不亡者也”①。其二，“古之书籍，有不出于当时而出于后代者”。有些古书，当时的目录书并没有记载，但后世却出现了，这主要是因为目录编校者的失误造成的。其三，“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有些图书不见于官藏，却散落民间，由民间藏书家保存。郑樵对散亡之书存在状况的分析，富有卓识，为其求书方法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郑樵看到，很多古书“民间所有，秘府所无”，都是因为“求之之道未至”。他提出政府要专门派遣求书之官求书，方能奏效，“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②。

除此之外，郑樵对“求书之法”深有研究，他说：“求书之道有八：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当不一于所求也。”③ 郑樵结合自身求书的实例所提出的八种方法，周少川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④，所谓“即类以求”和“旁类以求”，就是结合图书的内容向与其有关的学派、职业访求，如星历、乐律之书，求之星象家和乐工，性命道德之书，求之道家等。所谓“因地以求”和“因家以求”，就是注意与图书相关的某些地方性特点，在不同的地区寻访不同的图书，如《零陵先贤传》，一般在零陵本地为多；某人传记、家谱，求于其人身后子孙；某人作品，

①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08页。

②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12页。

③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13页。

④ 详见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13页。

求之其人家乡等。所谓“求之公”和“求之私”，是按图书收藏者的范围进行搜寻，如礼仪、祭祀、法律、官制等书，可求诸官府，珍稀秘本多藏于民间等。所谓“因人以求”和“因代以求”，即注意按某人做官的经历和时代的限制及时求书，如某人在某地做官，或有当地藏家之书；时代久远的，其书不易求，时代较近的，存书尚多，当及时寻访。

郑樵的“求书八法”系统而完整，他所求之书，不仅包括散落之书，还包括亡佚之书。更为重要的是，郑樵在“八法”之后强调“当不一于所求也”，即不能拘泥于一种求书方法，这是郑樵求书之法的思想精髓。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方法求书，各种方法要交互使用，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预期的求书效果。

郑樵的“求书八法”得到后世学者的赞赏，胡应麟认为郑氏之法“可谓曲尽求书之道，非沉湎典籍者不能知”[①]。但同时指出这种方法也有自身的局限，“可藉以求唐宋以下之书，秦汉而上亦难致也”[②]。在吸收前人求书方法的基础上，胡应麟形成了自己的书籍收集之道。首先，要有明确的目的性。事实上，每个人藏书都有自己的目的性，漫无目的聚集图书的现象是不存在的。胡应麟认为求书有难易、缓急之别，不同的人对书籍有不同的需求，“文人所急者先秦诸书，诗流所急者盛唐诸书，举子所急者宋世诸书”[③]。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的需求求书。其次，以勤补贫。求书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对于家境贫寒的书生来讲，要想拥有大量的藏书，那就只能以勤补贫。胡应麟以一介布衣而藏书丰富，靠的就是勤于搜书，“穷搜委巷，广乞名流，录之故家，求诸绝域，中间解衣缩食，衡虑困心，体肤筋骨，靡所不惫”[④]。

---

① 胡应麟：《经籍会通》四，见《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② 胡应麟：《经籍会通》四，见《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③ 胡应麟：《经籍会通》四，见《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④ 胡应麟：《经籍会通》四，见《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和郑樵、胡应麟相比，祁承㸁从更为广阔的视野里提出了他的求书原则："眼界欲宽，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①] 所谓"眼界欲宽"，指的是知识范围要广，学识要渊博，眼界要宽阔，收书不拘一格。他批评了当时两种错误的读书观念，一是"每见子弟于四股八比之外略有旁览，便恐妨正业，视为怪物"，二是"子弟稍窃窥目前书一二种，便自命博雅，沾沾自喜"。在祁氏看来，前者目光狭隘，后者炫耀自我，都对聚书不利。因此他号召聚书要放宽眼界，要知道"旷然宇宙，自有大观"。[②] 所谓"精神欲注"，所强调的是求书要专心。在祁氏看来，人们嗜好多样，或"博饮狭邪"，或"驰马试剑"，或"染翰临池"，或"鼎彝金石"，但是这些嗜好都"不足言"，只有嗜书才是最值得称道者。他说："古今绝世之技，专门之业，未有不由偏嗜而致者。"只有精神专注了，才能物聚于所好，"奇书秘本，多从精神注向者得之"。[③] 所谓"心思欲巧"，讲的是灵活运用各种方法求书，拓宽求书渠道。祁氏对郑樵"求书八法"非常赞赏，认为是"典籍中之经济矣"，同时又在"八法"之外补充了"三说"，即辑佚法、析离法、书目书序索引法。辑佚法即从他书中辑出本书。郑樵曾提出著名的"书有名亡而实不亡"的理论，但"书不亡"的根据是什么呢？祁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指出"书有著于三代而亡于汉者，然汉人之引经多据之；书有著于汉而亡于唐者，然唐人之著述尚存之；书有著于唐而亡于宋者，然宋人之纂集多存之"。在后人著作中可以看到前人著作的内容，因此可以从这些著作中将前人之书辑出，"凡正文之所引用，注解之所证据，有涉前代之书而今失其传者，即另从其书各为录出"[④]。析离法即主张将一些重要的古籍注本一分为二，如将

① 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② 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6页。

③ 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④ 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水经注》、《世说新语》中的注文析出，使正文与注文并存于世，这样既可让人看清正文的本来面貌，也可对注文和考证进行独立的研究。书目书序索引法即编制求书书目，按目访求，从而起到“夜行之烛”、“探宝之珠”[①] 的作用。祁承㸁的“三说”拓宽了求书的渠道，为藏书理论增添了新内容。

从郑樵、胡应麟到祁承㸁，中国古代聚书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差异。郑樵的求书之法，关注的是求书的具体途径，胡应麟的求书之道，更关注求书的目的性，而祁承㸁则把眼光更多放在藏书家主观的作为上。侧重不同，其道则一，即为人们聚集更多更好的图书提供方法或方法论支持。

三、措理之术

中国古代藏书家在长期的藏书实践活动中，形成了大量的行之有效的收藏方法，除了散见的记载外，更有一些有心之士，将这些经验寻绎归纳，著述传世，诸如祁承㸁的《澹生堂藏书约》、《庚申整书小记》，孙从添的《藏书纪要》，叶德辉的《藏书十约》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著作不仅有较为抽象的理论阐释，诸如对典藏功用、藏书心态的分析，更有较为具体的方法介绍，诸如图书的鉴别、保藏、装潢、陈列等，所涉及的都是藏书的措理之术。

其一，鉴别。鉴别是收书的关键，历代藏书家无不慎之又慎。祁承㸁在《澹生堂藏书约》中就列有“鉴书之训”。他说：“夫藏书之要在识鉴，而识鉴所用者在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而别品类，如此而已。”[②] 可以看出，祁氏不是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识鉴典籍，而是从典籍的品位、真伪、内容、急需或缓用等方面来判断图书的价值。比如在“审轻重”方面，他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来排列典籍的品位，他还进一步

① 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② 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指出："得史十者不如得一遗经，得今集百者不如得一周秦以上子，得百千小说者不如得汉唐实录一。此其书不相及也。"① 对于典籍的产生时代，他认为愈古愈善，他说："购国朝之书十不能当宋之五也，宋之书十不能当唐之三也，唐之书十不能当汉与六朝之二也，汉与六朝之书十不能当三代之一也。此其时之不相及也。"②

和祁承㸁略有不同的是，孙从添在图书鉴别上更看重图书的版本。他指出："夫藏书而不知鉴别，犹瞽之辨色，聋之听音，虽其心未尝不好，而才不足以济之，徒为有识者所笑。"③ 此论之后，孙氏对于如何鉴别宋刻、元刻、明刻、清刻、抄本等具体的技术问题作了具体的说明，如称"鉴别宋刻本须看纸色、罗纹、墨气、字划、行款、忌讳字、单边"，"元刻不用对勘，其方脚行款，黑口，一见便知"，"洪武、永乐间所刻之书尚有古意，至于以下之板，更不及矣"等。孙氏还指出，购置宋元刻本，须防假冒，当时有"将明藩本、明蜀本、明翻刻宋本，仿刻本文、序跋，染纸色，伪诈宋刻，真赝杂乱，不可不辨"。就是宋刻，也分数等，如称"十三经蜀本为最，北宋刻第一，巾箱本甚精"，"十七史宋刻九行十八字最佳"。最后，孙氏提出鉴别版本的总原则："凡收藏者，须看其板之古今，纸之新旧好歹，卷数之全与缺，不可轻率。"④ 孙从添所论鉴别之法，在审定版本方面有独到之处，有关技术上的问题，阐述甚详，成为清代许多藏书家的指南。

叶德辉也论版本鉴别，但他没有在技术细节上过多论述，而是独辟蹊径，为藏书家指一条自通之路，他说："当知鉴别之道，必先自通知目录始……不通目录，不知古书之存亡。不知古书之存亡，一切伪撰抄撮、张

---

① 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② 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③ 孙从添：《藏书记要·鉴别》，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④ 孙从添：《藏书记要·鉴别》，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冠李戴之书，杂然滥收，淆乱耳目。此目录之学，所以必时时勤考也。”①他开列了一批清代私家藏书的目录，作为后学者鉴别古书参考借鉴的对象。叶德辉着意于引导人们关注私藏目录，是和当时私家藏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清代私家藏书经过数代人的经营，在古籍版本鉴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方法，创获颇多。这些经验和方法，往往被藏书家们写进私家藏书目录中。叶德辉指出鉴书要先通目录，不仅为藏书者指明了一条捷径，而且揭示了私家目录中有关鉴别古书方法的内容，是一举两得之举。

其二，保藏。从中国藏书史来看，除了禁毁、兵燹等政治原因外，水、火、虫等自然因素对图书破坏也非常严重。古代藏书家在自然损害以后，吸取教训，总结出了一些防水、防火、防蠹等的保藏经验和方法。在这方面，孙从添和叶德辉成就最大。

就防水来讲，孙从添认为藏书楼要避开“卑湿之地”②。叶德辉说：“藏书之所宜高楼，宜宽敞之净室，宜高墙别院，与居宅相远，室则以近池水，引湿就下，潮不入书楼，宜四方开窗通风，兼引朝阳入室”。“窗橱俱宜常开，楼居尤贵高敞，盖天雨瓦湿，其潮气更甚于室中也”。“春夏之交，宜时时清理，以防潮湿，四五月黄霉，或四时久雨不晴，则宜封闭，六七月以后至冬尽春初，又宜敞开”。③叶德辉关于防水防潮的保管经验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藏书宜在高楼，这样可以避免洪水或潮气；二是筑高墙，远宅居，既隔火源，又隔水源；三是如无高楼条件，坐地之室则宜有蓄水之池，以便“引湿就下”，这一点与孙从添消极地避开潮湿地有所不同，而是主动导流防湿；四是常开窗通风，驱除潮气，避免霉烂生虫。

就防火来讲，孙从添特别赞赏古人的“石仓藏书”，他说：“古有石仓藏书，最好，可无火患，而且坚久。今亦鲜能为之。惟造书楼藏书，四围

① 叶德辉：《藏书十约·鉴别》，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② 孙从添：《藏书记要·收藏》，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③ 叶德辉：《藏书十约·收藏》，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3页。

石砌风墙，照徽州库楼式乃善。不能如此，须另置一宅，将书分新旧钞刻，各置一室封锁，匙钥归一经营，每一书室，一人经理，小心火烛，不致遗失。"① 石仓藏书固然很好，但后世照此办理存在很多困难，所以孙氏提出按照徽州库房的样式，砌石墙、断火源，来保护图书。他还提出专人专责，预防火患。在防火方面，叶德辉提出"灯烛字篓，引火之物，不可相近"② 的主张，这实际上是天一阁"约不携烟火"的翻版。总之，各种防火措施不外两个方面，一是用石、用水等隔断火源，二是书室远离火源，严禁书楼内用火。

就防蠹来讲，我国的防蠹技术由来已久，西汉刘向校理图书，就已经用"杀青"的方法进行典籍防蠹了。后世又发明了染纸避蠹、药物避蠹、治糊防蠹、曝书去虫防霉等方法，③ 而孙从添、叶德辉则系统总结了这些方法。孙从添说："藏书断不可用套，常开看则不蛀。柜顶用皂角炒为末，研细，铺一层，永无鼠耗。恐有白蚁，用炭屑石灰锅锈铺地，则无蚁……书放柜中或架上，俱不可并，宜分开寸许，放后亦不可放足，书要透风，则不蛀不霉。"④ 叶德辉说："橱下多置雄黄石灰，可辟虫蚁。橱内多放香烈杀虫之药品，古人以芸草，今则药草多矣，肉桂、香油或嫌太贵，西洋药水、药粉，品多价廉，大可随时收用，食物引鼠，不可存留。"⑤ 孙、叶都重视药物防蠹，同时注意摆放要通风，要勤翻阅，可以防潮防虫。古人还总结了曝书去虫防霉法。曝书即晒书，《穆天子传》里就有了曝书的记载，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还总结了曝书的经验。唐宋之际，公家

---

① 孙从添：《藏书记要·收藏》，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② 叶德辉：《藏书十约·收藏》，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③ 见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229页。

④ 孙从添：《藏书记要·收藏》，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⑤ 叶德辉：《藏书十约·收藏》，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藏书每年在适当时候曝书，已成制度，即"曝书会"。孙从添指出，晒书须在伏天，一日晒一柜，用高凳支起二尺宽、一丈五六尺长的木板晒书，两面翻晒，摊书、收书时不可汗手拿书，以免污损，曝书后必须凉透才能上楼入藏。[①] 由于南北气候的差异，所以晒书季节的选择又各有不同，对此，叶德辉有自己的看法："古人以七夕曝书，其法亦未尽善。南方七月正值炎薰，烈日曝书，一嫌过于枯燥，一恐暴雨时至，骤不及防，且朝曝夕收，其热非隔宿不退，若竟收放橱内，数日热力不消，不如八九月秋高气清，时正收敛，且有西风应节，藉可杀虫。南北地气不同，是不可不辨者也。"[②] 这种因时因地而变通的方法，又高出孙从添一筹。

其三，装潢。从文献记载看，古代藏书家很早就有意识地保护、爱惜书籍。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已经不仅仅考虑平时对书籍的爱惜，而是更多注意到对书籍采取装潢的方式进行保护。装潢技术在古代可以追溯很早，尤其是书画的装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清代孙从添、叶德辉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对书籍装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孙、叶有关装潢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实用。孙从添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③] 叶德辉非常赞成孙从添的观点，说："装钉不在华丽，但取坚致整齐。"[④]

至于装潢的方法，则各有讲究。孙从添从制作封面、折叠书页、订书眼、套页、切边、订线、贴书签等工序说明装潢的用料和技术要求。他强调书籍装潢不用书套，因为书套过于密封，容易生虫。他提出"糊裱宜夏，折订宜春"，因为夏天糨糊易干，不致发霉，春天装订手心和额头无汗，不会渍霉书页。他还提出装潢用色既不能华丽又不能呆板，要注意内

① 孙从添：《藏书记要·曝书》，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8页。

② 叶德辉：《藏书十约·收藏》，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③ 孙从添：《藏书记要·装订》，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④ 叶德辉：《藏书十约·装潢》，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外颜色的和谐。叶德辉对装潢的要求则强调因地制宜，特别注意南北的区别。如云："北方书喜包角，南方殊不相宜。包角不透风，则生虫，糊气三五年尚在，则引鼠。"他还反对南方用书盒，主张用夹板，云："北方多用纸糊布匣，南方则易含潮，用夹板夹之最妥。夹板以梓木、楠木为贵，不生虫，不走性，其质坚而轻。"在装潢书籍方面，叶氏还强调"勤"，"每得一书，即付匠人装饰，今日得之，今日装之，则不至积久意懒，听其从乱"[①]。天道酬勤，大概只有这样着意保护，才能使藏书历久常新。

其四，陈列。对于藏书的陈列，古人颇有法度。唐朝时藏书家李泌用红、绿、青、白四色牙签分悬四部书，世称"邺架"，既区分了图书部类，又方便了检索。明清时期，祁承㸁、孙从添、叶德辉诸人对图书陈列编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祁承㸁在《庚申整书小记》中继承郑樵"治书如持军"的方法，把藏书管理比喻为用兵，并由此总结出寡法、众法、部勒法、应卒法、联络驾驭法、坚壁清野法、用寡以御众法、借资于人而因粮于敌法等八种方法。八种方法中部勒法、应卒法、联络驾驭法即有关图书的陈列。所谓部勒法，是指陈列如同排兵布阵，井然有序，"插架七层，籍分四部，若卒旅漫野而什伍井然，如剑戟摩霄而旌旗不乱"。应卒法则要求在陈列中体现图书的分类和条理，检书能够做到手到擒来。联络驾驭法则是提倡"抽一卷而万卷可知，举一隅而三隅在目"，图书陈列有由此及彼、互相联系的系统性。

孙从添对藏书陈列的探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图书的摆放，他强调架上图书摆放要稍微宽松、透气，这样不易霉蛀。对于书架，他认为"雅而精，朴素者佳"，书架放置不可靠近窗户和墙壁。二是通过建立藏书的编目体系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图书编目与陈列关系密切，编目除了有学术价值外，还有明显的实用价值，可以使藏书"检阅清楚，门类清晰，有条有理"[②]。按照这样的目的，孙氏提出编制四种书目：藏书总目、善本书

---

① 叶德辉：《藏书十约·装潢》，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7页。

② 孙从添：《藏书记要·编目》，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4页。

目、排架目录、流动书目。前两种书目关乎学术，此处不讨论。后两种书目则是专门的管理书目。排架书目详记何书在何书柜的何位置，以便查取，可兼作借阅清册。流动书目则记载何书何时取出、何时归还，以便心中有数，随时整理。

叶德辉对图书陈列颇为讲究，他提出在图书的摆放时要将大本和小本分别搁置，单本和丛书也要区分。书柜之间，要以门类相聚，如五子、七子之类，衔接起来，便于利用。他认为陈列的顺序可以不必与目录相同，只要便于检阅即可。陈列既定，可编一草目，体例可以与正目不同，载明某书在某柜，以便检索和随时注明增减。

以上所论列之鉴别、保藏、装潢、陈列等四项，均为藏书措理之术，这些方法虽嫌具体琐细，但却是中国几千年藏书经验的总结，值得珍视。不仅如此，从这些图书措理之术来看，藏书家们常常能因地制宜、随时变通，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整理图书的办法，其中所蕴含的变通的思想观念，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三章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文献分类叙录的理论

中国的文献典籍极其丰富，堪称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区分其类别，明确其源流，评价其价值，发挥其作用，就成了历代文献学家致力的事业。自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编纂《别录》、《七略》以来，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编目便代有其人，连绵不绝，出现了国家目录、地方目录、私藏目录、史志目录、专科目录等形式和众多目录学名著，形成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

由于中国自古就有分类叙录文献的文化自觉，而文献本身又是对人类经验事实的记录与总结，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结晶。因此，对文献的分类著录，实际上就是对文化遗产的反思与整序。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对于文献整序和文化分析的思想和理论，在分类原则、著录方法、目录功用、目录与政治活动、道德教化、学术发展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提出了颇有价值的观点。由此，考察古人在文献分类、著录等方面的思想和理论，揭示目录著作中所蕴含的学术史评论方面的思想，分析文献目录学与学术史、思想史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对于拓展文献学的学科内涵，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一节 “盖有目录，以为纲纪”

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叙录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文献编目活动，更不仅仅是为了获取文献的方便。在古人看来，文献的分类叙录就是一种“为治之具”[①]，他们通过文献分类、编制目录、撰写提要等，把现实社会中的政教人伦观念表达出来，辅助统治者进行政治治理。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古人那里，文献目录学绝不是技术层面的工作，它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和明显的价值取向。

一、弘道设教

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明确的价值观念，有着鲜明的致用色彩。早在先秦时期，诸子在评论各家学术时就强调它的致用功能。如在划分儒家经书时，《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六经分别被赋予不同的教化功能，这种致用思想显然对后世目录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上言论在后世的目录学著作中被反复引用，经常被作为论证分类叙录的价值依据。可以这样说，目录学的价值取向，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

在古人看来，文献典籍的价值无所不包，除了“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等宏大作用外，对于成就大业的帝王和追求成功的匹夫，文献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都必

---

①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总序。

须依靠文献典籍。正是因为对文献的价值有着如此深刻的认识，所以才会对图书分类叙录的价值有着深刻的体认。由此，《隋书·经籍志》认为："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① 又进一步指出："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虽未能研几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故列之于此志云。"② 显然，在古人看来，目录不仅是文献之纲纪，更是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之纲纪。《隋书·经籍志》在编制图书目录时，对前代目录中的文献典籍作了一番取舍，其标准就是是否"辞义可采"、"有益教理"，之所以这样，目的就是"弘道设教"。

基于以上认识，古人编制图书目录，总是从弘道设教的角度考虑问题，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思想观念投射到目录编制之中。

如修纂《四库全书》时，乾隆皇帝就想通过修书来达到自己维护纲常名教、以求民族思想之统一的目的。他的这一思想在《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中贯彻无遗。《四库全书总目·凡例》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文章德行，自孔门既已分科，两擅厥长，代不一二。今所录者，如龚诩、杨继盛之文集，周宗建、黄道周之经解，则论人而不论其书。耿南仲之说《易》，吴开之评《诗》，则论书而不论其人。凡兹之类，略示变通，一则表章之公，一则节取之义也。至于姚广孝之《姚虚子集》，严嵩之《钤山堂诗》，虽词华之美，足以方轨文坛，而广孝则助逆兴兵，嵩则怙权蠹国，绳以名义，非止微瑕，凡兹之流，并著其见斥之由，附存其目，用见圣朝彰善瘅恶，悉准千秋之公论焉。"这里实际上是交代了《四库全书》的著录标准，其一是"论人而不论其书"，其二是"论书而不论其人"，其三是"附存其目"。③

---

① 《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

②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总序。

③ 高路明：《古籍目录学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

但这些标准都不是学术的，而是政治的或道德的。所谓“论人而不论其书”，《凡例》举了龚诩、杨继盛、周宗建、黄道周四位明朝人来说明问题。龚诩为洪武年间官员，拒不仕燕王朱棣，忠于故君；杨继盛在嘉靖时因弹劾权相严嵩而遭弃市；周宗建在万历间为阉党魏忠贤所害；黄道周在明亡后拥立唐王朱聿键为隆武帝，后抗清失败，不屈而死。这四个人虽然遭遇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忠于君王。他们符合清廷表彰忠义之士的政策，因此不论其所著书籍有无价值，均收入《四库全书》中。所谓“论书而不论其人”，《凡例》举了耿南仲、吴开两个例子来说明问题，耿、吴二人在宋代靖康时期力主割地之议，编纂者虽对二人之人品进行贬斥，但认为耿南仲所著《周易新讲义》和吴开之《优古堂诗话》“往往切实有裨”，“颇有可采”。故也在收录之内。所谓“附存其目”，《凡例》举了姚广孝和严嵩两个例子。姚广孝助燕王谋逆篡位，严嵩权相蠹国，二人所著书籍“虽词华之美，足以方轨文坛”，但“绳以名义，非止微瑕”，故而将其附于存目之中。很明显，无论哪一种情况，其标准都是“用见圣朝彰善瘅恶，悉准千秋之公论”。当然，在统治者看来，本朝的善恶标准就是千秋万代的善恶标准，本朝的言论当然也就是“千秋之公论”了。可以说，图书分类已经不仅仅是起到指引治学门径的作用，而且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其对典籍的分类、褒贬完全体现帝王的意志。

晚清，利用目录宣传政治主张成为当时的学术潮流，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目的就是为了宣传新学，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之治绩”，“使中国人知日本有此种要籍而译读之”。康有为反复强调“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矣”。“大收日本之书，作书目志以待天下之译者”。“先著简明之目，以待忧国者求焉”。“吾今取之至近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愿我君读明治之维新书，借观于寇仇，而悚厉其新政，以保我万万里之疆域”。[①] 梁启超更是自觉利用目录学宣传自己的政治和学术观念，编纂《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东籍月旦》等书目，可以说，“宣传西学是他开始目录学研究的目

①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上海大同译书局光绪间刻本。

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他目录学思想的基础"①。当时很多维新人士编制的目录著作，多有宣传政治主张之意。

总之，传统目录学通过对各种文献的分类叙录来维护传统社会秩序，前面引述《隋书·经籍志》所谓"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之言，是这种分类叙录思想产生的根源。那么，古典的分类叙录的文献著录方式又是如何达到维护统治秩序、文化秩序和道德伦理秩序的作用的呢？要而言之，主要靠两种方法。

其一，分类。即通过六分法、四分法等各种分类方法以及各部类下面的小类来体现其政治、伦理和教化的观念。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为例，《总目》作者在地理类之下划分若干小类，其分类就体现了正宗思想："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辨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② 这种分类明显地体现出两种观念，一是拱卫王室、天下一统的思想，二是分辨方域、经世致用的思想。一层一层，以拱卫王室为中心展开，其地位和价值依次递减，逻辑严密。而这种分类排列方式的逻辑起点就是弘道设教。可以这样说，地理类中宫殿、总志、都会、郡县、河防、边防、山川、古迹以至于外纪的排列顺序，实际上是根据总体地理学的价值选择而逐级决定的。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总目》中的职官类，该类下分官制和官箴两小类，其目的一是"稽考掌故"，以备文献，二是"激劝官方"，以肃清吏风。体现的同样是经世的价值取向。

其二，提要。即通过凡例、部序、类序、解题、案语等形式，强调某类文献及某种观念在政治、伦理上的教化功能，以期有裨于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比如刘向编制《别录》时，就对诸子典籍的政治实用价值特别重视，总是在"叙录"中点出来，提醒人们注意其价值。如《战国策·叙

---

① 余庆蓉、王晋卿：《中国目录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史部·地理类小序》。

录》说该书"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晏子·叙录》云："其（内篇）六篇可常置旁御观。"班固对刘向的做法非常赞赏，认为他和孟子、荀况、董仲舒、司马迁、扬雄一样，"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①。郑樵认为班固改造《七略》为《汉书·艺文志》，就是要"蹑刘氏之迹"②，突出文献的经世价值。刘歆在《诸子略》"大序"中对"九流十家"进行了一番比较评论，纵论其优劣短长，明确指出："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隋书·经籍志》亦云，诸子典籍，"若使总而不遗，折中之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则强调子部诸家"皆有补于时"，并指出其弊端乃"非道本然"，"特学者失之"。《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也把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六家当作"治世者所有事"，所谓"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③。由此可见，从汉代刘氏父子，中经隋唐宋元，直到清代，诸子典籍一直被人们当作"兴化致治"的工具而存在。虽然儒家之书在汉代以后就被统治者尊奉和信仰，并理所当然地在政治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古代的目录学家并没有因此而忽视其他典籍在政治生活中的价值和作用，相反，他们总是在文献叙录中指出每类文献的实用价值之所在，为历代统治者有效利用文献进行政治教化提供帮助。

二、崇经重儒

和弘道设教一样，崇经重儒也成为古代目录学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所

---

①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②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1821 页。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子部总叙》。

谓崇经重儒，就是在图书分类中以六经居首，以儒家为上。

汉代董仲舒上《贤良对策》，云："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 汉武帝接受了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②。统治者提倡读经，天下士子靡然向风，习经乃学问正道，经书俨然成了第一等书籍。在此风气驱使之下，刘向在《别录》中独尊儒术，把"六艺"列于各类书籍之首，不仅如此，在书的提要中，也同样奉行了以是否符合经义为准的原则。

刘氏父子的崇经重儒思想，成为后世目录学遵行不悖的原则，其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经书无论在何种分类法中都居于第一。在目录学著者看来，"经者非他，天下之公理而已"③。经是天下之公理，是治国安邦之准绳。基于这样的看法，历代目录著作，无一例外将六经置于众书之上。不仅如此，对于那些肆意改经者，目录著作都进行了批评。而成于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更是崇经的代表。《总目》对背离圣人之道、篡改经书旨意的著作，直接在文献分类中将其摒入存目，打入另册。其春秋类小序就说："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总目》还特别重视经的教化功能，在提要中反复阐明经的意旨，认为经很好地体现了圣人的教化思想，有益于人事。如同属音乐类著作，《总目》将熊朋来的《琴谱》和王坦的《瑟旨》列入经部乐类，而把朱长文的《琴史》、和素的《琴谱合璧》列入子部艺术类琴谱之属，其理由是："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④ 在《总目》作者看来，后两者乃"末技"、"繁声"，非"大乐元音"，更不能"道侔天地"，

①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②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序》。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八《经部·乐类小序》。

无法起到“广博易良”的教化作用，故而只能列入子部。

其二，在诸子类中，又是儒家为首。《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① 《北齐书》在引述班固这段话时对儒家的重要地位又作了进一步说明，云：“班固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行教化’者也。圣人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是以古先哲王，率由斯道。”② “明天道、正人伦”离不开儒家经典，而儒家经典的核心则是经书，故而重儒即是尊经。与《汉书·艺文志》一脉相承的是《隋书·经籍志》，《隋志》云：“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其大抵本于仁义及五常之道，黄帝、尧、舜、汤、文、武，咸由此则……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经，三千之徒，并受其义。至于战国，孟轲、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师之，各有著述，发明其指，所谓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③ 可以看出，《隋志》继承发展了《汉志》对儒家的看法，儒家经典之所以重要，因为其所本乃“仁义及五常之道”，而“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④，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要素。《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与经史旁参。”⑤ 《总目》重经重史，其余诸家学问，则以儒家为最高。总之，在他们看来，儒家经过孔子、孟子、子思、荀子等的不断发展，其学说及理论遂成“百王不易”之准则。

其三，与崇经重儒相联系，在史部分类中，又以正史居首。《汉书·艺文志》为六分法，未设史部，史书附在春秋类之后，紧随经书。之后，随着史书数量的增加，史部逐渐独立，《隋书·经籍志》第一次使用“正

①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② 《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传》。
③ 《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三》。
④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子部总序》。

史”之名，在史部分类中，处在第一位的也是正史。此后史志目录，正史均放在第一位。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史部总叙云：“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① 明确指出正史是“大纲”，编年至载记参考了正史的纪传，时令至目录参考了正史的志，史评参考了正史的论赞，皆受正史启发而分类。正史之所以可尊，《总目》一语道破天机：“正史体尊，义与经配。”② 由尊经而重史，由尊儒家经典而重正史，在古代图书分类的逻辑上是一致的。

总之，古典目录学通过特定的文献分类排序及提要，来“寓褒贬，别善恶，明是非”，传达出特定的观念。它们有一种超文本的道德劝诫和伦理教化的功能。可以这样说，古典目录学不拘泥于文献外部的形态，它从文献的内涵出发，把分类叙录建立在政治教化、伦理道德等现实世界的价值观念之上，并通过这种分类叙录进一步强化现实社会的政治统治和伦理教化，以期符合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政治需求和人文教养需求。纯粹为检索方便而进行的图书分类，在中国古代几乎是没有的。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叙录的真正内涵是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古人对图书进行分类，是为了触及文献背后的文化，是为了展示文献背后所蕴含的政治观、价值观和学术观。

第二节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中国古典目录学是致用之学，这种致用除了体现在伦理教化等政治层面外，还体现在划分类例、辨明学术源流等学术层面。考辨学术源流是古代目录学家最看重的目录功用之一，郑樵称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总叙》。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正史类小序》。

在章学诚眼里，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古人看来，文献分类著录不是简单地把典籍分类排序，章学诚云：“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吏足矣。”[①] 图书部次条别的旨意乃是“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②]。余嘉锡曾指出，古人论目录之学，有不同的观念，但是对于“编目之宗旨，必求足以考见学术之源流，则无异议”[③]。余嘉锡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④]。洵为至言。

因为有这样的价值预设，故而古代文献学家最为关注的就是目录要详明类例与编纂叙录，发挥它在学术研究、读书治学中的重要作用。郑樵曾明确指出：“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⑤] 认为目录不明、源流不分，必然导致学术委顿，丧失宗旨，马虎随便。王鸣盛更是把目录当作读书治学的门径，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⑥]

中国古代目录著作经过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余嘉锡将其分为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录书者。”[⑦] 通过对三类目录书的考察，余嘉锡认为：“属于第一类者，在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属于第二类者，在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属于第三类者，在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以此三者互相比较，立论之宗旨，无不吻合，体制虽异，功用则同。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之簿籍、自名赏鉴、图书馆之编目仅便检查者异也。”[⑧] 在余氏看来，三类

① 《校雠通义通解》卷一《互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② 《校雠通义通解》卷一《互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③ 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④ 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⑤ 《通志总序》，见《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⑥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记集解分八十卷》，中国书店1987年影印本。
⑦ 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⑧ 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页。

目录著作“体制虽异，功用则同”，立论之宗旨完全一致，就是详明类例，明辨学术。

一、“剖判条源，甄明科部”，“辨其真伪，核其异同”

由于传统目录学体现的是文献学家的意义判断和价值选择，因此古代文献分类叙录的原则、方法等也带有强烈的实用色彩，它们重内容而不重形式，形成了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的目录之书。这类目录之书总是先拟订一个分类体系，对文献分类有一个总体说明，然后每类之下有小序，说明各类的学术源流，最后每书都撰有解题或提要等。这类目录著作主要有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及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等。

这类目录之书以“剖判条源，甄明科部”[①] 和“辨其真伪，核其异同”[②] 为主要价值追求。各部类的大、小序主要是“剖判条源，甄明科部”，也就是条别学术源流及异同，而书名之下的解题则主要是“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也就是对文献本身之作者、版本、史料价值等作出判断。古代文献学家鄙弃“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③] 的图书文献著录方式。在他们看来，“剖判条源，甄明科部”，“辨其真伪，核其异同”，是目录学著作之最高境界。对于这一点，古代文献学家有着丰富的理论认识，是我国传统目录学思想中最值得关注的方面。

唐中期著名目录学家毋煚在《古今书录·序》中指出，自古及今，文献典籍不断积累，至为丰富，“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目录的作用就是“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

---

① 《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上》。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直斋书录解题》条。

③ 《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

以传后来，不其愈已”。[①] 这段话被认为是中国目录学史上较早涉及目录作用和意义的系统而又精彩的议论。在毋煚看来，如果不将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加以分类与编目，揭示其渊源流变，人们就无法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图书，“经坟浩广，史图纷博，寻览者莫之能遍，司总者常苦其多”[②]，没有目录之引导，学者治学犹如“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不得要领。

唐代高僧智昇在《开元释教录·序》中云：“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伦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③] 在智昇看来，目录的作用有二，一是通过解题对文献进行考证，二是通过各种序，“欲使正教伦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智昇所强调的依然是目录考文献真伪、明文献源流的作用。

清人朱彝尊在《经义考》中云：“《崇文总目》，当时撰定诸儒，皆有论说，凡一书大义，必举其纲，法至善也。其后若《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等编，咸取法于此。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焉。”[④] 撰定图书解题，起到内容介绍的作用，即便书籍亡佚，后世之人看到目录，就能大致了解全书的基本内容。

《四库全书总目》曾评价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云：“（陈）振孙此书，在宋末已为世所重矣。其例以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各详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题其得失，故曰解题。”接着指出“方今圣天子稽古右文，搜罗遗籍，列于四库之中者，浩如渊海，此区区一家之书，诚不足以当万一。然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⑤]。在《总目》作者看来，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区分类例，为每种书籍撰写解题，

---

① 《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上》引毋煚语。
② 《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上》引毋煚语。
③ 释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十四《著录》，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直斋书录解题》条。

为读书治学起到引导作用。《四库全书总目》继承这一传统，通过撰写提要，为治学者指示门径。

孙诒让在《温州经籍志·叙例》中对目录解题有一番评论："中垒校书，是有《别录》，释名辨类，厥体綦详。后世公私书录，率有解题……大都繁简攸殊，而轨辙不异……观其择撢群艺，研核臧否，信校雠之总汇，考镜之渊棷也。"在孙氏看来，解题的作用在于"释名辨类"，后世书目解题之作虽"繁简攸殊"，但揭示文献内容、考辨学术源流的主旨没变。王先谦《郡斋读书志·叙》中对史志目录仅列书目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解题之作胜其一筹，他说："史志仅列诸目，不若簿录家阐明指要，并其人之姓字里居，生平事迹，展卷粲列，资学者博识尤多。"书目解题之所以胜过仅列书目，关键就是解题可以"阐明指要"，介绍作者生平，收知人论世之功。

综合以上学者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论述虽角度不同，看法各异，但对叙录、解题俱全的目录著作都持肯定的态度，其原因就在于，其一，它们可以揭一书大义，论书籍指归，品内容得失，阐作者旨要，从而使后人知古书之崖略，明学术之源流。其二，它们可以辨书籍之真伪，考内容之讹谬，核版本之异同，对文献的价值进行评判。

二、"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

与部类之后有小序，书目之下有解题的书目形式有所不同，还有一类有小序而无解题的书目，诸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皆属此类。这类书目同样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宗旨。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人们把各类文献当作一个整体对待，每一个具体的文献都是这个整体的一分子，目录学家的任务就是在把握整体的基础上，对文献进行分类，然后按照一定的原则，将文献安放在适当的位置。

有小序而无解题的书目，小序揭示的主要是学术流变，而书目主要揭示的是学术异同，合在一起就是"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①。中国古代

① 《校雠通义》自序，见《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图书分类，在整体把握文献的基础上，要求"以学类书"，而绝不仅仅是"部次甲乙"。郑樵指出，"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①。图书分类是以学术分类为基础的。目录学家根据每一具体文献的内容特征将其安放在合适的位置，使之与某一学科的所有相关文献相一致，达到按类求书的目的。然后又将某一学科的所有文献放置在目录系统之中，以见其整体价值。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目录学有一个"体系——类例——单元"的整体观，单元在类例中，类例在体系中的位置得以确定，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价值观中的地位才能得以确定，② 所言极为有理。

对于"部次条别"的重要性，章学诚等人有深刻的认识。他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③ 在章学诚看来，刘向父子撰《别录》、《七略》，"部次条别"，目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自身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修养，要能"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否则无法达到"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的目的。章学诚崇信刘氏父子，对后世目录学著作只能"部次甲乙"，不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的状况非常不满，提出了严厉批评。

章学诚又云："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④ 在这里，章学诚强调了"部次流别"的整体性和系统

①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1804 页。

② 参见傅荣贤：《传统目录学的伦理价值及其形而上学侧面》，《图书馆》1997 年第 4 期；黄顺荣、傅荣贤：《传统目录学本质特征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1 年第 4 期。

③ 《校雠通义》自序，见《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④ 《校雠通义通解》卷一《互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 页。

性，那就是“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图书分类的目的乃“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这与郑樵“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的思想是一致的，只不过是郑樵强调先有学术流别，然后要在图书分类中体现学术流别，而章学诚强调从图书分类中考究学术流别。在图书分类叙列过程中，章学诚主张以类相从，把与之相关的各种文献放在一起，充分反映各家学术流变。

对于有小序而无解题的《汉书·艺文志》，章学诚极为赞赏，他说：“《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二子》之意。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①

以分类明学术流变，在分类的基础上分析学派传承演化，是目录小序的首要任务。《汉书·艺文志》易类小序自伏羲画八卦开始，介绍了伏羲、文王、孔子对易学的贡献，历数《易》在汉代的传授及师承关系。②《隋书·经籍志》易类小序同样介绍了伏羲、文王、孔子对易学的贡献，只是增加了周公。其后便历数《易》在两汉魏晋南北朝乃至隋时期的传授演变过程。③ 小序对易学流变的介绍和其后的分类相呼应，达到了“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的目的。

抛却解题勿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小序同样揭示学术流变，所谓“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叙，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④。如史钞类，从孔子删《诗》、《书》讲起，其后有卫飒的《史要》、张温的《三史略》、葛洪的《汉书钞》、张缅的《晋书钞》、阮孝绪的《正史削繁》等。到宋代，史钞更加发展，有“离析而编纂”者，有“简汰而刊削”者，有“采摭文

---

① 《校雠通义通解》卷二《补校汉艺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6 页。

②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③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句而存”者，有“割裂词藻而次”者，名目繁多。到明末，编纂史钞之风更盛，“趋简易，利剽窃，史学荒矣”。[①] 经《总目》这样探源考流一分析，史钞的源流、得失就清楚了。

朱一新曾说：“世途以审订文字为校雠，而校雠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②] 在朱一新看来，绝不能把校雠仅仅看成是“审订文字”，把目录仅仅看成是“甲乙簿”，它们的背后蕴含深意。揆诸古代文献学的实际，此乃至理名言。古代目录学因为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故而其活动就不是单纯的“网罗群籍、部次甲乙”的“簿录之学”，而是具有很强学术性和理论性的学术活动。

三、“类例既分，学术自明”

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还有一类书目，既无小序，也无解题，《旧唐书·经籍志》、《明史·艺文志》等均属此类。这一类书目，不辨流别，但记书名。如果此类书目出自通人之手，经过缜密考虑，分门别类，秩然不紊，照样可以起到辨章学术的作用，郑樵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盖指此也。

在中国文献学史上，郑樵的目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类例观上，他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③] 在郑樵看来，其一，“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明则图书明，图书明则学术明，不着一字的图书分类，主要就靠类例来体现学术源流，即“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其二，类例明则书籍有所归，书籍有所归则不易亡佚。郑樵把类例看成是关系学术源流和图书存亡的大事。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五《史部·史钞类小序》。

②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6页。

③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04页。

郑樵还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学，非古道也。"① 图书类例的严明，实际上就是学术分类的清晰。郑樵把图书分类和学术分类联系在一起，强调书目分类与学术分类的联系，认为图书类例明晰可以为人们展示学术发展的渊源流变。

在编次上，郑樵坚持"必谨类例"②，在郑樵看来，类例严谨是图书分类的关键，就像将军治军，"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患处多之无术耳"。只要类例严谨，再多的图书都能纳入到类例的体系之中，秩然有序。他充分肯定类例严谨的书目，"每于一书而有数种学者，虽不标别，然亦有次第"，要求编排图书应做到"见先后之次"，"见因革之宜，而无所紊滥"。③ "先后之次"主要是就成书时代的先后，"因革之宜"则主要是指学术门类的变迁。郑樵还主张要按书的实际内容而不是书名来分类，对于那种"见名不见书"，"见前不见后"而导致图书分类错误的现象，郑樵给予了严厉批评。

郑樵主张古今之书不论存亡，都要载入目录，使后世之人看到图书先后本末具在，乃可以知学术之源流，故要求编次必记亡书。他说："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谓如隋人于历一家最为详明，凡作历者几人，或先或后，有因有革，存则俱存，亡则俱亡。唐人不能记亡书，然犹记其当代作者之先后，必使具在而后已。及崇文四库，有则书，无则否，不惟古书难求，虽今代宪章亦不备。"④ 他认为编纂书目记载不全最易导致书籍亡佚："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⑤

---

①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06页。
②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04页。
③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22页。
④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07页。
⑤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09页。

郑樵主张会通百家，主张目录著作应记载通代之书，所谓“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①] 之所以这样主张，其目的依然是通过编排历代书目，以见学术源流正变。

张之洞继承郑樵类例之法，继续创新，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②] 郑樵之类例，乃备录存亡之书，以见各类学术流派之先后本末。张之洞之类例，在于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为治学指示门径，使初学者认识读书治学之缓急。

总之，郑樵的类例观总结了中国古代目录——特别是无小序和解题之书目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的特点，对类例的作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揭示出了古代图书目录所担当的文化责任。

第三节 “审正旧疑，详开新制”

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富有批判和创新精神，在两千多年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前人目录分类的利弊得失，根据时代的需求和目录学家个人的见识，不仅提出了富有创新意义的目录学思想，而且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文献分类、著录方法等方面的实践，所谓“总集众家，更为新录”[③]，“审正旧疑，详开新制”[④]，便是此意。

---

①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07页。

② 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见《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③ 阮孝绪：《七录序》，见《广弘明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毋煚：《古今书录·序》，见《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上》。

一、总结得失，评判优劣

中国目录学思想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那就是不断对前人的目录学思想和目录学实践进行评判和扬弃，并把这种评判和扬弃作为变革创新的出发点。

由于目录学家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不同的“时”与“世”自然会对其目录学思想及实践产生影响，使之不断审视前代的经验教训，在新的需要面前进行更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阮孝绪作《七录》，首先对前代目录著作进行研究和反思，他说：“孝绪少爱坟籍，长而弗倦，卧病闲居，傍无尘杂，晨光才启，缃囊已散，宵漏既分，绿衮方掩，犹不能穷究流略，探尽秘奥，每披录内省，多有缺然，其遗文隐记，颇好搜集。凡自宋齐以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其方内经史，至于术伎，合为五录，谓之内篇；方外佛道，各为一录，谓之外篇。凡为录有七，故名‘七录’。”① 阮孝绪经过研究，发现宋齐以来私家书目，“多所遗漏”，存在严重不足。于是决定“总集众家，更为新录”，编制出不同于前人的目录著作。很显然，阮氏的目录编制思想来源于对前代目录实践缺陷的反思。

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这样的反思和评判屡屡见诸历史记载。比如《隋书·经籍志》簿录类小序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隋志》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一部短小精悍的目录学史，陈述了目录起源于史官司典籍，反思了孔子等人对目录学的贡献，推崇刘向、刘歆父子的目录学工作，批评了刘氏父子之后目录

① 阮孝绪：《七录序》，见《广弘明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学著作“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就是因为“疾其浑漫”，但由于才识不足，王、阮之作虽模仿刘向父子，然成就“远不逮矣”。

对于荀勖的《中经新簿》，《隋志》也有恰当的评论，云：“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荀勖《中经新簿》虽然上承《七略》，下启四部，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对作者之意无所论辩，《隋志》对其评价不高。对于王俭《七志》，《隋志》也有进一步的评论，云：“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对于阮孝绪《七录》，《隋志》的评论也很不客气，云：“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从这里可以看出，凡目录不辨流别、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隋志》都认为它们浑漫不经。即使那些有解题者，见识不深，不能反映学术流变，也属遗憾。有些目录著作虽详列作者事迹，颇收知人论世之效，但“不述作者之意”，使人无法明了撰述指归，也“未为典则”。

郑樵对前人著录之得失也进行过分析评判，如他认为“《崇文总目》，众手为之，其间有两类极有条理，古人不及，后来无以复加也”。这两类就是道书和杂史，郑樵认为《隋志》和《唐志》都无法与之相比，“隋、唐二志，皆不成条理，今观《崇文》之作，贤于二志远矣”[①]。对于“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的做法，他非常赞成，认为这样有利于保存和搜求古书。对于唐代编纂书目“只记其有，不记其无”的做法给予批评，认为不利于人们对文献典籍存佚情况的了解。对于历史上的六分法和四分法，他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七略》所分，自为苟简；四库所部，无乃荒唐”[②]，要用新的书目取代它们。

明清时期，反思前代目录学著作得失的言论更为多见，《四库全书总目》评论《宋志》云：“托克托等作《宋史·艺文志》，纰漏颠倒，瑕隙百出，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③] 对《宋志》评价不高。王鸣盛《十七史商

①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18页。
②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05页。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崇文总目》条。

榷》在谈到目录学的重要性时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辈人，皆学识未高，未足剖断古书之真伪是非，辨其本之佳恶，校其讹谬也。"[①] 王氏批评了从宋代晁公武直到明代焦竑的众多目录学家，认为由于他们的"学识未高"，对于书籍真伪、版本佳恶、校勘正讹等不能"剖断"，无法给后人读书治学提供实质性帮助。

反思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求变，"审正旧疑，详开新制"就成了中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

二、损益旧制，另开新篇

在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无论是文献分类还是著录方法，都有一个追求变革的精神。这种精神伴随中国目录学发展的始终。

（一）文献分类

《七略》将天下图书分为六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另有"辑略"，对书目及各部分进行说明，属"诸书之总要"。在文献典籍分类上确立了六分法。自此以后，关于图书文献的分类法，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创新之举。

西晋荀勖作《中经新簿》，在分类上进行创新，首用四部分类法，以甲、乙、丙、丁四部命名，甲部纪经，著录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纪子，著录子书、兵书、术数等；丙部纪史，著录史书、皇览簿、杂事等；丁部纪集，著录诗赋、图赞、汲冢书等。[②] 到了东晋，著作郎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在荀勖分类基础上，把乙、丙两部所纪之书互换，将纪"史"之丙部排在第二，而纪"子"之乙部排在了第三，这一排序上的变动，深得后人赞赏，"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③]，成为官修书目的样板。到《隋书·经籍志》，始以经、史、子、集之名代替甲、乙、丙、丁之号，明

---

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记集解分八十卷》，中国书店 1987 年影印本。

② 见《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

③ 《晋书》卷九十二《文苑·李充传》。

确了各类文献的学术性质。自此以后，经、史、子、集四分法成了图书分类的主流，直到清代编《四库全书总目》，其地位都没有动摇。

四分法之所以在图书分类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它适应了文献典籍的变化和学术文化的发展，有超越六分法的优势。对此，章学诚有精到的见解，他说："《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春秋》家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钞辑之体，既非丛书，又非类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又非总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清，学术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于古人官师合一之故，则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补于古人矣。"[①] 在这里，章学诚根据图书和学术发展之势，指出图书分类从《七略》的六分法向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发展，是大势所趋。图书的种类、编纂方式、内容等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图书的分类也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变化。图书分类要"宗刘"，即宗法刘向、刘歆父子的目录学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分类体系，而不是要回复到《七略》的分类体系和形式。"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彰显"辨章流别之义"[②]，恰恰是文献分类创新的根本。

尽管四分法在图书分类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但文献分类的创新从来没有间断过，很多目录学家都试图探寻更好的文献分类方式。一方面，是四分法自身的调整、完善、发展与变更，以适应学术日歧、典籍弥众的情况；另一方面，在四分法以外，目录学家们不断变通和变革，探索更加符合学术发展实际的文献分类体系。

就以四部分类法逐步确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论，官修四部目录众

---

① 《校雠通义通解》卷一《宗刘》，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7 页。

② 《校雠通义通解》卷一《宗刘》，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 页。

多，成就卓著，同时私撰目录亦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南齐王俭作《七志》，梁代阮孝绪作《七录》，都是私修目录的经典之作。

王俭《七志》依《七略》写成，但进行了较大变革，首先是他变通了《七略》中的类目名称，把《七略》的“六艺略”改为“经典志”，把“诗赋略”改为“文翰志”，把“兵书略”改为“军书志”，把“数术略”改为“阴阳志”，把“方技略”改为“术艺志”，并新增了“图谱志”。王俭改动类目，更好地把古今典籍囊括在图书分类的体系之中，反映了现实的图书存留情况以及学术思想的发展。在具体图书的排列次序上，王俭也有创新，其《七志·经典志》把《孝经》列为群经之首，和《七略》及《汉志》列《周易》为群经之首者不同，蕴含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看法。陆德明云：“五经六籍，圣人设教，训诱机要，宁有短长，然时有浇淳，随病投药，不相沿袭，岂无先后，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礼记·经解》之说，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所记，用《易》居前，阮孝绪《七录》亦同此次。而王俭《七志》，《孝经》为初，原其后前，义各有旨。”[1] 王俭之所以一改前人对书籍的排列顺序，以《孝经》具先，原因就是“仆以此书，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2]。“他的《孝经》居首的思想，正是他的封建政治思想在目录学中的反映和适应‘然时有浇淳，随病投药’的政治需要”[3]。另外，王俭还根据当时图谱之学发展，此类书籍众多的情况，增设图谱志，专记地域图书和谱牒，此举受到郑樵赞扬，云：“宋齐之间，群书失次，王俭于是作《七志》以为之纪。六志收书，一志专收图谱，谓之‘图谱志’，不意末学而有此作也。”[4] 为此，郑樵根据宋代图谱的发展情况，撰写《图谱略》，写入《通志》之中。王俭根据图书发展情况而进行类目调整增删，体现了变革求新的分类要求。

到了宋代，图书分类方法不守四部成规，各种分类都有出现。而其中

---

① 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次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② 《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

③ 余庆蓉、王晋卿：《中国目录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7 页。

④ 《通志二十略·图谱略》，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1826 页。

犹以南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最有代表性。郑樵开史志目录新体例，“记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创立了一种图书分类新体系，其类目划分，极为详尽。“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凡十二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星数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每类下面又分数家，每家之下又分数种，如经类分九家，九家有八十八种书，等等。“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朱紫分矣”[①]。郑樵重视类例，主张“类例既分，学术自明”，故而不因袭旧法，一反四分、六分诸法，根据自己对图书分类的认识和客观实际的需求，进行了大胆创新。

郑樵的十二分法在处理图书类别时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比如礼、乐、小学，在四分法属于经部，郑樵则把它们独立出来，成为礼类、乐类、小学类，与经类相并列，这样的分类“反映了他（郑樵）拟冲破经部书籍传统范围的倾向”[②]。此外，郑寅的《郑氏书目》也是冲破四分法樊篱的代表作，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他大胆地把艺术、方技、类书三类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表达自己对图书典籍价值的认识。

明清是文献分类思想极为活跃的时代，不守四部成规的目录学著作屡屡出现。如杨士奇的《文渊阁书目》，在卷首设国朝类，[③] 取消“经部”之名，《礼》、《乐》等典籍也不归入经部，韵书也不附于经部，类书不附于子，文集与“诗”、“词”分立，在分类上有很多不同于前人之处。由于该书只录书名，不著书籍卷数及撰人姓名，遭到《四库全书总目》作者的严厉批评，称其为“当时阁中存记册籍”，认为杨士奇等人“承诏编录，不能考订撰次，勒为成书，而徒草率以塞责，较刘向之编《七略》、荀勖之

---

①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1804～1805 页。

② 朱天俊：《郑樵目录学思想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第 3 期。

③ 卷首设国朝类的做法，除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外，还有陆深《江东藏书目》、沈节甫《玩易楼藏书目录》、焦竑《国史经籍志》、叶盛《绿竹堂书目》、孙能传《内阁书目》等，均仿《文渊阁书目》体例。

叙《中经》，诚为有愧"[1]。然而，近人姚名达却对这种分类方式大加赞赏，认为"在分类史中实为一大解放"，对于打破"四部成规"具有"摧锋陷阵之功"。[2] 即便是到了四分法极为成熟的《四库全书总目》时代，依然有学者在文献分类方面进行创新，如孙星衍撰《孙氏祠堂书目》，就创造性地采用了十二分法。可以这样说，随着文献典籍种类、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学术文化的不断发展，一成不变的文献分类方法必然显得僵化，无法反映新的情况，故而在目录学家眼里，新的分类法取代旧的分类法，亦是"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到了近代，更先进的文献分类方法取代了经、史、子、集四分法，其间目录学家创新求变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

王重民说："我国古代目录学家，如刘向、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毋煚、郑樵，都是非常重视图书分类法的改进的。"[3] 事实正是如此。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往往根据现实社会中图书文献存在的实际状况而进行，分类法的不断改进创新实际上反映的是目录学家对图书及学术发展不断进行深入体认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文献分类带有学术分类的性质。

（二）著录方法

在古代的书目实践中，目录学家们不断创新，不仅创造了许多具体的著录方法，而且进行了理论总结，为有效编排文献、利用文献提供了极大帮助。

解题是中国古代书目著录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叙录体、传录体和辑录体。叙录体创自西汉刘向父子，他们在校书时，"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4]。"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5]。这里"撮其指意"，"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都是指书之叙录，也就是解题，或曰提要。刘向所创叙录体解题叙作者生平及学术源流，并说明全书大要，同时辨其真伪，兼及图书内容，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文渊阁书目》条。

②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版，第121页。

③ 王重民：《序言》，《校雠通义通解》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④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⑤ 阮孝绪：《七录序》，见《广弘明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对后世影响巨大。南宋时期，出现了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两书继承叙录体传统，完善体例，不断创新，不仅更加详尽地介绍图书内容和作者，而且涉及版本异同、篇卷稽考及得书过程等，每一篇提要就是一篇学术简介，更加方便了读者。

南齐王俭编《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①，创立了传录体这种新的解题形式。传录体强调“知人论世”，通过作者传记体会其思想，与此相仿者，有阮孝绪、释僧佑、道宣、智昇等所编书目解题。

宋末元初，马端临编《文献通考·经籍考》，又创立了辑录体这一解题形式。所谓辑录体，就是把众多书目及其他著作中的有关某书的解题或评价等相关文字，置于有关类下和书下，不管这些评论出自何书，什么目录、史传、文集、杂说、诗话等，“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②。辑录体将有关一书的资料汇辑在一起，方便考索研究，极有学术价值。后来清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的《小学考》均仿此。

中国古代书目解题形式到清代编《四库全书总目》时达到顶峰，《总目》利用官方力量，充分吸收前人图书分类叙录的成就，扬长避短，加以创新，成为古典目录学方法的集大成之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总目》既重视介绍图书，又重视评价作者，“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权惩”③。对于《总目》的这些做法，余嘉锡有过“衣被天下，沾溉靡穷”的评价：“《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故衣被天下，沾

①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总序。
② 《文献通考》自序，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溉靡穷。”[①]

解题形式之所以不断有所创新、变革和完善，是因为目录学家根据文献及学术发展的不同特点、规律进行变通，反映了人们对推论图书之要旨，辨章学术的不懈追求。

在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互著和别裁之法是著录方法的一大创新，“标志着分类法的进一步提高”[②]。何谓互著？如何别裁？王重民有非常精到的解释：“别裁与互著是著录图书上的两种并行而又互为补苴的重要方法。互著是根据读者需要和学术源流把一书著录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类目内；别裁是把一书内的重要部分（或篇章）裁出，著录在相关的另一类（或另几类）里面。”[③] 互著之法出现较早，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就已使用互著的方法。而在书目中同时使用互著与别裁且对其进行初步理论探讨的则是明代藏书家祁承㸁。祁氏提出“通”、“互”的理论，“通”，就是别裁，祁氏云：“通者，流通于四部之内也。”[④] 比如欧阳修的《易童子问》、王安石的《卦名解》、曾巩的《洪范传》等，就可以从各自的文集中析出，使一书变多书，“悉为分载，特明注原在某集之内，以便简阅”[⑤]。“互”，就是互著，“互者，互见于四部之中也”[⑥]。比如有些图书，其内容既涉及“谈经”，又涉及“论政”，在分类时就必须归于两处。《皇明诏制》一书，既要收入国史类中，又要收入诏制类中，“同一书也，而于此则为本类，于彼亦为应收”，“各存其目，以备考镜”。[⑦] 祁承㸁强调

---

① 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页。

② 王重民：《序言》，《校雠通义通解》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 《校雠通义通解》卷一《别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④ 祁承㸁：《庚申整书略例四则》，见李希泌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9页。

⑤ 祁承㸁：《庚申整书略例四则》，见李希泌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页。

⑥ 祁承㸁：《庚申整书略例四则》，见李希泌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页。

⑦ 祁承㸁：《庚申整书略例四则》，见李希泌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页。

“通”、“互”，主要还是从便于检索图书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希望通过“通”、“互”方法使类目之间、类目之下所载各书之间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充分显现书目作为检索工具的作用。

从理论上对互著、别裁方法加以系统总结的是清代章学诚，他在《校雠通义》中吸收祁承㸁的一些观点，正式提出了互著与别裁的概念。对于互著，章学诚这样解释：“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录，于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矣。”[①] 按照传统的看法，一书著录在一类中，似乎是不可动摇的铁律，但是，就某书的内容来讲，涉及的问题可能不止一个方面，如果把它单独归入某类，势必会影响该书的充分利用，也不利于考析学术流别。特别是那些“书之易混者”和“书之相资者”，更需要用互著法来处理。王重民先生指出，章学诚所谓“书之易混者”，是指一书虽只有一个主题，但这个主题有的和两个类目都有关联；所谓“书之相资者”，是指一书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题，那就必然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类目相适应。[②] 在此情况下，一书一般都有两用或多用，必须以互著法重复著录，“书之易混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免后学之抵牾；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③]。别裁即“裁篇别出”，“权于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章学诚分析了使用别裁法的几种情况，一是“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二是“历时已久，不知所出”，三是“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这些都可“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之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

① 《校雠通义通解》卷一《互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② 王重民：《序言》，《校雠通义通解》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 《校雠通义通解》卷一《互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妨"。[①] 运用别裁之法必须是"真有见于学问流别而为之裁制"，且别出之篇应加注，"申明篇第之所自"。[②]

章学诚的互著、别裁的文献著录方法，一方面是为了便于检索文献，更重要的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明一家之学"，"辨著述源流"。章学诚在编纂《史籍考》一书时，普遍采用了互著与别裁之法，把文献当作一个系统来对待，对于经、子、集中与史学有关的篇章，裁篇别出，分别著录在相关类目中，"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王重民指出，欧洲在 15 至 16 世纪科学文明逐渐上升的时候，开始发展分类目录，但直到 18 世纪，我国的目录学仍然迅速发展，且远在欧洲之上，"这与我们在系统分类目录的优良传统上，又发现了互著别裁在分类著录上的辅助作用，有着很重要的关系"[③]。章学诚在这方面的独创之功，是不能抹杀的。

就中国古代书目形式中的思想和理论而言，无论是官修目录还是私家目录，都不乏各种各样的理论研究，诸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序、解题以及《七录》、《古今书录》等的序文等等，都蕴含丰富的目录学思想。此外，郑樵《通志》的《校雠略》和《艺文略》及章学诚的《校雠通义》，都是光辉的目录学理论专著。可以说，自汉至清，在具体的文献编目基础上，中国目录学思想不断发展，目录学研究从未中断，其内容之丰富，见解之精辟，值得后人认真总结。

和西方相比，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叙录有自己的特点。柯平曾比较了中西古代目录学的差异，指出在对文献的认识上，西方强调文献的知识和学术作用，中国则强调图书的政治和历史作用；在集书、校书的实践和理论上，中国比西方明显高出一筹；在图书分类上，中西都把文献分类与学术分类联系在一起，一般都是以学术分类为基础进行文献分类，文献分类随

① 《校雠通义通解》卷一《别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4 页。
② 《校雠通义通解》卷一《别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5 页。
③ 王重民：《序言》，《校雠通义通解》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历史的发展而创新、改进；在书目功用上，中国重视书目在保存文献和学术研究方面的作用，而西方较重视文献的利用和书目的检索功能；中国古代的目录学受到政治的影响最大，而西方的目录学较大地受到宗教的影响。[①] 通过对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的考察可以看出，由于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国目录学在本土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现代目录学发展的今天，如何发挥古典目录学的价值和作用，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① 柯平：《中西古代目录学比较研究》，《津图学刊》2003 年第 2 期。

第四章
“实事求是，订误存真”：文献校勘的观念

由于文献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重视圣人之道和历史经验的古代中国，文献的真实性就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古代文献，辗转抄刻，必然会出现散乱、衍讹、错谬等问题，这些文献上的错误不仅误传了历史的信息，而且使后世之人无法正确理解圣人之道，无法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正因为此，自古及今，学者们均重视文献校理，通过鉴定版本、校勘文字、辑佚钩沉等手段，极力恢复文献的原貌。吴孟复先生曾说：“辑佚是为了求全，辨伪是为了求真。版本与校勘，也是为了求全（无脱文）、求真（无讹字、衍文）。”[①] 吴先生所概括的求全、求真，是文献校理的核心，围绕这样一个核心，产生了一系列的思想和方法，诸如对文献致误通例的归纳、对版本优劣的分析、对校勘理论及方法的总结等等，这些思想和方法以具体的文献校理为基础，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看似零碎分散，实则系统完整。

① 吴孟复：《古籍研究整理通论》，见吴孟复：《国学典籍阅读要义》，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307页。

第一节 对文献致误原因及形式的认识

文献校勘的主要目的就是发现文献存在的讹误，恢复文献原貌。而要发现文献存在的讹误，首先就要懂得文献致误的原因，找出其规律，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在文献校勘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

在文献学领域，古代学者很注重对规律的探索，他们并没有把校勘工作看作是纯粹技术层面的工作，而是从中发现文献出现错误的共同之处，把看似支离琐碎的文献校理工作上升到具有规律性的层面上来认识，赋予这种具体而微的工作以思想内涵，甚至是哲理内涵。这种对文献文本形式规律的探索，其表现就是对古书通例进行归纳。漆永祥指出：“通例归纳在形式上可分为专书通例与群书通例两种，从内容上可分为标举大义例、行文修辞例和发疑正误例三种。”①

一、对文献致误原因的分析

在文献学家看来，文献材料发生错误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社会原因造成错误；二是学术原因造成错误，三是主观原因造成错误。

1. 社会原因：“世变人移，音讹字替”。

古代文献学家有着变化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的。时代的变化必然导致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思潮等等的变化，同时也会导致文献流散、文字字体及声音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会造成文献本身错讹的增加，而且还会造成后世之人对前世之事理解的偏差。

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卷首《条例》中明确指出文献出现错误的原因

① 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8 页。

是“世变人移，音讹字替”①。陆氏已经明确看到，物换星移、人世沧桑的社会变迁必然会出现文献传播的古今悬隔、音声不同。岳珂指出：“字学不讲久矣，经文非古，讹以传讹。魏晋以来，则又厌朴拙，嗜姿媚，随意迁改，义训混淆，漫不可考……唐人统承西魏，尤为谬乱。至开元所书五经，往往以俗字易旧文。”② 岳珂分析了朝代更迭对语言文字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文献致误的影响。

与陆德明、岳珂类似，鲍廷博认为文献出现讹误，一是因为“旧本传写”，导致“承讹袭谬”③；二是因为“古人使事措辞，后人不习见，误以致疑”④。前者是说文献在不断传写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后者是说随着时代的迁移，前人所面临的世事及表达思想的措辞后人会有很多不了解，导致误断。不管怎样，诚如张元济所言：“古籍传世辽远，断简阙文，短篇欠叶，恒所不免。”⑤

需要指出的是，清人孙诒让特别注意到汉语文例及汉字字体的变化导致文献材料出现讹误，他说：“秦汉文籍，谊旨奥博，字例文例多与后世殊异……骤读之，几不能通其语。复以竹帛梨枣，钞刊屡易，则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汉篆隶之变迁，有魏晋正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书之流失，有宋元明校刊之羼改，逵径百出，多岐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⑥ 汉语文例及文字字体的不断变化在客观上使得文献材料容易产生错误。

2. 学术原因：“一经之学，数家竞爽”。

在古代学者看来，学术授受的不同、学术自身的演变也会导致所传经书出现问题。《汉书·艺文志》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

① 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条例》，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字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知不足斋丛书·凡例》，中华书局1999年版。
④ 《知不足斋丛书·凡例》，中华书局1999年版。
⑤ 《涉园序跋集录·重印四部丛刊刊成记》，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⑥ 孙诒让：《札迻》自序，中华书局1989年版。

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①] 陆德明说：“战国交争，儒术用息，秦皇灭学，加以坑焚，先圣之风，扫地尽矣。汉兴，改秦之弊，广收篇籍，孝武之后，经术大隆，然承秦焚书，口相传授，一经之学，数家竞爽，章句既异，踳驳非一。后汉党人既诛，儒者多坐流废，后遂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于石碑之上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取则，未盈一纪，寻复废焉。”[②] 班固和陆德明都道出了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实际。儒家经典在孔子之后，数家传授，各有不同。汉朝建立，经学传授依然数家纷争，保存下来的五经由于整理或传授者的思想观点不同，各经在流传过程中又有所分化，一经的内部形成不同的体系。这种学术传授的不同，导致对经籍解释的差异，甚至出现经书内容不同的情况，给以后认识经籍的本来面目造成困难。不借助校勘，几乎无法搞清因学派传授不同所导致的经典的错误。

3. 主观原因：“学识肤浅，以意刊改”。

文献错讹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主观原因又可分为有心之误和无心之误两种情况。清代学者王念孙即指出文献致误“传写讹脱者半，凭意妄改者半”。近代史学大师陈垣先生亦认为从主观方面看，文献致误“无心之误半，有心之误亦半”[③]。

唐代颜师古作《汉书注》，谈及自己的校勘工作，就明确指出《汉书》出现讹误的主观因素是由于“后人习读，以意刊改”，“意有所疑，辄就增损”，他所作的工作就是勘正这些过失，恢复《汉书》原貌，他说：“《汉书》旧文，多有古字，解说之后，屡经迁易。后人习读，以意刊改，传写既多，弥更浅俗。今则曲核古本，归其真正，一往难识者，皆从而释之。”又说：“古今异言，方俗殊语，末学肤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辄就增损，流遁忘返，秽滥实多。今皆删削，克复其旧。”[④] 陆德明也指出：“近

---

①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② 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条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见《励耘书屋丛刻》（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 年影印本。

④ 颜师古：《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代学徒，好生异见，改音易字，皆采杂书，唯止信其所闻，不复考其本末。”顾炎武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①] 清人顾广圻也指出，很多古书历经“浅人改易”、“妄子刊削”，结果“因讹致舛，其来久远”。[②] 主观上任意刊改古书，是导致文献出现讹错的重要原因。

宋代馆阁校书，对于文献讹误的分析更加详细，孙兆在校勘王焘《外台秘要方》时指出：“此《方》撰集之时，或得缺落之书，因其阙文，义理不完者多矣。又自唐历五代，传写其本，讹舛尤甚，虽鸿都秘府，亦无善本。”[③] 这就把导致文献讹误的因素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书籍编纂时就出了问题，编纂者资料采择不严谨，造成先天缺陷；二是书籍流传时发生讹舛，出现问题。王鸣盛也看到同样的问题，他在考察十七史错讹时发现“史家纪事，所书甲子，舛误最多”，原因就是“或本自误，或因传钞而误，书经三写，乌焉成马”。[④] 人们在编纂文献时，或因学识修养不足，或因资料占有不备，造成文献先天错误。文献流传后世，随着时代的变化，不免会产生文字语句的错误和思想理解的歧义，异文及歧解不断产生，障蔽了文献的本来面貌，这就必须仰赖校勘，一层一层剥去附着在原始文献上的后世异文和歧解，恢复文献典籍的本来面目。

二、对文献致误通例的归纳

文献材料出现错误，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文献学家在对待这一问题时，没有被星星散散的个别问题所困扰，而是通过敏锐的眼光，归纳文献致误的通例，寻找一般规律。

---

①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见《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二版，第69页。

② 顾广圻：《顾千里集》卷二十三《文选六十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72页。

③ 《外台秘要方》卷首《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六《甲子多误》，中国书店1987年影印本。

读书、校书必明其例，是古代文献学家的明确看法，钱大昕云：“读古人书，必须寻其义例，乃能辨其句读，非可妄议。”[①] 凌廷堪在研治《仪礼》时，强调循例而为，他说：“《仪礼》十七篇，礼之本经也。其节文威仪，委曲繁重。骤阅之如治丝而棼，细绎之皆有经纬可分也；乍睹之如入山而迷，徐历之皆有途径可跻也。是故不得其经纬途径，虽上哲亦苦其难；苟其得之，中材固可以勉而赴焉。经纬途径之谓何？例而已矣。”[②] 凌廷堪把总结古书义例当作治学的途径，循此途径而上，文献中存在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朱一新也认为“古书各有体例”，“校勘其细目，不通此则愈校愈误”。[③] 正因为人们认识到掌握古书通例对于治学的重要性，故在校勘过程中，率先掌握的就是古书流布过程中导致错误的规律。

刘向在《别录》中就指出先秦典籍有因形近而误、音近而误、字形残缺而误等情况。到宋代彭叔夏《文苑英华辨正》及岳珂《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已开始对文献致误通例进行全面归纳，严格而详悉，标志着通例归纳走向成熟。

彭叔夏认为，文献存在错讹的形式多种多样，在用字、用韵、事件、人名、官爵、郡县、年月、名氏、题目、门类、脱文、同异、离合、避讳、异域、鸟兽、草木等方面都会出现问题，为此，他在校勘《文苑英华》的过程中归纳通例，将其分为二十类四十五个子目。即用字一：凡字有本之前人不可移易者；用字二：凡字因疑承讹当是正者；用字三：凡字有两存于义亦通者。用韵一：凡前人用韵有两音而不可辄改者；用韵二：唐赋韵数平侧次第初无定格，今略举一二。事证：凡用事有可以证他本之非者。事误一：事有讹误当是正者；事误二：前人用事元自舛误而文苑有袭之者。事疑：事有可疑或两存者。人名一：凡用事有人名与他本异，不可轻改者；人名二：其有讹舛当是正者；人名三：人名有与史传集本异，

---

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一《答问八》，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73 页。

②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六《礼经释例序》，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241 页。

③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五，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83 页。

不可轻改者；人名四：其有讹舛质于史传当是正者；人名五：其有与史集异同当并存者。官爵一：凡官职封爵有与史集异，不可轻改者；官爵二：其有讹舛当是正者；官爵三：其或有疑当两存者。郡县一：凡郡县名及地名有不可以他本而轻改者；郡县二：其有讹舛当是正者；郡县三：其或有疑当两存者。年月一：凡年月与他本异，不可轻改者；年月二：其或讹舛当是正者；年月三：其有他本原误，文苑因而袭之者；年月四：其有与史全异所当考者。名氏一：凡撰人名氏或有以甲为乙当以文苑为正者；名氏二：其有舛讹当是正者；名氏三：其有可疑及当两存者。题目一：凡题目有讹舛当是正者；题目二：又有题目是而文则非者。门类：凡门类混淆当是正者。脱文一：凡有脱文见于他本者；脱文二：又如；脱文三：其有他本节略而文苑有全篇者；脱文四：其有原本脱逸而文苑因而袭之者。同异：凡诗文与他本有题同而词异者。离合：凡诗有一篇析而为二，二篇合而为一者。避讳：凡避讳而易以他字者。异域：异域国名有与史传异者。鸟兽：凡鸟兽名有讹舛及与他书异者。草木：凡草木名有讹舛及与他本异者。杂录。[①]

从彭叔夏的归纳可以看出，尽管彭氏对文献出现错误的分类还存在明显不足，诸如把文献材料的内容（人名、地名、官爵、年月、鸟兽、草木等）与文献材料发生错误的情况（脱文、同异、离合等）混为一谈，但不管怎样，彭叔夏已经开始摆脱一字一句校勘的局限，把隐含在只言片语背后的规律性的东西发掘出来，在归纳通例方面更具条理性，其成就超越前人，值得肯定。正因为此，四库馆臣对《文苑英华辨正》评价甚高，云："叔夏此书，考核精密，大抵分承讹当改；别有依据，不可妄改；义可两存，不必遽改三例……其用意谨严，不轻点窜古书，亦于是可见矣。"[②]

清代学者王念孙父子对古籍讹误通例进行了集大成式的归纳，其《读书杂志·淮南内篇》后序列举各种误例凡六十二种：一、有因字不习见而误者，二、有因假借之字而误者，三、有因古字而误者，四、有因隶书而误者，五、有因草书而误者，六、有因俗书而误者，七、有两字误为一字

① 见《文苑英华辨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六，《文苑英华辨证》条。

者，八、有误字与本字并存者，九、有校书者旁记之字而阑入正文者，十、有衍至数字者，十一、有脱数字至十数字者，十二、有误而兼脱者，十三、有正文误入注者，十四、有注文误入正文者，十五、有错简者，十六、有因误而致误者，十七、有不审文义而妄改者，十八、有因字不习见而妄改者，十九、有不识假借之字而妄改者，二十、有不审文义而妄加者，二十一、有不识假借之字而妄加者，二十二、有妄加字而失其句读者，二十三、有妄加数字至二十余字者，二十四、有不审文义而妄删者，二十五、有不识假借之字而妄删者，二十六、有不识假借之字而颠倒其文者，二十七、有失其句读而妄移注文者，二十八、有既误而又妄改者，二十九、有因误字而误改者，三十、有既误而又妄加者，三十一、有既误而又妄删者，三十二、有既脱而又妄加者，三十三、有既脱而又妄删者，三十四、有既衍而又妄加者，三十五、有既衍而又妄删者，三十六、有既误而又改注文者，三十七、有既误而又增注文者，三十八、有既误而又移注文者，三十九、有既改而又改注文者，四十、有既改而复增注文者，四十一、有既改而复删注文者，四十二、有既脱且误而又妄增者，四十三、有既误且改而又改注文者，四十四、有既误且衍而又妄加注释者，四十五、有因字误而失其韵者，四十六、有因字脱而失其韵者，四十七、有因字倒而失其韵者，四十八、有因句倒而失其韵者，四十九、有因句倒而移注文者，五十、有错简而失其韵者，五十一、有改字而失其韵者，五十二、有改字以合韵而实非韵者，五十三、有改字以合韵而反失其韵者，五十四、有改字而失其韵又改注文者，五十五、有改字而失其韵又删注文者，五十六、有加字而失其韵者，五十七、有句读误而又加字以失其韵者，五十八、有既误且脱而失其韵者，五十九、有既误且倒而失其韵者，六十、有既误且改而失其韵者，六十一、有既误而又加字以失其韵者，六十二、有既脱而又加字以失其韵者。[①]

王念孙对文献致误的通例归纳，看似繁复，实则逻辑清晰、条例严明、归纳周详。首先，王念孙把文献致讹的形式分为两大类：即“传写讹

① 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书后，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62～976 页。

脱”与“凭意妄改”。一到十六，所言为后人抄刻文献时无意致误，属于“传写讹脱”；从十七到六十二，则是后世读书者、校书者因各种原因而妄改古书所致，属于“凭意妄改”。其次，文献致误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王念孙所列六十二种情况，由单纯一重错误到两重错误再到多重错误，由简到繁，层层推进，逻辑严密。“王念孙的误例主要从书面材料发生讹、脱、衍、倒等错误类型的角度来分类总结的，因此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标志着对校勘条例的概括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①。

由于归纳致误通例对于文献校勘具有极大帮助，自此以后，不断有专家学者在这方面作出成绩，俞樾撰写《古书疑义举例》，继王念孙之后又发现不少新的误例，并举出丰富的实证，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马叙伦《古书疑义举例校录》、姚维锐《古书疑义举例增补》等，都是在俞樾著作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继承前人归纳致误通例，并不断发展，且对校勘作出极大成绩的是陈垣先生。陈垣先生在校补沈家本刻《元典章》时，更为简洁地总结出“一代语言特例，并古籍窜乱通弊”②。他把《元典章》的舛错分为行款误例、通常字句误例、元代用字误例、元代用语误例、元代名物误例、校例六类，③ 前两类适用于所有古籍的整理；中间三类根据《元典章》的具体情况而确定误例，看似只归纳了“一代语言特例”，实则可补前人所举他书误例之不足，反映的是“古籍窜乱通弊”，具有普遍意义；最后一类总结校勘方法，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论述。陈垣先生不仅总结各类通例，而且在校补《元典章》的过程中阐发具有理论意义的看法，如在“形近而误例”中指出：“形近而误，有易察觉者，有不易察觉者。其易察觉者，文义不通者也，其不易察觉者，文义似通非通者也。”在“不谙元代专名而

---

①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篇》，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13页。

② 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见《励耘书屋丛刻》（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③ 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见《励耘书屋丛刻》（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误例"中云："一时代有一时代所用之专名，校书者对于本书时代所用之专名，必须有相当之认识。"在"不谙元时用语而误例"中说："凡一代常用之语言，未必即为异代所常用，故恒有当时极通用之语言，易代或不知为何语，亦校者所当注意也。"[①] 也正因为此，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是我国校勘史上带总结性的著作"[②]。白寿彝在评价陈垣的学术成就时说他"以列举例类的方法来表示一定学科范围内的通则"[③]，可谓至理名言。实际上，陈垣归纳通例的做法在继承了传统校勘方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中国古代文献整理均注重通例归纳，善于从个别看一般，从类例的探索中引导学者进窥问题的全貌，看似斤斤于个别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在相当宏观的高度上认识问题。从这个角度讲，白寿彝的话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的文献学家。

归纳文献致误通例，在通例基础上对文献进行校理，是归纳法与演绎法的结合。通例归纳来源于具体的文献校理实践，又能给文献校理以具体指导，并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和进一步总结。不仅如此，通例归纳对近现代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由个别到一般的思维倾向对近代文献学、史学、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等领域都起着指导性作用。

第二节 丰富的文献校勘理论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文献校勘的传统，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开始对出现讹误的文献进行校勘。自此之后，人

---

① 均见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励耘书屋丛刻》（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② 白寿彝：《纪念陈援庵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见《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页。

③ 白寿彝：《纪念陈垣校长诞生一百周年》，见《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4页。

们在不断的文献校理过程中，总结经验，阐发理论。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校勘开始由依附于典籍传注而趋向独立。到宋代，校勘便具有了一定的理论色彩。清代，校勘兴盛，校勘实践及理论都有了新的建树。历朝历代积累下来的丰富的文献校理思想和理论成了当代文献学可资借鉴的文化遗产。

一、对校勘目的及校勘重要性的认识

校勘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意义又如何，文献学家在自身的校勘工作中，提出了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1. “归其真正”，“克复其旧”。

对于文献校勘的目的，颜师古较早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注《汉书》时对《汉书》进行了必要的校勘，提出要通过“曲核古本”，消弭后世之人任意刊改增删《汉书》所造成的错讹，达到“归其真正”，“克复其旧”①的目的。自此以后，凡校勘文献者，均以此为目的。到清代，段玉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深入论述：“夫校经者，将以求其是也。”② 把校勘当作求得经书之“是”的手段。段玉裁的“是”既有经书文字形式上的正确无误，也有经书内容及思想的正确无误，但不管怎样，在段玉裁看来，校勘的第一步就是首先求得底本的正确。段玉裁还说：“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③ 就是强调要分别根据贾公彦、孔颖达、陆德明、杜预、郑玄等的注、疏、释文，考定每个人当日所用的经本，使经本和每个人的注说相合，把每个人的底本还给每个人，从而恢复先儒注释它们时所依据的底本的本来面目。黄廷鉴也指出，古人校勘，目的是为了正本清源，恢复古籍原貌，所谓“注存旧本，不没其真”④。

“归其真正”，“克复其旧”的看法一直被学术界所接受。学者们坚信，

---

① 颜师古：《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②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十一《答顾千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98 页。

③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十二《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36 页。

④ 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卷一《校书说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只要"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①]，就能够复原古籍面貌，为人们研究历史提供一个可靠的本子。

2. "有功古人，津逮后学"。

王鸣盛指出校书的重要，认为校书是做学问的第一步，"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②]。王鸣盛的观点得到晚清叶德辉的呼应，云："书不校勘，不如不读。"[③] 并深刻指出校勘"有功古人，津逮后学"[④]。对此，陈垣先生也指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⑤] 古书在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脱衍讹误，必须通过校勘解决，否则就会影响古籍在文化思想史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前人事迹、圣人思想、典章制度、历史事件等一切历史的内容，几乎都是靠文字和书籍来传播的，但是，书籍在传抄、印刷、整理过程中常常发生错误，"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⑥]，这些错误又造成文化传播过程中真实信息的中断或扭曲，古人的思想言行无法正确地传达给后人，后人也无法正确接受古人的思想言行。更有甚者，因为文献的讹误，还可能造成后人厚诬古人。而要纠正文献流传中出现的错误，校勘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之一。

钱大昕曾指出校理文献："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⑦] 认为："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

---

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中国书店1987年影印本。

②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中国书店1987年影印本。

③ 叶德辉：《藏书十约·校勘》，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④ 叶德辉：《藏书十约·校勘》，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⑤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19页。

⑥ 《抱朴子·内篇·遐览》。

⑦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答王西庄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03页。

非为龄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①] 校勘古籍，一方面还古人清白，做古人功臣，另一方面刊正错误，有益后人。钱大昕认为日读误书而不知，是一件很可悲的事。他说：“经史当得善本，今通行南北监及汲古阁本，《仪礼》正文多脱简，《穀梁》经传文亦有溷错，《毛诗》往往以《释文》混入郑《笺》，《周礼》、《仪礼》亦有《释文》混入《注》者，《礼记》则《礼器》、《坊记》、《中庸》、《大学》疏残缺不可读，《孟子》每章有赵氏《章指》，诸本皆阙，《宋史·孝宗纪》阙一叶，《金史·礼志》、《太宗诸子传》各阙一叶，皆有宋、元刊本可以校补。若日读误书，妄生驳难，其不见笑于大方者鲜矣。”[②] 校勘就是要“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③]。

段玉裁认为，校勘不仅要定底本之是非，还要定立说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④] 校勘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操作，既不诬古人，又不误今人。

晚清俞樾在高度评价孙诒让的校勘成就时，也讲到校勘对于后人正确了解经书中的旨趣具有扫除障碍的作用，他说：“是正文字，遂为治经之要，至后人又以治经者治群书，而笔缄墨炙之功遍及四部矣。夫欲使我受书之益，必先使书受我之益。不然，‘割申劝’为‘周田观’，‘而肆赦’为‘内长文’，且不能得其句读，又乌能得其旨趣乎？”[⑤]

余嘉锡在论顾广圻、黄丕烈校勘异同时说：“昔人谓有读书者之藏书，有藏书者之藏书，校雠亦然。（顾）千里乃读书者之校书，若（黄）荛圃

---

①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自序，见《廿二史考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三《经史当得善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③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答王西庄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04页。

④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十二《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36页。

⑤ 俞樾：《札迻》序，见《札迻》，中华书局1989年版。

者则藏书家之校书耳。”[1] 余嘉锡把校勘分为“为读而校”和“为藏而校”，只是看到了他们对待版本的差别，事实上，藏书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读书，二者均要剔其传写之误，都“有功古书”[2]，其对文化的贡献，不可磨灭。

3. 稽古右文，经世致用。

校理文献是主体的行为，校什么书，不校什么书，其中隐含着校勘者的思想观念。从现存文献看，古人校书，绝非“好治闲事”[3]，而是有着明确的致用观念。宋代范祖禹曾批评王钦臣奏请道士陈景元校勘道书，指出：“六经之书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明。至于诸子百家、神仙道释，盖以备篇籍、广异闻，以示藏书之富，无所不有，本非有益于治道也……道书除《老子》、《庄》、《列》已立于学官，其余多虚诞不经，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宫观自有道藏，馆阁所藏，唯备数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雠校，以崇长异学也。”[4] 校理图书，目的是为了减少文献错误，利于人们学习利用，从而使学术昌明，有益治道。但范祖禹担心校理道书会加快它们的传播，崇长异说，紊乱儒学，不利于士习民风的养成，是一件“轻朝廷之体，羞当世之士”[5] 的事。

和范祖禹相似，林亿在校勘《黄帝内经素问》时也特别强调校勘工作的社会意义，指出经过校勘，“舛文疑义，于是详明。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施于有政，可以广生于无穷”[6]。曾巩校理史书，正是为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故有的学者指出曾巩“校书目的，考

---

① 余嘉锡：《黄顾遗书序》，见《顾千里集》附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29页。

② 余嘉锡：《黄顾遗书序》，见《顾千里集》附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30页。

③ 俞樾：《札迻》序，见《札迻》，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④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十一《封还差道士陈景元校道书事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十一《封还差道士陈景元校道书事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林亿：《校正黄帝内经素问序》，见《黄帝内经素问》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古知今以经世"[1]。

就清代学者而言，校勘文献的经世思想也非常明显，全祖望七校《水经注》，研治之精，备受推崇，究而言之，原因就在于在他看来，《水经》及注乃是一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著作，校理《水经》及注，就是为了经世致用。他在"五校本题词"的结尾引朱郁仪《〈水经注〉序》中之语，说"有国有家者，使能因是《水经》之理，引申触类，以施于政，何患不地平而天成乎！"而要想把《水经》经世致用的作用发挥出来，首先必须有一个善本，由于当时"《水经》今亦无善本"，导致"读误本《水经》而不知正"，[2] 有鉴于此，全祖望才尽其所能，通过校理《水经注》，为世人提供一个善本，以便应用。

学者们对校理文献所具有的经世价值有自觉的认识，段玉裁评价卢文弨校书的意义时说："校雠之事，自汉刘向、扬雄，后至圣朝极盛。公自以家居无补于国，而以刊定之书惠学者，亦足以裨益右文之治。"[3] 校勘古籍，无论对于国家文治建设还是应用于现实，都是富有意义的工作。

总之，校勘的过程就是复原文献真实的过程，而恢复原稿的原文和作者的原意，是为了保证被记载的历史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保证作者真实思想在后世的传递，从而使后世之人不被错误的历史或思想所欺骗和愚弄。

二、实事求是的校勘原则论

中国是一个文献大国，长期的文献整理使人们积累了丰富的校勘经验，并进而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校勘工作的理论观念。"实事求是"的校勘思想就是在长期的校勘工作中形成的、至今仍是文献整理者所恪守的原则，成为了文献校勘的优良传统。

"实事求是"一语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传载河间献王刘德"修

---

① 余敏辉：《历史文献学散论》，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0 页。

②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四《水经硃溪帖子柬慎甫》，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53 页。

③ 段玉裁：《翰林院侍读学士卢公墓志铭》，见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首，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校勘古籍的宗旨是返真求是，尽其真、求其是就成了校勘文献高树的旗帜。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孔子整理六经，提出“言必有据”、“多闻阙疑”原则，即已开后世实事求是文献校勘思想的先河。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①] 强调文献记载及贤人言论的重要，绝不可在讨论古代典制时臆说。孔子还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②]。“多闻阙疑，慎言其余”[③]。指出对于古书的残缺，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宁可保留原状，绝不凭私意窜改。正因为此，王欣夫对孔子校书给予了极高评价。[④]

其后，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人们校勘古籍一直以实事求是为鹄的，并日益丰富着这一思想。宋代彭叔夏作《文苑英华辨证》，认为“校书之法，实事是正，多闻阙疑”[⑤]。当时馆阁校勘兴旺发达，人们对校勘态度也有明确认识，所谓“名山之藏为空，广内之策加倍，而后实事求是，聚精会神，芟夷复重，笔削讹谬”[⑥]。均把实事求是放在校勘工作第一位。到清代，古代文献整理达到高潮，学者更是以实事求是相标榜：戴震治学，“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⑦]；汪中治学，“实事求是，不尚墨守”[⑧]；钱大昕认为“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⑨]；邵晋涵治学，“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⑩]；阮元治学，“推明

① 《论语·八佾》。

② 《论语·卫灵公》。

③ 《论语·为政》。

④ 王欣夫：《王欣夫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182页。

⑤ 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强至：《谢除校勘启》，见《宋文鉴》卷一百二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72页。

⑧ 汪中：《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428页。

⑨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卢氏群书拾补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页。

⑩ 《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邵学士家传》，见《洪亮吉集》（第1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92页。

古训，实事求是而已"[1]，如此等等。实事求是不仅成了乾嘉时期学者治学的宗旨，也成了人们校理古籍的首要原则。

1. 多闻阙疑，审慎对待古籍。

自孔子提出多闻阙疑的校勘原则后，后世校勘古籍均将其奉为圭臬，《汉书·艺文志》对阙疑的重要性有明确认识，云："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寖不正。"颜师古注云："《论语》载孔子之言，谓文字有疑，则当阙而不说。孔子自言，我初涉学，尚见阙文，今则皆无，任意改作也。"对于不能遵守多闻阙疑之义的现象，《汉志》还提出批评，"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2]，严重损害了经籍的流传。东汉学者何休在注疏《春秋公羊传》时也阐发孔子校勘古籍的微言大义，指出"夫子欲为后人法，不欲令人妄亿错，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3]。所谓"不欲令人妄臆错"，是说孔夫子不希望后人在校书时，对于疑字阙文，通过任意猜测来处理。这说明孔子对待古籍极为审慎，疑则传疑，为后世校书立法。何休也把孔子"四绝"引进校勘领域，当作人们校理文献的态度，即不凭空猜测、不绝对武断、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做好了这四点，自然就会在文献校理方面作出成绩。总之，多闻阙疑要求在校勘资料的搜求和考证方面，力求多闻，充分利用各种版本，广泛考察一切可资利用的他书资料，综合使用各种校勘方法，进行考校。在校书过程中，坚持阙疑，就是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不妄下断语，"苟无依据，皆属阙疑"[4]，"正其脱谬，疑者阙之"[5]。阙疑之旨的贯彻，体现了校勘态度的客观与审慎。

---

① 阮元：《研经室集》自序，见《研经室集》卷首，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②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③ 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二《昭公十二年》。

④ 程俱：《麟台故事残本》卷二《校雠》，见《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83页。

⑤ 《曾巩集》卷十一《说苑目录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1页。

宋代馆阁校勘，一向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臆断，不师心自用。宋真宗咸平年间校理《汉书》，“历代名贤竞为注释，是非互出，得失相参，至有章句不同，名氏交错，苟无依据，皆属阙疑。其余则博访群书，遍观诸本，傥非明白，安敢措辞！虽谢该通，粗无臆说”[①]。重版本、重证据、不主观臆断，即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谓“一言去取，必有稽考”[②]。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三种古传本，即《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金匮玉函经》，三种传本不尽相合，嘉祐年间整理《金匮玉函经》，即云：“《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欲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臣等先校定《伤寒论》，次校成此经。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③]尊重历史形成的不同传本的差异。

阙疑、存疑是欧阳修校勘时的一贯主张，“君子之学有所不知，虽圣人犹缺其疑以待来者，盖慎之至也”[④]。强调指出每个人都会有知识方面的缺陷，所谓“君子之学有所不知”，故而在校勘文献时要认识到自己的缺陷，慎之又慎，小心从事。对于反复研究依然搞不清楚的东西，主张采取“难以臆断为定，当两载之，使来者自择”[⑤]。

到清代，多闻阙疑更成为学者校书的准绳，并进一步提出对于无法解决的疑误问题的处理方法，赋予这一原则更加系统、丰富的思想内涵。对于史书中的讹舛，钱大昕的处理方法是：“今搜采诸书，详加折衷，其可征信者，则增入正文；其当两存者，则附之分注；若史文舛讹，加以驳

① 程俱：《麟台故事残本》卷二《校雠》，见《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83～284页。

② 林亿：《校正黄帝内经素问序》，见《黄帝内经素问》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林亿：《校正金匮玉函经序》，见《全宋文》卷九百三十三，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④ 《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唐颜勤礼神道碑》，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254页。

⑤ 《欧阳修全集》卷七十《再与王深甫论裴公碣》，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18页。

正，皆必依据古书，非敢自逞臆见，仍注于诸条之下，以便省阅。”[①] 鲍廷博也提出对于不同问题的处理办法：“遇有互疑之处，择其善者从之；义皆可通者两存之；显然可疑而未有依据者仍之。”[②] “择善而从之”、“两存之”、“仍之”，反映的恰恰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观念。和鲍廷博的校勘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章学诚，他说：“古人校雠，于书有讹误，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于其下；其两说可通者，亦两存其说；删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阙目。所以备后人之采择，而未敢自以为必是也。”[③]

2. 字句讹舛，不可轻改妄改。

多闻阙疑是就对待文献的慎重态度而言，不可轻改妄改古书则是针对校书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而言，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轻改妄改古书历来是文献整理的大忌，而慎改古书历来是我国古代文献整理的优良传统。《文苑英华辨证》的作者彭叔夏曾说：“叔夏年十二三时，手抄太祖皇帝实录，其间云：‘兴衰治□之源。’阙一字，意谓必是治乱，后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肱为良医，信知书不可以意轻改。”[④]

对于妄改古书的情况，自汉至今，一直遭到人们的批判。许慎作《说文解字》，严厉批评了“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的行为。宋明人好改书，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抨击。宋代苏东坡指出：“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⑤] 妄改古书，造成书籍讹舛百出，令苏东坡非常气愤。《宋史·田敏传》云：“敏虽笃于经学，亦好为穿凿。所校九经，颇以独见自任，如改《尚书·盘庚》‘若网在纲’为‘若纲在纲’，重言‘纲’字。又《尔雅》‘椴，木槿’注曰‘日及’，改为‘白

---

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八《续通志列传总叙》，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5 页。

② 《知不足斋丛书·凡例》，中华书局 1999 年版。

③ 《校雠通义通解》卷一《校雠条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8 页。

④ 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原序，文渊阁四库丛书本。

⑤ 苏轼：《商刻东坡志林》卷五，见《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九册，大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7 页。

及’。如此之类甚众，世颇非之。”[①] 因为任意改字搞乱了经籍的本来面目，故而遭到非议。对宋代坊间刻书任意篡改内容的恶劣做法，清代顾广圻等人也都进行了批判，顾广圻说：“南宋时建阳各坊，刻书最多，惟每刻一书，必倩雇不知谁何之人，任意增删换易，标立新奇名目，冀自玄卖，而古书多失其真。逮后坊刻就衰，而浮慕之敝起，其所刻也，转转舛错脱落，殆不可读者有之。加以牡丹水利，触目满纸，弥不可读者有之。又甚而畚其空疏白腹，敷衍谬谈，涂窜创痏，居之不疑。或且凭空构造，诡言某本，变乱是非，欺绐当世，阳似沽名，阴实盗货，而古书尤失其真。”[②] 坊间刻书，为了赚取最大利润，或增删换易，或标新立异，或涂窜敷衍，或凭空构造，致使文献典籍“舛错脱落”、“多失其真”，传之后世，不忍卒读。

明代学风浮华，妄改古书更胜于宋代，清初大儒顾炎武对此进行了猛烈批判，他说：“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③] 妄改古书对后世造成很坏的影响，“苟如近世之人，据臆改之，则文益晦，义益舛，而传之后日，虽有善读者，亦茫然无可寻求矣”[④]。顾炎武还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书》，而后人往往效之。然犹曰：旧为某，今改为某，则其本文犹在也。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叹者也。”[⑤] 杭世骏对明人任意改变书名、删削卷数、掺入其他资料等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明人之妄如此”！[⑥]

---

①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田敏传》。

② 顾广圻：《顾千里集》卷十《重刻古今说海序》，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64 页。

③ 《日知录集释》卷十八《改书》，岳麓书社 1994 年版，第 672 页。

④ 《日知录集释》卷十八《勘书》，岳麓书社 1994 年版，第 671 页。

⑤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见《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 1983 年第二版，第 69 页。

⑥ 《道古堂集》卷十八《欣托斋藏书记》，清乾隆刻本。

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浩如烟海，但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也相当严重，号为“书厄”。隋代的牛弘、明代的胡应麟曾分别提出图书“五厄”论[①]、“十厄”论[②]。饶有兴味的是，清人黄廷鉴认为妄改古书也是古籍一“厄”，他说：“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谨守师法，未闻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于启、祯之代，凡《汉魏丛书》以及《裨海》、《说海》、《秘笈》中诸书，皆割裂分并，句删字易，无一完善，古书面目全失，此载籍之一大厄也。”[③] 由此可见，在秉承实事求是思想而整理文献的学者那里，妄改、轻改古书对文献的破坏和朝代更替、兵灾匪患、水淹火烧等对文献的破坏没有什么两样。

在批判了妄改古书的现象以后，文献学家们提出了“慎改字”、“不改字”的主张。

其实，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在校理文献时，对于改动字句历来是小心谨慎的。东汉郑玄在校理经籍时，不仅不刊改文字，而且还保存异文，择优而从。南北朝时期颜之推校书，对妄删、妄加都提出批评，[④] 告诫人们校书必须谨慎从事，切不可以意增删，徒增讹误。唐代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充分估计到古书在传抄流传过程中文字讹误的严重性，把校勘看作是释义的前提，他谈到自己的校勘原则时说：“余既撰音，须定纰缪。若两本俱用，二理兼通，今并出之，以明同异；其泾渭相乱，朱紫可分，亦悉书之，随加刊正；复有他经别本，词反义乖，而又存之者，示博异闻耳。”[⑤] 很明显，陆氏既校是非，又校异同，反对轻改、臆改。到宋代，欧阳修是主张慎改古书的重要人物，“要知改字当慎”[⑥]，要求人们慎于改字。有清一代，校勘发达，校勘学理论也更加系统化，对于校书改字问题，人

---

① 《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

②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③ 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卷一《校书说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④ 《颜氏家训集解》卷六《书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75～472页。

⑤ 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条例》，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⑥ 《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一《唐田弘正家庙碑》，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270页。

们提出了更为独到的看法。

鲍廷博反对在校勘时改字，坚信自已“从未尝以已见妄改一字”①，其原因就是怕改字“失作者本来也”②。顾广圻亦反对妄改古书，主张校书要保存古籍的本来面目，“一字不改，悉依其旧，尚存‘不知为不知’之遗意，于是而古书可以传，可以传而弗失其真”③。对于擅改古书，段玉裁也是不同意的，他说：“凡书必有瑕也，而后以校定自任者出焉，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类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今公序所据之本皆亡，惟此岿然独存，其讹误诚当为公序所黜，而其精粹又未必为公序所采，是以荛圃附之考证，持赠同人，此存古之盛心，读书之善法也。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邢子才曰：‘误书思之，更是一适。’以善思为适，不闻以擅改为适也。”④阮元提出要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对待校勘，绝对不能轻易改字，他说：“刻书者最患以臆见改古书，今重刻宋版，凡有明知宋版之误字，亦不使轻改，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别具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卷之末，俾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慎之至也。”⑤焦循对于校勘任意改字也很不满：“不求其端，任情删易，往往改者之误，失其本真。”⑥朱一新也认为古书不可轻改，“凡本义可通者，即有他书显证，亦不得轻改。古书词义简奥，又不当以今人文法求之”⑦。他批评清代某些校勘家在这方面所

① 《知不足斋丛书·凡例》，中华书局1999年版。

② 《知不足斋丛书·凡例》，中华书局1999年版。

③ 顾广圻：《顾千里集》卷十《重刻古今说海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4页。

④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八《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⑤ 阮元：《研经室三集》卷二《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见《研经室集》（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20页。

⑥ 焦循：《雕菰集》卷八《辨学》，见《焦循诗文集》，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139页。

⑦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三，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5页。

犯的错误，说："国朝人于校勘之学最精，而亦往往喜援他书以改本文。不知古人同述一事，同引一书，字句都有异同，非如今之校勘家，一字不敢窜易也。今人动以此律彼，专辄改订，使古书皆失真面目。此甚陋习，不可从。"① 李兆洛也批评校勘者"不知守阙如之戒，妄缘疑而致误"，致使"本初无误，校乃致误"。清代学者坚持阙疑，决不妄改，"本朝读书士共守此训，不敢妄改，而雠校之事，确然有所守，故所刊书籍，贤于前代远甚，至乾隆中极盛矣"②。

校勘中之所以不轻改、妄改古书，是因为古书致误的原因错综复杂，③非主观猜测或臆断所能解决。但事实上，凡校勘必有改字，一字不改的校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关键在于是否改得正确，是否能避免轻改、妄改，绝不能拘泥。宋代朱熹校经，往往改字，但他不是轻改、妄改，而是此处当改，"某所改经文字者，必有意，不是轻改，当观所以改之之意"④。清代王引之提出"三改三不改"论，也认为有些当改、有些不当改，要视情况而定。他认为对于"写官误"、"椠工误"以及唐、宋、明之士妄改经书这三种情况，只要证据确凿，校勘时就要"勇改"；对于异体字、假借字以及写官椠工失误但又找不到佐证这三种情况，校勘时就不能轻易言改。⑤应该说，王引之的主张更为通达。

三、段顾之争的若干问题及乾嘉时期校勘理论的发展

讨论中国古代校勘思想的成就，不能不涉及清代乾嘉时期段玉裁与顾广圻关于校勘问题的争论。段顾之争涉及校勘思想、校勘原则、校勘方法等诸多问题，是校勘学史上的著名论争。由于段、顾二人俱学识渊博，所以争论引经据典，你来我往，难分伯仲。时人洪亮吉认为可与历史上的

---

①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三，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4～95页。

② 李兆洛：《顾君墓志铭》，见顾广圻：《顾千里集》附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05页。

③ 参见倪其心：《校勘学大纲》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 《朱子语类》卷一百五，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626页。

⑤ 龚自珍：《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见《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8页。

“朱陆异同辨”媲美，[1] 在清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并直接促进了校勘学理论的发展。

关于这场争论，后世或是段而非顾，或是顾而非段；或认为是吴、皖两派校勘家的门户之争；或认为是对校（或称死校）、理校（或称活校）的校勘方法之争。[2] 其实，这些认识都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段顾之争的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反思，它所反映出的乾嘉时期校勘学理论发展的特点，值得总结。

段顾之争，缘起于对《礼记》中几个字正误的校法，《礼记·礼器》：“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顾氏据唐石经对校，认为“有文”二字乃衍文；段氏根据推理，运用理校，认为“有文”不是衍文。《礼记·曲礼》：“二名不徧讳。”顾氏据郑注，认为应作“偏”；段氏用义理推求注文，认为当为“徧”。《礼记·王制》：“虞庠在国之四郊。”顾氏据《正义》判定“四”当作“西”；段氏则据他书引文证明“四”为是。

一二文字校勘的差异，背后所反映的是校勘依据、校勘原则以及校勘成果的保留形式等的差异，再深一步讲，是学术理念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在乾嘉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校勘理论上，顾广圻有“不校校之”之说，段玉裁有“定底本之是非与定立说之是非”之论。这两个学说分别是二人校勘学思想的核心，他们关于校勘的一系列看法，都是围绕这两个学说展开的。

顾广圻说：“书必以不校校之：毋改易其本来，不校之谓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谓也。今古余先生重刻宋抚本《礼记》，悉依元书，而别撰《考异》，以论其是非得失，可云实获我心者也。观乎《考异》之为书，举例也简，持论也平，断决也精，引类也富，大抵有发疑正

---

① 陈鳣：《经籍跋文·宋本礼记注跋》，转引自《王欣夫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7 页。

② 对于段顾之争的探讨，有漆永祥《论段、顾之争对乾嘉校勘学的影响》（《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 年第 3 期），余敏辉《段、顾之争与校勘原则》（《社会科学战线》1997 年第 3 期），倪其心《“不校校之”与“有所不改”》（《校勘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罗军凤《论段玉裁的“义理校勘”——为段、顾之争进一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8 年第 3 期）。

读之功，无茧丝牛毛之苦，去凿空腾说之损，收实事求是之益，岂但有功于此书哉？夫固使弊于校者，箴其膏肓而起其废疾矣。”①

按顾广圻的解释，“不校校之”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是“不校”，二是“校之”。所谓“不校”，就是在校勘过程中，所误不改，“毋改易其本来”，以存其书原貌。所谓“校之”，就是另述发生讹误之所以然，即“悉依元书，而别撰《考异》，以论其是非得失”。“不校校之”，并不是机械地对校，消极地不校，而是主张在校勘时谨慎下笔，不要轻改臆改原书文字，同时要“思其误”，即保留各种版本的异文——存旧，与读者共同思考古书的“真”面目。对此，顾广圻有进一步的论述，他说：“以思适名斋者何？顾子有取于邢子才之语也。史之称子才曰：‘不甚校雠。’顾子役役以校书而取之者何？谓顾子之于书，犹必不校校之也，子才诚仅曰不校乎哉？则乌由思其误？又乌由而有所适也？故子才之不校，乃其思，不校之误使人思，误于校者使人不能思，去误于校者而存不校之误，于是日思之，遂以与天下后世乐思者共思之，此不校校之者之所以有取于子才也。”② 校勘既然是要恢复古书的原貌，就有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通过去讹存真，恢复了古籍的本来面目，二是任意校改，旧错未去，又添新错，结果是愈校愈乱。在顾广圻看来，“不校之误”不可怕，因为那是原书就有的误，人们还可以思考究竟误在何处，何以致误。“误于校者”最可怕，校勘者由于主观臆断，可能把对者改错，错者未改，致使所校之书错上加错、误上添误。顾广圻的“不校校之”实际上就是针对“误于校者”的情况而提出来的。而这种“误于校者”的情况，在顾广圻看来，恰恰是段玉裁所经常犯的错误。

“不校校之”实际上还只停留在对文献表面问题的处理上，而段玉裁的“定底本之是非与定立说之是非”这一理论则涉及文献作者的问题。

段玉裁云：“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

① 顾广圻：《顾千里集》卷十七《礼记考异二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5页。

② 顾广圻：《顾千里集》卷六《思适寓斋图自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6页。

断其立说之是非。二者不分，轇轕如治丝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实而瞀乱乃至不可理。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①] 对于这段话，倪其心先生这样评价：“段玉裁提出区别‘底本之是非’与‘立说之是非’，这一卓越见解的伟大意义正在于明确划定古籍整理与古籍所载内容的专门研究的界限。这就是说，先把原著文字原貌整理出来，然后再研究探讨它的内容涵义。”[②] 在段玉裁看来，勘定文献中的文字错讹不难，难的是定“底本”和“立说”的是非。“定底本之是非”是“定立说之是非”的前提，“定立说之是非”是“定底本之是非”的归宿。段玉裁所要纠正的不仅仅是因失之粗心而导致的手写之误，而且还有因昧于字义所导致的作者之误。底本之是非（稿本）属于文献整理，作者之是非（义理）属于文献内容及思想研究，二者一个是形式，一个是内容，形式的差异必然导致内容的差异，故而首先要厘清底本的是非，然后在此基础上研究义理的是非。段玉裁已经不满足于对一书文字的校订，他还进一步包括对一书内容的审核和考订。

在段玉裁看来，考定本子之是非易，考察作者之是非难，“顾读书有本子之是非，有作书者之是非。本子之是非，可雠校而定之，作书者之是非，则未易定也。慎修先生、东原师皆曰：从事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审定难。仆以为定本子之是非，存乎淹博，定作书者之是非，则存乎识断、审定。”[③] 不管怎样，段玉裁认为校书不能只满足于订正讹文误字，应当正本清源，以恢复古人义理为校勘的最终目的。

相比二人的理论，可以发现，顾广圻更注重文献自身的问题，诸如校与不校、改与不改等，看重版本等实证工具的作用；而段玉裁则重视通过校勘以明道，其校正文字是为了探讨经籍中所蕴含的义理，看重自身的识断能

---

①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十二《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32～333页。

② 倪其心：《“不校校之”与“有所不改”》，见《校勘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

③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五《与胡孝廉世琦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页。

力，陈义更高。顾氏的理论在方法上易行，段氏的理论在方法上难行。

在“不校校之”的原则指导下，顾广圻在校勘上重版本、重对校、不妄改、存异文，形成了自己的校勘学特色。

在校勘中，顾广圻极其重视版本，尤其是古本旧椠，讲求版本间的互勘、对校，坚持校勘要有版本依据。对此，冯桂芬指出顾氏“博综群本异同，折衷一是，尤不肯轻改，务存其真”①。余嘉锡也说顾广圻“于书必求善本，而以各本互校”②。顾广圻本人也说：“广圻由宋本而知近本之谬，兼由勘宋本而即知宋本亦不能无谬，意欲准古今通借以指归文字，参累代声韵以区别句逗，经史互载者考其异，专集尚存者证其同，而又旁综四部，杂涉九流，援引者沿流而溯源，已佚者借彼以订此。”③ 又说：“通而论之，宋椠之误，由于未尝校改，故误之迹往往可寻也。而赵刻（指赵用贤刻本）之误，则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于是而并宋椠之所不误者，方且因此以至于误，其宋椠之所误，又仅苟且迁就仍归于误，而徒使可寻之迹泯焉，岂不惜哉!”④ 可见，顾广圻重视版本依据，强调对校，但也参校其他材料。

和顾广圻不同，段玉裁在校勘上更重视异文考证，而不太重视版本。他治学深受乃师戴震影响，戴震说：“余尝欲搜考异文，以为订经之助，又广揽汉儒笺注之存者，以为综考故训之助。”⑤ 很明显，戴震主张校勘要重视异文，以异文为考订对象。段玉裁身体力行了这一观点：“东原师尝搜考异文，以为订经之助，令其族子时甫及仆从事于此。”⑥ 又说：“先师

---

① 冯桂芬：《思适斋文集序》，见顾广圻：《顾千里集》附录，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417 页。

② 余嘉锡：《黄顾遗书序》，见顾广圻：《顾千里集》附录，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430 页。

③ 顾广圻：《顾千里集》卷二十三《文选六十卷》，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72 页。

④ 顾广圻：《顾千里集》卷十《韩非子识误序》，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53 页。

⑤ 《东原文集》卷十《古经解钩沉序》，见《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 1995 年版，第 377 页。

⑥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十一《答顾千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98 页。

东原云：‘凡考一事，勿以人之说蔽我，勿以我之说自蔽。’”① 段氏搜集异文的范围相当广泛，除本书各种版本的异文外，还广及所有载述本书的各种异文。

由于秉承“不校校之”的理论，顾广圻反对校勘改字，说：“余性素好铅椠，从事稍久，始悟书籍之讹，实由于校，据其所知，改所不知，通人类然，流俗无论矣。”② 顾广圻还对校勘家在校勘中所出现的此类错误进行了批判，他说：“盖以校书之弊有二，一则性庸识暗，强预此事，本未窥述作大意，道听而途说，下笔不休，徒增芜累；一则才高意广，易言此事，凡遇其所未通，必更张以从我，时时有失，遂成疮痏。二者殊途，至于诬古人惑来者，同归而已。”③ 认为校书要阙疑存信，“通其所不通，而不强通其所不可通”④。

和不改原文相呼应，在校勘结果的处理上，顾广圻指出书上有误，可用校勘记注存，保存原文，不做任何改动，避免因误改而无法复原。

与顾广圻不同，段玉裁在校勘上反对墨守旧刊，认为对感觉到文理不顺的字句要勇疑其误，当改则改，以通其理。他说：“夫校经者，将以求其是也，审知经字有讹则改之，此汉人法也。汉人求诸义而当改则改之，不必其有佐证”⑤。“凡校书者，欲定其一是，明贤圣之义理于天下万世，非如今之俗子夸博赡、夸能考核也”⑥。无论什么版本，只要通过理校感到有错，尽可改正：“凡宋版古书，信其是处则从之，信其非处则改之，其

---

①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十一《与顾千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95 页。

② 顾广圻：《顾千里集》卷二十三《文苑英华辨证十卷》，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76 页。

③ 顾广圻：《顾千里集》卷十七《礼记考异二卷》，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65 页。

④ 顾广圻：《顾千里集》卷十一《重刻宋九卷本古文苑序》，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70 页。

⑤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十一《答顾千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98 页。

⑥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十一《答顾千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00 页。

疑而不定者则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论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适滋后来之惑也。"① 段氏的观点包含这么几层意思：其一，校经的目的是为了"求其是"，"明贤圣之义理于天下万世"；其二，校经的原则是"当改则改之，不必其有佐证"。段玉裁认为，如果学识无憾，可以直接改字，写成定本。

由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段、顾二人在校勘理论上存在很多不同，实事求是而论，二人的校勘思想各有特色，共同丰富了我国的校勘学理论。

段、顾在校勘理论上的差异与他们的学术渊源及所坚持的治学思想密切相连。顾广圻在校勘思想上受颜之推、邢邵以及岳珂和彭叔夏影响较大，继承了他们重版本、不轻改的优良传统，强调校勘的客观标准。段玉裁受郑玄影响较大，他说："校书何放乎？放于孔子、子夏。自孔、卜而后，汉成帝时，刘向及任宏、尹咸、李柱国各显所能奏上。向卒，歆终其业。于是有雠有校，有竹有素，盖綦详焉。而千古之大业，未有胜于郑康成氏者也。《七略》必衷六艺，删定必归素王。康成氏其亦汉之素王乎？盖一书流传既久，彼此乖异，势所必有也。墨守一家，以此攻彼，夫人自以为能也。而郑君之学，不主于墨守，而主于兼综；不主于兼综，而主于独断。其于经字之当定者，必相其文义之离合，审其音韵之远近，以定众说之是非，而以己说为之补正。"② 很显然，段玉裁继承了郑玄敢于通过推理考据刊误订正的传统，再加上戴震的影响，认为读经是为了明道，校经亦是为获取义理。校勘既要"兼综"，宏观思考问题，又要"独断"，敢于决断是非。段氏重视主观理念在校勘中的作用，反对"校书者就一字一句异同卤莽立说，而不观上下文以求其义理"③ 的校书思想。

虽然段、顾之争异常激烈，甚至有些意气用事，但二人之争，只是方

---

①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四《与黄荛圃论孟子音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5 页。

②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八《经义杂记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8 页。

③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十一《礼器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84 页。

法论上的差别，在目的上两家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恢复古籍原文面貌。

另外，我们说段、顾在校勘理论上有差异，也是就大的方面而言。有些学者把顾广圻、卢文弨等人目为吴派校勘家，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父子看成皖派校勘家，并认为吴派校勘家重对校、重版本、强调保持文本原貌、主张说明异文正误而不做更改，皖派校勘家重理校、重异文考证、强调根据文本义理进行文字音韵及历史知识考察、主张改正误字。① 在“校勘应遵循的原则上，二人持有对立性的分歧”②。事实上，这样的认识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其一，不能把段顾之争当成是吴皖两派校勘家之间的分歧。段、顾之间确有分歧，但这种分歧不是学派间的分歧，而是学者间的分歧。他们存在分歧，也有相互影响，很多校勘观点都是相互认同的。从学术关联上讲，顾广圻曾师从江声，是惠栋的再传弟子，似乎承续了吴派的学术理念，但同时，他也是段玉裁的学生，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二人相识，从此相互欣赏，“千里（广圻）遂请业于先生（玉裁）”③。作为长者的段玉裁对顾广圻的学问赞赏有加，作为后生的顾广圻对段玉裁的学识崇敬备至，④ 并不存在学派间的隔阂。二人发生争执，更多的是因为二人校改主张的不同，以及意气用事。梁启超认为清儒最恶立门户，“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⑤，此言放在段、顾身上，特别合适。

其二，段玉裁提出“定底本之是非”，这一原则实际上顾广圻也在用。段玉裁说：“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

---

① 比如漆永祥指出：“段、顾之争实际上是乾嘉时期学术界，尤其是校勘学界内部吴、皖两派之间围绕着校勘中对待古本、他校材料、校勘方法原则、校勘成果保留方式等方面不同意见而进行的一次全面性学术检讨，是吴、皖两派矛盾的冲突化，也是两派优劣得失相比较下的总曝光。”（《论段、顾之争对乾嘉校勘学的影响》，《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 年第 3 期）。

② 余敏辉：《段、顾之争与校勘原则》，《社会科学战线》1997 年第 3 期。

③ 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七年，北平来熏阁书店 1936 年印行本。

④ 董莲池：《段玉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8～41 页。

⑤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 页。

经之义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① 段玉裁强调要分别根据贾公彦、孔颖达、陆德明、杜预、郑玄等的注、疏、释文，考定每个人当日所用的经本，使经本和每个人的注说相合，把每个人的底本还给每个人。而这恰恰也是顾广圻所坚持的，顾广圻主张恢复古书原貌，其目的和原则是“还之自古相传至唐孔、贾所受之经典注而已”，这实际上就是段玉裁的“定底本之是非”，并一一还之本人。

其三，在校法上，并非顾氏完全用对校，段氏完全用理校。事实上，“两人所用校勘方法其实相同，都是参用对校、理校来校出异文；两人不同的是判断与处理”②。顾广圻不仅重版本、重对校，而且能融对校与理校于一体，余嘉锡说：“论者徒见其校书不轻改字，以为先生（顾广圻）尊信旧本，如藏书家佞宋之为者，非知先生者也。”③ 就段玉裁而言，校勘时并不是不要版本，事实上，段玉裁也重视版本，常常罗列众本之异同，定其是非。只是段氏校勘古书，是为了注释儒家经典，由字以通词，由词以明道，获取经书义理，故而理校用得多些。

其四，对于顾广圻的“不校校之”，段玉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认同的。段氏云：“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邢子才曰：‘误书思之，更是一适。’以善思为适，不闻以擅改为适也。”④ 这句话和顾广圻的“误于校者”及“思适”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段玉裁也意识到校勘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强调校勘时要善思、慎改：“凡书必有瑕也，而后以校定自任者出焉，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类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

①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十二《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36页。

② 倪其心：《“不校校之”与“有所不改”》，见《校勘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页。

③ 余嘉锡：《黄顾遗书序》，见顾广圻：《顾千里集》附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页。

④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八《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①]

段顾之争直接推动了清代校勘学理论的发展。与其同时，卢文弨提出了“两通者但注其下”的原则，他说：“其灼然断在不疑者，则就改本文，而注其先所讹者于下，使后来者有所考。若疑者、两通者，则但注其下而已”[②]。卢文弨的观点是对段、顾校勘思想的折中，对于“灼然不疑”者，可以“就改本文”，显然吸收了段玉裁当改则改的观念。对于“疑者、两通者”，则“注其下”，显然吸收了顾广圻保存异文的思想。王引之提出“三改三不改”论，他说：“吾用小学校经，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书体六七变，写官主之，写官误，则为改。孟蜀以降，椠工主之，椠工误，吾则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声音文字而改经，以不误为误，是妄改也，吾则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没，汉之初，经师无竹帛，异字博矣，吾不能择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来旧矣，其本字十八可求，十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则考文之圣之任也，吾不改。写官椠工误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群书无佐证，吾惧来者之滋口也，吾又不改。”[③] 在王引之看来，校勘古书，有些当改，诸如常识性的明显的错别字，有些不当改，诸如那些无法断定的本字。王氏的校勘原则，对于戴震、段玉裁等人勇于改字，以及顾广圻等人一字不改的做法进行了有意的纠偏，这无疑是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基础上的进步。而且他的“有所不改”在实质上是承认古籍整理存在一种无法否认的局限，即真本失传、传本失真，无论通过什么方法，某些错讹永远也无法纠正，古书也永远无法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四、对校勘家的要求

校书是一项长久的工作，其中艰难，古有定论。沈括《梦溪笔谈》中

---

①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八《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1 页。

②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五《新校说苑序》，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59 页。

③ 《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见《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48 页。

记载宋敏求关于书籍校勘的话说："宋宣献（敏求）博学，喜藏异书，皆手自校雠，尝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一书三四校，犹有脱谬。"① 朱弁《曲洧旧闻》也有类似的记载："宋次道龙图云：'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② 清人黄丕烈在校书实践中对宋敏求的话深有同感，说："校书之难，如扫落叶，如拂几尘"③。"书之难校，扫叶拂尘，可为至论"④。不是青灯黄卷日复一日地校书，难有如此切入肌肤的体会。

既然校书如此困难，对校勘家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具体如下。

（一）对校勘家自身修养的要求

文献校勘是在校勘者主体支配下的学术实践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校勘者主体的观念及修养支配着校勘实践的进行，决定着校勘实践的方式和校勘质量的高低。正因为此，古往今来的校勘家都对自身修养提出过要求。

第一，知识储备：广博专精。颜之推认为校订书籍必须具有渊博的知识储备："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⑤ 校书绝非雕虫小技，只有扬雄、刘向这样学识渊博的大儒才算称职，遍观天下之书，才能比勘文句，否则不敢置喙。对于这一点，宋代的欧阳修也认为，书籍内容，至为庞杂，校勘者必须学识渊博，要求"天地事物，古今治乱，九州四海，幽荒隐怪之说，无所不通"⑥。中国古代书籍，尤其是经史著作，其内容上涉天文，下及地理，中

①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见《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三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页。

② 朱弁：《曲洧旧闻》卷四，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1页。

③ 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四《新序十卷（校宋本）》，见《黄丕烈书目题跋》，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④ 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五《刘子新论十卷（校宋明抄本）》，见《黄丕烈书目题跋》，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⑤ 《颜氏家训集解》卷三《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⑥ 《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五《上执政谢馆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446页。

载古今变化，旁预玄远幽怪，如学识浅薄，触处皆滞，校勘工作自然无法进行下去。故而顾炎武说："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① 孙从添也认为校勘家要"博学好古，勤于看书"，"勤学好问"，② 具备丰厚的知识储备，方能从事这一工作。

对于校书者而言，光有渊博的学识储备还不够，还必须"专精"。李笠先生曾指出："校勘学家应具两种学识，一曰常识，二曰特识"，常识"无工作界域之区别，一切校书家俱用之"，而特识则是"从事工作时特殊对象之鉴别"。③ 广博的知识储备，可以看作是"常识"，必须具备，方能从事校书，"特识"则是一种特殊的修养，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储备，可用之于与之相关的文献的整理。

从事校勘所应该具备的知识，荦荦大者，有文字、音韵、训诂等语文学知识，版本、目录、辨伪、辑佚等文献学知识以及其他相关的专门知识。文献以文字来书写，但文字、读音屡经变化，造成文献讹误，宋代岳珂、清代顾炎武都对文字、音韵变化造成的文献讹错进行过分析。正因为此，人们主张"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④，加强文字音韵学修养，成为校勘学者的共识。版本、目录等文献学知识，更是校勘文献不可或缺的修养。至于其他相关专门知识，古代学者强调"专家校书"。刘向校书，即形成这一优良传统，"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兵部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都是用具备某一方面知识的专家校理相关文献，事半功倍，效果极佳。

第二，治学态度：勤勉细心。在古人看来，校勘古书，还必须具备两种治学态度，一要勤勉，二要细心。古代文献学家校勘古籍，非常勤恳和细心，"一编在手，废寝忘食，丹铅无已时。一字之疑，一行之缺，必博

---

① 《日知录集释》卷十八《勘书》，岳麓书社 1994 年版，第 670 页。

② 孙从添：《藏书记要·校雠》，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0 页。

③ 李笠：《广段玉裁论校书之难》，见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篇》附录，齐鲁书社 1998 年版，第 507 页。

④ 《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志铭》，见《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48 页。

征以证之，广询以求之”[①]。朱翌《潜山集·题校书图》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勤勉细心校书的情景：“我闻校书如扫尘，尘随帚去辄随有。萤窗孤坐志不分，帝虎鲁鱼相可否。榻上诸公富贵人，安能辨此铅黄手。绿柳啼莺耳畔春，翠袖弹丝眼前酒。如何复窥蠹简尘，又借管城公作帚。画史画名不画实，润色丹青传不朽。我是瀛洲旧校书，挥汗磨铅胝两肘。当时万一见此图，诸郎不免涎垂口。”[②] 诗中所云“萤窗孤坐”、“挥汗磨铅”，亦指出校书要耐得住寂寞。王鸣盛考校十七史，“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勤勤恳恳，小心谨慎，云：“暗砌蛩吟，晓窗鸡唱，细书饮格，夹注跳行。每当目轮火爆，肩山石压，犹且吮残墨而凝神，搦秃豪而忘倦。时复默坐而玩之，缓步而绎之，仰眠床上而寻其曲折，忽然有得，跃起书之，鸟入云，鱼纵渊，不足喻其疾也。顾视案上，藜羹一杯，粝饭一盂，于是乎饮饭进羹，登春台，飨太牢，不足喻其适也。”[③] 这不仅是勤勉细心，而且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每校出一处错误，竟如登春台、飨太牢一般享受！没有对校书事业的热爱，是不可能达到如此境界的。

第三，对待自己：勇于反思。古代著名的校勘家律己极严，常常解剖自我的校勘工作，反躬自省。以钱大昕为例，在校勘工作中，他反对吹毛求疵、自我炫耀的作风，说：“世之考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摘沈、箫之数简，兼有竹、素烂脱，豕、虎传讹，易‘斗分’作‘升分’，更‘子琳’为‘惠琳’，乃出校书之陋，本非作者之愆，而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④] 很明显，钱大昕反对在校史时指小疵为大创。钱大昕主张考校古书，宜时时自省，忌夜郎自大，“自高”、“自狭”、“不得其源”、“自贵而贱人”、“自盈而拒物”，[⑤] 都是为学大忌。他认为，古人治学有误，“吾虽不言，后必有言之者，虽欲掩之，恶

① 《知不足斋丛书·朱文藻序》，中华书局1999年版。

② 朱翌：《潜山集》卷一《题校书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中国书店1987年影印本。

④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自序，见《廿二史考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⑤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二《跋方正学溪喻草稿摹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3页。

得而掩之？所虑者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成吾之妄”①。对于那种“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的轻浮学风，钱大昕不以为然，指出：“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果无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吾能见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吾求吾失而不暇，何暇论人哉。”② 虽然钱大昕所反思的是当时整个学界的治学问题，但确实包括校勘在内。这种号召学者反躬自省的观念，正是实事求是的体现。

（二）对校勘家资料占有的要求

第一，校勘必须掌握广泛的、用以比勘佐证的资料。宋代馆阁整理医书，网罗众本，“搜访中外，裒集众本，浸寻其义，正其讹舛……又采汉唐书录古医经之存于世者，得数十家，敘而考正焉。贯穿错综，磅礴会通，或端本以寻支，或泝流而讨源……一言去取，必有稽考，舛文疑义，于是详明”③。如校理《千金要方》，“乃自广内秘文及民间众本、道藏竺典、字篇杂子，并用搜访，以资参考，得以正其舛互，补其遗佚”④，真可谓穷尽一切材料，以资利用。

和前人一脉相承，王鸣盛对待校勘非常认真，占有资料极其丰富，他说：“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亦随读随校，购借善本，再三雠勘，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⑤ 王鸣盛认为，从事校勘，必须博综群籍，凡世间所有之资料，均要搜罗殆尽，以供佐证，以便校勘时相互检照，达到精校之目的。

校书必广搜异本（副本），是自刘向以来文献校勘家的共同主张，他

---

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答王西庄书》，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04 页。

②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七《奕喻》，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78 页。

③ 林亿：《校正黄帝内经素问序》，见《黄帝内经素问》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六十五《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序》，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999 页。

⑤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中国书店 1987 年影印本。

们或付诸实践，或进行理论阐释，都把广储异本放在资料准备的首位。这些异本包括稿本、抄本、拓本、印本、注本、选本、校本等等。章学诚说："校书宜广储副本，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夫中书与太常、太史，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外书与臣向臣某，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夫博求诸本，乃得雠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①] 从理论上论述了广储副本、异本的重要。黄丕烈也认为校书必须集众本以校一书，搜罗不同的版本进行互校，他说："古书传抄，岂能无误？得此证彼，可定去取，所谓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也。"[②] 他在校勘《周礼》一书时，就以明代嘉靖本为底本，以董本为主，参以家藏之岳本、蜀大字本、小字本、互注本、校余氏本等七个不同的本子，"集腋成裘，以期美备"。钱大昕称赞卢文弨校书"精审无误"，原因就是他"凡所校定，必参稽善本，证以他书，即友朋后进之片言，亦择善而从之"[③]，认为广搜异本以校书是卢氏取得较高成就的原因之一。

校勘古籍，除了用本书的各种异本外，还必须充分利用他书的引文，诸如类书、注文等等。此法始于宋人，明人利用类书、注文进行校勘的例子已有不少，但广泛应用以乾嘉时期为最盛。王念孙父子最善于利用类书校书，由于人们对类书的价值评价不高，故而占有类书以校书，得失参半。朱一新总结说："高邮王氏父子之于经……其精审无匹，视卢召弓辈亦远胜之。顾往往据类书以改本书，则通人之蔽。若《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之类，世无善本，又其书初非为经训而作，事出众手，其来历已不可恃。而以改数千年诸儒断断考定之本，不亦傎乎？然王氏犹必据有数证而后敢改，不失慎重之意。若徒求异前人，单文孤证，务为穿凿，则经学

① 《校雠通义通解》卷一《校雠条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② 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五《砚笺四卷（校宋本）》，见《黄丕烈书目题跋》，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③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卢氏群书拾补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02页。

之蠹矣。”[①] 近人刘文典也说：“清代诸师校勘古籍，多好取证类书，高邮王氏尤甚。然类书引文，实不可尽恃，往往有数书所引文句相同，犹未可据以订正者。盖最初一书有误，后代诸书亦随之而误也……故虽隋、唐、宋诸类书引文并同者，亦未可尽恃。讲校勘者，不可不察也。”[②]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占有资料，不可不慎。同样，对于他书注文，利用时也要小心，卢文弨说：“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故校正书籍，自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况未有雕版以前，一书而所传各异者殆不可遍举，今或但据注书家所引之文，便以为是，疑未可也。”[③]

另外，甲骨文、金文、石刻等也是校书必须掌握的校勘资料，尤其是石刻文献，校勘价值极高。严可均认为汉、魏、唐石经不仅时间早，而且保留也比较完整，以之校勘，定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他说：“取今本与石经对校……审知今本逊宋版本，宋版本逊石经，而石经又非善之善者……然而后唐雕版，实依石经句度钞写，历宋、元、明转刻转误，而石经幸存。以之复古则不足，以正今误则有余。世间无古本，石经即古本矣。”[④]

第二，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及专家意见。校勘文献，代代相继，前人校勘成果理应成为后世校勘的参考。从校勘发展史来看，后世对前人校勘成果的利用比比皆是，对前人校勘成果的评论也一分为二，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如宋代沈揆校《颜氏家训》，在把闽本与谢景思校本比较后，虽谢氏校本“亦时有此疏舛”，但“所校颇精善”，故“多采谢氏书，定著为可传”。[⑤] 王念孙校《荀子》，也尽可能地吸收了各家校本的可取之处，“择善而从，诚不可以已也”[⑥]。

博访通人，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也是校勘家占有资料的有效途径，

---

①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75 页。

② 刘文典：《三余札记》卷一《类书》，黄山书社 1990 年版，第 6 页。

③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十《与丁小雅进士论校正方言书》，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284 页。

④ 严可均：《铁桥漫稿》卷五《唐石经校文叙》，续修四库全书本。

⑤ 沈揆：《颜氏家训》跋，见《颜氏家训集解》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⑥ 王念孙：《王石臞先生遗文》卷三《读荀子杂志补遗叙》，见《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王念孙校释《管子》，除"博考诸书所引，每条为之订正"外，还与王引之、孙星衍、洪颐煊等人讨论，"稽合同异，广为考证"。[①] 阮元撰《仪礼石经校勘记》四卷，博采戴震、刘台拱、王引之、金榜、钱大昕、王念孙等人的看法，焦循为之作后序，称其"博访通儒，务从人善"，非常准确地概括了校勘学家虚怀若谷、博采通人的良好学风。对此，孙从添有言："若古人有弗可考究，无从改正者，今人亦当多方请教博学君子。善于讲究古帖之士，又须寻觅旧碑版文字，访求藏书家秘本，自能改正。然而校书非数名士相好聚于名园读书处，讲究讨论，寻绎旧文，方可有成，否则终有不到之处。所以书籍不论钞刻好歹，凡有校过之书，皆为至宝，至于字画之误，必要请教明于字学声韵者，辨别字画音释，方能无误。"[②]

要言之，校勘家的主体修养是影响校勘成果质量高低的最主要的因素，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的文献学家在理论上有清醒而系统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广博专精、勤勉细心、勇于反思，是主体修养的内在条件，广搜异本、占有其他相关材料，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博采通人，务从其善，是主体修养的外在条件，二者相辅相成，不仅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文献学思想，而且推动了中国文献校勘实践的发展。

第三节　文献校勘的方法与方法论

校勘古书离不开一定的方法，从归纳致误原因到版本的选择，从资料的搜罗到具体的比勘，都需要方法。由于中国古代文献学家缺乏对方法的总结，虽然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校勘实践中使用着一些有效的方法，但上升到理论高度对其进行归纳探讨，则是比较晚的事情了。就中国古代校勘

① 王念孙：《读书杂志·管子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11页。

② 孙从添：《藏书记要·校雠》，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实践及思想来看，其方法一直是以归纳、比较以及严密实证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的。

一、“求古”与“求是”相统一的版本价值观

选择版本是校勘工作最关键的一步，因为校勘的目的既然是要纠正文献书面材料的讹误，使之恢复或接近其本来面目，那就必须掌握一批可以用来比勘、佐证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版本的选择是最为重要的。倪其心说：“从理论上说，校勘的一般方法就是，搜集各种版本和有关资料，包括今本古本、写本刻本、残本选本、白文本注疏本等等。然后择其善者、要者，进行比较，列出异文，分别类型，予以分析，说明理由，举出证据，作出正误是非的判断。”① 什么样的版本才是最好的呢？对此，古人有精辟的论述，值得我们总结、反思。

中国的文献学家在校勘时，一般都重视古本、旧本和宋本，强调古本、旧本、宋本的重要性。但又不盲信它们，而是有着“求古”与“求是”相统一的版本价值观，思想非常通达宏阔。

古本、旧本以及宋本因去古未远，疑误夺失较少，历来受校勘者重视。就古本、旧本而言，稿本、抄本的校勘价值最高，史载唐代颜师古校订五经，利用魏晋古旧抄本，大获成功。但是，由于稿本、抄本等留存甚少，得之不易，故可资利用的空间不大，于是人们就只能利用后世的拓本以及各种印本来从事校勘。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这些本子的价值呢？

充分肯定旧本、宋本的价值，是绝大多数文献学家的共同看法。早在宋代，人们已经认识到旧本的校勘价值。方崧卿在校理韩愈诗文时，重视旧本，认为“旧本之可信莫比”②。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人对旧本的热爱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黄丕烈注重旧本的价值，“余喜古书，不论全否，以旧本为据”③。卢文弨也重视旧本，他说：“大凡昔人援引古书，

---

① 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2 页。

② 方崧卿：《韩集举正》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九《樵云独唱集六卷（旧钞本）》，见《黄丕烈书目题跋》，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不尽皆如本文。故校正书籍，自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①] 清代有"佞宋"之风，不少人专爱宋刻，清初钱曾自称"生平所嗜，宋刊本为最"。到清代中期，黄丕烈自号"佞宋主人"，主张校书要以宋本定是非，"不得宋刻，总不敢定其是非"[②]。"盖书以宋刻为最佳，世无宋刻则已，苟有之而闻之、见之，不能得之，必思借之，手为校之，此余爱书之苦衷也"[③]。对于校书不注重古本旧本的做法，顾广圻提出了批评："书以弥古为弥善，可不待智者而后知矣。乃世间有一等人，必谓书无庸讲本子，噫！将自欺耶？将欺人耶？"[④] 对于蔑视宋本之人，顾广圻称之为"瞽人"，"世间瞽人，往往诋宋本不足重，呵佞宋者为浅学，彼顾未尝究心于铅椠耳"[⑤]。在顾广圻看来，校书、读书不选择版本，不懂古本、旧本及宋本的重要，纯然是自欺欺人。

校书重视旧本、宋本，在观念上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这种重视变成盲信，那就不可取了。事实上，凡有成就的校勘家对旧本、宋本等并不盲信，而是能一分为二来看待它们的价值，既"求古"——本子愈古愈好，更"求是"——不囿于古本，尊信错误较少的善本、精校本。

就清人而论，他们在校勘中就能客观公允地看待宋版书，把"求古"与"求是"完美结合起来。

卢文弨认为"宋本自胜近世所行本，然亦多错误"[⑥]，因为宋人勇于改经，故刻本中错误也在所难免，"今之所贵于宋本者，谓经屡写必不逮于

---

①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十《与丁小雅进士论校正方言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84页。

② 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七《蔡中郎文集十卷（校本）》，见《黄丕烈书目题跋》，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③ 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再续录》卷二《刘子十卷（明抄校宋本）》，见《黄丕烈书目题跋》，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④ 顾广圻：《顾千里集》卷二十二《蔡中郎文集十卷外传一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2页。

⑤ 顾广圻：《顾千里集》卷十七《经典释文三十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6页。

⑥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五《新校说苑序》，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9页。

前时也。然书之失真，亦每由于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见而改旧文”①。盲信宋本有时会造成很大错误，明代毛斧季、吴元恭校贾谊《新书》，盲信宋本，不知别择，出现不少问题，卢文弨批评说：“宋本科段字句有绝佳者，而讹脱处亦致不少，两君一无持择，疏矣！”② 就连号称“佞宋”的黄丕烈对宋本也有较为客观的看法，他说：“今人校书多据宋本，亦有高下之别。即如《说文》，汲古阁校刊据北宋本，而钱君（景开）所据以校汲古阁者又为麻沙宋本。是二本者，安知不有瑕瑜耶？金坛段君玉裁，为今之名儒，取钱君校本于宋本之谬者旁抹之，诚为有识。然余将近时传本展阅，亦有一二可据，何必过信汲古阁之本而没其善也。”③ 总之，黄丕烈主张对据以校勘的各种版本，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深入鉴别，不能盲信。

段玉裁说：“有所谓宋版书者，亦不过校书之一助，是则取之，不是则却之，宋版其必是耶？”④ 又说：“自有十三经合刊注、疏、音释，学者能识其源流同异，抑鲜矣。有求宋本以为正者，时代相距稍远而较善，此事势之常，顾自唐以来积误之甚者，宋本亦多沿旧，无以胜今本，况校经如毛居正、岳珂、张淳之徒，学识未至，醇疵错出。胸中未有真古本汉本，而徒沾沾于宋本，抑末也。”⑤

钱大昕对版本有极为高明的见解，他反对抱残守缺，仅据一本就妄下定论，即便是对校勘较精的宋元刊本，他也不完全盲信。他说：“金根、白芨之徒，日从事于丹铅，而翻为本书之累，此固不足道。其有得宋、元

---

①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重雕经典释文缘起》，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24 页。

②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十《书校本贾谊新书后》，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42 页。

③ 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一《说文十五卷（校本）》，见《黄丕烈书目题跋》，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④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十一《答顾千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00 页。

⑤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一《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 页。

刊本，奉为枕中秘，谓旧本必是，今本必非，专己守残，不复别白，则亦信古而失之固者也"[①]。"今本固有胜于古本者，而古人读书粗率，转或不如后人之精审也"[②]。他还说："今人重宋刊本书，谓必无差误，却不尽然。陆放翁《跋历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而略不校雠。错本书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无误矣。张淳《仪礼识误》、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举各书异同甚多，善读书者当择而取之。若偶据一本，信以为必不可易，此书贾之议论，转为大方所笑者也。"[③] 钱大昕推重善本，但不盲信一本，而是主张多本互参，这种见解不仅在文献校勘方面极有价值，而且使得他的历史考据严谨周密，极少错误，且能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

对于宋本与时本价值的优劣，陆贻典在校《管子》跋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陆氏云："古今书籍，宋版不必尽是，时版不必尽非。然校是非以为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时刻之是者无六七，则宁从其旧也。"[④] 一方面，陆氏认为宋版和时版都会有错误，没有"尽是"、"尽非"之书；另一方面，由于宋版校刻较精，错误较少，价值较高，故须"从其旧"。

许增在《唐文粹·凡例》中说："校雠之学二途：一是求古，二是求是。求古代者取宋元旧本，一一复写，期于毫发无遗，并旧本显然谬误及俗书国圣之类，亦必沿袭以存其真。求是者，寻求原本，博采群籍，舍短从长，拾遗补阙，以正未刻之前写官之误，既刻之后刊工之失，求心所安，以公同好。今刻此本，略依求是之例，知不免为求古者所讥。"在这里，许增把"求古"与"求是"对立起来，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有成就的校勘家都是将"古"与"是"统一起来的。以钱大昕为例，

---

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卢氏群书拾补序》，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02 页。

② 钱大昕：《三史拾遗》卷三《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见《嘉定钱大昕全集》（肆），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4 页。

③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宋刊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07 页。

④ 《皕宋楼藏书志》卷四十二《兵家类·管子二十四卷》，光绪八年十万卷楼刊本。

钱氏在治学上尊重古人，但不过分株守，坚持“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①，并明确指出：“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一儒之说而先后异，从其是焉者可也。”② 钱大昕的治学态度很能代表清代校勘家的校书风格，选择版本重“古”，同时又不“泥古”，而是取其“是”，后有校本胜于旧本，以后出版本为据，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要而言之，古代校勘家版本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重古而不泥古，贵宋而不佞宋，善旧而不非新，唯善是从，唯是而用。这样的版本校勘思想永远值得后人重视。

二、校勘的方法及方法论

校勘离不开一定的方法，在长期的校勘实践中，人们不断自觉地对方法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反思。

（一）对校勘方法的总结

中国古代学者校定古籍讹舛，由来已久，成绩辉煌，但在对校勘方法的总结方面，片言只语为多，系统论述很少，一直到清代，随着文字学、考据学的勃兴，校勘学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校勘之学，为清儒所特擅，其得力处真能发蒙振落”③。清代学者开始根据自己的校书经验，总结校勘的方法，为校勘学理论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最早系统总结自身校勘方法的是顾广圻，他说：“广圻由宋本而知近本之谬，兼由勘宋本而即知宋本亦不能无谬，意欲准古今通借以指归文字，参累代声韵以区别句逗，经史互载者考其异，专集尚存者证其同，而又旁综四部，杂涉九流，援引者沿流而溯源，已佚者借彼以订此。”④ 这段话把顾广圻校勘工作的方法表述得相当完整，首先勘定版本；然后指归文

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75 页。

②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九《答问六》，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6 页。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77 页。

④ 顾广圻：《顾千里集》卷二十三《文选六十卷》，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72 页。

字，区别句逗；接着考其异，证其同；最后沿流而溯源，借彼以订此。虽然顾广圻对校勘方法的总结还比较笼统，对校勘的指向性还不是十分明确，但毕竟已经开始上升到较为抽象的层面上思考问题。

孙诒让说："综论厥善，大抵以旧刊精校为据依，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不参成见。其是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之它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类通转为之錧键，故能发疑正读，奄若合符。及其蔽也，则或穿穴形声，捃摭新异，冯肊改易，以是为非。乾嘉大师，唯王氏父子郅为精博，凡举一谊，皆塙凿不刊。其余诸家，得失间出，然其稽核异同，启发隐滞，咸足饷遗来学。"① 孙诒让所总结的校勘方法包括：首先选择版本，以旧刊精校为据依；其次是归纳义例，不掺己见；接着通过版本比勘，正文字讹舛；最后运用文字音韵学修养，发疑正读。孙氏所言比顾氏虽然明晰一些，但仍然失之笼统，不便操作。

与顾广圻、孙诒让不同，吴承志、叶德辉、朱希祖、梁启超以及陈垣等人对校勘方法进行了更为准确的总结，真正使自己总结的内容迈进了方法的门槛，对后世影响极大。特别是陈垣先生"校勘四法"的提出，广泛为学界接受，为现代校勘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校勘方法上，吴承志提出"改字五例"：据善本校改，据古本校改，据注文校改，据本书校改，据义校改，并说："总此五例，校雠之方大略尽矣。"② 其实，这只不过是论述了校勘改字的依据，与王引之的"三改三不改"没有什么两样，还很难说是比较全面的校勘方法。

对于校勘方法的重要，叶德辉进行了深刻论述，他说："顾知校书之善矣，而不得校之之法，是犹涉巨川而忘舟楫，游名山而无篮舆，终归无济而已矣。"③ 由此，他把校勘方法分为"死校"和"活校"两种，叶德辉云："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本。"在他看来，顾广圻、黄丕烈校书就是

---

① 孙诒让：《札迻》自序，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吴承志：《逊斋文集》卷六《校管子书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叶德辉：《藏书十约·校勘》，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死校。“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在他看来，卢文弨、孙星衍校书就是活校。叶德辉指出，死校和活校并非清代“校勘家刻书之秘传”，而是有着悠久的传统，“实两汉经师解经之家法。郑康成注《周礼》，取故书杜子春诸本，录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刘向校录中书，多所更定，许慎撰《五经异义》，自为折衷，此活校也。其后隋陆德明撰《经典释文》，胪载异本，岳珂刻《九经三传》，抉择众长，一死校，一活校也，明乎此，不仅获校书之奇功，抑亦得著书之捷径也已”[①]。

叶德辉所论的死校类似于对校，据此本以校彼本，一一比对，录而不改，保存原文。活校类似于理校，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择善而从。死校与活校的提法较之以前对校勘方法的总结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未达到科学的程度。

朱希祖也提出了两种校勘方法，他说：“校雠之法有二：一则罗列各本，择善而从，其不善者，弃而不言。然必择一本为主，若他本、他书有善者，据以校改此本，必注云原本作某，今据某本或某书改。否则必犯无征不信之讥，且蹈无知妄改之戒。原本不误而校改反误者，皆由于此。一则择一本为主，而又罗列各本之异同，心知其善者，固当记注于上，即心知其误者，亦当记注于上，以存各本之真面，使后世读此书者，得参校其异同，斟酌其是非，择善而从，抑亦校雠之善法也。然主前法者，或讥后法为芜类而无所发明，主后法者，或讥前法为专擅而妄改古书。其实各得其法，不偭而矩，皆有益于学者。”[②] 朱氏所归纳的这两种方法，前者类似叶德辉的活校法，后者类似叶德辉的死校法，只是做了更加明晰的阐述，是对叶氏校法的发展。

梁启超总结出四种校勘方法，“第一种校勘法是拿两本对照，或根据前人所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第二种校勘法是根据本书或他书的

① 叶德辉：《藏书十约·校勘》，见《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0～51页。

② 朱希祖：《校本意林跋》，见《明季史料题跋》附录，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3～124页。

旁证反证校正文句之原始的讹误"，"第三种校勘法是发见出著书人的原定体例，根据他来刊正全部通有的讹误"，"第四种校勘法是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之错误或遗漏"。[①] 梁启超的第一种校勘方法，类似死校，实际上就是两本对校。第二种方法类似于后来陈垣提出的本校法和他校法，即"在本书或他书找出凭证"。第三种方法注重归纳著作的义例，亦类似于陈垣的本校法。第四种方法与前三种不同，"前三种校法，都是校正后来传刻本之错误，力求还出原书的本来面目，校勘范围总不出于文句的异同和章节段落的位置"。第四种方法乍看像他校法，实际上在梁启超看来，其目的是"更进一步对于原书内容校其阙失。换言之，不是和抄书匠、刻书匠算账，乃是和著作者算账"。这种方法陈义甚高，实际很难做到。梁启超的校勘方法虽然更深入一步，但逻辑不够严密，存在很多方法上的交叉混乱，有着明显缺陷。

对校勘方法总结最为精到的是陈垣先生，他结合自己的校勘实践，对我国历史上传统校勘方法进行了科学总结，提出著名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校勘四法"。

"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的校勘方法为对校法。这种方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它有短处也有长处，"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对校法是一切校勘方法的基础，"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择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的校勘方法为本校法。在陈垣先生看来，"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

"以他书校本书"的校勘方法为他校法。这一校勘方法灵活多样，"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这种校勘方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理校法是校勘四法中最高妙也是最危险的方法。"所谓理校法也，遇

---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281页。

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这一校勘方法对校勘者的学识修养要求很高，需要有“通识”，“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①。

陈垣先生的校勘四法第一次对历代学者使用过的校勘方法进行了高度抽象和科学分类，给每种方法规定了名称并赋予了科学的内涵。校勘四法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首先，对校法又叫版本校，其作用就在于通过这种校法，厘清书籍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文字讹错、衍脱、倒置、错简等。对校法是其他校法的前提，在整个校勘体系中处于基础与核心的地位。其次，本校法、他校法与对校法一样，都要有所凭借，只不过所凭借的材料不同罢了。对校法凭借的是版本，本校法凭借的是本书前后义例、内容的差异，他校法凭借的是与本书有着源流关系的征引或被征引的材料。通过这些材料进行校勘，求得本书之真。最后，理校法是在没有版本以及其他材料佐证的情况下使用的方法，主要靠校勘者的识断能力。总之，校勘四法明确了校勘工作的科学含义和性质，厘清了校勘程序及四法的相互关系。由对校到本校到他校再到理校，层层推进，都是围绕一个目的：求真。求书籍文字之真，求记载内容之真。

(二) 归纳、比较、考证

校勘是一项综合性工作，从方法论角度看，归纳、比较、考证是校勘最常用的方法。

其一，以归纳、比较为基础，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方法体系。校勘是为了正文字，而正文字的第一步就是要归纳文字产生讹误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校勘是对古书进行一字一句的琐细校理，而实际上，对文献致误规律的探讨一直是文献学家努力的方向，从形而下的文字校理到形而上的规律探讨，由形而上的规律探讨指导形而下的文字校理，一直贯穿整个文献校勘发展史。校勘离不开版本，广搜版本，将不同的版本放在一起进行比校对勘，找出文献的讹、误、衍、倒，是比较方法得以全面运用于校勘的基

---

① 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卷六《校例》，见《励耘书屋丛刻》(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础。同书祖本之间的比勘是比较，一书中前后内容的对比是比较，以他书与本书对照也是比较，甚至运用自身学识修养进行理校，也包含比较的成分。可以说，归纳、比较是文献校理的方法论基础。通过归纳比较，才能求得关于文献的本来面貌。

其二，校勘是在比较方法基础上的层次递进。这主要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文献求真的层次性，一个是校勘方法的层次递进性。校勘文献，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求真。所谓求真，实际上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求古书文字之真，即经过校勘，使古书中的文字基本上是作者原本之真，至少应求其更为接近原本之真。二是求其记载内容之真，即通过校勘，应指出古书内容的失实或记载的错误、歧异之处，尽量避免以讹传讹，贻误后人。在二者之间，探求文字之真是校勘最基本的任务，因为没有文字之真这个前提，其他工作就失去了可靠的基础。因此正文字绝对是校勘的第一步。诚如段玉裁所说："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①] 在求真层次的要求下，校勘方法也有一个层次递进的过程。对校法的最大功能，就是比勘诸本，达到正文字的目的。它所起的作用就是清理文献，清理文献是审核、研究文献的第一步，于是对校法就成了所有校法的基础。接下来就是梳理古书自身的有关记载，从前后相抵牾中发现问题，这就必须用本校法。但是，往往靠一书本身的记载还不能判明是非，还必须借助它书以为佐证，这就必须使用他校法。在这个关系中，本校法又成了他校法的前提。在上述三种方法都不起作用的时候，最后还有理校法。理校虽不常用，但有其存在的必要。这样，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校勘四法，每一校法都有自己的特点，他们互为补充，层层深入，向着求真的方向前进。

其三，归纳、比较、考证与文献校勘的局限性。在文献校理过程中，有一个前提是谁都回避不了的，那就是某些距今久远、真本失传的典籍中的疑点和错讹，试图考核其完全符合原本的真正面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原本失传，谁都没有见过，以今律古，无论怎样言之凿凿、论据充

①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十二《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36页。

分，都只是后人的猜测。也正是基于此，无论是顾广圻的保存异文、段玉裁的当改则改、王引之的有所不改，都试图通过归纳、比较、考证，从不同的方面使自己的校勘尽量符合文本原貌和作者原意。此外，他们认识到，古籍校勘，遵循的思想原则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善本、旧本、古本，实事求是地对待前人校勘成果，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总之是“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①]，一切从文献本身的状况出发，采用有效的方法，鉴别讹误，保证文献典籍的内容在流传中不走样、不失真，从而在最大限度上保持作为文化载体的古代文献在信息传播上的真实，使后人能借此校勘过的文献来窥知古人的真实思想和古代的真实历史。大概看到文献校理的局限性，焦循曾说：“人各有所近，高下浅深，必难一致，本子、拾骨之学，非不可为，特非经学之尽境尔。若习为高论，鄙弃一切，而高深之地，究莫能窥测，浮而无实，尤所切戒。”[②] 在焦循看来，文献校勘之学，不是不可治，但如果把这些当作做学问的最高境界，那就错了。版本校勘只是做学问的第一步，要想取得更大成就，还必须“融会经之全文，以求经之义，不为传注所拘牵，此诚经学之大要也”[③]。焦循的话虽已经超出了文献校勘所要讨论的界域，但他不把校勘作为治学的最终目的，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72 页。

② 焦循：《里堂家训》卷下，续修四库全书本。

③ 焦循：《雕菰集》卷十五《代阮抚军作丧服足征录序》，见《焦循诗文集》，广陵书社 2009 年版，第 275 页。

第五章
“疑古惑经，正讹考信”：文献辨伪的思考

追求历史的真实历来是中国史家治史的崇高理想，而要追求这种真实，研究历史的文献或史料的真实就显得特别重要。没有真实可靠的文献或史料，要想求得真实的历史，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对此，梁启超和郭沫若都有过精辟的论述。梁启超说：“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中国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① 郭沫若说：“无论做何种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② 在他们看来，文献辨伪乃学术研究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② 《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的第一步，是搞一切学问的基础。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疑古考信的辨伪传统，有着丰富的辨伪学思想和系统的辨伪方法体系。正是考辨伪书、伪史等观念的存在，才使得中国的学术研究一直在理性科学的道路上前进。

第一节 中国古代疑古辨伪思想的发展

中国古代辨伪思想的发展，一直是与疑古思想的发展相始终的。可以说，疑古思想是中国古代辨伪学发展的理论基础，没有对古书、古史乃至圣人经典的怀疑，就不可能有辨伪思想与方法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古代疑古辨伪思想是有限度的，士大夫对史、子、集等文献的疑辨较少顾忌，但对儒家原始经典的神圣性从来没有怀疑过，在他们心中往往有一个先验的判断事物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经书中的“圣人之意”。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之所以怀疑经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流传后世的经书曾被后人窜改，掺杂了非圣人的思想。特别是秦火以后，专制皇朝重新收拾经典，是非纠结，真伪窜乱，严重扰乱了人们对圣人之意的获取。他们怀疑的是后世流传的儒家经书文本的权威性和真实性，他们就是以疑古辨伪为手段，通过厘清经典文本及史事以明道统之原，恢复经典原貌，探知圣人本真。

一、“考信于六艺”与“疾妄求实”

梁启超曾说：“作史学的始祖是司马迁，辨伪学的始祖也是司马迁。从他以后，汉朝学者对于书的真伪已有很明瞭的辨别眼光。”[①] 司马迁作《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结果发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

---

①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一《总论》第三章《辨伪学的发达》，见《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1页。

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殷商时期还没有三皇五帝的记载，西周以后却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值得怀疑。故而他在撰写《史记》时，面对有关上古历史的不同说法，力求通过比勘抉择找到一种有儒家典籍作依据，有古老传说或历史遗迹可验证的比较可信的历史，意欲做到“疑则传疑，盖其慎也”①。他发扬“多闻阙疑，慎言其余”，重视对文献征验考核的精神，慎重对待黄帝以前的史事，不盲从，不附会。因此顾颉刚评价司马迁说：“他一说到上古，就叹一声‘尚矣’，于是接着说，这‘不可记’了，‘不可考’了，‘吾不知’了，‘余不敢言’了。这种老实承认不知道的态度，试问比了一班儒者自以为万事万物都能明白，虽是文献无征之世也可用了排列法来排出它的制度的，要光明磊落了多少?”② 由于有了慎重对待古史记载的态度，在考辨史料时，司马迁有着自己的原则，一是“考信于六艺”。他认为儒家经典是选用史料的重要依据，“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③。对儒家经典之外的记载，司马迁一般都持怀疑态度。二是“择其言尤雅者”。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这体现了他怀疑和摈弃百家叙述的黄帝事迹，主要依据《尚书》、《国语》、《左传》、《世本》等典籍，从中“择其言尤雅者”来编纂《史记》，而对那些奇异不雅或荒诞不经的传说，则慎之又慎抑或删除不录。三是用事实来考辨伪说。即以他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访问来印证文献记载，通过事实的考证，做到取舍有据，史料精审。司马迁对史料严谨详审的“考信”态度和方法，是儒家朴素的理性思想在史料考辨上的体现和发扬，对于后代学者产生深远的影响。

东汉王充“疾妄求实”的思想以及对伪说、伪书的考辨最令人瞩目。他著《论衡》目的是为了“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使后进晓见然否之分”④。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对当

① 《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序。

② 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

④ 《论衡·对作》。

时盛行的谶纬迷信进行了批判，对于俗儒穿凿附会的传记，乃至圣人凭空立说的经书，都持怀疑态度。他在《论衡》中指出许多古事讹伪不可信，又通过《书虚》、《儒增》、《艺增》等篇对经书和子书举出了不少的疑点，进行了大胆的“订其真伪，辨其实虚”的考辨工作。《论衡》中的《问孔》、《刺孟》对孔、孟言论进行驳难，更是被人们认为是充满了批判精神的篇章。有专家曾总结王充辨伪的四个方面的主要表现，一是对儒家经传中不实之辞的考辨，二是对圣贤言论的驳难，三是对儒书宣扬的瑞应理论和天人感应论的批驳，四是对儒经真伪的考辨。[①] 通过一系列的疑辨，王充明确指出：“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②] 王充这种“疾妄求实”的疑辨思想也对后来的辨伪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中国辨伪学史上，司马迁、王充无疑是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人物，其“异端”的思想在整个专制社会中也是极有代表性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人物，在疑古辨伪的过程中，依然对儒家六经表示了极大的尊重。司马迁认为“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③]，把六经当作核实史料可靠性的重要依据。他作《史记》，“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④]，就是要补六艺（六经）之阙，取协于六经，但对“百家杂语”则可以“整齐”。从他撰写《史记》运用资料的特点来看，他比较相信儒经中关于古史的记载，而对儒经之外的记载持怀疑态度。王充虽然对圣人言论及部分经书持怀疑态度，但是他怀疑的是秦火以后的经籍，《论衡》中的这段话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使五经从孔门出，到今尚不缺灭，谓之纯一，信之可也。今五经遭亡秦之奢侈，触李斯之横议，燔烧禁防，伏生之徒，抱经深藏。汉兴，收五经，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辈，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师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为是。亡秦无道，败乱之也。”[⑤] 在王充看来，如果五经没有经过秦火，不曾损毁，本来

① 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6页。

② 《论衡·正说》。

③ 《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

④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⑤ 《论衡·书解》。

面目得以保留下来，"信之可也"。可惜的是它们不仅经过秦火，导致缺灭弃散，而且经过后世经师私意拆分，更是"不知何者为是"，因此需要疑辨求实。司马迁、王充的思想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看法，考察中国古代辨伪思想的特点，这一点是必须要认识到的。

二、"疑古惑经"

在唐代，首倡辨伪的学者刘知幾发扬王充"疾妄求实"的疑辨思想和学说，对伪史、伪说、伪书进行考辨。他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史通》中的《疑古》、《惑经》两个专篇。在其中他提出了《尚书》的可疑之事十点，《春秋》"所未谕"者十二、"虚美"者五，对两书褒美过当，讳恶失实之病提出怀疑、批判。

在《疑古》篇中，刘知幾利用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和儒家经典的矛盾等等，揭示出古圣先王的贤明和功绩是后人粉饰、附加的结果，而孔子等圣人隐恶扬善、虚美损丑的说教是造成伪事、伪说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还针对《论语》、《尚书》相互矛盾的记载，尖锐地指出："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何者？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竞列纣罪，有倍五经。"[1] 这段文字体现了刘知幾对经注、诸子传说的"纣之恶"的质疑。《疑古》篇还特别对孔子以后儒家所美化的尧、舜、禹、汤等古代帝王的事迹提出质疑，怀疑经书，讥议圣贤，批评《尚书》的隐恶虚美、前后矛盾，表现出大胆的疑古思想和批判精神。

《惑经》篇是专辨《春秋》的，它从修史的原则、方法、体例等方面，尖锐地批评了孔子和《春秋》。刘知幾认为孔子修史不实事求是，并对《春秋》记事多依据别国不确切的传言进行了批评："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而《春秋》记他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而来

---

① 《史通笺注》卷十三《外篇·疑古》，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86 页。

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败而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应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闻，或秋葬而以冬赴。”① 这导致了其所记史事真伪难辨，是非混淆，也说明孔子记载别国史事，对史料缺乏分析、鉴别和选择，常有取舍不当、繁简失调之处。他批评了后人对《春秋》的盲目崇拜和赞扬，对千百年来人们尊圣崇经的信仰予以猛烈的抨击，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破除迷信的作用。总之，刘知幾对盲目崇古、迷信圣人的观念进行的批判，在魏晋以后辨伪学衰微已久的空气中，重新开启了疑古之风。

自唐代开始，疑古辨伪作为一股学术潮流一直影响后世。到了宋代，学术界的疑古辨伪已蔚然成风，十分盛行，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欧阳修在宋人的疑古思潮中是先驱、开风气的人物”②，他认为自己是孔子以后二千年敢于疑古的第一人，他说：“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屡为说以黜之，而学者溺其久习之传，反骇然非余以一人之见，决千岁不可考之是非，欲夺众人之所信，徒自守而世莫之从也。余以谓自孔子没至今，二千岁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焉与修同其说也。”③ 欧阳修的疑辨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尊经疑传。这是与他的“不惑传注”的思想完全一致的。他强调从经的自身理解，否定后儒对经的臆断和曲解。“六经，万世之法”，然而“自秦汉以来，诸儒所述，荒虚怪诞，无所不有”④，所以“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⑤。在笃信经传、墨守注疏的时代，欧阳修力排旧说，超越注疏，疑辨经传，对先儒注疏无法说通之处不牵强附会地解说，而是从经义本身出发进行阐释，

---

① 《史通笺注》卷十三《外篇·惑经》，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2页。

②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金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76页。

③ 《居士集》卷四十三《廖氏文集序》，见《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98页

④ 《居士集》卷四十八《问进士册四首》，见《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330页。

⑤ 《居士集》卷十八《春秋论上》，见《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31～132页。

勇断不惑且简易明了，其胆识非凡。第二，疑古意在求真。在考辨经传的同时，欧阳修发现有些经书非圣人所作，他从《易传》的语言文字、内容及经传之间的关系上，判定《易传》为圣人之作实属伪，“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从脞而乖戾也”[1]。而《文言》中的“子曰”也不是圣人之言，却是经师解说《易》的“讲师之言”，其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2]。这就从思想统一、内容统一的角度条理出辨伪的原则，说明《易传》既不是圣人所作，也不是一人之言。其他的诸如《系辞》是“僭伪之书”，《说卦》、《杂卦》为“筮人之占书”。总之，欧阳修对《易传》的疑辨，廓除了前人蒙在《周易》上的迷雾。第三，欧阳修对《史记》的古史系统产生怀疑。他依据《史记》本纪排列出远古帝王的世次图，发现前后抵牾，舛错从生，竟至于“尧、舜、夏、商、周，皆同出于黄帝”。欧阳修以阙疑求信的态度，指出了从黄帝以来到尧、舜这段古史，是司马迁因“尽集诸说而论次”增益进古史的，[3] 并由此提出“君子之学，不穷远以为能，而阙其不知，慎所传以惑世也”[4] 的命题，这表明他已对远古的记载表示怀疑，体现出欧阳修的疑古思想有探寻历史之“理”的趋向。

对于欧阳修的疑古辨伪，清代学者陈澧评论道：“欧阳子掊击经传，何其勇也！其于《易》，则以为《系辞》非圣人之作；又以为《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其于《周礼》，则以为实有可疑，反秦制之不若。其于《中庸》，则以为其说有异于圣人，怠人而中止，无用之空言。其于《春秋》三传，则以为妄意圣人而惑学者，三子之过。至其通论诸经，则以为自秦之焚书，六经尽矣，至汉而出者，皆其残

① 《易童子问》卷三，见《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 1986 年版，第 571 页。

② 《易童子问》卷三，见《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 1986 年版，第 568 页。

③ 《居士集》卷四十三《帝王世次图序》，见《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 1986 年版，第 300～301 页。

④ 《居士集》卷四十三《帝王世次图序》，见《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 1986 年版，第 300 页。

脱颠倒，或传之老师昏耄之说。又以诸经所载凤凰、玄鸟、河图洛书、龟龙、六鹢鹳鹆、麟暨驺虞，皆为语怪，启秦汉以来诸儒所述之荒虚怪诞。然则如欧阳子之说，六经真可焚矣。”①

唐宋时期是中国辨伪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其“疑古惑经”的观念得到后世高度评价，特别是刘知幾对《尚书》、《春秋》的考辨，更是被一些学者认为剥去了经书的神圣外衣，具有破灭儒经圣光的作用。这种评价显然抬高了刘知幾等人，事实上，包括刘知幾在内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儒家经典及圣人孔子的崇敬之情是发自内心的，他们从来不鄙薄儒经，更不会妄议圣人。相反，他们总是自觉维护儒经和圣人的崇高地位，其辨别儒经真伪，是要剔除后人对儒经的附会、窜乱、编造等，恢复儒经真面目，目的是为了尊经。有学者深入分析过刘知幾的思想，指出刘氏对孔子推崇备至，把孔子当作自己立身行事的榜样，“刘知幾对孔子及儒家经典的批评完全是从维护史书实录精神出发的，丝毫不涉及尊孔、反孔的问题”，“他对经书的批评是在维护经书的尊严”。② 揆诸唐宋时期辨伪思想的实际，这段话不仅适合刘知幾，更适合柳宗元、欧阳修、郑樵、朱熹等人。

三、“考信求真”

明代胡应麟是中国辨伪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辨伪之成学，就是从他所作的《四部正讹》开始的。该书广泛考辨伪史、伪书，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辨伪学理论进行了系统归纳，首次总结了伪书产生的原因及伪书的种类，第一次系统总结了辨伪的方法，即“辨伪八法”，并且从宏观上分析了伪书的范围和伪的程度。胡应麟所总结的这些理论和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他对伪书种类的划分以及辨伪方法直接影响到梁启超对伪书的认识及对辨伪的论述。也正因为此，梁启超对胡应麟的辨伪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专著一书去辨别一切伪书，有原理、有方法

① 陈澧：《东塾集》卷四《跋欧阳文忠公集》，见《陈澧集》（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5～146 页。

② 许凌云：《刘知幾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7、119 页。

的，胡应麟著《四部正讹》是第一次”。“全书发明了许多原理、原则，首尾完备，条理整齐，真是辨伪学以来的第一部著作。我们也可以说，辨伪学到了此时，才成为一种学问”。①

清代是考据学发达的时代，疑古辨伪与考证求真相结合，考证精密，成果丰硕，成就远远超过前人。清代诸多学者都十分重视对伪史、伪书的考辨，嘉庆以后，随着今文经学的兴起，疑古精神再度高涨，并一直影响到近现代古史辨的兴起。

阎若璩在充分肯定、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居建瓴之地，穷毕生之力，远稽近考，补偏救弊，撰成《尚书古文疏证》八卷，举出128条证据全面系统地考辨了伪《古文尚书》。既追根溯源地寻出伪《古文尚书》的来源，又探赜索隐地揭破作伪者抄袭古书而又抄错的地方，还明察秋毫地检举了伪书中与古代实际或古本《尚书》、汉代经师解释不合的篇数、篇名、编次、文字、文体、语言风格、典制、典籍、史实、历法、地理等内容，昭示了伪《古文尚书》的种种内在矛盾。梁启超认为《尚书古文疏证》“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②，“委实是不朽之作”。阎若璩“实开后来一般学者用科学方法治学的先声，是不可磨灭的”③。

与阎若璩同时代的姚际恒也是勇于疑古的学者，他“敢于大胆批判前人，不但敢批判宋代的学术权威朱熹，而且还敢批判汉代的学术权威郑玄，不但敢疑‘传、注’，而且敢于疑‘经’”④，其辨伪的范围比阎氏的更宽广，态度也更彻底。姚际恒继承了前人的考辨成果并有所创新，可惜其疑古思想过于超前为世所不容，大部分著作已经亡逸，只有《九经通论》中的《诗经通论》、《古今伪书考》和《好古堂书画记》完整地流传下来，

---

①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一《总论》第三章《辨伪学的发达》，见《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36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③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一《总论》第三章《辨伪学的发达》，见《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页。

④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见《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其他著述多散见于别人的著作中。总的来说，姚际恒的辨伪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撰写《古今伪书考》考辨经、史、子部群书之伪。在书前的《小序》中，姚氏表述了著书的宗旨："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予辄不自量，以世所传伪书分经、史、子三类，考证于后。明宋景濂有《诸子辨》，予合经、史、子而辨之。凡今世不传者，与夫琐细无多者，皆不录焉。其有前人辨论精确者，悉载于前，以见非予之私说云。"① 这段话反映了姚际恒十分重视古书的辨伪和前人的考辨成果，并在此基础上阐发己见，有所创造。该书对经类书籍的考辨成果主要集中在辨伪《子贡诗传》和《申培诗说》中，姚氏从多方面详尽分析了二书的作伪及流传，阐述了其精思独得的创见。第二，姚际恒著有专攻伪《古文尚书》的《古文尚书通论》十卷，可惜这一辨伪专著已经亡佚。所幸的是，康熙三年（1693 年），他与阎若璩相遇时出示其书，阎氏阅后认为"多超人意见外"②，十分喜欢，手抄许多，在撰《尚书古文疏证》时常加引用。这对阎若璩关于伪《古文尚书》的考辨及定案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我们也能透过阎著管中窥豹，发掘姚氏考辨伪《古文尚书》的成果。

继阎若璩、姚际恒之后，乾嘉时期出色的辨伪学家崔述耗费四十多年的心血写成了一部辨伪专著《考信录》，把中国上古至秦统一以前的古史作了一番系统的整理。他对三代先王的怀疑，动摇了千百年来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偶像，基本上打破了传统的三皇五帝系统；在揭示五帝与五德之间互有关系问题上，剖析了封建政权维护统治的政治理论思想——"五德终始"说形成的过程和本质，有着首创之功；还通过对古代典籍的详细考辨，阐发了对有关史料的真知灼见。

在清代辨伪学史上，《四库全书总目》也有着重要地位，它不仅集中

①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小叙，朴社 1929 年版。

②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第一百二十一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06 页。

国古典目录学之大成，而且集古代辨伪学之大成。该书涉及伪书众多，[①]辨伪方法多种多样，历代辨伪学家们创造的方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总目》利用了。可以说，《总目》的辨伪成就代表了清代历史考据学发达时期辨伪学的最高水平。

明清时期，辨伪学由于有了严密考证的支持，逐渐呈现出科学严谨的一面，重视证据，无征不信，重实证，斥臆度，凡下一断语，必广收佐证材料，论必有据。这种"考证求真"的辨伪观念，较之两汉时期的"考信于六艺"，以及唐宋时期的"疑古惑经"，在理论方法上更趋于理性和成熟，"疾虚妄"和"疑古惑经"被真正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当然，这一时期的学者依然无法摆脱对六经的信任。只有到了近代，辨伪才摆脱六经的桎梏，"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②]，真正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总之，在漫长的疑古辨伪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人们不断丰富着疑古辨伪的思想内容，不断积累辨伪的方法，并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文献学史上颇具民族特色的一个方面。

第二节　中国古代疑古辨伪的思想成就

在中国古代，疑古辨伪的思想贯穿于学术发展的全过程，一代又一代学者通过自己的学术活动不断丰富着这一思想。有的学者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辨伪学理论，比如胡应麟；但就多数学者来讲，他们寓思想于辨伪活动之中，在看似零散的辨别伪书、伪史的工作中，表达了丰富的对于辨伪工作的看法。

---

① 据杜泽逊研究，《四库全书总目》辨定和怀疑的伪书有570余部，而朱熹、宋濂、胡应麟、姚际恒四家辨出的伪书总共也不过173部。见《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7页。

② 钱玄同：《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见《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

可以说，中国古代疑古辨伪思想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传统学术的发展，而且积累了内涵丰富的理论成就，值得我们总结。

一、对伪史、伪书等产生原因的论述

最早对伪史、伪书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的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和他的宾客。在《淮南子·修务训》中，他们指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尊古而贱今”的观念是伪史、伪书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一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近代梁启超就说：“‘好古’为中国人特性之一，什么事都觉得今人不及古人，因此出口动笔都喜欢借古人以自重。此实为伪书发达之总原因。”①

美化古代圣王，丑诋古代罪主，是伪史产生的又一原因。如王充就曾指出，“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②。实际上，“载于竹帛”的有很多“虚妄”之事，如儒家经典美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丑化夏桀、商纣。王充认为这是“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③ 美化圣王、丑诋罪主与“俗人”的“好奇”心态相联系，就使得伪说流行，伪史迭出。

儒经中伪说的出现，还和儒家传授注重师承、不敢怀疑有关。王充说：“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早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

---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05 页。

② 《论衡·书虚》。

③ 《论衡·艺增》。

并失其实。”[①] 刘知幾也认为虚美的根源在于儒家的偏私和授受传统：“考兹众美，征其本源，良由达者相承，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②] 学术传授如拘于师说，不敢有所怀疑，必然导致伪谬出现，后人习之而不自觉，遂使伪谬愈传愈广。刘知幾又说：“按，《论语》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又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斯并襄贤精鉴，已有先觉。而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虽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盖亦多矣。又按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斯验圣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已者多矣。”[③] 总之，后世之人缺乏疑古精神，对圣贤之言和前代之书不敢怀疑，其结果当然是“后来诸子，承其伪说”[④]。

伪说出现的原因还在于人们识见不明，刘知幾说：“夫人识有不烛，神有不明，则真伪莫分，邪正靡别……而行之者伪成其事，受之者信以为然。故使见咎一时，取怨千载，夫史传叙事，亦多如此。”[⑤] 史书中之所以掺杂着大量的伪事、伪辞，有时是由于史官的识见不明、真伪不分、曲笔讳饰、好异猎奇、多信小说寓言造成的。

对于伪书、伪说产生的原因，崔述从文献传播和接受者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在崔述看来，古代史事及文献典籍在传播过程中会出现变形，崔

---

① 《论衡·正说》。

② 《史通笺注》卷十三《外篇·惑经》，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18 页。

③ 《史通笺注》卷十三《外篇·疑古》，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76～477 页。

④ 《史通笺注》卷十三《外篇·疑古》，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86 页。

⑤ 《史通笺注》卷二十《外篇·暗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83 页。

述把它们分为三种情况：其一，虚言衍成实事。先秦时期很多事情，往往是后人附会而成，结果是“传之益久，信者愈多，遂至虚言竟成实事”①。其二，实事之误传。“前人所言本系实事，而递传递久以致误”②。其三，传闻异词之重出。“传记之文，往往有因传闻异词，遂误而两载之者……二事绝相似，亦必有一误”。故此，崔述指出，“汉以来之书以误传误者甚多，不得尽指以为实也”。③ 历史上的各种说法和记载就是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渐渐失去了它本来的面目。

客观上的传播变形遇到接受者的愚昧，必然导致伪说盛行。崔述从五个方面分析了接受者的局限：其一，少见者多误。“凡人多所见则少所误，少所见则多所误……唐、虞、三代之事，战国、秦汉所述，其移甲为乙，终古不白者，岂可胜道哉”④。其二，以己度人。“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度。往往径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⑤。其三，记忆失真之弥缝。“传记之文，有传闻异词而致误者，有记忆失真而致误者。一人之事，两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数人递传之，有失其本意者矣”⑥。其四，曲全而误会。“后人之书，往往有因前人小失而曲全之，或附会之，遂至大谬于事理者”⑦。或者缺乏怀疑精神，对古人“尊信太过，

---

①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②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③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④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⑤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⑥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⑦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先有成见在心，即有可疑，亦必曲为之解，而断不信其有伪也”①。其五，强不知以为知。崔述说：“今去二帝三王远矣，言语不同，名物各异，且易竹而纸，易篆而隶，递相传写，岂能一一不失真!”因此他认为人们不知道历史上的很多事情是很正常的，但可怕的是人们强为解说，遂使古代典籍原意尽失，“学者必欲为之说以通之，此古书之所以晦也”②。崔述从流传与接受两个方面探讨伪史、伪书产生的原因，具有较高的理论色彩，值得珍视。

时代愈往上古，流传后世的伪书就越多，对此唐代啖助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上古书籍多是口传，后来有了文字，才书之竹帛，结果出现谬误，“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说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又说：“《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意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③ 啖助的说法是否正确，我们还可讨论，但他指出伪说和伪书出现的原因，却是符合实际的。

明代胡应麟从狭义辨伪的角度分析了伪书产生的原因：其一，“有惮于自名而伪者”④。如宋人魏泰假名张师正作《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以个人喜怒诬蔑前人。其二，“有耻于自名而伪者”⑤。如五代人和凝少时作《香奁集》，内多艳词，后显贵，恐人议论，遂嫁名唐人韩偓。其

①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下，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②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③ 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第二》，广雅书局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④ 胡应麟：《四部正讹》上，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90页。

⑤ 胡应麟：《四部正讹》上，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90页。

三，“有恶其人伪以祸之者”[1]。如李德裕门人韦瓘以牛僧孺名撰《周秦行纪》，意图陷害牛氏。其四，“有恶其人伪以诬之者”[2]。如魏泰假名梅尧臣作《碧云騢》，丑诋庆历以来诸公，虽范仲淹也未能得免，不但诬累诸公，又以诬梅氏。胡应麟对作伪原因的分析主要是从作伪者的心态和目的出发的，故而更加切近实际，近代梁启超在分析古人作伪动机时就吸收了胡应麟的不少看法。

二、对作伪手法、作伪类型以及辨伪原则的分析

胡应麟曾说：“凡赝书之作，情状至繁。”[3] 可见古代作伪手法多样。对此，古代学者也有较具理论色彩的认识。如唐代高僧道世撰《辨道经真伪表》，归纳出道书作伪的手段：“增加卷目，添足篇章；依傍佛经，改头换尾。或言名山唱出，或云仙洞飞来。”[4] 道世所揭示的不仅仅是佛书造伪的方法，世俗之书也是这样造伪的。胡应麟对作伪手法的揭露更加详细，所谓“有掇古人之事而伪者”，“有挟古人之文而伪者”，“有傅古人之名而伪者”，“有蹈古书之名而伪者”，“有袭取于人而伪者”，“有假重于人而伪者”[5] 等，不一而足。总之，古代作伪的手法包括假托他人、改题著者、割裂序跋、沿袭旧名、节采连缀、变乱旧例、窜乱旧帙等，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古人对作伪手法的总结归纳，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伪书、伪说的形成，以及这些伪书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影响，都是有意义的。

在总结中国古代作伪手法时，还形成了带有理论色彩的看法。比如宋濂，就把伪书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有所附丽”，一类是“凿空扇虚”。

---

① 胡应麟：《四部正讹》上，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90 页。

② 胡应麟：《四部正讹》上，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90 页。

③ 胡应麟：《四部正讹》上，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90 页。

④ 《全唐文》卷九百十二，中华书局 1983 年影印本。

⑤ 胡应麟：《四部正讹》上，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90 页。

他说："大抵古书之存于今者，多出于后人之手。如《孔子家语》谓为孔安国所录壁中之文，往往多抄《左传》、《礼记》诸书，特稍异其辞耳，善读者固不敢与之。世传贾谊《新书》谓谊所作，亦不过因《过秦论》、《吊湘赋》而杂以《汉书》中语足之，似非谊本书也。此犹有所附丽而然。古《三坟书》亡已久，宋毛渐特出之：《山坟》则言君臣、民物、阴阳、兵家，谓之《连山》；《气坟》则言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谓之《归藏》；《形坟》则言天地、日月、山川、云气，谓之《乾坤》，与先儒所言'三易'大异。《阴符》古无是书，唐李筌特出之，以为黄帝所作，皆取兵家荒诞不经语而文以奇涩之辞；又妄说太公、范蠡、鬼谷、张良、诸葛亮等训注，皆凿空扇虚以惑世，犹使人惊愕不止。"[①] 可以看出，宋濂所论实际上已经摆脱了就事论事的束缚，对造伪进行较为抽象的概括。近代梁启超又在前人的基础上将造伪分为"有意作伪"和"无意作伪"两种情况，托古、邀赏、争胜、炫名、诬善、掠美等属于有意作伪，误题、妄题、误编、附入等属于无意作伪。[②] 这是从主观动机方面对造伪手法做出的分析。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对造伪情况的分析愈来愈深入。

正因为对造伪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中国古代的学者除了运用各种手法进行具体的辨伪之外，对辨伪原则也进行了较为抽象的思考。其一，对远古之书和远古之事要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司马迁作《史记》，就对上古记载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他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③] 对于经书以外的记载，司马迁自称"余不敢言之也"[④]，态度极为谨慎。刘知幾认为远古之书与近世之史，不仅记事详略不同，就是记事的真实性也差距甚大。远古之书的记载多不可信，故而他认为"远古之书，其妄甚矣"[⑤]。对此，欧阳修也有相似的看法，谓："尧、舜、禹、汤、文、武，此六君子者，

① 宋濂：《诸子辨·言子》，朴社1926年版，第18页。

②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见《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30页。

③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④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

⑤ 《史通笺注》卷十三《外篇·疑古》，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页。

可谓显人矣，而后世犹失其传者，岂非以其远也哉。是故君子之学，不穷远以为能，而阙其不知，慎所传以惑世也。”① 其二，辨伪主要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义理之所当否”，二是“左验之异同”。这是朱熹提出的辨伪的原则。所谓“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②。朱熹的这一辨伪原则正体现出他作为一个不废考证与传注的理学家在理论与文献两个方面的追求，考辨文献真伪，从理论上要看其是否合乎“义理”，从证据上要看其能否“左验”，这种理论色彩极浓的原则一直影响后世的辨伪工作。其三，辨伪的目的是为了求真，是为了取得历史的真实。王充在《论衡·对作》中说明他作《论衡》的目的：“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雕文饰词为奇伟之观也。”又说自己所从事的是“订其真伪，辨其实虚”的工作，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③。叶适也说：“考索必归于至实。”④ 胡应麟更是要“抉诬摘伪”，“俾撰者弗湮其实，非撰者弗蒙其声”。⑤ 其四，强调辨伪者应该具有敏锐的眼光和渊博的学识。胡应麟说：“真以为伪，伪或为真，惟具眼者，能别其真与伪耳。”⑥ 强调辨伪主体必须要有“具眼”，即独到的眼光，否则很难看出问题。同时还要博览群书，“熟读诸书”⑦，绝不能凿空蹈虚，

① 《居士集》卷四十三《帝王世次图序》，见《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 1986 年版，第 300 页。

② 《朱熹集》卷三十八《答袁机仲》，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82 页。

③ 《论衡·对作》。

④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九《春秋》，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17 页。

⑤ 胡应麟：《四部正讹》上，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91 页。

⑥ 胡应麟：《甲乙剩言·刘玄子》，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⑦ 胡应麟：《四部正讹》下，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5 页。

空发议论，一切要靠证据说话。

三、对伪书范围、类例及复杂性的认识

这主要体现在胡应麟的论述中。对伪书在四部中的分布，胡应麟有全面的考察，他说："凡四部书之伪者，子为盛，经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经之伪，《易》为盛，纬候次之。凡史之伪，杂传记为盛，琐说次之。凡子之伪，道为盛，兵及诸家次之。凡集，全伪者寡，而单篇列什借名窜匿甚众。"① 胡应麟的这一归纳很符合历史实际。顾颉刚就认为胡应麟的这种认识"是对伪书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并体现了一个目录学家辨伪的特点"②。仓修良也说："这个比例，是他长期对古籍进行深入研究中所得到的规律，真可谓宝贵的经验之谈，不作全面深入的研究，自然就无此经验可谈。"③

由于伪书情况复杂，胡应麟还试图按照不同的情况把伪书进行分类，划分不同的类例，所谓"有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有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有掇古人之事而伪者"，"有挟古人之文而伪者"，"有传古人之名而伪者"，"有蹈古书之名而伪者"，"有惮于自名而伪者"，"有耻于自名而伪者"，"有袭取于人而伪者"，"有假重于人而伪者"，"有恶其人伪以祸之者"，"有恶其人伪以诬之者"，"有本非伪，人托之而伪者"，"有书本伪，人补之而益伪者"，"有伪而非伪者"，"有非伪而曰伪者"，"有非伪而实伪者"，"有当时知其伪而后世弗传者"，"有当时记其伪而后世弗悟者"，"有本无撰人，后人因近似而伪托者"，"有本有撰人，后人因亡逸而伪题者"。④ 胡应麟所划分的 21 种伪书情况，虽有混乱交叉、不够严谨之处，但他综合归纳，超越前人只作具体考辨而拙于宏观思考的局限，对伪

---

① 胡应麟：《四部正讹》下，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22 页。

② 顾颉刚：《中国辨伪史要略》十七《明代的造伪与辨伪》，《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7 页。

③ 仓修良：《辨伪学家胡应麟》，《浙江学刊》1998 年第 5 期。

④ 胡应麟：《四部正讹》上，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90～291 页。

书类别进行抽象概括，举一反三，成为后世对伪书进行分类的参考依据。刘咸炘说：“辨伪之书，惟胡氏能挈纲要，所举例有小误，不足为病。”[①]诚哉斯言。

胡应麟还按照文献伪的程度，把伪书分为“全伪”、“真错以伪”、“伪错以真”、“真伪错”、“真伪疑”、“残而不得言伪”、“补而不得言伪”、“讹而不得言伪”、“名讹而非伪”、“出晚而非伪”[②]等几种情况。这又是充满辩证色彩的分析，也是符合中国古籍流传的实际情况的分析。刘咸炘曾指出胡应麟“所定真伪，虽不皆当”，但对胡应麟所提出的“真错以伪、伪错以真、真伪疑，与残、补、讹、晚诸说”大加赞赏，认为“分析至细，为近世辨伪者所未审”[③]。刘咸炘之所以赞赏胡应麟，是因为胡应麟看到了伪书的复杂性，没有对伪书进行简单论定。

对于伪书的复杂性，章学诚也有精辟的分析，他说：“古人有依附之笔，有旁托之言，有伪撰之书，有杂拟之文，考古之士，当分别观之。依附之笔，门人弟子为其学者，辗转附益，或得其遗，或失其旨，或离其宗，各抒其所见也。旁托之言，诸子著书，因寄所托，标其风旨，有所称引，人即传为其人自著，如墨者著书称述晏子，人传为晏子书；儒者著书称魏文侯，人传为文侯书是也。《艺文》所著诸子九流，刘、班注谓似伪托者，多不出此二种，皆非有心于造伪也。伪撰之书，后世求书悬赏，奸人慕赏造伪，与上二种不同。杂拟之文，则始于文人托兴寓意，其后词科取士，因以命题，古人所无，断始于六朝，非惟与伪造不同，亦与前二种迥不类也。”[④]章学诚从“依附之笔”、“旁托之言”、“伪撰之书”、“杂拟之文”四个方面分析产生伪书的情况，并把致伪归结为无心造伪、有意造伪

---

① 刘咸炘：《目录学·真伪第三》，见《刘咸炘论目录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② 胡应麟：《四部正讹》下，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页。

③ 刘咸炘：《目录学·真伪第三》，见《刘咸炘论目录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8页。

④ 《〈淮南子洪保〉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78页。

和“托兴寓意”致伪三种情况，指出“依附”与“旁托”是由传统学术发展、著述情状、书籍流传的特点所导致的，并非有心造伪；伪撰之书则纯粹是有意造伪；杂拟之文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需要作具体分析。章学诚从古人书籍产生的实际情况出发，考察古书致伪的原因，指出伪书的复杂性，告诫人们不可误伪为真，也不能诬真为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谓用心良苦。与章学诚同时，孙星衍还特别考察了诸子书产生的情况，认为先秦时期“凡称子书，多非自著，无足怪者”[①]。“诸子之文，皆由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②]。清楚了诸子书产生的过程，自然就不能轻易断定《晏子春秋》等诸子书为伪书了。

中国古代辨伪学家对伪书复杂性的认识，直接影响了近现代辨伪学思想的发展。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中吸收古代学者的观点，指出伪书有十种情况，即全部伪、一部分伪、本无其书而伪、曾有其书因佚而伪、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皆伪、内容及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伪、盗袭割裂旧书而伪、伪后出伪、伪中益伪。[③] 很显然，梁启超吸收了胡应麟的一些看法。梁启超之外，现代学者张心澂在所著《伪书通考》中也从伪书的复杂性出发，指出辨伪需要注意的问题，即辨伪不能以卫道或矜奇好异为目的；不能存门户之见；不能先存成见，再作辨伪；不能因某书中一部分伪，或所用名词与著者时代不合，就以偏概全，断定全书为伪。[④]

中国学者对伪书复杂性的分析，充满了理性。他们虽然对历史事物、文献典籍充满了怀疑，但并没有轻易否定所考典籍的真实性，而是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对真伪杂错的文献进行客观分析，指出文献真伪的各种情况，为后人正确利用这些文献提供了帮助。有些学者对历史上的疑古学派

---

① 孙星衍：《问字堂集》卷三《晏子春秋序》，见《问字堂集·岱南阁集》，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77 页。

② 孙星衍：《问字堂集》卷三《孙子略解序》，见《问字堂集·岱南阁集》，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81 页。

③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见《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3～15 页。

④ 张心澂：《伪书通考》总论，商务印书馆 1954 年版，第 5～7 页。

甚有微词，对他们考证伪书的工作多所贬抑，甚至说“凭主观臆测断定古书为伪书，是疑古派的又一特点”，“以偏代全，也是疑古派辨伪的特点之一”。[①] 实际上，这是没有深入研究古代疑古学者的辨伪思想而做出的错误判断，只要看一看胡应麟、章学诚诸人对伪书情况的分析，这些学者就不应该得出如此轻率的结论。不考文献，不究史实，在指责别人“主观臆测”的同时，自己恰恰犯了“主观臆测”的错误。

像胡应麟、章学诚、孙星衍这样对古代文献真伪复杂性的宏通的看法，应该是我国古代文献学思想中的瑰宝。

四、对伪书价值的评判

中国古代学者对伪书的价值也有宏通的看法，他们辨伪是为了求真，为了梳理清楚学术发展的脉络，他们在指出伪书错谬的同时，充分肯定伪书的价值。明代胡应麟是较早提出伪书价值问题的学者，并进行了理论阐释。对于如何判定伪书的价值，胡应麟提出“真者以作之时为次，伪者以出之时为次”[②]，也就是将伪书置于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来判断它的价值。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和顾颉刚在此基础上说得更加明白，陈寅恪说：“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③] 顾颉刚说：“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④]

中国古代的学者对伪书价值的肯定主要体现在具体的辨伪活动中，他们通过辨伪来表达思想，提出自己对伪书价值的认识。

---

① 刘建国：《先秦伪书辨正》前言，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 胡应麟：《经籍会通》二，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③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页。

④ 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其一，伪书具有学术思想价值，对于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些伪书，可以保存作伪者个人和当时社会及古代的学术思想。如胡应麟指出，汉代张霸伪造《古文尚书》，隋朝刘炫伪造《连山易》等，“二子诬娇圣真，诚足诛。第皆经术大儒，其所撰造，要非唐宋以后所及，惜今遂无一传者”①。“炫在隋号大儒，其学博，其业精。其造《连山》虽伪妄，必有过人者”②。很显然，胡应麟一方面指责张霸、刘炫的造伪，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所造伪书没有流传下来表示惋惜，认为在学术价值上“必有过人者”。再如《子华子》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它“商榷治道，大旨皆不诡于圣贤。其论黄帝铸鼎一条，以为‘古人之寓言’，足证方士之谬。其论唐尧土阶一条，谓‘圣人不徒贵俭，而贵有礼’，尤足砭墨家之偏”③。又如《关尹子》，《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其书虽出于依托，而核其词旨，固远出《天隐》、《无能》诸子上，不可废也”④。总之，古人认识到，伪书虽伪，但只要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的思想价值必凸显无遗。这对我们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使我们认识到伪书中所蕴含的思想同样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重要环节。

其二，伪书具有文学价值，对古代文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胡应麟在考辨伪书的过程中，对伪书的文学价值给予极大关注。如《子华子》、《亢仓子》，虽是伪书，但“文采可观”⑤，尤其是《子华子》一书，“其书理致肤近，而持论不甚诡于道，文字亦舂容雅则，至宋世一时盛传”⑥。《四库全书总目》在考辨伪书时，对此尤为注意。如《海内十洲记》托名

① 胡应麟：《四部正讹》上，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页。

② 胡应麟：《四部正讹》上，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页。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七，《子华子》条。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六，《关尹子》条。

⑤ 胡应麟：《四部正讹》下，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

⑥ 胡应麟：《四部正讹》中，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页。

东方朔撰，《总目》考证为六朝作品，同时指出该书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自《隋志》已著于录。李善注张衡《南都赋》、宋玉《风赋》、鲍照《舞鹤赋》、张衡《思元赋》、曹植《洛神赋》、郭璞《游仙诗》第一首、第七首、江淹《拟郭璞游仙诗》、夏侯玄《东方朔画像赞》、陆倕《新刻漏铭》并引其文为证。足见其词条丰蔚，有助文章。……唐人词赋，引用尤多”[①]。此外《汉武洞冥记》，旧题东汉郭宪撰，《总目》认为该书“皆怪诞不根之谈，未必真出宪手”，推测是“六朝人依托为之”。同时指出：“然所言影娥池事，唐上官仪用以入诗，时称博洽。后代文人词赋，引用尤多。盖以字句妍华，足供采摭。至今不废，良以是耳。”[②] 此类小说还有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它们的价值不仅在于足供采摭，增广见闻，它们是六朝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唐传奇及后代小说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们在小说史上的地位绝不会因为是伪书而受到削弱。

其三，伪书具有史料价值，不少伪书是研究中国古史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伪书和伪史、伪事不同，真书中可能有伪史料，而伪书中又可能蕴含真史实，何况不少文献都是真伪相错，其价值就更需要认真甄别。比如《孔子家语》一般认为是王肃伪造，但《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流传已久，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③]。正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才使得人们不能废弃。又如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载于《魏书》本传，到《崇文总目》中已佚其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没有著录，据此，《四库全书总目》推断该书亡佚于北宋。万历以后所出本子，乃“嘉兴屠乔孙、项琳之伪本”。在指出《十六国春秋》的伪迹以后，《总目》充分肯定了该书的价值：“其文皆联缀古书，非由杜撰。考十六国之事者，固宜以是编为总汇焉。”[④] 可见对于伪书应一分为二来看，不可一笔抹杀。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二，《海内十洲记》条。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二，《汉武洞冥记》条。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孔子家语》条。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六，《十六国春秋》条。

其四，其他价值，诸如语言学价值、艺术价值、医学价值等等。在古人看来，只要确定了作伪的年代，它的各方面的价值就会体现出来。

总之，伪书具有重要的价值，何况绝大多数伪书乃真伪杂错，我们不应该因其伪而弃之不用，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辨其赝则可，以其赝废之则不可。"[①] 亦如张心澂所言："虽大多数伪作不及真，然尽有书为真而无甚价值者……亦有书为伪而有其相当价值者……不可因其伪而遽削之，使后人不得见也。"[②]

第三节 作者、文本及流传：中国古代文献辨伪的方法体系

中国古代辨伪方法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随着辨伪工作的开展，一代又一代辨伪学家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不断提出新的方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

在中国早期的辨伪活动中，就已经蕴含了不少的方法论因素。如刘向、刘歆父子通过考察作者时代、语言特征、思想内容以及因袭等问题考辨古书的真伪，虽然方法有些简略，"但却启示了后人辨伪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③]。之后，班固、马融、郑玄、王充、颜之推、刘知幾、柳宗元、朱熹、洪迈、宋濂、梅鷟、胡应麟、阎若璩、崔述等人不断为辨伪方法增添新的内容，使之愈来愈完备。班固开创了"从旧志不著录而定其伪或疑其伪"的辨伪方法；马融创造了"从古书佚文不见于今本来辨伪"的辨伪方法；郑玄开创了从典章制度辨伪的方法；王充在进行辨伪时，不仅注意到作者、成书，更注意到书籍的流传情况；[④] 颜之推开创了从地理沿革上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七，《子华子》条。

② 张心澂：《伪书通考》总论，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第7页。

③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86页。

④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辨伪的方法。唐宋以后，运用多种方法综合辨伪的情况屡见不鲜，刘知幾在考辨伪书的过程中，已经注意从著录传授上提出疑问，从同时代人是否称引或议及上指出疑点，从内容的虚妄上以驳其谬，从文体、文句与时代风格的不同上辨其真伪等等，方法多样；柳宗元则从时代、内容、作者、著录、思想、取材、语句上考辨伪书；朱熹所使用的辨伪方法也非常丰富，如从一般常识上来推断，从语言文字、文章风格上考辨，从材料抄袭和拼凑上考辨，从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上考辨，从书中观点与所托作者思想不符上考辨等等；洪迈从避讳、称谥、地理沿革等方面进行辨伪，变换了角度；宋濂则从典制、避讳的角度、内容与事实的矛盾、文章风格、语言上进行考辨；梅鷟从书籍的传授系统、文章体例、句法特点、文字风格上揭示其作伪迹象。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所有前贤在辨伪方面所作的这些工作，都为辨伪方法的系统化、理论化做了前驱先路的准备工作。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在前人辨伪方法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辨伪八法”，所谓“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兹八者，而古今赝籍亡隐情矣”①。辨伪八法是对辨伪方法所作出的理论性、方法论性的抽象概括，集前代辨伪方法之大成，启后学之津逮。清初，阎若璩所作《尚书古文疏证》，其方法多是导源于胡应麟，“如果说胡应麟的辨伪方法是我国古代比较系统、全面、有一定理论色彩的辨伪方法的话，那么阎辨《古文尚书》及《孔传》之伪的活动，就是这些方法的卓越实践”②。乾嘉时期，崔述也提出了辨伪所遵循的原则，即凡是伪托古人之说或古人之书者，都会暴露出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风气与文体风格，同样为中国古代辨伪方法的理论化贡献了力量。

中国古代辨伪学有着丰富的方法积累，深入探究，我们就会发现，古

---

① 胡应麟《四部正讹》下，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

② 于语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析》，《南开学报》1994年第5期。

人辨别文献真伪，主要从作者、文本内容以及流传三个方面入手，即围绕文献典籍的产生、外在形式、内在本质以及辗转流传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方法体系。

一、作者

作者是文献典籍的记录者或创作者，就伪书来讲，署名的著者不是该书的真正著者，该书就可判定为伪书。因此，考察文献典籍的作者是辨伪工作的重要步骤。胡应麟认为，“核伪书者，核所出之人，思过半矣”①，就说明了从作者角度辨伪的重要性。同时，胡应麟在辨伪八法中提出“核之撰者以观其托”，也是重视从文献典籍的创作者的角度来论定文献的真伪。

从作者的角度辨伪，主要考查书籍与作者行事、思想、学术水平、生卒年代等方面的矛盾，进而发现问题，做出判断。

从该书与作者行事的矛盾辨伪。比如《太清神鉴》是一部论相法的书，旧题后周王朴撰，书前有自序云：“离林屋洞下山三载，遍搜古今，集成此书。”《四库全书总目》辨别云：“考朴家世东平，入仕中朝，游迹未尝一至江左，安得有隐居林屋山事？其为依托无疑。盖朴以精通术数知名，故世所传奇异诡怪之事，往往皆归之于朴。”② 根据人的行事辨伪，不失为一有效之法，但一个人一生的行迹有时很难考证清楚，故而此法又应慎重使用。

从该书与作者的思想矛盾辨伪。如柳宗元辨《晏子春秋》，指出《晏子春秋》中有很多墨子的思想，诸如尚同、兼爱、非攻等等，这些思想和言论与晏子的思想有很大差别，“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③。又如朱熹辨《孝经》非孔子所作，云：“《孝经》，疑非圣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说

---

① 胡应麟《四部正讹》下，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太清神鉴》条。

③ 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辨晏子春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4页。

得好处。然下面都不曾说得切要处著，但说得孝之效如此。如《论语》中说孝，皆亲切有味，都不如此。”[①] 再如宋濂辨《文子》非计然所作：“计然与范蠡言皆权谋、术数，具载于书，绝与此异。予固知非著是书者也……其殆文姓之人祖老聃而托之者欤？”[②] 又如《疑耀》一书，旧题李贽撰，《四库全书总目》辨别其为伪书云：“贽恃才妄诞，敢以邪说诬民。所作《藏书》，至谓‘毋以孔夫子之是非是非我’。其他著作，无一非狂悖之词。而是编考证故实，循循有法。虽间倡儒佛归一之说，其言谨而不肆。至云‘儒不必援佛，佛不必援儒’，又云‘经典出六朝人润色，非其本真’。且与贽论相反，断乎不出其手。”[③] 这些都是找出本书所反映的思想与作者的思想不一致，从而断定其真伪。

从该书与作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专长的矛盾上辨伪。伪书一般托名于大家名家，而造伪之人十有八九只是略识学术门径而已，这就造成该书与被依托之人学术水平上的反差，循此辨伪，也是古人常用的手法。如《披肝露胆经》一书，旧本题明代刘基撰，刘基文韬武略，在明代也是一代文宗，但是该书内容浅俗，且有剽窃，《四库全书总目》辨别云：“观书中所分《龙诀》、《穴情》两篇，大半剽剟《撼龙》、《葬法》诸书。《砂诀》、《水诀歌》亦皆浅俗。如‘笔架科名应有分，满床牙笏世为官’等句，基必不若是之陋。”[④] 又如《珍珠囊指掌补遗药性赋》一书，旧题金代李杲撰，《四库全书总目》辨之云：“是编首载寒、热、温、平四赋，次及用药歌诀，俱浅俚不足观，盖庸医至陋之本，而亦托名于杲，妄矣。”[⑤] 李杲是张元素的学生，“而名乃出于元素上，卓为医家大宗”[⑥]，而《珍珠囊指掌补遗药性赋》一书“浅俚不足观”，与李杲的医学造诣大大脱节，故《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是庸医陋本托名于李杲。历史上有很多学有专长的人

---

① 《朱子语类》卷八十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142 页。
② 宋濂：《诸子辨·文子》，朴社 1926 年版，第 9 页。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九《疑耀》条。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一《披肝露胆经》条。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珍珠囊指掌补遗药性赋》条。
⑥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内外伤辨惑论》条。

物，后人造伪，往往将某一类著作依托于这些人物，如汉代东方朔好诙谐，后世之人就将奇言怪语依托东方朔；唐代李淳风是著名天文算学家，后代就将有关天象、算学、占验乃至阴阳五行之书托名于他。但依托之书内容参差不齐，甚至与所托之人的研究旨趣大相径庭，结果露出破绽，被人识破。

从书中内容与作者生卒年代的矛盾辨伪。如熊禾《勿轩集》之许衡序系伪撰，《四库全书总目》辨之云："前有元许衡序，称其晚年修《三礼通解》，将脱稿，竟以疾卒。平生著述，独《四书标题》、《易经讲义》、《诗选正宗》、《小学句解》传于世，嗣孙澍，家藏遗稿，存什一于千百。族孙孟秉，类次成帙，厘为八卷，传诸二世孙斌，授梓以传，求余序之云云，末署至元十七年。考至元为世祖年号，而禾卒于仁宗皇庆元年，自至元迄皇庆，相距三十余年，何以先称其疾卒？年月错谬，依托显然，盖其后人伪撰此文，借名炫俗，不知禾亦通儒，固不必以衡重也。"① 这是根据熊禾的实际卒年来推定序为伪撰。

二、文本

辨别文献的真伪，文本内容是最重要的部分。中国古代的文献学家在辨别伪书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运用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具体来说，主要从文体、文章风格、语词、史实、称谓、制度、地理沿革等内容来考察文献的真伪。

文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它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不能够颠倒的。胡应麟提出的"核之文以观其体"，就是对从文体角度考辨文献真伪的理论总结。南朝刘勰对当时流行的李陵、班婕妤的五言诗进行考辨，指出："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② 唐代刘知幾也从文体角度考辨《李陵集》中的《与苏武书》系伪作，所谓"《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五，《勿轩集》条。

② 《文心雕龙·明诗》。

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缺而不载，良有以焉”[1]。梅鷟考辨《大禹谟》，也从文章体例入手，深入分析了《大禹谟》与《尚书》体例不合之处，指出它是“变乱圣经之体者”[2]，从而怀疑《大禹谟》为伪。清代阎若璩在考辨《古文尚书》时，同样注意到文体对辨伪的作用，他根据朱熹“古史例不书时”的论断，具体论证了《尚书》各篇记言、记事皆不表明具体时间。但后出古文《泰誓上》开篇就有“惟十有三年春”[3]，这显然与《尚书》全书的体例不合。

和文体一样，文章风格与文中所用词语也都有鲜明的时代性，可以用来判定文献的真伪。早在汉代，刘向、刘歆及班固就注意到以此辨伪，《汉书·艺文志》所载《伊尹说》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4] 就是由文词而发疑的。后世如朱熹在考辨《麻衣心易》时指出：“《麻衣心易》顷岁尝略见之，固已疑其词意凡近，不类一二百年前文字……此书所谓‘落处’、‘活法’、‘心地’等语，皆出近年，且复不成文理。计其伪作，不过四五十年间事耳。”[5] 再如他考辨《尚书序》时也指出：“《尚书序》不似孔安国作。其文软弱，不似西汉人文，西汉文粗豪。也不似东汉人文，东汉人文有骨肋。也不似东晋人文，东晋如孔坦《疏》也自得。他文是大段弱，读来却宛顺，是作《孔丛子》的人一手做。”[6] 明代宋濂在辨《关尹子》时，也是从文中词语的时代性来辨伪的，他说：“《关尹子》一卷，周关令尹喜所撰。喜与老聃同时，著书九篇……间读其书，多法释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变识为智’、‘一息得道’、‘婴儿’、‘蕊女’、‘金楼’、‘绛宫’、‘青蛟’、‘白虎’、‘宝鼎’、‘红炉’、‘诵咒土偶’

---

① 《史通笺注》卷十八《外篇·杂说下》，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33页。

② 梅鷟：《尚书考异》卷二，《大禹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四，第五十四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页。

④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⑤ 《朱熹集》卷八十一《书麻衣心易后》，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9页。

⑥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93页。

之类，聃之时无是言也。其为假托，盖无疑者。”①

对于文体和文章风格在辨伪中的作用，崔述曾从理论上进行过总结，所谓“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有三代之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战国、秦汉以迄魏晋亦各有其文焉。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类者。是故战国之人称述三代之事，战国之风气也。秦汉之人称述春秋之事，秦汉之语言也。《史记》直录《尚书》、《春秋传》之文，而或不免杂秦汉之语，《伪尚书》极力摹唐虞三代之文，而终不能脱晋之气，无他，其平日所闻所见皆如是，习以为常而不自觉，则必有自呈露于忽不经意之时者。少留心以察之，甚易知也……是知伪托于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考古者但准是以推之，莫有能遁者也。”②

典章制度、地理沿革、避讳、史实等也都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从一些著作中涉及的这些内容入手，可以考辨著述的年代，从而断定其真伪。这种方法也就是胡应麟总结的“核之事以观其时”，即通过检查该书所记载的内容，看它的记载是否与作者所处时代的事实相符。

郑玄在辨别《礼记·月令》非周公所作时，指出“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③，开创了典章制度辨伪的方法。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也多涉及典制辨伪：如《山海经》一书，相传为夏禹及益所记，但书中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后世郡县名；《本草》一书，相传为神农所述，但书中也出现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后世郡县名，④ 故而这些书乃后人伪造。另外，颜之推还从人名、史实的角度，指出了不少典籍如《尔雅》、《春秋》、《世本》、《列仙传》、《列女传》等书的矛盾之处，证明这些书籍之中有后人附益的成分。宋代黄震也从书中提及后世的典章制度、地理沿革来辨伪，如他辨《亢仓子》之伪云：“其书称‘自乡而县’、‘县而州’，此后世之区划也。称‘被以青紫章服’，此后

① 宋濂：《诸子辨·关尹子》，朴社1926年版，第9～10页。

②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下，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③ 孔颖达：《礼记正义》卷十四引郑玄《三礼目录》。

④ 《颜氏家训集解》卷六《书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38页。

世之品式也。”[1]《亢仓子》旧题周庚桑楚撰，据《史记·商君列传》载，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是为县制的最早起源，而《新唐书·车服志》和《旧唐书·舆服志》始有“青紫章服”的记载。黄震通过典制、地理辨伪，使伪迹昭然若揭。欧阳修怀疑《周礼》，指出《周礼》非周公所作，它所描绘的西周制度不存在，是一部理想之书。他主要考察了两点：一是《周礼》设官数目与当时国家田土、户口、贡赋极不相称，悖于情理。二是立制在于为后世取鉴，但汉以后制度大都取法秦，反而不用《周礼》，而搬用《周礼》模式治国，无不招致败乱，因而《周礼》的真实性值得怀疑。[2]

明代宋濂不仅从典制、史实考辨真伪，而且运用避讳之法辨伪。如《亢仓子》，柳宗元、高似孙主要从它的文字材料来源及著录上辨伪，而宋濂则指出：“其言曰：‘危代以文章取士，则剪巧绮缫益至，而正雅典实益藏。’夫文章取士，近代之制，战国之时无有也。其中又以‘人’易‘民’，以‘代’易‘世’。世民，太宗讳也，伪之者其唐士乎？予犹存疑而未决也。后读他书，果谓天宝初，诏号《亢桑子》为《洞灵真经》，求之不获，襄阳处士王士元采诸子文义类者撰而献之。其说颇与予所见合。”[3] 在这里，宋濂把典制、避讳综合运用考辨《亢仓子》的伪迹，说服力很强。早于宋濂的南宋学者洪迈也曾运用避讳对李陵诗进行辨伪，“《文选》编李陵、苏武诗，凡七篇……予观李诗云：‘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盈字正惠帝讳。汉法触讳者有罪，不应陵敢用之”[4]。故而《文选》中所选李陵诗殊可怀疑。

用地理沿革考证古书真伪的最典型的例子当属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考辨。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注中，有“积石山在金城郡西

① 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十五《诸子一·亢仓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居士集》卷四十八《问进士策三首》，见《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326～327页。

③ 宋濂：《诸子辨·亢桑子》，朴社1926年版，第10～11页。

④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李陵诗》，见《容斋随笔》，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19页。

南”之说，阎若璩经过考证，指出汉昭帝“始元六年庚子秋，以边塞阔远，置金城郡”，而孔安国是汉武帝时的博士，且又“早卒”，其卒年当在元鼎末、元丰初，早于始元庚子前三十年，根本不可能知道“金城郡”之名。[①]《古文尚书》在地理记载上破绽百出。

古人造伪，往往采用杂采、抄袭、拼凑其他书籍的方法进行，然后号称某某古书。古代很多学者掌握了造伪的这一规律，往往从伪书内容的抵牾出发进行辨伪。如高似孙辨别《亢仓子》的真伪，就指出该书“往往采诸《列子》、《文子》，又采诸《吕氏春秋》、《新序》、《说苑》，又时采诸《戴氏礼》。源流不一，往往论殊而辞异，可谓杂而不纯、滥而不实者矣”[②]。再如朱熹考辨《古文孝经》，指出：“《古文孝经》亦有可疑处。自《天子》章到‘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便是合下与曾子说底通为一段。只逐章除了后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后面引《诗》，便有首尾，一段文义都活。自此后却似不晓事人写出来，多是《左传》中语。如‘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季文子之辞。却云‘虽得之，君子所不贵’，不知论孝却得个甚底，全无交涉。如‘言斯可道，行斯可乐’一段，是北宫文子论令尹之威仪，在《左传》中自有首尾，载入《孝经》，都不接续，全无意思！只是杂史传中胡乱写出来，全无义理。疑是战国时人斗凑出者。”[③] 梅鷟在揭露《古文尚书》的伪迹时，花费了相当的精力考辨《古文尚书》各篇系杂取先秦文献中的语句而成，而且矛盾重重，通过一一找出它剽窃的出处，有力地揭露了作伪的真相。

三、流传

文献无论真伪，只要在社会上流传，都或多或少会留下印痕。依靠这些线索，也可以用来辨析文献的真伪。对此，胡应麟将其总结为“核之

---

①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上，第八十七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9～740页。

② 高似孙：《子略》卷三《亢桑子》，见《史略·子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③ 《朱子语类》卷八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41～2142页。

《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也就是要检查所考辨之书最早的著录情况，同时考察后世各种官私目录的著录，分析其流变；考察同时代人的著述中有无谈论、征引该书的情况，并从后世相关的著述中考察有无转引、发挥和引申的情况，分析其来历。如该书不见于目录著录，长期以来后人也没有征引，其真实性就值得怀疑。

从历代图书目录的著录情况考辨伪书是古人辨伪常用的方法。如班固有感于当时好事者取奇言怪语附会东方朔作品的情况，在《汉书·东方朔传》中罗列了东方朔的所有作品，指出：“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则非也。”[①] 班固以刘向《别录》为依据，将东方朔作品的真和伪划清了界限。柳宗元在辨《鬼谷子》的真伪时也指出：“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鬼谷子》后出，而险戾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纵横者，时葆其书。尤者，晚乃益出七术，怪谬异甚，不可考校。”[②] 又如胡应麟辨《列仙传》非刘向所作，就从目录入手，“案《汉书·艺文志》，刘向所叙六十七篇，止《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而无此书（按：即《列仙传》）。《七略》，刘歆所定，果向有此书，班氏决弗遗，盖伪撰也”[③]。刘歆乃刘向之子，自刘向校书之初便参与其事，刘歆既不言其父有《列仙传》，则肯定未有。班固《汉书·艺文志》又全据刘歆《七略》成文，凡有增删并省之处，皆有说明，是则《汉志》不著录此书，正说明刘向未有此书。《四库全书总目》在辨伪时也常常考察书籍在历代目录中的著录情况，如《乙巳占略例》，旧本题唐李淳风撰，《总目》疑辨云：“按淳风有《乙巳占》十卷，盖以贞观十九年乙巳，在上元甲子中，书作于是时，故以为名。《唐志》、《宋志》所载卷数并同。惟《宋志》别出有《乙巳指占图经》三卷，不言何人所撰，而无此书。尤袤《遂初堂书目》、焦竑《国史经籍志》亦仅载《乙巳占》，不云别有《略

①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

② 《柳宗元集》卷四《辨鬼谷子》，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2～113页。

③ 胡应麟：《四部正讹》下，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页。

例》。检《永乐大典》，绝无一字之征引，可知明以前无此书矣。钱曾《述古堂书目》始以《乙巳占》、《乙巳略例》二书并列，而又不言其所自来。"[①]《总目》详考唐、宋、明、清书目，追踪《乙巳占略例》最早著录的出处，发现它来历不明，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又如《丰溪存稿》一书，旧题唐吕从庆撰，《总目》同样从目录源流上疑辨："其集（即《丰溪存稿》）历代史志书目皆不著录。此本为乾隆庚申其裔孙积祚所刊，称其从叔高祖元进所手录。黄之隽、邵泰、储大文皆为之序，称其湮没八百年而始显。然其书晚出，授受源流渺不可考，越宋、元、明至今，忽传于世，论者颇以为疑。"[②]

古书在流传的过程中，一般会被他书引用。某书在亡佚之后又有重出本，可用征引验证复出本之真伪。如《尚书》一书，在先秦及秦汉时期，被人征引很多，阎若璩就将这些被人征引的《尚书》文句与后出《古文尚书》相比较，发现多有不合。如阎氏根据刘歆《三统历》所引古文《武成》篇八十二字，与伪孔本《武成》文句进行对比，认为二者"迥异"，指出"无论此篇已亡而复出，相距三百年，中间儒者如班固、郑康成皆未之见，而直至梅赜始得而献之，可疑之甚。即其事迹、时日亦多未合"[③]。再如《竹书纪年》一书，相传是晋太康二年（281 年）出土的魏襄王（一说魏安釐王）时的竹书，沈约注。《四库全书总目》利用宋以前旧籍所引《竹书纪年》与清初传本对照，发现舛误漏脱比比皆是。例如《穆天子传》郭注引《竹书》七条，与今本同者仅三条；《水经注》引《竹书》七十六条，其中五条不见今本，其余各条纪年方式也与今本全异；《史通》引两条，与今本全异；《文选》李注引五条，今本只有一条；《开元占经》引四条，今本全无，等等。其沈约注，《总目》云："惟五帝三王最详，他皆寥寥。而五帝三王皆全抄《宋书·符瑞志》语。约不应既著于史，又不易一字移而为此本之注。"由此《总目》断定当时流传的《竹书纪年》及沈约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乙巳占略例》条。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四，《丰溪存稿》条。

③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五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1 页。

注均系后人伪撰，且谓“观其以《春秋》合夏正，断断为《胡传》盛行以后书也”[1]。近人王国维在《总目》启发下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实际上是把世传《竹书》的辨伪工作完成。

以上我们把中国古代的辨伪方法从作者、文本、流传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事实上，古代学者在辨伪时所用的方法比这要丰富得多，很多文献学家在辨伪时也并不是使用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方法并用。如颜之推辨别《通俗文》就从多角度进行思考：“《通俗文》，世间题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汉人，其《叙》乃引苏林、张揖，苏、张皆是魏人。且郑玄以前，全不解反语，《通俗》反音，甚会近俗。阮孝绪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书，家藏一本，遂无作李虔者。《晋中经簿》及《七志》并无其目，竟不得知谁制。然其文义允惬，实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训》亦引服虔《俗说》，今复无此书，未知即是《通俗文》，为当有异？近代或更有服虔乎？”[2] 这里从作者时代、音韵、传播、目录、文义等方面考察真伪，论证充分，立论可靠。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竹书纪年》条。
② 《颜氏家训集解》卷六《书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36页。

第六章
“传注训解，疏通疑难”：文献阐释的特色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意识早熟且发达的民族，历史意识的早熟导致了两种现象的产生：其一是在文字产生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不断追寻自身的来源，追溯本部落、本氏族的起源。“从虚幻的始祖和真实世系的结合，进而表现为对先祖的‘慎终追远’”[①]。祖先崇拜成为中华民族起源时期就产生的重要的历史观念。追念先祖在开拓进取中创造出的真实业绩，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意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二是在文字产生以后，形成了中华民族尊重文化传统、珍视历史经验、崇奉文化典籍的价值取向。在他们看来，文献典籍是文化传统、历史经验的最重要的载体，同时也是圣人之意、天地之道的体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怀着对传统文化的崇敬心理，“以复古为解放”，根据时代的要求和自身的体验，通过训诂、笺传、注疏、章句、正义、解微等方式，以文献典籍的内容为指归，根据典籍的思想建言立说，对典籍作出新的解释。

---

①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7页。

文献典籍作为一种文本已经固定下来，它所承载的是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内涵，但是时代却是要不断发展的，尊重祖先和珍视传统的中国人因此也就在不脱离经典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典的阐释进行新的创造，推动思想发展。中国传统学术史上绝少有抛开前人观点而另起炉灶的现象，围绕前人留下来的文献典籍来不断修正、不断阐释，是中国传统学术区别于西方学术的特征之所在。通过世世代代不断地对文献典籍的注疏训解，既保持了传统，使后世之人不至于过分曲解经典本意，从而使中华文化代代相传，绵延不断，又能不断推陈出新，以文献典籍的内容为出发点而尽情发挥自己的思想，实现思想上的进步。正如黄俊杰所言：“经典解释不仅是中国思想史的主流，也是中国思想发展日新又新的内在动力。”[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献阐释就绝不仅仅是文献整理的问题，而是思想发展的问题。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献阐释的发展及特点

中国古代文献阐释源远流长，它萌生于先秦，兴起于两汉，发展于魏晋，丰富于隋唐，变革于宋明，完善于清代，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也在不断变革和转型，从而形成阶段性发展的特点。

一、“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

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献阐释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诸多意蕴深刻的命题，诸如“述而不作”、“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等，都蕴含着文献阐释的深刻思想内涵。除此之外，影响后世文献阐释至大且巨的两种文献阐释

---

① 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简体字版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的基本模式——“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并一直主导着中国古代文献阐释的发展。

“我注六经”即试图以训诂的方法理解典籍的本意，达到对先贤文本的本真的把握，就经作注，经注相贯，多用语言解释，重视以训诂为基础的文献考据，发挥微言大义是其末节。“六经注我”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文献典籍只是文献解释者用来表述思想的工具，与经典若即若离，多用义理解释，多独立成书，重视微言大义的发挥，训诂考据是其末节。两种模式萌芽于先秦，形成于两汉。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传统的国家，故有“六经皆史”的说法。中国的文献典籍产生很早，在甲骨文出现的殷商时代就有了典册，“惟殷先人，有册有典”[①]，此后一直到西周，“学在官府”的王官之学一直非常发达，由此形成了“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掌”的体制，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整理、编纂中华典籍，逐渐形成了《易》、《书》、《诗》等中华元典的“最初版本”。这些中华文化的原创性经典，都是殷周先民尤其是其中的知识者在社会文化变革的过程中形成的精神财富，凝结着中华民族原初的生命文化精神。

春秋时期，孔子以《诗》、《书》等教授学生，提倡“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②]。孔子信奉而且喜好古代经典，他所作的只是阐释经典，而不是脱离经典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当时颇有同声。孟子所谓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及“述仲尼之志”，荀子所谓的“仁人”之务，“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③]，强调的都是“述”。道家虽然在哲学思想上多有创新，但仍极为重视古代典籍。如老子尝做周守藏史，其文中多引用古圣人之言。《庄子》书中也往往托古圣人之言以抨击今人之非。法家虽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并批评儒、墨两家过于“迷信”古代，但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的意思，如韩非就对前此之法家人

① 《尚书·多士》。
② 《论语·述而》。
③ 《荀子·非十二子》。
④ 《韩非子·五蠹》。

物多有推崇，并有“故先王贵之而传之”[1]之语。既然诸子各家都重视对文化传统的“述”，在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的形势下，人们开始对文献典籍进行注释，“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文献阐释模式渐露端倪。

汤一介曾将先秦文献阐释归纳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左传》对《春秋》的解释，称为历史事件的解释。第二种是《系辞》对《易经》的解释，称为整体性的哲学解释。第三种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叫做实际（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2]仔细分析这三种文献阐释模式，实际上就是“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模式。《左传》阐释《春秋》，重视对经文所述事件、掌故、制度等进行解释和补充，其解释内容虽完全可以独立成篇，但确确实实是对《春秋》经文的注释，从不脱离经文，也不随意发挥，属于“我注六经”的解释模式。而《系辞》解《易经》和《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则与之不同。《易经》本是占验卜筮之书，《系辞》把它看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并对它作了整体性的解释，赋予其深刻的哲学内涵。韩非的《解老》、《喻老》，大都用法家的社会政治观点来阐释《老子》，主要是为其“法、术、势”的法家思想作论证，对《老子》书中形而上意义的内容则多无注解。《系辞》及韩非的这种阐释文献的方式基本是以文本为依托来发挥自己的思想，属于“六经注我”的模式。

先秦时期还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对后世深有影响的若干文献解释体式，诸如故体、说体、解体、记体、传体等。不同的解释体式往往适应不同的文献阐释模式的需要，从而使中国古代文献阐释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故体，主要以释词为主，兼明篇意，间或也有解句的内容。故体形成的时间很早，但留下来的早期著作不多，到汉代，故体流行，魏晋以下直至明代，此体应用较少，直到清代，故体又重新兴起。记体，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文献阐释的体式，有随文记解者，如《礼记》的《士冠礼》、《士婚礼》等12篇之后所附之记，附于当篇末尾，或记缺文以备礼，或记古礼

---

① 《韩非子·有度》。

② 汤一介：《论中国先秦解释经典的三种模式》，《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以比证，或揭示其隐微，对理解《礼》文有很大好处；有单独作记者，《汉书·艺文志》所载礼类有“记”131篇，可信为先秦所作者当属不少，这些文章独立成篇，大都有助于理解《礼》文。这些体式不脱离文本，不过分阐发己意，特别适合“我注六经”。说体，这种解释体式主要以解说经籍原文的意蕴为主要内容，并借此融入己意，创立新说。《墨子·经说》与《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皆属此类。该体式在宋代疑古创新成为风尚的情况下曾大行于世，并在阐发文献的深层意蕴时加强了考辨。解体，主于解说经籍蕴意奥旨，不以词义训释为务，或就经籍原文作解，或通论要义。《管子》的《形势解》、《韩非子》的《解老》以及《礼记·经解》等均属此类。这些体式重视思想发挥，文本只是借以发挥己意的依据，故而特别适合“六经注我”。

与上面几种体式相较，传体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传体是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文献注释体式之一，也是先秦初创的诸多文献解释体式中体例最为完备、价值最高、对后世影响最深的体式，很能代表当时文献诠释所能达到的水平。《春秋》三传等是这一阐释体式的代表。在解说内容方面，传体的基本特征是记载故事、传述师说和发明义理；在阐释方法上，传体的基本特征是训释词语、辨析体例、以意逆志。[1] 传体产生于先秦，兴盛于两汉，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种分支体式。根据解释的目的不同，传体适用于不同的解释模式，《左传》解经，如前所述，不任意发挥，属于“我注六经”的模式；《公羊》、《穀梁》解经，重视微言大义的发挥，未必尽合原意，属于“六经注我”的模式。

两汉时期，伴随经学的发展，文献阐释也兴旺发达起来，出现了经典解释的第一次高潮。自西汉武帝以后，儒学定于一尊，经学昌盛，儒学经学化和经学派别化开始发展，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的争斗。经学内部今古文派别之争，是以经典文本的不同和解释目的的差异为起因的，正因为这样，这种争论就不可避免地使双方都拿起了文献诠释这一武器，争论的过程实际上变成了不同派别经典文本的阐释过程。经学派别之

---

① 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64～171页。

争，不仅促进了经学的发展，也使经学注释的规模不断扩大、形式逐渐多样。可以说，汉代的文献注释学是在经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汉代文献阐释的主要对象是儒经。其特点是每一种经典都有多家注释，而注释方式又多种多样。此后，随着经书在封建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各个时代的经学家、文献学家、思想家不断对经书作出创发性的解释，使经书不断适应变化了的社会要求，成为新时代政治统治的精神支柱。

由于经书注释的流风所及，其他文献注释也出现了，子学文献、史学文献、文学文献都有了注释。如子学文献有《吕氏春秋》高诱注，《淮南子》高诱注、许慎注，赵岐《孟子章句》，《九宫经》郑玄注等。史学文献有服虔《汉书音训》，应劭《汉书集解音义》，胡广《汉官解诂》，《汉官》韦昭注以及《战国策》高诱注等。文学文献有刘安《离骚传》，刘向、扬雄各作《天问解》，王逸《楚辞章句》等。注释范围的扩大，标志着文献注释之学开始突破经学的藩篱，向更广阔的文献领域拓展，为后世文献阐释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汉代文献阐释的发展，刺激了文献阐释体式的多样化。王国强说：“汉代注释体式的发展已经比较完备，一是体现在基本的注释体式已经多已具备，如传、故、说、训、解、章句、记、义、序、注、笺、疏、音，或继承，或创制；二是体现在传注合用体的发明，已具备基本的样态，如故训传体、训诂体、音义体。”① 不同的注释体式作用不同。音体专门标示字音。音义体一般以释音为主，兼及释义。注体则为经典作注，以语言解释为主，兼及义理及典故。笺体则将注文夹杂在经文中间逐字逐句进行解释，并启发了后世的疏、补注、考辨三种新的解释体式。训诂体是一种综合性的文献注释方式，而不仅是训诂两种体式的结合使用。汉代还有解故、注训、训释、注解，与训诂名异实同。故训传体是故、训、传三体并列合用体。疏体则有讲疏和疏注二种，讲疏又称讲义体、口义体，以疏解原文大意、阐发思想内容为任务，引用前人旧解为己说服务；疏注是既释

① 王国强：《汉代文献注释的背景和体式》，《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5期。

原文又释注文的一种体式，其结构一般是先录原文，次录前人注文，接着分别标明所疏原文、注文起止并对原文和注文疏解。义体主要阐述所解文献的要义，如班固《白虎通义》等。很显然，汉代文献阐释的主流是训释考证字词、讲解句义，多数走的是"我注六经"的路子，后世常用的古籍注释体式在这一时期大体都已具备。

汉代，在注释体式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章句体。章句作为一种阐释文献的体式，孕育于战国，创制于汉代，是汉代和以后影响最大的注释体式之一。章句对经典文本的诠释，首先是将文本分章断句，然后在此基础上注入诠释文字。其结构特征是以被诠释文本的篇章和句子为基本框架，在句子之间加入作者的解释，其中既有文字训诂，又有义理阐发，有时还会在每章的结尾或开头撰写内容提要，简要说明本章的主旨。赵岐的《孟子章句》和王逸的《楚辞章句》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汉代章句之学极为兴盛，政府也大力提倡，《孝经章句》还成为太学生的必读之书。[①] 作为一种新创的综合性注释体式，章句方法走向综合，兼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方面的功能，解说有据，分析也多深刻，体例较为完备。

在汉代，"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分歧表现明显。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其书名就已隐含阐发义理之义，所谓"繁露也者，古之冕旒，似露而垂，是其所从，假以名书也……推想其书，皆句用一物，以发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②]。可见，书名"繁露"，是一种比喻或象征，表明想以《春秋》一书为据，以重新解释的方式，发挥、表述自己的思想见解，属于"六经注我"。马融、郑玄等人重视以训诂为基础的文献考据，所谓"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③]，就是要从文本中寻找、揭示文献典籍所蕴含的"元意"。凡事不能脱离文本来理解，忠实于文本，为先圣继绝学，属于"我注六经"。董仲舒阐发微言大义，重义理，偏重主观臆断，轻训诂；郑玄等人则多采用随文释义，运用训释术语，揭示句

① 《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上》序。

② 《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二《经籍考九·春秋繁露十七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566 页。

③ 《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

意，且多遵守传疑之例。诚如皮锡瑞所言：“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①] 分界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我们说先秦两汉文献阐释有两种模式，并不是说这两种模式截然对立，不相交融。事实上，“六经注我”模式不会完全抛开对词语的训释，“我注六经”模式也没有完全抛开对微言大义的挖掘，只是二者的侧重面不同罢了。

二、“言意之辨”与“疏不破注”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文献阐释之学得到发展，并形成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文献阐释理论，一是“言意之辨”，二是“疏不破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阐释著作数量多、范围广，除经书注释继续发展之外，史、子、集部文献的注释也得到迅速发展，涉及的学科远比两汉时期要丰富。史部不仅注正史，也注及杂史、专史，如郭璞《穆天子传注》、《山海经注》，挚虞《三辅决录注》等。子部的注释涉及儒家、道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天文家、历算家以及医家，如王肃《太玄注》、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徐岳《九章算经注》、全元起《黄帝素问注》等。集部则涉及了楚辞类、别集类和单篇作品的注释。另外，还涌现了大量佛经的注释。更为重要的是史注摆脱了依附经注的状况，发展为独立的注释形式，他注和自注均已出现，并出现了注史派别。史注家在阐释史部文献时，传述事实，证发文意，对前代和晚近史书进行全面的注解和阐发，除注音、释义、评论及发凡起例外，还评述原作得失，补其缺漏，阐明内涵，裴松之注《三国志》是其代表。

魏晋时期，玄学发达。从文献注释的角度看，玄学就是在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王弼注《老子》，向秀、郭象注《庄子》，张湛注《列子》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从方法上看，这类阐释略训诂而重名理，略文句而贵旨意。和汉代经学相比，玄学的经籍解释更具有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的品质，更富有哲学意味。盖因如此，在文献阐释理论上，滥觞于先秦

---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6页。

的“言意之辨”，适应魏晋学术的发展而得到更深入的讨论。由此生发出来的关于语言、思想与本体存在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进一步在经籍诠释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形成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阐释原则。

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考察，会有不同的体悟。从文献阐释的角度看，它所表达的是语言文字（言）与思想（意）的关系问题，即语言文字能否完整表达人的思想或思维。关于这一问题，当时又有“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三种看法。系统阐述“言不尽意”理论的是荀粲，他认为圣人对世界深微的认识体验难以用语言表述出来，人们要想获知经典本义，只能透过语言和表象，直接用心理解释的方法探寻“理之微者”。[①]“言不尽意”注意到语言文字在表意方面的缺陷，“正好为文本的接受者留下阐释的自由空间”[②]。“言尽意”是对“言不尽意”的反拨，欧阳建作《言尽意论》，认为名与物、言与理存在着同一性，语言是可以清楚表达圣人之意的，通过文本所提供的语言资料完全可以寻求作者的思想。在“言意之辨”的讨论中，王弼的“得意忘言”最具代表性。周裕锴通过研究指出，王弼的主张实际上是提出了两种阐释学的方法，第一种是“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语言具有指示意义的作用，依循言、象就可以追寻圣人之意；第二种是“忘象乃得意，忘言乃得象”，超越语言的形式化的一面，直接去领悟体验圣人之意。[③] 从某种意义上讲，“得意忘言”是对“言不尽意”和“言尽意”的折中。按“言不尽意”的观念，一切文本阐释都将失去意义，按“言尽意”的看法，汉儒拘泥于言词的解经法永远也不能更改。“得意忘言”从语言文字出发，又不被具体的语言文字所拘牵，强调以理解意思为主，不落言语之窠臼，得意为上，从而达到对文本的创造性的理解，促进思想的发展。

对于中国文献阐释传统而言，“言意之辨”的贡献在于它在古文经学所固守的章句训诂的方法论中撕开了一道裂缝，解经不拘泥于文字的思想

---

① 《三国志》卷十《荀彧传》裴松之注引《晋阳秋》载何劭《荀粲传》。

② 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③ 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从此深入人心，这一诠释观念的直接后果就是为经典的理解与解释向着多元发展提供了依据。正是在这一观念的推动下，王弼得以用道家的思想解释儒家的经典，以道家理念塑造圣人形象。

隋唐时期的文献阐释在中国古代诠释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文献诠释的方式、范围和理论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出现了一大批影响后世的阐释著作。经学方面，孔颖达《五经正义》、贾公彦《周礼注疏》和《仪礼注疏》、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等相继出台，结束了经学长期分裂的局面。史部典籍中，《史记》司马贞“索隐”和张守节“正义”、《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等，都是集大成式的优秀注本。诸子之书中，新产生了《荀子》杨倞注、《黄帝素问》王冰注等权威注释。文集中的《文选》李善注，兼有《文选》诸多注释的众家之长，奠定了“选学”的基础。在通释语义的训诂专著方面，陆德明《经典释文》为多部先秦重要典籍注音、释词，具有很高的文献学、语言学价值。玄英《一切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遍释佛典，篇幅巨大，卷帙浩繁，是我国古代佛典诠释的稀世之作。总之，隋唐的典籍注释，经史子集各部均产生了一批中国文化史、中国文献学史上的上乘之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一时期，政治的统一，要求思想和学术的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学术的不同、郑学王学的争论以及儒、释、道的融合及争斗，使得经典传承师法多门，解释多歧，义疏章句繁杂，是非无定。文献解释的多样化局面显然不利于大一统王朝的思想统治。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统一经学，统一经典注释，为人们学习、研究经典提供一个从文字到注释都得到官方认可的样本，就成了统治者考虑的主要问题了。于是，随着唐初《五经正义》的编定，“注不违经，疏不破注”的诠释思想就出现了。

“疏不破注”起于唐太宗诏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撰成五经定本，诏孔颖达等人撰定《五经正义》。“正义”这一注释体式的目的是要建立标准化的经典解说文本，其内容是顺着所采纳旧注的意思进行解释，如果旧注有错误，也必须为之圆融强辩，不能有所违迕，而且采纳旧注只能独尊一家，即使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只要与注文相左，也不能采纳。这一种做

法，即文献注释史上著名的“疏不破注”。“疏不破注”要求疏解文献时要根据先儒之笺注进行，不能随意发挥，要维护原注文的思想体系。这一文献阐释原则具有多面性：其一，起到了统一经旨的作用，遏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多元发展的局面，达到了官方掌握经学话语权的目的。其二，维护了传统，强调了继承，恪守原注，是对“诗无达诂”、“言不尽意”之多维解释体系的反拨。其三，限制了学术的发展，使得人们无法在经典的基础上根据现实需要进行发挥，遏制了思想发展的生命力。正是由于正义乃“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①，强调释义的权威性，在精神上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制约，故而隋唐经学阐释表现出三种倾向：“一是传统的旧说排斥了新颖的创见，二是集体的解释取代了私人的理解，三是权威的文本压抑了多元的著述。”②《五经正义》成为传统经义的忠实的守护者和辩护者。

当然，凡事不可绝对，我们说“疏不破注”固守经注，也只是大体而言。实际上，疏对笺、注还是有所补充，有所突破的。认识不到这一点，就认识不到中国古代文献阐释的进步，认识不到思想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三、义理阐发与训诂考据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文献诠释发展的又一重要时期，人们对经典的解释，内容更加广泛，方法更趋多样，思想更为丰富。

宋代，思想活跃，疑古批判精神出现，时代的发展需要对儒学作出新的解释，有识之士开始对汉唐经学进行反思。孙复在反思儒学发展时有言：“孔子既殁，七十子之徒继往，六经之旨郁而不章也久矣。加以秦火之后，破碎残缺，多所亡散。汉魏而下，诸儒纷然四出，争为注解，俾我六经之旨益乱，而学者莫得其门而入。观夫闻见不同，是非各异，骈辞赘

---

① 《后汉书》卷二十八《桓谭传》载桓谭上光武帝疏曰：“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五经正义》之名，当有取于此。

② 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语，数千百家，不可悉数……又后之作疏者，无所发明，但委曲踵于旧之注说而已。”[①] 在孙复看来，“六经之旨郁而不章也久矣”，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后儒的注释章句不仅不能揭示儒学的精义妙思，反而常常“俾我六经之旨益乱”，这些注疏踵于旧说，弊端丛生，无所发明，对儒学发展不利。稍后的欧阳修更是直接批评唐代的《五经正义》，认为是“非圣之书，异乎正义之名”[②]。汉唐经学阐释方法的局限和阐释结果的片面，无法揭示儒学的“大道精微之理”，故而宋儒要重新阐释典籍，回答现实存在的问题。

宋明时期的文献阐释活动往往成了理学家的思想宣传活动，他们通过注释儒家经典，发挥义理，极力阐扬“性”、“命”、“天”、“道”、“理”等理学范畴，从哲学的角度阐释它们的意义。把儒学经典哲学化，是宋明理学对经学发展的贡献，也是对文献阐释学发展的贡献。宋明时期的文献阐释工作敢于怀疑权威，尤其是怀疑唐代《五经正义》的解释，倡导把握圣人著述之心，重新发明经典的本义；大多数学者肯定超越文字训诂的个人化的心灵体察和认知，肯定对文本意旨的多元化理解和解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除了宋明学者根据现实需要对经书重新解释之外，这一时期在注释方法上还有一个创新，那就是诗文评点和小说评点之类的著作出现。诗文评点在唐代就有了，但数量不多，影响不大，到了宋代，不仅数量增多，而且方法也日趋成熟。诗文评点附于原文而行，与作品浑然一体，随时对作品进行分析、评点，加深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和理解。有些著作在评点之外还有注释，构成了评注结合的形式。宋人的诗文评点开启了明清时期的小说评点，出现了李贽、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等小说评点大家，他们评点的四大文学名著，对古典小说批评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很大。

在中国诠释传统中，朱熹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对理解与解释的方法论之探讨，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朱熹阐释经典的主旨是阐发经典之

---

① 孙复：《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奏议集》卷十六《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见《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887页。

要义，但他并未摒弃古文学家所注重的章句训诂，这使得他的经义发挥有了可靠的文字学基础。朱熹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在经学史中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自宋以后文献诠释的主流。

如果说在理学家那里训诂的解释方法已不被重视的话，那在心学家那里，已反对用传统的训诂学方法来解释经典了。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认为六经本来是一个整体，是天理的呈现，因为人们迷于训诂章句，析理太精，支离蔓芜，而被分裂。在他看来，“习训诂，记传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①。圣人之所以是圣人，乃是因为他悟出了天理，此天理就是“吾心之良知”，人们应该从自己的心中去追寻天理。古代圣人著述，实是他们对自己的心的描述与解释，由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可以循着经典所提供的线索，通过“内省”达到圣人之心，而这圣人之心也就是吾心，也就是“天理”。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这种通过主观内省理解与解释经典的方法，代表着中国解释传统中的一个新的解释路线，其主旨已不是解释古书的原意，而是读者对古代圣人之言的个人体悟，他们不像训诂派的学者那样尊崇经典，其解释也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常与所谓的经典之原意不合，也因此受到种种非难，② 被中国学术界视为非正统的思想流派。

有清一代，学风大变。正如宋儒对先前学术研究进行总结、批判，并创出新路一样，清儒对宋明学术也进行了反思批判，认为宋明学者治学，游谈无根，束书不观，空疏无当，任意解经，致使学者学无根底，无法通经致用。就文献阐释而言，清儒对宋明儒者进行了批评，钱大昕云：“汉儒说经，遵守家法，训诂传笺，不失先民之旨。自晋代尚空虚，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

① 《王阳明全集》卷七《文录四·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55 页。

② 参见余英时：《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9～190 页。

诠说经典。”① 钱大昕对宋明儒者文献阐释的批评，在当时非常有代表性。在清人看来，宋人“师心自用”，其文献阐释因为缺乏训诂学的支持而穿凿附会，歪曲了文献典籍的本义，其精神实质离圣人本义越来越远。由此，清人对经典的解释又转入以训诂为主，力求追寻经典之原义。清代汉学家尊重汉儒古训，反对宋儒“空凭胸臆”的义理发挥，认为只有通过训诂等一系列文献阐释工作，才能得到真正的义理，绝不能离开训诂而任意诠说义理。戴震坚持“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② 的文献阐释原则，指出“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训诂有师承，亦有时附会；晋人附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③。钱大昕也指出：“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④ 又说：“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⑤ 由于清儒重视音韵训诂和文献考证，实事求是，其文献阐释以考据为主流，全面发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

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纂诂序》，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77 页。

② 《戴氏杂录·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见《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 1995 年版，第 505 页。

③ 《戴东原先生文·与某书》，见《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 1995 年版，第 495 页。

④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纂诂序》，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77 页。

⑤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75 页。

如果归纳一下，清代文献阐释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训诂考据成为文献阐释的最主要手段，对古籍进行了重新阐释和注疏，并对古注进行了研究整理。清代学者在继承前人文献注释成果的基础上，紧扣文本进行考证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诠释经典，严谨求实，出现了大量的类似于《古文尚书疏证》和《孟子字义疏证》这样的卓越的文献阐释名著。其二，在文献阐释过程中综合利用各学科的成就。清代考据学发达，语言、文字、音韵之学、辨伪学、辑佚学、校勘学等等都自成体系，这些学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对文献阐释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中国古代文献阐释的特点

通过对中国古代文献阐释的发展历程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中国古代的文献阐释工作既有连续性、继承性，同时又超越前人弊端，不断变革、不断发展。自先秦开始，古代哲人就不断对经典进行解释，创造出不同的阐释经典的模式，并被后人继承下来。就注释体式而言，一代一代学者继承前人所创，并不断丰富发展。就文献阐释理论和方法而言，两汉时期，既有重视章句训诂的“我注六经”，也有注重阐发微言大义的“六经注我”。到魏晋时期，人们痛感汉儒拘牵文句所进行的经典诠释严重限制了人们对经典的理解，经典所蕴含的精义被文字训诂所取代，于是产生了“言意之辨”，对语言文字的表意功能提出质疑，人们开始超越“我注六经”，注重对文献的心理体验和创造性解释。到唐代，由于大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魏晋时期出现的对文献的多元化解释受到遏制，“疏不破注”成为人们注释文献时遵循的原则。及至宋代，宋儒在汉唐诸儒的基础上，勇于创新，由汉儒的注重文本诠释、解字释词而发展为重视义理阐发。而清儒又根据学术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超越宋儒，重新回到文本，运用各方面的知识，以更加缜密的方式诠解文献，并以“解蔽”“闻道”为目的，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发展出一套以语言、文字、训诂、典制为途径，以博览、求证、推理为方式的文献阐释方法论。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献阐释是在不断变革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创新的因素。

其二，中国古代文献阐释绝不仅仅是文献整理的问题，它是传统文化绵延不绝的重要手段，它的发展与社会的文化需求密切相关。首先，如果没有文化典籍及其解释，古人连同其思想、情感就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不可能被后人所了解，古代文献也就不可能体现其价值并产生影响。如果没有文化典籍及其解释，后世学人就难以了解和解释古代学者及其思想情感，因而也就不可能体察其生活经验，领悟其生命价值，接受其有益启示。刘家和先生在讨论古代经学问题时曾说："如果只有经书而无经解，那么随着时世迁移和语言变化，经书就越来越读不懂，当然经学最终就会失去其存在的理由。"① 揆诸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整体情况，如果没有文献的阐释，也就没有古代学术的传衍和发展。其次，文献阐释者总是抱着经世致用、解决各自时代文化需求的态度来解释文献、注疏文献，蕴含着明显的入世观念，这就使得中国古代文献阐释具有重视现实人生、政治伦理教化和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倾向。

其三，中国古代文献阐释走着两条并行的道路，一为汉学的道路，一为宋学的道路。这两条道路只是侧重面不同而已，绝非对立，相反，它们总是交叉在一起。汉、宋经典诠释方式的不同，在于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不同。汉学的诠释方法以文本为中心，注重对经典的文字诠解与梳理，解字释词和训诂考证是其特点。宋学则进了一步，从以文本为中心走向以义理为中心，大大扩展了阐释空间。这样区分，也只是就大体而言，而实际上，宋学家照样非常重视文本，比如朱熹。而训诂笺传也不仅仅只关注文本，它依然是探寻文献本义与阐发义理并重。中国古代的训诂笺传者历来重视探寻文献的本义，总是努力使自己的解释符合作者和文本的原意。以文献为本，依文献立义，由注解、阐释文献而构成意义，是中国文化长期延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训诂笺传不再仅仅是具体的文本注释方式，而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力。汉、宋文献阐释方式的并存，正说明中国文献阐释既重视经典本义的"文献"意义，又连通过去与

① 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1 页。

现在，重视文献的“义理”。其实，这种汉、宋分流的文献阐释方法，到清代开始进入综汇其长的阶段，正如冯天瑜所指出的，在清代，“有些学者认为不要限于汉宋门户之见，而应使二者相得益彰，这便是‘合汉宋’的元典诠释路线，即以训诂立足，开掘文本‘本义’，又着意发挥文本‘引申义’，并作出现时代的价值评判”①。

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献阐释的理论

中国古代学者不仅对文献典籍有着代有所承的诠解，而且在诠解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献解释理论。中国古代学者通过不断地诠释经典、疏解文献，不仅使后世之人理解了前世文献，继承了传统，并利用这些文献研究本民族的历史，而且使思想之泉淙淙长流，永不枯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思想创造的活的因子。而那些在解释文献中形成的理论又成了文献学、思想史宝库中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文献阐释的必要性

为什么文献需要解释，换言之，文献阐释的必要性何在，这是在论述文献阐释思想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一是时空间隔，文献载体的变化导致文献理解上的困难。由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献传播的工具不断发生变化，再加上辗转传抄和理解的不同，势必加剧了文献典籍文本意义理解的复杂性，这就为文献诠释工作营造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新唐书·艺文志》云：“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其后传、注、笺、解、义疏之流转相讲述，而圣道粗明。”这段文字道出了文献阐释产生的原因以及文献阐释的方法和手段。正因为

①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页。

“师传之道中绝”、“简编脱乱讹缺”，才有“诸儒章句之学”以及“传、注、笺、解、义疏之流转相讲述”。清人戴震认为：“自有书契以来，科斗而篆籀，篆籀而徒隶，字画俯仰，浸失本真。”[①] 在戴震看来，作为文献载体的文字发生变化而造成文献失去本真，而要恢复本真，阐释必不可少。戴震还指出，之所以进行解释，还因为“遗文垂绝，今古悬隔”。所谓“遗文垂绝”，就是文献的残缺和错讹，所谓“今古悬隔”，就是现世的解释者和文献产生的年代相隔久远。文献的残缺和错讹再加上时空相隔而产生的思想的差异与隔膜，就势必要通过考证、辨伪以及语言解释的方法来打通障碍。

清代另外一位学者崔述也认识到时代久远、言语差异以及文献书写工具、书写文字的变化，会导致文献本真的缺失。他说：“今去二帝三王远矣，言语不同，名物各异，且易竹而纸，易篆而隶，递相传写，岂能一一不失真！”[②] 很显然，文献在流传中会因种种原因而出现传写之误。陈澧的论述更能说明问题：“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训诂之功大矣哉。”[③] 陈澧认为对文献进行阐释实际上就是为了跨越语言上的时空距离，使后世之人能够与作者相通，看懂并理解文献的意义。

二是学术传承过程中对文献理解不同而产生歧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亦云：“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左丘明之

① 《东原文集》卷三《与王内翰凤喈书》，见《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 1995 年版，第 278 页。

②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10 页。

③ 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一《小学》，《陈澧集》（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5 页。

所以为《春秋》作传，解释《春秋》，就是看到孔门后学对孔子思想的理解不同，造成圣贤思想本真的流逝。

前引宋代孙复论“六经之旨郁而不章”的原因之一就是“诸儒纷然四出，争为注解”。清人崔述也认为由于时代的变迁，师承的不同，文献传播必然出现问题，他说：“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顾自秦火以后，汉初诸儒传经者各有师承，传闻异辞，不归于一。兼以战国之世，处士横议，说客托言，杂然并传于后……魏晋之际，俗尚词章，罕治经术，旋值刘、石之乱，中原陆沉，书多散佚，汉初诸儒所传《齐诗》、《鲁诗》、《齐论》、《鲁论》陆续皆亡，惟存《毛诗序传》及张禹更定之《论语》，而伏生之《书》，邹、夹之《春秋》亦皆不传于世。于时复生妄人，伪造《古文尚书经传》、《孔子家语》，以惑当世。二帝、三王、孔门之事于是大失其实。”[1] 孙复和崔述所言虽为六经之流传情况，但道出了所有文献致误的原因。即政治环境、历史背景的变化以及学术传承的混乱势必造成对古书甚至古史的杜撰。战国时说客辩士惯用讽喻，他们或把己说托名于圣贤，造成学统混乱，或编造故事，造成史料真伪并存。秦汉人将这些讽喻故事托言误认为史实，不加分辨地收入书中，且师法传经，一经之义各家所说不同，给后代学者造成理解上的误导。魏晋以后，五胡乱华，书又散佚，加上诸儒争相注释，好事者伪造杜撰，六经之旨就更加淆乱，所反映的史实也就离本来面目越来越远。

鉴于以上情况，传、注、笺、解、义疏、章句等对文献的诠释就势在必行了。

二、文献阐释的目的

在古代文献学家看来，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解释方法，文献阐释的最终目的有两个：一是恢复文献文本的原貌，探知文献作者的原意，二是在理解原意的基础上，阐释蕴含在文献中的“道”，从而丰富自身，用之于社会实践。

---

①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对于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文献阐释学来讲，文献典籍具有“原意”，是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而存在的。尤其是被后世反复阐释的儒家经典，更是包含有深刻的固有的意旨。《庄子·天下篇》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就明确肯定儒家六经都有其旨意。《荀子·儒效》篇亦云：“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相信五经各从一个侧面言说圣道之意，而圣道之意就隐含在五经之中。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述而不作”之“述”，就是紧扣经典文本，发挥圣贤精义。肯定“原意”并“述而不作”成了后世注释文献的一个原则，无论是传，是注，还是疏，都是依据文献而作出的主观上认为符合文献典籍本义的解释。从文献诠释的角度看，虽然在中国学术史上有所谓今文和古文之争、义理和考据之争，但是，它们的分歧不在于是否肯定经典的本义，而在于如何才能达到或揭示经典的本义。

阐释文献的最基本目的就是探求经典文本所蕴含的本义，汉代学者首揭此意。东汉以治《左传》而闻名当时的学者陈元在上书皇帝时就指出，《左传》解释《春秋》，不脱离典章史实，“解释先圣之积结，洮汰学者之累惑”[①]，更接近《春秋》本义，故而要求将《左传》立为博士。郑玄在告诫自己的儿子时说自己“博稽六经，粗览传记”，注释经典，“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②]，同样把探求经典文本中所蕴含的先圣的“原意”放在第一位。

这种追求本义的思想成为中国文献阐释的一个传统，宋代朱熹就说，解释文献首先应该“一切莫问，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③]。仇兆鳌在《杜诗详注》序中说：“是故注杜者必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

---

① 《后汉书》卷三十六《陈元传》。

② 《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

③ 《朱熹集》卷四十八《答吕子约》，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317 页。

接其人，而慨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朱熹和仇兆鳌的话表达了文献阐释者的普遍认识。在解释者看来，解释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圣贤之指”，但这必须是紧扣文本本义，反复研究，体味作者之苦心于千百年之上，要能在思想上跨越时空，进入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思维状态，“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作出符合作者原意的客观解释。

恢复本义只是第一步，紧接着就是通过文献阐释，积极入世。在古人看来，古代经典文献中包含着圣人的精义、民族的思想智慧、历史的经验教训。解释这些经典文献，除了存古之外，重要的还在于学以致用，将文献典籍中所蕴含的精义、思想和经验引进现时代，以解决现时代所存在的种种问题。

朱熹就指出，文献解释的目的并非仅仅取得文献的本义，而是要通过解释来体验古人的心境，从而丰富自身，用之于社会实践，“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自家见未到，圣人先说在那里。自家只借他言语来就身上推究，始得”[①]。清代学者戴震也指出，解释文献的目的，除复原文献外，还为了考见古人的义理，阐发“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的“至道”。早年，他就批评“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闻道”，晚年，他申述“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②] 中国古代有“文以载道”的说法，文献典籍皆为“载道之书”，通过阐释而取得文献典籍中的“道”，结合现实需要，治国安民，修身养性，是文献阐释的终极目的。

三、文献阐释的可能性

既然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遗文垂绝”，而且文献诠释者与文献制造者“古今悬隔”，那为什么后世的解释者能够较为准确地解读前世的文献而又不至于“臆断”呢？换言之，古人是基于什么样的思想基础而认为文献诠释可以探求文献作者的原意呢？

---

① 《朱子语类》卷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1页。

② 《戴东原先生文·与某书》，见《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495页。

其一，古今相通。诠释者之所以能够与著述者取得相同或相似的认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古今相通。关于这一点，先秦思想家有着很多的论述。《管子》中云：“问曰：‘古之时与今之时同乎？’曰：‘同。’”① 又云：“天，覆万物而制之；地，载万物而养之；四时，生长万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②《庄子》中云：“冉求问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犹今也。’”③ 荀子也有相似的看法，所谓“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④，“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古今一也。类不悖，虽久同理”⑤。《吕氏春秋》同样表达了这一思想：“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⑥ 类似这样的说法还有很多，这说明，在古代哲人看来，虽然世易时移，但基本环境“变而不化”，是相通的，正是这种“古今一也”，构成了文献解释可能性的基础。当然，这种古今相通绝非古今完全一样，而是周围环境有着相似之处。后人虽然与前人远隔千年，但毕竟生活在同一块大地、同一种文化之中，日月山河依旧，基本的文化观念依旧，这种环境上和文化上的一致性就为后世之人诠释、理解前世文献准备了条件。当然，随着时空的变迁，文献典籍自会损失不少具体的内容和信息，但这并不妨碍后世之人对前世文献整体大意的理解和把握。郭象在注《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时云：“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游放，无为而自得，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郭象指出，个别信息的丧失或不解，对于理解整个文献的“大意”和“宏旨”并无大碍。朱熹也曾说：“千载而下，读圣人之书，只看得他个影象，大概路脉如此。若边旁四畔，也未易理会得。”⑦

---

① 《管子·侈靡》。

② 《管子·形势解》。

③ 《庄子·知北游》。

④ 《荀子·不苟》。

⑤ 《荀子·非相》。

⑥ 《吕氏春秋·察今》。

⑦ 《朱子语类》卷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5页。

其二，人之性情相通。后世之人能理解前世之人的思想，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人类有着共同的性情。孟子曾指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①] 荀子也指出，“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②]。“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③]。“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④]。强调人性的共通性，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共同的看法，而自秦汉以来，对于人之常情与共通人性的论述，几乎无代无之，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中重要的一页。从文献诠释的角度看，只要在解释者和被解释者之间存在着“人之常情”，即存在共通的人性，那么人们就可以“由近知远，由己知人”[⑤]，后世之人正确理解前世文献就是可能的。孟子言：“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⑥] 正是这种“心之所同然”才使得读者设身处地地推测作者的思想成为可能且变得有效，文献诠释才得以完成。

其三，语言文字相通。后世诠释者诠释前世文献，依靠的是语言文字。也就是说，语言文字是文献的载体，文献是由语言文字“堆砌”起来的，诠释者只要弄懂文字，就能读懂文献，也就能正确揭示文献中所包含的作者的原意。就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来看，几千年来未曾中辍，绵延不断，成为后人理解前人思想的必由之途。许慎对文字的作用有精辟的论述，他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⑦] 文字是圣人作则、

① 《孟子·告子上》。
② 《荀子·荣辱》。
③ 《荀子·性恶》。
④ 《荀子·不苟》。
⑤ 《淮南子·主术训》。
⑥ 《孟子·告子上》。
⑦ 许慎：《说文解字叙》，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63 页。

垂法后世的工具，同时也是后人认识前人、理解典籍的锁钥。文字虽然“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①]，但只要掌握了正确的释词方法，就能正确诠解文献典籍。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学者在诠解文献时特别注意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的方法，钱大昕就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②]。“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③]。

要之，正是因为古今相通、人之性情相通、语言文字相通，才能使人们跨越时空，以后世之思想与前人之意旨相接，使文献诠释变得可能。

四、文献阐释的原则

既然文献阐释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典籍的本义，体察蕴含在文本中的圣贤之道，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换言之，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才能使后世之人正确理解前世文献的本义或原意？对此，古人提出了丰富的思想，值得总结。

古人对于文献注释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古代文献之所以代代相传，后世之人之所以能理解前世之意，全在于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注疏解。阮元曾就经书的解释说明这一道理：“古书之最重者莫逾于经，经自汉、晋以及唐、宋，固全赖古儒解注之力。”[④] 可以说，离开对文献的解释，人们要想准确理解文献，并进而研究历史，那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正是基于对追求文献本义、探求圣人原意以及文献阐释重要性的认识，古人提出了一系列文献阐释的原则，以保证文献阐释的正确无误。

---

①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八《王怀祖广雅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7 页。

②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小学考序》，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78 页。

③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左氏传古注辑存序》，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71 页。

④ 阮元：《研经室一集》卷五《王伯申经义述闻序》，见《研经室集》（上），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120 页。

（一）“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的理论最早是由孟子提出来的。“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①] 孟子的这段话，由“尚友”谈到“读书”，又由“读书”谈到“尚友”，故而导致后世之人的不同理解。但把这段话看作是诠释文化典籍的原则，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赵岐在注孟子这段话时这样说：“读其书，犹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论其世以别之也。”朱熹注云：“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即观其言，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②] 赵岐和朱熹都倾向于以某种客观标准来分判古人高下，即通过考知古人所处之环境和形迹来帮助理解古人之书。

孟子这种“知人论世”的文献典籍的解释理论，得到后世学人的赞同并对之进行了很好的阐释。南宋张栻对孟子的这段话作出这样的解释：“夫世有先后，理无古今，古人远矣，而言行见于诗书，颂其诗，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则何益乎？颂诗读书，必将尚论其世，而后古人之心可得而明也。”[③] 在张栻看来，古人言行见于诗书，读其书需知其人，知其人必论其世，如此才能明“古人之心”。清代章学诚的论述更深入了一步：“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于千古以后乎？”[④] 正因为此，章学诚强调“论古必先设身”[⑤]，也就是要设身处地，“知古人之身处”，考察时代和环境对作者的影响，这样就能更好地了解其人品和思想，较为准确地领会著作中所蕴含的作者的真实意图，离开了这样的原则，必然不能很好地探寻文献本义。著名文论家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中对“知人论

① 《孟子·万章下》。

② 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408 页。

③ 张栻：《孟子说》卷五《万章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文史通义校注》卷三《文德》，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278 页。

⑤ 《文史通义校注》卷三《文德》，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279 页。

世”的解释原则作了这样的论断：“世字见于文有二义：纵言之，曰世运，积时成古；横言之，曰世界，积人而成天下。故天下者，我之世；其世者，古人之天下也。我与古人不相及者，积时使然；然有相及者，古人之诗书在焉。古人有诗书，是古人悬以其人待知于我；我有诵读，是我遥以其知逆于古人。是不得徒诵其诗，当尚论其人。然论其人必先论其世者何也……人必与世相关也。然未可以我之世例之，盖古人自有古人之世也。苟不论其世为何世，安知其人为何人乎?”吴淇的精辟之处在于，他首先对“世”进行了新颖的解释：纵向看，“世”是时代，是历史的形成，横向看，“世”是环境，是由人构成的社会。其次从“古人有诗书”和“我有诵读”两个角度揭示了文献诠释超越时空以使读者和作者融合的可能性。再次论证了人和“世”的相关性，指出“不论其世为何世”，就不知“其人为何人”。吴淇的论述精义迭出，实际上是为“知人论世”设定了具体法则。

“知人论世”的文献阐释原则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首先，它向人们指出，任何文献典籍都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特定文化及特定环境的产物。文献作者不可能脱离特定环境而存在，他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思想观念以及个性特征，都是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产生的。他所撰写的文献典籍，必然是他在特定文化氛围中针对特定问题所作出的具有个性化的反应和评论，这样的典籍必然带有特定的时代印痕，必然是文献作者文化修养、个性特征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特殊面貌的共同折射。因此，正如章学诚所言，要想准确理解古人“文辞”，必须要搞清楚古人生活的特定时代，并进而搞清楚古人在特定时代下的特定的生活经历、文化心理和个性特征，庶几才能接近真实。其次，文献解释者同样是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生存的人，他对文献的解释同样折射出他本人的个性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特点。而他所生活的时代与文献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存在着时空上的距离，因此在诠解文献时绝不能以今例古，要明白古人自有古人之世、今人自有今人之世这一道理，从而去设身处地、论世知人，对文献典籍作出正确解释。

“知人论世”的解释原则在中国古代文献阐释史上被广泛应用。汉代，《诗序》、《诗谱》在解释《诗经》时，或考定作者，或联系史实，或论述历史渊源，或阐释文化背景，成为成功运用和发展这一原则的例子。

（二）“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最早也是由孟子提出的。孟子在和咸丘蒙讨论《诗·小雅·北山》时曾说过一番这样的话：“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① 孟子的“以意逆志”是什么意思呢？东汉学者赵岐在批注《孟子》时这样解释：“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说诗者当本之志，不可以文害其辞，文不显乃反显也，不可以辞害其志。”② 还说：“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也。”③ 朱熹在解释这句话的含义时说：“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其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④ 赵岐和朱熹都指出孟子的“以意逆志”就是读者或解说者可以以自己的心意去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孟子的这段话，实际上就是在阐述文献解释应遵循的原则，即“解说《诗》的人，不要因为文字片断的意义而妨害对篇章整体的意义的理解，不要因为篇章整体的言词义而妨害对作者创作意图的理解，应该采用设身处地的测度方法来考察作者的创作意图，这样才能获得《诗》的本义”⑤。孟子认为，只要做到“以意逆志”，泯灭时空差距，就能使自己的体认与文献作者的原意相契合，从而避免断章取义和“以辞害志”，达到对文献的正确理解。

孟子“以意逆志”的文献解释理论对历代学人产生了巨大启示和影响。魏晋时期，王弼建立起了“触类而思”说，倡导在解读文化经典的过程中，“触”文本语言表达与思想主题之“类”，联类以想之，引申以思之，务必在意义阐释上有新的发现。⑥ 到了宋代，二程、朱熹的阐释理论都受“以意逆志”的影响，程颐曾说：“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

① 《孟子·万章上》。
② 《孟子注疏》卷九上，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35页。
③ 《孟子注疏》卷九上，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35页。
④ 朱熹：《四书集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⑤ 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⑥ 周光庆：《王弼老子解释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①] 这种“圣人作经之意”可以通过“以理义去推索”的方法而加以解明。朱熹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圣贤之书”[②]，强调以唤醒体验为契机的心理解释，从而对文献作出创造性的发挥，不断推动思想创新。明代，从陈白沙到王阳明，也一直主张文献阐释要超越文本世界，而直接回到生活意义的世界。他们厌弃经典理解的诸多中间环节，认为“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蔓芜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③] 他们反对训诂考证，主张凭胸臆来诠释文献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清儒李光地曾说过：“天下之道尽于六经，六经之道尽于四书，四书之道全在吾心。”[④] 试图回到一种直接的体证和领悟，用“心”来与文献典籍沟通。

总之，“以意逆志”的思想带有明显的心理体验的色彩，强调后人在语言文字的基础上，超越语言文字，实现“意”与“志”的相互对话和融合，并产生新的意义。

（三）“由字以通词，由词以明道”

通过解释字词而揭示文献典籍的意蕴，是中国古代文献诠释最常用的方法。众所周知，任何文本的文献，都是用本民族的文字书写下来的。语言文字几乎是人们理解文献的唯一途径。伽达默尔曾说：“一切理解都是解释，而一切解释都是通过语言的媒介而进行的，这种语言媒介既要把对象表达出来，同时又是解释者自己的语言。”[⑤] 通过语言文字，人们描述世界，传达思想；通过语言文字，前人把自己的认识和思想形诸于文本，流传后世；同样通过语言文字，后人了解前人，继承传统。可见，弄懂文献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见《二程集》（第一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322 页。

② 《朱熹集》卷四十二《答吴晦叔》，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77 页。

③ 《王阳明全集》卷七《文录四·别三子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26 页。

④ 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之一，见《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上册，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1 页。

⑤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96 页。

典籍的字词含义，对于文献诠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哲人推重语言文字在理解与解释活动中的崇高地位，早在先秦时期就提出的"名实之辨"、"言意之辨"等观念都与语言文字在文献诠释中的作用密切相连。在"名实之辨"的讨论中，孔子认为语言不仅具有描述世界的功能，而且具有调整社会秩序的功能，从而提出"正名"的主张。[①] 墨子一派指出，语言具有指称世界、传递知识、表达思想的作用，语言与世界是可以契合的，故而提出"以名举实"、"名实耦合"的主张。[②] 总之，他们都主张"名"（词语）可以正确反映"实"（事实），"循名"可以"责实"。"言意之辨"亦产生于先秦，主要探究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重点回答语言能否完全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儒家一派认为语言文字完全可以准确地表达人们的思想，提出"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论断。先秦时期的这些思想对后世文献阐释产生了重要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重视语言文字训诂的诠释传统。

重视训诂笺注在文献诠释中的作用，兴起于汉代。但在理论上对此进行阐释则是在宋以后，尤其是清代。宋代朱熹虽然重视文献诠释中的心理体验，但是他并不否认语言文字的作用。他指出在解经过程中"必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其浅深近远，详密有序……大抵解经但可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乃为有益耳"[③]。他还批评在解释文献时"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迷"[④] 的风气，而这恰恰是两宋时期盛行起来的解释方法。由此可见朱熹对文献阐释中文字训诂、释词解义的重视。

清人重考据，文字训诂放在首位，提出了文献解释的语言文字方面所遵循的准则，那就是戴震的一番话："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

---

① 《论语·子路》。

② 《墨子》卷十《经说》。

③ 《朱熹集》卷三十一《答敬夫孟子说疑义》，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33 页。

④ 《朱熹集》卷七十五《中庸集解序》，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957 页。

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①] 归纳起来就是“由字以通词，由词以明道”。戴震多次阐发这一思想：“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②] 又说：“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③] 和戴震一样，钱大昕也极力强调小学文字的重要，他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④] 又说：“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⑤] 从戴震、钱大昕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特别强调文献解释中由文字到训诂再到义理的顺序，并把这看成是文献阐释的原则。在他们看来，六经这样的文献包含着圣贤之道——义理，而六经的载体是文字，要阐明文献中所包含的圣贤之道，必须首先弄懂文字的含义，从而才能真正地搞清文献的旨意。在这样的原则下，他们研究文字学、声韵学和训诂学，利用小学手段研讨经典，取得了令后人赞佩的成就。

（四）排除先见

因为文献诠释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追求原意，故而古人最忌讳在诠释文献时掺杂个人的先见或偏见，主张排除私意，泯灭立场，并以此作为文献阐释的一个重要原则。其实，“中国认知论并非完全否认‘先见’和‘偏见’在解释和理解中的作用，比较典型的一个说法是大家熟知的‘仁者见仁谓之仁，智者见智谓之智’，其中的‘仁者’之‘仁’、‘智者’之

① 《东原文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见《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 1995 年版，第 370 页。

② 《东原文集》卷十《古经解钩沉序》，见《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 1995 年版，第 378 页。

③ 《戴氏杂录·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见《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 1995 年版，第 505 页。

④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纂诂序》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77 页。

⑤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75 页。

'智'，就是解释者所具有的不同'先见'和'偏见'"①。但是，"在中国认识论中，要求排除'先见'和'偏见'，则是一个基本的倾向"②。先秦思想家荀子在《荀子·解蔽》篇中对那种以片面之知为全面之知的"蒙蔽"现象进行了批评，指出："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在荀子看来，人们以"曲知"为"大道"，以"偏见"为"全体"，并以此"先入之见"和"一偏之见"排斥它见，自蔽蔽人，不能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因此必须"解蔽"。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指出历史研究难免存在爱憎问题，告诫人们必须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③，也是要求在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时尽量排除个人偏见。

中国认识论史上这种排斥先见和偏见的思想影响到人们对文献诠释的看法。朱熹对"今人观书，先自立了意后方观，尽率古人语言入做自家意思中来"的读书方法及理解圣人之义的做法非常不满，认为这样做"只是推广得自家意思，如何见得古人意思"，是把个人先见强加到古人身上。而要真正领会经典含义，最可靠的做法是："须得退步者，不要自作意思，只虚此心将古人语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杀向何处去。"④ 陆九渊也说："解书只是名他大义，不入己见于其间，伤其本旨，乃为善解书。"⑤ 明人姚勉也说，"以意逆志"绝"不可以私意逆之也"。并引用张载的话，要"置心平易始知《诗》"，进而指出"夫惟置心于平易，则可以逆志矣。不然，凿吾意以求《诗》，果《诗》矣乎!"⑥ 清人戴震同样也拒斥"先见"，

① 王中江：《"原意"、"先见"及其解释的"客观性"》，《学术界》2001年第4期。

② 王中江：《"原意"、"先见"及其解释的"客观性"》，《学术界》2001年第4期。

③ 《史通笺注》卷十三《外篇·惑经》，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4页。

④ 《朱子语类》卷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0页。

⑤ 《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3页。

⑥ 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三十七《诗意序》，豫章丛书本。

把“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① 当作学者治学的重要境界，指出“凡习于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自觉”②。可以看出，排除私意，完全回到作者本意，是学者们的普遍看法。这表明，在文献诠释上，反对先见和偏见形成了共同的立场，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原则。

第三节 中国古代文献阐释的方法及方法论

中国古代对文献典籍的阐释多种多样，仅就阐释体式而言，就有传体、故体、说体、训体、解体、记体、义体、序体、注体、笺体、疏体、证体、音体、章句体、诂训传体、训诂体、音义体、校注体、注译体、疏证体、考辨体、通释体、广补体、读本体、表注体、集解体、纂集体、翻译体、总论体、考证体、释例体、图解体等。③ 这些文献注释体式，或侧重解释语言文字，或侧重考证、说明、补充历史事实和名物典故，或侧重文献资料的补辑和辨析，或侧重作品的赏析和评价，或侧重分析和发掘文献的思想意义，或侧重考证和介绍文献作者的生平、思想、创作意图和文献编纂的历史背景等。总之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文献进行释词解句、考辨疑误、疏证旧训、补叙故实、发凡起例、阐发思想、解释说明等，以使后人能够准确理解文献原意。中国古代文献解释体式的多样化反映了中国古代文献解释的多角度、多层次。但是，不管文献阐释体式的形式多么丰富，如果我们从方法论的角度细细体察，就会发现，中国古代文献阐释的方法实际上只有三种最具代表性：一是以训诂注疏为主，二是以义理发挥为

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72 页。

② 《孟子字义疏证》卷中《天道》，见《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 1995 年版，第 178 页。

③ 见冯浩菲：《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8～193 页。

主，三是训诂注疏与义理发挥相结合。第一种方法注重解释语言文字，主要是解决由于古今时代的差异所造成的语言文字障碍问题，以便准确理解文献的含义；第二种方法略训诂而重名理，略文句而贵意旨，肯定超越文字训诂的个性化的心灵体察和认知，在承认作者原意的情况下，对文献本义做多元化理解，使后人体察语词解释之外的内容；第三种方法是在训诂注疏基础上进行义理发挥，既能“回归原意”，又能“意义创新”，从而不断推动学术发展。

一、以训诂注疏为主的文献阐释方法

这种文献阐释方法以文本为中心，注重对经典的文字诠解与梳理，解字释词及训诂考证是其特点。对文献的语义训释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见于记载，如《论语·颜渊》：“政者，正也。”《孟子·梁惠王下》：“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老子》：“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①]《荀子·非十二子》：“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贵贤，仁也；贱不肖，亦仁也。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②] 等等，皆是此类。到两汉时期，随着经学的发展，训诂学也空前兴盛。由于经书之文本多为先秦古籍，到了汉代，语言和文字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要读懂先秦典籍，必须借助于文字音义训诂。

汉代今古文经学并立，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对待先秦典籍时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今文经学虽然没有完全抛弃训诂，但其对经典的阐释比较漠视文本，而主要是着眼于经文大意，往往是就原典借题发挥，阐述个人见解。而古文经学则讲究文字训诂，明察典章制度，力图申说经典的原始意义，采用的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由于古文经学家紧扣经典文本而进行考据性作业，以语言文字为基础展开自己的阐释工作，能够对古籍作出比较正确和合理的诠解，故而他们的训释就成了后人理解先秦古籍的重要参考。

汉代古文经学家所开辟的以考证字词、讲解句意、诠说典故、举指出

① 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2页。

② 《荀子·非十二子》。

处为主的文献阐释方法，为历代坚持实事求是态度对待古代典籍的学者所继承。清人崇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订的治学风格，故用“汉学”命名自己所从事的经学研究。[①] 他们普遍认为，汉儒去古未远，解说经典要比宋儒可靠，且汉儒对经典进行解释，家法师承，不易走样，最得经典原始之真。于是他们高扬汉帜，识字审音，遵循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意，由文字训诂以求经书义理的文献阐释方法，认为训诂明义理自明，反对主观武断发明经义，逐步发展出一套以“解蔽”、“闻道”为根本目的，以语言文字训诂和名物典制考订为途径，以重视证据、实事求是为原则，以博通实证、严密推理为方式的文献诠释方法论体系，解决了文献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典籍的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成就巨大。

就汉代以训诂注疏为主的文献阐释方法来讲，郑玄对先秦文献内容的诠释最具代表性，他主张文献阐释的目的是“念述先圣之元意”[②]，强调阐释经典就是要探求经典作家寄寓的原意，揭示经典文本蕴含的本义。他解释先秦典籍，特别是注《三礼》，笺《诗经》等，在方法上为后世学者树立了榜样。从郑玄对文献典籍的具体解释来看，以下方法是他常用的：

(1) 随文释义，即根据上下文语境来解释文献的言语含义。郑玄善于利用语境，循文立训，注释特定语境中词的涵义，以丰富的训诂实践确立了据语境随文释义的文献阐释方法。如《泰伯》中云：“曾子曾言：‘君子所贵乎道有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对于此句中的“道”，郑玄解释云：“此道，谓礼也。”所谓“此道”，即说明是该句中“道”的临时义，而绝不是其基本义，体现了郑玄文献解释方法的灵活性。

(2) 揭示句意。在随文释义的基础上，郑玄还揭示句意，甚至言外之意。他往往采取以下四种方法揭示句意：一是概括提炼句意，二是揭示内在逻辑，三是揭示心理动机，四是指明喻义。[③] 比如指明喻义，对《论语·八佾》中“绘事后素”的解释，《论语集解》云：“郑曰：‘绘，画文

① 刘师培：《左庵外集》卷九《清儒得失论》，见《刘申叔遗书》（下），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35～1540 页。

② 《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

③ 匡鹏飞：《〈论语〉郑玄与朱熹解释之比较》，《孔子研究》2001 年第 4 期。

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也。'”

(3) 阙疑传信。汉代及后世文献学家无不遵循多闻阙疑的原则来注释文献。郑玄在解释古代文献时也多用此法，从不擅改经典。张舜徽先生在《郑学丛著·郑氏经注释例》中就探讨了郑玄的“阙疑例”，谓郑氏注书，于所不知，辄用“未闻”、“未之闻”、“未得尽闻”、“未闻孰正”、“未闻孰是”等字样来表示。其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自身无法搞清典制之真相，故将疑问留待后世解决，绝不强作解事，疑上加疑。

(4) 分析篇章结构。郑玄注释经典，除了涉及具体字词语句的训诂外，也对文献典籍的篇章结构等内容进行揭示，从总体上全面驾驭文献主旨，为后人在深层次上理解文献起到了重要作用。郑玄笺注《诗》，在对《诗》的篇章划分上常常与《毛诗》不同，用“故言”表示，“故言”之后就是《毛诗》的章节分配，如《周南·关雎》写道：“《关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即毛公原分三章，而郑玄分为五章。郑玄把《关雎》分为五章，每章最后一个字分别是逑（幽部）、求（幽部）、侧（职部）、友（职部）、乐（霄觉通韵），从音韵角度看非常讲究押韵，声音圆美。如果按《毛诗》分为三章则不押韵，使后人无法体会诗歌的美感。由此可见，郑玄对诗有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并且注意到诗作为一种咏唱形式，需要音韵和谐、富有美感。郑玄还对《诗》的内容进行点评，如《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郑笺云：“此章说庄姜容貌之美，所宜亲幸。”郑玄善于从诗篇入手，分析篇章结构，概括具体章节内容，有利于系统地阐释诗意和从总体上把握诗的精神。

(5) 补释文题主旨。诗的题目是诗的“眼”，理解了诗的题目及诗题的背景，就能更好地揭示诗的主旨，解释诗的内容。《毛传》在诗序中点明文章的主旨内容，郑玄在此基础上对文题进行补充阐释，进一步揭示诗之主旨。《邶风·雄雉·序》揭示诗的中心是“怨”，郑玄在行文笺释中阐述是“女怨之辞”，更具体地点明怨的主体，阐明诗的中心旨意是“男旷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把妇人念夫的心绪展露无遗，更为准确。诸

如此类的阐释，在郑笺中常见。对文题主旨补释是需要诠释者深入理解并有新的发现才能做到的，郑玄在对诗、传透彻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补释，准确地阐明了诗的意蕴。

（6）解释名物制度。《礼记》中记载有大量的典章礼制。郑玄在注释中贯通殷周秦汉的文化传统及其蕴含的宗法、婚姻、祭祀、朝聘等制度，根据社会文化语境，对占卜、祭祀、器具、婚嫁、朝聘、宫室、建筑、饮食等名物制度进行阐释，析名物之殊，辨典章之异，不仅能够准确释义，而且体现出训诂的文化阐释功能。

（7）说明史实典故。郑玄在阐释《礼记》的过程中，还常常结合名物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训释其义，为后人展示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

郑玄的这套文献阐释的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唐人注释典籍，旨在解释和疏通文本的基本意义，大多也把解释的重点放在了校勘文字、注音、释词、考释名物和典章制度等方面，在汉人文献阐释方法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就校勘文字来讲，孔颖达领衔主修的《五经正义》，其中不乏校勘文字的内容。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文字校勘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颜师古注《汉书》，非常重视校勘和整理《汉书》的文字。李善注《文选》，亦兼校勘文字。可以说，在古籍阐释中校勘文字受到唐代学者的普遍重视。除校勘文字外，唐代学者还能够正视语言音读产生变化的事实，能够正确认识文字的读音与意义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能够重视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并自觉把它运用到古籍注释之中，成为阐释古籍的重要手段之一。唐代学者还在文献释义方面，诸如训释词义、解说名物、说明典章制度、通释串讲语义、概括章旨和段旨、解题等做了发展。有的文本阐释中还包含有考证山川地理、补充史实等内容。唐代的文本释义，侧重揭示文本的基本内容，对哲理的思辨、义理的发挥不太注重。

历史发展到清代，随着宋明理学的崩解，清儒弃虚务实，力矫元明学风空疏之弊，主倡研究经史百家，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择善而从，故而清人治学博大兼综。在文献阐释方面，清人主张重返未经后儒改造的原始文献典籍，做出最符合文献文本原意的解释。基于这样的想法，清代学者首先通过辨伪、校勘、辑佚等手段，确立文献的真伪及本来面

目，然后通过训诂学的方法，识字审音，严格以文献文本为依据，逐层地进行语言解释，以探求本义。王念孙训释《荀子》，就是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即破假借、据古训、因声求义、审文例、审词例、审本书、考异文等等，广征博引，以求得对《荀子》的正确理解。戴震建立思想体系，采取的也是回到经典文本，发掘经典本义，从原始经典出发。戴震曾说："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①] 又说："不求诸前古贤圣之言与事，则无从探其心于千载下，是故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②] 由此，戴震指出文献阐释的方法论："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藉，辨言则舍其立言之体无从相接以心。"[③] 如果我们归纳一下戴震的文献解释方法，它实际上是"离词"、"辨言"、"以心相遇"、"闻道"四项工作依次递进的过程。"离词"即考释文献文本词语的组合关系和语境意义，"辨言"主要是分析文本的表达方式和逻辑结构，这二者是整个文献诠释的基础和前提。"以心相遇"类似于孟子的"以意逆志"，即以设身处地的体验方式理解作者，这是整个文献诠释的关键。而"闻道"则是文献诠释的归宿，即把握经典中的圣人之道。

总之，以训诂注疏为主的文献阐释方法是紧紧围绕文本而展开的，在审音识字的训诂学基础上，对文献典籍进行解释，凡解必不脱离文本，为后人正确利用文献扫清了障碍。

二、以义理发挥为主的文献阐释方法

以义理发挥为主的文献诠释方法是一种"六经注我"式的方法。这种

---

① 《戴氏杂录·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见《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505页。

② 《东原文集》卷十一《郑学斋记》，见《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407页。

③ 《东原文集》卷十一《沈学子文集序》，见《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93页。

诠释方法滥觞于先秦，先秦时期"道不可言"、"言不尽意"的观念开启了各种以审美体验为中心的阐释学理论，即强调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将阐释变为一种超越作者、超越语言文字的纯粹的个人体验。他们把文献理解成一个开放的文本，"诗无达诂"，承认对"道"的每一种特定领域的领悟都有其合理性。

这种观念到汉代今文经学这里又得到发展，今文经学对今文文献的阐释，不太注重文本的意义，而是着眼于阐述个人的见解，文本只是成了证明个人见解的工具。其形式是阐释单行，不附于经文之下。在汉代，董仲舒对经典的注释最能代表这种以义理发挥为主的文献阐释方法。

董仲舒解经是为了"通经致用"，为了达到构建自身思想体系的目的，他有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1) 深察名号。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正名的传统，在解释方法中，非常重视名号问题。《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专门讨论名号的依据及其意义。名号问题本来是逻辑或符号问题，但是在董仲舒这里，在名号可以辨别是非之情的前提下，走向了政治解释。《深察名号》所谓的"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深察王号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黄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①]。董仲舒以代圣立言的身份把他对于孔子所记载、隐含的"天意"的解释融贯在经书之中，成为一种重要的文献解释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深察"，也就是充分挖掘名号所指陈的事物以外的涵义，这种挖掘实际上是从自己的思想、学术视野出发，寻求现实社会所需要的蕴涵于经书中的微言大义。

(2) 辞指论。董仲舒非常重视对《春秋》辞指的分析，徐复观认为董仲舒所说的"指"，"是由文字所表达的意义，以指向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意义；由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大概不出于《公羊传》的范围。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指'，则突破了《公羊传》的范围，而为董仲舒所独得，这便形成

①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第三十五》，见《董仲舒集》，学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8 页。

他的《春秋》学的特色"[①]。董仲舒对《春秋》辞指的研究，主要基于他提出的《春秋》之道有常变的见解。《春秋繁露·竹林》云："《春秋》之道，因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②]与之相适应，他认为《春秋》的文字有常辞和变辞两大类。常辞又称正辞，是从经、常的方面论说《春秋》，直接正面地体现《春秋》的道义法则。常辞所表示的内容，被董仲舒称为"《春秋》之法"、"《春秋》之道"和"《春秋》之义"。与常辞相反，变辞则从权、变的方面加以言讲，变化多方，不易明白。他把变辞分为三类：一是因事物本身发生了变化，常辞已不足以明变，而需采用变辞为说。二是常辞不足以概括所言的全部对象，而需采用变辞而补其不及。三是为亲者、尊者、贤者讳而采用的变辞。[③]这也就是所谓"《春秋》无通辞"、"《春秋》无达辞"。因为《春秋》有变辞，就为自己灵活地借经言说提供了文本学的根据。这样的结论，离不开董仲舒以变通的精神训解《春秋》的释经方法。针对《春秋》辞例的变化规律，他提出了两种解释方法：一是"见其指不任其辞"，就是不受文辞的束缚而自由发挥己说。二是"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就是紧紧抓住文本特定表述所启发的思路和留下的空白，广泛联系，多方类比，以尽天下道理。[④]

汉代形成的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文献阐释方法到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学者们为了新思想的产生和发挥，以"自得"、"体认"为基本要求，继续利用文献阐释构建理学思想体系。自得的前提是怀疑，自中晚唐以后，疑经惑传的思想萌芽便产生了，刘知幾《史通》的《疑古》、《惑经》两篇，打破了经书不可怀疑的神圣性。啖助、赵匡、陆淳以及韩愈、李翱等治经，摆脱章句之学的影响，着重于义理的阐释。宋代学者讲求义理，更是从疑经尤其是怀疑汉儒的注疏入手的，继而抛开汉儒的注疏和解经方法，

---

①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② 《春秋繁露·竹林第三》，见《董仲舒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③ 黄开国：《董仲舒公羊学方法论》，《哲学研究》2001年第11期。

④ 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通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84页。

自己来解经。清代学者皮锡瑞借陆游的话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①] 宋学作为一种解释经典和治学的方法，是对汉学改造的结果。宋儒认为汉唐训诂注疏的诠释方法只重视一事一物的解释，使得儒学知识系统中的价值信仰被淡化，而且埋头故纸，远离社会实践，违背了儒者“内圣外王”的基本人文精神。宋代理学的根本目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造儒学，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学说体系和儒家人文信仰。这种重建是通过对儒家经典内涵的重新发现和重新诠释来完成的。宋儒通过解经、笺注等看似传统的方法，不仅阐发了经典文本中许多重要的范畴和命题，而且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命题。他们以己意说经，阐发经书中的微言大义，构建自身的思想体系，义理之学逐步取代了汉唐训诂疏注之学。

以五经为本是汉学解经的传统，宋学要想构筑不同于前人的思想体系，除了转变治学思路以外，还要在文本依据上有所突破。实际上，自中唐始，儒家经典诠释的重心就开始逐渐由经向传、记转移。至宋代，朱熹极力表彰《大学》、《中庸》，推崇《孟子》，使之与《论语》并行，诚如蔡方鹿所言：“（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经典作出全面解释，首创‘四书’二字，建构起以四书义理之学为主体的新经学思想体系。”[②] 朱熹等人把研究重心由五经移向四书，是因为四书能够为他们所建立的新的思想体系提供充足的资料。朱熹作《四书集注》，重在发挥义理，具有以往经学史上不曾有过的新的范畴、新的观念及新的解释方法，使四书学正式成为儒家十三经经学体系中可与五经学诠释体系并驾齐驱的又一大经学诠释体系。朱熹讲学民间，注释四书，在社会上开启四书的新传统，扩大了经书范围，掀起了重新注释经书的文化运动，为儒家经典诠释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空间。

陆王心学对经典文献的解释与程朱理学走的道路又有不同。虽同为宋学，同样注重对经典的义理发挥，但陆王心学更强调通过内心体验来体察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6页。

② 方眉：《“注释、诠释与建构——朱子与四书”国际学术会议综述》，《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

圣人之心，领会经典精义。陆九渊对于“沦溺于训诂、声律之间”[1]的治学方法非常不满，认为此乃“只用心于枝叶，不求实处”[2]。他认为永恒、普遍的法则在于人的内心，普通人的心与圣人之心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是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3]。因此，不立文字，内求于心，乃治学之本，掌握此本，便可掌握圣人之心，不必沉溺于读书解字，“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4]，经典只是发明本心的手段。通过心之体验诠解圣人经典、体察圣人精义，这是与朱熹的最大不同。陆氏强调“尊德性”，朱熹相对重视“道问学”，这一分野，影响直到清代。

三、训诂注疏和义理发挥两种方法的融合

训诂注疏和义理发挥作为经典诠释的不同方法，前者关注名物训诂，后者注重义理阐发，看起来是对立的，而事实上，这两种方法往往是交融在一起，密不可分的。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献诠释是以“回归原意”与“意义创新”的统一为最终归宿的。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的《孟子》诠释，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东汉末年赵岐的《孟子章句》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孟子》注本，是《孟子》注释的早期代表作。受古文经学注释倾向的影响，《孟子章句》在注释时同样看重字义训诂，贴近字义以求经典原意。同时也将自己的政治理念融入《孟子》诠释之中，并开始尝试对《孟子》中的“心”、“性”等哲学问题进行初步探索。有学者研究表明，赵岐在《孟子章句》中对《孟子》中的篇章、文字、名物等难懂之处都进行了注释，同时又以经解经、

---

① 《陆九渊集》卷三十一《问制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3页。
② 《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44页。
③ 《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44页。
④ 《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5页。

博将子史、诠释文意，训诂之外，不废句意义理的阐发。[①] 如《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赵岐除解释“沼，池也”外，在本章末尾章旨中又进一步发挥曰：“圣王之德，与民共乐，恩及鸟兽，则忻戴其上，太平化兴，无道之君，众怨神怒，则国灭祀绝，不得保守其乐也。”这一章旨实际是对正文意义的引申，以隐晦的手法表达了自己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和政治理想。与赵岐不同的是宋代的朱熹，由于宋代是一个思想创新的时代，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之《孟子集注》，上承孔孟义理传统，借《孟子》思想而下己意，发挥其中微言大义，顺应学术发展潮流，使之成为建立博大精深的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作品，体现出勇于创新的学术品格。在发挥义理的同时，朱熹也重视文字训解，明确表示：“注疏如何弃得”[②]。“某寻常解经，只要依训诂说字”[③]。他在论证自己的理、气、心、性等哲学理论问题时，从来没有脱落章句、凭空臆造来理解经典，无论是解释词句还是阐发义理，都力求符合原意，简明扼要。赵岐重视文字训诂而不忘义理阐发，在“回归原意”的基础上进行“意义创新”，朱熹重视义理阐发而不弃文字训诂，在“意义创新”时兼顾“回归原意”。清代乾嘉时期，在考据学风盛行的情况下，作为思想家的戴震，撰作《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建立了“由训诂以明义理”的诠释原则，力图通过文字训诂重建孔孟的义理体系，阐发经典的原始意义，在批判宋儒的“空疏”中发明新“微言”，达到社会批判的目的，从而成为《孟子》诠释史上“追求原意”与“阐发义理”相统一的典范。

文献诠释方法的产生总是与相应的时代特点和诠释理念相对应的。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产物，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性规定，人们在注释文献典籍时，必然要受到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思潮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自己的学术

---

① 陈书铨：《试论东汉赵岐〈孟子章句〉之诠释方法》，《湖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②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91页。

③ 《朱子语类》卷七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12页。

传承、知识结构、政治立场、道德观念、情感性格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文献的诠解变成特定时代下的文献的诠解。黄俊杰从诠释学的角度把它称之为诠释者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无论有多么不同，都有明显的现实指向，黄俊杰说：“中国文化中的诠释学传统，具有强烈的现实取向，它不是虚无缥缈的形上学的玄思，而是与人民共其呼吸、哀民生之多艰的政治学，它更是可以使人厄穷独处知道而乐的生命哲学。”[①] 把整个中国古代文献注释史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观察，便会发现，由于时代的变化，政治、经济、思想、学术等对于经典文献诠释的需求不同，使得同一经典文献的诠释，因时因人因地而异，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阮籍在《通易论》中所说的“应时当务，各有攸取”，很形象地道出了这一道理：任何一个文献诠释者都是以“时务”决定其“攸取”的。汉武帝时代，积极入世的儒家学说受到统治者大力提倡，经学为政治服务成为当时的社会需求，于是促成了今文经学的兴起。可是，由于今古文学派之间的矛盾，今文经学依附政治、不拘字句的经典文献诠释风格受到古文经学派的抵抗和批判，于是逐渐形成了重视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和追求经典原意的文献诠释特色，对今文经学家的文献诠释进行政治和学理上的双重校正。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不同的政治、学术需求使得南北文献阐释风格各异，北朝继承古文经诠释传统，呆板僵化，由“核其根本”发展到唐的“疏不破注”。而南朝却在玄学兴起、佛教兴盛、思想活跃的学术背景下，产生了经学文献诠释求异求变的新动向，从学术脉络上看，这既是今文经学的延续，又是新形势的逼迫。然而，汉以后佛、道两家的发展，对儒学形成极大的冲击，到宋代，这种冲击愈发明显，再加上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的变化以及五代以来混乱动荡所造成的纲常秩序的破坏，使得宋代思想家不得不冲破“疏不破注”的经学束缚，通过一场儒学的改造更新运动，重建儒家伦理秩序。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非要对儒家经典“另加新解说不可”[②]，就这样，通过重新解经，发明经旨，探究义理，建立起了理学

① 李清良：《黄俊杰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类型、方法与特质》，见洪汉鼎主编：《中国诠释学》（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33 页。

新体系。明清易代，促使清初知识分子开始由反思政治得失而推原学术精神，由历史的批判总结而进行学术的批判总结，理学的“轻凭臆解”、寡于治道受到抨击，经义不明之害政，被当作易代之际的痛切教训而屡屡提起。于是关注现实、博求征实的学风兴起，清代学者重新阐释儒学的学术宗旨，辨析、修正道学诸命题，承担了创新经典的艰巨任务，他们遵循“由训诂而明义理”的解经宗旨，笺传注疏，在回归经典原意的旗帜下，构建自身的思想体系。

可见，由于文献的诠释者处于与文献的作者不同的历史情境中，任何文献的诠释都是诠释者从现有时代出发所作出的对于文献的独特的理解。对文献的解释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解释者从自己的历史性出发去解读文献，并在与文献的沟通中创生意义的过程。在这里，现在与过去交融，今人与古人对话。处于不同时代的文献诠释者基于自身所生活的特定时代以及对文献的富有个性的理解，进行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来回应自身所处时代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或为了安顿个人身心，或为了淑世、经世乃至救世。诚如黄俊杰所言：“他们在注释经典的事业中，安顿他们的生命（所谓‘安身立命’）。换句话说，他们不只是经典的‘观察者’，更是经典中的价值的‘参与者’与‘实践者’。”① 文献诠释不仅使经典文献代代承续，而且使经典文献代代发展，“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文化就是在继承与创新的过程中绵延不绝、日益发展的。

---

① 李清良：《黄俊杰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类型、方法与特质》，见洪汉鼎主编：《中国诠释学》（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七章
“求实致用，证经考史”：金石学与文献考证的成就

整理文献，必涉及对文献的考证，自先秦到今日，莫不如此。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史上，文献考证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大批学者，穷一生之精力，对传统文化典籍的方方面面进行疏通、清理。他们精通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金石等学问，通过校勘、辨伪、辑佚、考订、注疏、补苴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重要文献，进行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的考证，使很多错讹遍布、难以卒读的文献基本恢复了本来面目，并大体可以阅读研究。考证之学，有功中国学术甚巨。陈垣先生曾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①

文献考证，涉及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版本、目录、避讳、天文律历等诸多专门知识，这些专门知识在文献考证中的运用，本书在其他章

①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60页。

节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此处所言文献考证，主要以金石学为例进行考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第一，以金石考证文献，在古代文献整理中占据重要地位；第二，金石学启导近代“二重证据法”，对近代考据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三，金石学理论与方法对近代考古学具有重要贡献。

“金石”二字初见于先秦典籍，《墨子》所谓：“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① 《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称：“故功绩铭乎金石”，高诱注：“金，钟鼎也；石，丰碑也。”其意即是把丰功伟绩以文字形式刻在钟鼎、石碑上，以传之子孙、垂之不朽。后人把研究这方面文字的学问称为金石学。此学“滥觞于汉，历魏、晋、六朝、隋、唐而稍演进。惟见其于时之著录者，大抵一鳞片甲，犹未足以言学也。至宋刘原父、欧阳公起，搜集考证，著为专书，而学以立”②。“金石之学始于宋”③ 成为学界共识。元明时期，金石学进入沉寂期，至清代进入极盛期，王国维云：“自宋人始为金石之学，欧、赵、黄、洪各据古代遗文，以证经考史，咸有创获。然涂术虽启，而流派未宏，近二百年始益光大。”④ 据容媛《金石书录目》统计，自宋至清金石著作共 969 种，其中仅清朝就有 906 种。陆增祥所谓：“著录之家，本朝极盛，荟萃成书，奚啻百数，有限以时代者，有限于一省者，有限以一省并限以时代者，有限以一郡者，有限以一邑者，有限以域外者，有限以名山者，有限以一人者，有限以一碑者，有别以体者，有叙以表者，有绘以图者。其上追秦汉，下逮辽金，近自里闾，远迄海外。总括而考证之者，亦不下数十家。或宗欧、赵之例，著目录加跋尾；或宗洪氏之例，具载全文；或勘前人之讹，或补前人之不足。”⑤ 因此朱剑心称其“流派之宏，著述之富，更远过

---

① 《墨子》卷四《兼爱下》。

② 朱剑心：《金石学》序例，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

③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山左金石志序》，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97 页。

④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八《齐鲁封泥集存序》，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55 页。

⑤ 陆增祥：《金石续编》跋，《金石萃编》第五册，中国书店 1985 年版。

于宋人"[1]。要之，自宋至清，金石之学一直在文献考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节 金石分类的思想

关于金石学的分类研究，吴怀祺先生指出："分类的研究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它对于金石成为专学有着特殊的意义。"[2] 此论甚确。就金石学而言，如何将大量钟鼎彝器及石刻文字进行分类整理，实是该学问的首要大事。只有正确进行分类，才有助于对金石文字展开深入的研究。正因如此，有成就的金石学家大都注意对金石进行分类排比，从而产生了一系列金石分类的思想。

一、对金石学研究对象的认识

金石之所以需要分类，是因为金石学的研究对象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器物之间差异甚大，只有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才能有的放矢，取得成效。纵观金石学的发展历程，历代学者对金石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呈现出不断深入的趋势。

当金石学在宋代兴起之初，学者对金石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比较简单，因而研究的范围就显得相当狭窄。马衡指出，金石学的研究对象"最初仅限于器物及碑碣，其后乃渐及于瓦当砖甓之属"[3]。易漫白则指出，宋代金石学，"从对象来说，则基本上只有金（铜）、石（包括玉）两种，而且铜器多为先秦的，石几乎专指石碑"[4]。如吕大临的《考古图》著录青铜器及

① 朱剑心：《金石学》序例，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吴怀祺：《金石、金石学与〈通志·金石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 年第 1 期。

③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2 页。

④ 易漫白：《考古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9 页。

玉器224件，王黼等的《宣和博古图》著录古器839件，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著录钟鼎彝器511件，王俅的《啸堂集古录》著录汉唐彝器347件等。宋代的金石学虽以青铜古器和石刻碑碣为主，但在其他方面也还是颇有开拓之功的，如洪遵的《泉志》、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龙大渊的《古玉图谱》等在钱币、玺印、古玉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到了清朝，金石学进入繁荣期，学者们对金石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不断深化，遂使金石学的研究范围得到极大的扩展。如清人冯云鹏、冯云鹓称：“有器不必同于商周，而有象可绘，有铭可录，有年月可志者，若铜，若洗，若镫，若炉，若釜甑，若镳斗，以及浮屠造象，田野铃铎之微，皆可籍以想见古人制作精意。”① 显然，这比以青铜古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宋代金石学在研究范围上更为广泛。

朱剑心认为，因为石刻中的刻石、碑碣、佛教造像等被清代学者认为“观之可以见历代风气之变迁焉”②，故而加以著录、研究。与此同时，有许多刻于桥柱、井阑、柱础、神位、石人、石狮、石盆等物件之上的文字，也被视为“郑莒附庸”，而为学者所甄录。③ 在此风气熏染之下，陶器、瓦当、玺印等物也逐渐引起学者重视，从而多有专书著录、论述。如朱琰的《陶说》、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程敦的《秦汉瓦当文字》、钱泳的《唐赐铁券考》、端方的《陶斋藏砖》以及《陶斋藏瓦记》等就是这方面的著作。

清代还出现很多研究钱币的专书，如戴熙的《古泉丛话》、倪模的《古今钱略》、沈魏皆的《泉宝所见录》、张崇懿的《钱币新编》等。钱币之所以受到重视，今人丁保福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详考历代钱币，可见古帝王开物成务之功，裕国利民之意，而奸雄僭窃、变乱典章、家国存亡之道亦于是乎在。所以周官八政，货居其一，列史食货有志，洵民生日用最大之政也，试将此图偶一展卷，则古今兴亡，宛然在目，英雄成败，大抵如斯，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上下数千年历史，尽

① 冯云鹏、冯云鹓：《金石索》，“杂器之属”条。

② 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80页。

③ 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页。

在此区区阿堵中。”① 钱币研究所折射出来的是专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像，关乎生民休戚、国家兴亡，清人研究钱币，蕴含的当然是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丁保福所论无疑是适用于清代学人的。

清代金石学研究者在扩大研究对象的同时，还拓展了研究对象的时代范围。如朱剑心指出：“欧阳修《集古录》，近收五季。明初距今，将六百年，不啻欧公之视六朝也，岂可以近而贱之？乾嘉诸子，如毕沅、王昶，皆以赵宋为断；至阮元、孙星衍，始推广其例至元末；翁方纲辑《粤东金石略》兼收明碑。”这是向下拓展研究空间。又“按书学自北宋以来，惟重晋唐，未有言及北朝者。自清安吴包世臣作《历下笔谭》，而世始知有道昭其人。风会所趋，直至清末南海康有为更推衍其说，而风益炽。于是北朝碑版，家喻户晓，几莫不人手一编，实则未免矫枉过正耳”②。这是向上拓展研究空间。

清人从事金石研究的有识之士拓展金石研究的时代范围，尤其是向下延伸，意义重大。在这方面，钱大昕最具代表性，他曾说：“予谓欧、赵之视唐五代，犹今之视宋、元、明也。欧、赵之录，近取诸唐五代，今去欧、赵七百余年，尚守其例不变，是责唐之司刑以读赞侯之律，宋之司天以用一行之算也。可乎哉？故予于宋、元石刻，爱之特甚。”③ 研究金石，以古为尚，是一种风气。打破这一风尚，是清人金石研究的一大功劳。钱大昕在《金石文跋尾》中收碑 860 余通，其中元碑达 123 通。他对元代碑刻进行了精审的考订，一一指出其史料价值，为人们进一步利用这些石刻开辟了道路。经过钱大昕的发掘，元代金石资料的价值受到人们的重视，自此，中外学者对元碑的考释，成果显著，解决了元代历史上的很多问题。④

---

① 丁保福：《历代古钱图说序》，《历代古钱图说》，上海书店 1986 年版。

② 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61～262 页。

③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金陵石刻记序》，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99 页。

④ 参见王记录：《钱大昕的史学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58～259 页。

在围绕金石学研究对象展开分类研究的过程中，大致形成了三类金石著作，即以钟鼎彝器等器物为著录对象的金文著作，以碑碣等为著录对象的石刻著作，以及既著金文又录石刻的金石文著作等。而著录钱币、瓦当、铁券之类专书的出现，则是此三类体例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本来是以三代青铜彝器铭文和历代石刻碑版文字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其研究的对象愈来愈多，领域也愈来愈广，成为学术研究的一支生力军。

二、对著录体例的探讨

一件金石器物，大致包括出处、藏家、形状、款识、尺寸、重量、容量、文字等方面的内容，对于这些内容，哪些是重要的，需要予以著录的，学者们的看法各不相同，由此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著录体例。朱剑心曾将宋人的金石著录体例分为六类，所谓：“一曰存目，二曰跋尾，三曰录文，四曰分地，五曰分人，六曰纂字。”① 对于清人的金石著录体例，朱剑心又将其分为存目、跋尾、录文、摹图、纂字、义例、分地、分代、通纂、概论十类。② 然考其叙述，可发现朱剑心把金石著录体例与金石分类体例混在了一起。事实上，就石刻著录内容而论，主要有图录（摹图）、录文、目录等体例。

所谓图录，是指描摹古器的形状，同时对古器的相关情况进行介绍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大小比例、铭文、出处、形制等”③。而其代表则是吕大临的《考古图》与王黼等的《宣和博古图》，此即王国维所谓：“与叔考古之图，宣和博古之录，既写其形，复摹其款。”④ 吕大临《考古图》共10卷，著录了秘阁、太常、内藏等官方及河南王氏、开封刘氏等私人藏品224件，其中古铜器211件、玉器13件。每件都描摹其形，同时将该器物

① 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

② 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1页。

③ 易漫白：《考古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④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宋代金文著录表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的出处、藏家、款识、尺寸、重量、容量等标出，体例严谨。不足之处是所定器名错误较多。王黼等《宣和博古图》共30卷，著录了宣和殿所藏古器839件，著录中皆采用描摹图录的方式，故“其书考证虽疏，而形模未失；音释虽谬，而字画具存。读者尚可因其所绘以识三代鼎彝之制、款识之文，以重为之核订”①。此外又有张九成《续考古图》等。元代有朱德润的《古玉图》2卷，著录所见璧、环、带钩、佩等古玉40件，描摹有玉的形状，同时又标出了玉的尺寸、玉色等。清代这方面的著作甚多，著名者有梁诗正、王杰等奉敕编纂的《西清四鉴》，包括《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宁寿鉴古》。其中《西清古鉴》40卷，共收商周至唐代彝器1529件，著录数量远超《宣和博古图》，尤以商周彝器为多。另附有钱录16卷，其体例仿《宣和博古图》，每器皆描摹形状，同时记下该器的高度、重量，并且附以铭文，间有考证。不足之处是有伪器间出、器图比例失真、考证时有错误等。《西清续鉴甲编》20卷，附录1卷，共著录商周至唐代彝器及玺印等共975件。是《西清古鉴》编纂完成后，清统治者续得的器物。《西清续鉴乙编》20卷，著录藏于盛京宫廷的先代彝器共913件。《宁寿鉴古》16卷，著录宫廷所藏古彝器600件，镜鉴101件。三书体例皆依《西清古鉴》。在官方的带动下，清代自乾隆时期起掀起了一个图录古器的热潮，此即王国维所言：“海内士大夫闻风承流，相与购致古器，蒐集拓本。”② 如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编》2卷，收录青铜器共121件，每器绘其形制，摹录其铭文，并附以释文。吴大澂的《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不分卷，收录古器133件，自绘器物形状等。图录之作，形象具体，使后世之人因图而见古器物之外貌，对于保存器物形制具有重要作用。

所谓录文，即具录金石碑刻全文，并对有些金石文字进行摹写与考释。金鼎彝器方面，代表作为王俅的《啸堂集古录》、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此即王国维所谓：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五，《宣和博古图》条。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国朝金文著录表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啸堂集录》，薛氏《法帖》，但以录文为主，不以图谱为名。”① 王俅的《啸堂集古录》2卷，共著录铜器铭文345种，其中有印章37枚。该书体例上为摹写铭文，下为楷书写出，元人干文传认为“每列一器，必模其款识而以楷书辨之，刻画甚精”②。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20卷，共著录511件古器，其方式是对钟鼎彝器款识依样摹写，然后写出释文，并予以考释。清代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10卷，收商、周、秦、汉、晋等青铜彝器共550件，取法薛尚功的体例，摹录铭文并进行考证。吴荣光又有《筠清馆金文》5卷，收青铜器267件，采阮元体例，欲以补正阮书。吴式芬的《捃古录金文》3卷，收商周青铜器1334件，每件器皆摹其铭文，铭下释文，间有考证或采录他说。碑刻方面，宋人洪适《隶释》27卷，其一至十九卷著录古碑拓本192种，第二十卷录《水经注》中碑文，第二十一卷至二十三卷录《集古录》中碑文，第二十四卷至二十六卷录《金石录》中碑文，第二十七卷录《天下碑录》中碑文，“每篇依其文字写之。其以某字为某字，则具疏其下；兼核著其关切史事者，为之论证，称精博云”③，是录文之作的佼佼者。到清代，清代顾炎武有《求古录》1卷，黄本骥有《古志石华》30卷，端方有《陶斋藏石记》44卷，吴鼎昌有《慕汲轩志石文录》1卷，皆辑录石刻文字。录文之作，照录金石原文，有些保存了文字原貌，并一一释解，使后人得见古代文字写法，其录写全文，即便在金石器物磨灭销毁之后，金石之文也能传之后世，史料价值极高，是历史研究者必资利用的资料。此有功于文字及文献研究甚巨。

所谓目录，就是为金石编目，类似于书籍目录。金石目录一般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录名式，即只著录金石碑刻的名称，略及铸器立石的时间、撰者、书法以及所在地点，不作任何评论。一种是跋尾式，对金石碑刻的内容、文字、撰者、书者、价值等方方面面进行研究、评判，大致相当于书籍目录的提要，故又称解题式。录名式有宋代郑樵《通志·金石略》，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宋代金文著录表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② 王俅：《啸堂集古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3页。

③ 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著录历代吉金碑刻名称，数量浩繁。清初曹溶有《古林金石表》1卷，列碑帖之目800余种；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8卷，著录三代至元代金石文2320通；吴荣光有《筠清馆金石文字目》2卷，卷目2卷；吴式芬有《捃古录》20卷，著录碑刻之目15230种，被朱剑心评为“自有目录以来，未之有也”。近人缪荃孙有《艺风堂金石文字目》18卷。凡此诸种“皆金石兼采，特石多于金耳”[①]。专录碑目之书，有孙星衍、邢澍的《寰宇访碑录》20卷，所录碑目约有8000种之多。这些都为人们有效利用金石考证文献、研究历史提供了极大帮助。和录名式目录相比，跋尾式目录的价值更高，王国维曾说：“欧、赵金石之目，才甫古器之评，长睿东观之论，彦远广川之跋，虽无关图谱，而颇存名目。”[②] 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10卷，共有跋尾400余篇，其子欧阳棐又撰《集古录目》20卷。赵明诚的《金石录》30卷，其中目录10卷，跋尾20卷。皆为著录石刻之大宗。王象之的《舆地碑记目》4卷，所收碑目中，每碑都注明该碑所在地、时间、撰者及内容简介。陈思的《宝刻丛刊》20卷，著录古代碑刻，并集录金石诸家的题跋辨证文字。张抡的《绍兴府古器评》2卷，是考释铭文并加以评论之作。黄伯思的《东观余论》10卷、董逌的《广川书跋》10卷，属对古器物和金石文字的考证之作，这些著作对金石的著录，在某种意义又称得上是书目提要。翟耆年《籀史》2卷，上卷收金石书19种，下卷收15种，也属金石书目提要式著作。宋代以后，“金元浸衰，明清转盛，撰金石之目录者百数十家。或记一地之发现，或录一家之收藏，或述此学之史传，或考一物之底蕴，或断代为考究，或保存其图文。乃至录存碑目，表列器名，无不各以古物为对象，极一时之盛焉”[③]。清代，在订经考史学风的影响下，金石跋尾之作盛极一时，顾炎武有《金石文字记》6卷，朱彝尊有《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6卷，钱大昕有《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① 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宋代金文著录表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③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专科目录篇》，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版，第358～359页。

20卷，武亿有《授堂金石文跋》24卷，严可均有《铁桥金石跋》4卷，等等，皆考订精卓。金石跋尾，或考金石源流，或考文字体制，或考碑主谱系、事迹，而多与经史记载相参证，纠谬补阙之功惠及后人。

录文、目录之外，又有所谓纂字，也就是“纂集文字，编次为书，所谓以隶为经，以碑为注脚，虽无关著录，而颇存名目，如刘球《隶韵》，娄机《汉隶字源》是也”①。刘球的《隶韵》10卷，其碑目所引诸碑有261种之多。娄机的《汉隶字源》6卷，著录汉魏碑340种，文字异同，时有考证。清代项怀述有《隶法汇纂》、甘扬声有《汉隶异同》、翟云升有《隶篇》、清末罗振玉有《碑别字》等，皆为“承宋刘球、娄机之绪者”②。这类著述，在文字学、书法学研究方面最有价值。

金石著录体例除有以上几种形式外，清人又发展出了通纂、概论等体例。所谓通纂，就是将目录、图录、录文等诸种体例结合在一起，王昶的《金石萃编》是这方面的代表，该书共160卷，著录内容“兼具存目、录文、摹写、跋尾之长”③。所谓概论，就是对金石学通盘把握、总体论述。在这方面，叶昌炽的《语石》可称得上是代表性著作，所谓：“上溯古初，下迄宋元，玄览中区，旁征岛索。制作之名义，标题之发凡，书学之升降，藏弃之源流，以逮摹拓、装池、轶闻、琐事，分门别类，不相杂厕。自首至尾，可析可并。既非欧、赵之目，亦非潘、王之例。非考释，非辑录，但示津途，聊资谈囿。”④ 王、叶之作，已经不是简单地编个碑刻目录或抄成一部碑刻文字的汇编，而是从不同角度对大量的碑刻作详尽的讲述，已经由简单的分类、抄录、摹写等技术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思考，其系统性非其他浅学之作可比。

三、对金石分类的探索

在确定金石著录体例以后，金石学家所遇到的问题就是怎样对所著

① 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② 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③ 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
④ 叶昌炽：《语石·叙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录的金石的内容予以编排。从金石学发展史来看，这种内容编排经历了一个由“疏”到“密”的过程。在金石学形成之初的北宋时期，一些著作在内容编排方面显得比较随意，如吕大临的《考古图》“先后不以类从，盖随见随录”①。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进入南宋之后，在这方面开始有了显著的变化，逐渐形成了按器、按时、按地、按人等方法编排金石内容的传统。

按器之法。此以王黼等的《宣和博古图》为代表。按器类特征编排青铜器物与铭文的摹本，始于吕大临的《考古图》，该书卷一为鼎属；卷七为钟、磬、錞；卷八为玉器。但与此同时，他又按用途来编排器物，如卷二为鬲、甗、鬵，主要是烹饪器具；卷三为簋属，主要是盛食器具；卷四为彝、卣、尊、壶、罍，主要是酒器。最后的卷九、卷十所著录为秦汉器，又按时代来统属器物，可谓前后标准不一，因而显得相当杂乱。至《宣和博古图》，其分类就比《考古图》进步了许多。该书的分类注意到了器形的区别，同时还注意到了若干器物之间的关系，并据此对器物进行分类，如卷十四、卷十五都是饮器，卷十七至卷十九都是食器，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六都是乐器，这种分法相当合理。容庚对此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博古图》的分类比较合乎逻辑”，并指出这种分类方法对后世影响甚深，“此后金石学家关于古铜器形态的考察，大都根据以用途、器名意义的解释作为分类的标准”。② 清代著名的《西清四鉴》的器物分类就是承袭了《宣和博古图》。这一分类方法对研究器物形制者非常便利。

按时之法。以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赵明诚的《金石录》为代表。如赵明诚的《金石录》的前十卷依次是以三代、秦、汉、魏、吴、晋、伪汉、伪赵、东魏、梁、后魏、梁、北齐、后周、隋、唐、伪周为顺序，来编排各个时代的碑铭目录。后二十卷跋尾大致也是按此顺序著录。这一分类方法对后世影响也很大，钱大昕《金石文跋尾》即按时代来划分金石，排列顺序为三代、秦、汉、魏、吴、晋、前秦、梁、后魏、齐、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吴、吴越、闽、南汉、北汉、后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五，《考古图》条。

②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

唐、后蜀、南诏、宋、伪齐、辽、金、元、安南，这种纵向按时代，横向按政权的编排方法，便于人们集中利用某一朝代的金石文献来研究某一朝代的历史状况。另如王昶的《金石萃编》也是从先秦到辽金，依年代先后顺序来排列碑刻。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也是采用此法。此外又有“专记一个时代之书”及“于一代之中，择其一二种所谓铭心绝品，而专考之，则未易悉数焉”[①]，此可视为以时为纲编目在清代的发展。

按地之法。以陈思的《宝刻丛编》为代表。此书以《元丰九域志》所著录的宋代地方建制为纲，如第一卷至十九卷依次为京畿、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路化外州、陕西永兴军路、陕西秦凤路、河东路、河东路化外州、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福建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在每路下又细分出府、州、县，然后将有地理可考的碑刻依次编入相应的卷中。对于地址不详者，单独列入第二十卷“诸书所录刻石地里未详”中。王象之的《舆地碑目》则是按南宋统治疆域分郡编例碑刻。以地为纲的编目体例在清朝更加盛行，朱剑心认为：“石刻之分地记载，在宋尝有二派：一、统载寰宇而分地者；二、专载一地之所有者。自清迄今，则概属于第二派，且极为发达。据容媛《金石书录目·地志类》所载，凡一百五十六部，附录十部。而清以前人之作，仅三部而已。又方志中金石志目，其数尤多，凡二百九十七部。而清以前人之作，仅一部而已。”[②] 具体而言，有专记一省者，有专记一府者，有专记一邑者，负有盛名之作，层出不穷。甚至还有记述海外金石者，如刘喜海《海东金石苑》、傅云龙《日本金石志》等。

按人之法。南宋末人所编《宝刻类编》，对所搜集的从周秦迄于五代的碑刻，分为帝王、太子诸王、国主、名臣、释氏、道士、妇人、姓名残缺等八类，“每类以人名为纲，而载所书碑目，其下各系以年月地名；且于名臣类，取历官先后之见于石刻者，胪载姓名下方，以备参考，诠次具

① 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9～41 页。

② 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9 页。

有条理"①。这类编排方法便利了人们对历史人物的研究。

第二节　金石义例之学

凡为文，必有体例，中国传统文论讲求"文章以体例为先"。碑志文是文章的一种，载诸金石，义近史学，自然也要有自己的义例法则，即碑志文的独特的审美特征和表现手法。宋代金石学虽然成就甚大，但于义例之学却关注甚少。至元朝时潘昂宵撰《金石例》一书，遂开金石义例研究之先河，继之者有明代王行的《墓铭举例》、清代黄宗羲的《金石要例》，世称"金石三例"，金石义例之学遂由此奠定。嗣后，到了清朝中后期，这方面的学术著作如梁玉绳的《志铭广例》、郭麐的《金石例补》、王芑孙的《碑版文广例》、刘宝楠的《汉石例》、李富孙的《汉魏六朝墓铭纂例》、冯登府的《金石综例》以及《石经阁金石跋文》、梁廷枏的《金石称例》等不断涌现，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金石义例之学的发展。

一、金石义例的重要性

金石义例之学之所以在元代以后出现并繁荣，与学者们对金石义例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入关系甚大。

首先，学者们认为金石义例并非凭空捏造，在碑碣文字中本就存在着义例。如元人汤植翁称："文章先体制而后论其工拙，体制不明，虽操觚弄翰于当时，犹不可，况其勒于金石者乎。"事实上，"由先秦以来迄于近代，金石之所篆刻具有体制，好古博雅之士皆不可以不之考也"②。清人闵萃祥认为经、史都是有义例的，而金石之文作为"史之余体"自然也是有义例的，只是如《春秋》一样，被发现得比较晚而已，所谓"文章者，博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六，《宝刻类编》条。

② 汤植翁：《金石例》序，《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学而详说，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当止，夫何例之有！然而经垂训，史记事，举必遵道，用不违义，分驰而合轨，殊体而一致，是虽不以例言而例在其中，顾未有明言之者，有之，自杜氏《春秋释例》始。金石之文，盖史之余体，自三代以降，文之以金石传者，不知其凡几，亦未有明言其例者，有之，自潘氏昂宵《金石例》始”[①]。卢见曾也认为：“文章无义例，惟碑碣之制则备载姓氏、爵里、世系以及功烈、德望、子女、卒葬之类，近于史家，如《春秋》之有五十凡。故例尚焉。”[②] 温葆淳则列举金石碑刻中的义例，以证金石碑刻中存在着义例之学，所谓：“夏商之文简，但具子孙及祖父名，后则纪以岁月、国邑，文词可读。秦自始皇刻石称皇帝，二世诏备列臣名，为石刻之祖。汉则制碑式，有额、有正、有阴、有既，有额而复题于首者，有阴亦题额者，撰文立碑人及岁月有载于碑文内者，有特题于后者，有题书名者，有题工匠名者，有题出钱名者，后代因之，而法益备。”[③] 他不仅指出金石有义例，而且指出金石义例由简至繁、由疏阔到完善的发展事实。

其次，学者们认为掌握金石义例的益处甚多。比如对金石义例的掌握和理解有益于古文创作。元人傅贵全将金石义例比为可为后世所效法的《春秋》之例和国之制度，所谓“圣人《春秋》，褒贬著于笔削者谓之例，国家政刑，赏罚见于制度者谓之例，是皆以其可为法于天下后世也”，因此潘昂宵所著的《金石例》，可为“为文者之助”。[④] 王思明认为掌握金石义例可以使“学古者有所矜式而不敢肆”[⑤]。清人王芑孙撰《碑版文广例》，

---

① 闵萃祥：《金石三例再续编》序，《金石全例》（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09 页。

② 卢见曾：《金石三例》序，《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 页。

③ 温葆淳：《金石称例》序，《金石全例》（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99～700 页。

④ 傅贵全：《金石例》叙，《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11 页。

⑤ 王思明：《金石例》叙，《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 页。

就是为了有益于作文，所谓“学古文者，当始由无例以之有例，继由有例以之无例，此先生《碑版广例》所由作欤！”① 郭麐认为撰述铭文若“泥于例则官府吏胥之文移也，不知例则乡农村学究之论说也”②。张穆则认为“为文必当明例，碑志又文字之最谨严者，其例尤不可不讲”③。闵萃祥认为，对于为金石文者而言，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谓“夫例所以律文，文之境无尽，而例之用亦无穷”④。冯登府说得更加明确：“金石之有例，所以寓褒贬于笔削，辨体制于文章，为法天下后世，而传之永远者也。”⑤ 在学者们看来，金石义例是人们创作古文必须效法的范本，既要遵守义例，又要有所创新。

元人柳贯认为由于金石铭刻从某种意义相当于记述功业、褒贬善恶的《春秋》及史书，因此也应该有义例，不然这种铭刻活动就无法正常施行。他对潘昂宵所撰《金石例》一书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六经惟《春秋》有例，谓其以一字制褒贬，可举此而通彼也。史氏用其法，载言纪事，故亦有凡有例。然《春秋》，帝王经世之大权，太史公仿之以为《史记》，徒例云乎哉！自先秦、两汉而下，论撰功业，为铭为诔，著之金石，其斧衮侔乎《春秋》，其铢量概乎史氏，使无例以为之统纪，则漫且靡矣。《金石例》之作，其殆得诸此乎？”⑥ 金石碑刻，有诗文，有墓志，有儒家经典，有释道塔铭等等，内容繁杂，不一而足。不管怎样，“金石刻词，昭示无斁”⑦，目的是为了传诸后世，因此金石碑刻的撰写方式就显得特别重要，

---

① 王澐：《碑版文广例》叙，《金石全例》（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② 郭麐：《金石例补》序，《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581页。

③ 张穆：《汉石例》原序，《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649页。

④ 闵萃祥：《金石三例再续编》序，《金石全例》（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

⑤ 冯登府：《金石综例》自序，《金石全例》（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457页。

⑥ 柳贯：《金石例》序，《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⑦ 叶昌炽：《语石》卷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叶昌炽曾说：“秦汉诸碑，炳然与雅颂同文……即隋唐以下鸿文钜制，亦往往而有。”但同时也指出“造象墓志，陈陈相因之辞……不啻有相传衣钵”①，从而成为文士陋习。

有些学者还认为对金石义例的掌握和理解有助于推行道德教化。傅贵全就指出金石义例有助于教化，他说：“制度笔削于此，又可以概见焉。使世之孝子慈孙观其制度之等，则思得为而为，不得为而不为，而于事亲之道不至违礼矣。观其笔削之旨，则思孰为可传孰不可传，而于扬名之道有以自力矣。是岂惟为文者之助，于世教将重有补焉。”② 王思明也认为“后世之文，莫重于金石，盖所以发潜德、诛奸谀、著当今、示方来者也。如是而不知义例，其不贻鸣吠之诮也几希”③。金石义例与春秋笔法一样，蕴含褒善贬恶之旨，不明义例，焉知金石碑刻背后的微言大义？

金石义例还有助于考订古事。学者们认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金石义例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体现了时代的特点。“碑文有通用之词，亦有标新之诣”④，只要掌握了它们的特点，就可以在史实考证上大显身手，王思明所谓“俾夫考古者知古人用意之所在”⑤，即此意也。

金石学家们还认为，由于种种原因，金石义例的内容相当复杂，需要对之加以专门研究。如汤植翁所谓：“然而自上徂下，贵贱有等，名器亦因之而异数。叙事纪实，抑扬予夺，必当有所法，自非类聚而通考之，何以见之哉。”⑥ 金石义例研究，内容丰富，非通才无以钩稽其共性，探寻其规律。

---

① 叶昌炽：《语石》卷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② 傅贵全：《金石例》叙，《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2页。

③ 王思明：《金石例》叙，《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④ 叶昌炽：《语石》卷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⑤ 王思明：《金石例》叙，《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⑥ 汤植翁：《金石例》序，《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二、关于历代金石义例的论争

金石义例之学的兴起，源于创作的需要。宋元时期，古文盛行，因此以唐宋古文大家为核心的唐宋金石义例受到普遍推崇。如元时潘昂宵有感于当时文风不振，遂著《金石例》一书，着重对唐宋古文大家韩愈的碑碣之文进行分析探讨，以指导创作。他说："先生世居中州，以文学鸣。国初士之为文者犹袭纤巧，其气萎苶不振，先生患其久而难变也，乃述是书以授学者，使其知古之为文如此。"① 继而王行编写《墓铭举例》，收录唐宋名家的 242 件铭文作品，以补《金石例》之不足，至清初黄宗羲又著《金石要例》，对《金石例》加以补充。卢见曾所谓金石义例"断自韩子，元潘苍崖创为《金石例》十卷，制器之楷式，为文之榘矱，靡不毕具。明初王止仲又撰《墓铭举例》四卷，兼韩子以下十五家，条分缕析，例之正变，推而愈广。本朝黄梨洲以潘书未著为例之义与坏例之始，作《金石要例》一卷，用补苍崖之阙，合三书而金石之例始赅。"② 张穆云："元潘景梁、王止仲，明黄太冲，递有所述，然取法不越昌黎，是谓昌黎以前金石之文皆犷语也。"③

重唐宋古文大家者，不承认在此以前存在义例。如王芑孙云："碑版莫盛于韩、欧，韩以前非无作者，凡其可法，韩、欧则既取而法之矣，其不可法，韩、欧亦既削而去之矣。韩以后非无作者，能以韩、欧之例例秦汉、例元明，无往不得矣。不以韩、欧之例例秦汉、例元明，无往不失矣。得失之数明，而后承学治古文者有所入，此吾《广例》之说也。"④ 王芑孙持此论的理由是："古文莫贵乎事信而言文，汉碑版之在世亦多矣，或奥而赜，或枝以蔓，虽或得焉，其所得常不敌其所失。吾今举其尤雅者例之，庶几乎言文矣，而事之信不信，罔敢知也。且夫例，《春秋》之法

---

① 杨本：《金石例》序，《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 页。

② 卢见曾：《金石三例》序，《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 页。

③ 张穆：《汉石例》原序，《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49 页。

④ 王芑孙：《碑版文广例》自叙，《金石全例》(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 页。

言也，贯道而出，得乎心之所安，究乎义之所止者也。传家发例之情五：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是五者汉碑版有其仿佛乎？汉碑版无之，而韩、欧有之，斯不得不以文章正统与韩、欧矣。汉碑版不皆出于文士，乖离析乱，人率其臆，固未尝有例也。汉一代作者岸然以《春秋》自例，司马迁而止耳，班氏而止耳。下此虽范蔚宗氏有所弗逮，矧其散者乎？在作者本无例，故潘氏、王氏之例不及汉。韩、欧继司马、班氏而作，又例司马、班氏之例以自例于《春秋》，故潘氏、王氏举例自韩、欧始。"[①] 张穆也认为："至长洲王氏《碑版广例》，虽上取秦汉，下迄中唐，其旨乃主于摧毁汉人，专以文章正统与韩、欧。"[②] 李富孙则认为汉魏六朝碑志实无义例，云："尝考前代诸碑志，详略互异，盖汉魏时墓志墓碣等文，原无程式，晋宋齐梁各代，又少刻石之事，独北魏人颇多志墓者，然屡经丧乱，地尽边围，所志者，大抵武臣悍卒，或出自诸蕃，而田夫牧隶，约略记之，其书法不参经典，无足怪者。即隋唐诸志，其撰文察书，不必定为通儒，烦芜鄙陋之作，不能尽足为例也。"[③] 李慈铭也说："汉代碑碣，不重文章；魏齐石刻，多出村野。名字月日，信手而书，年号官称，亦间致错。至于子姓所叙，详略失宜，得氏溯张柳之星，方外有公薨之号，其为鄙缪，不可胜言。"[④]

与尊唐宋者不同，朱彝尊主张上溯义例之源，他说："窃意墓铭莫盛于东汉，潘阳洪氏所辑《隶释》、《录续》，其文其铭，体例匪一，宜用止仲之法，举而胪列之。惜乎！予老矣，不能为也。"[⑤] 朱彝尊的看法得到了清代许多学者的应和。如郭麐称自己是有感于朱彝尊的这段话，而撰《金石例补》的，所谓："顾既以为有例则必从其朔，东汉其鼻祖矣。辄不自

① 王芑孙：《碑版文广例》卷一，《金石全例》（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3页。

② 张穆：《汉石例》原序，《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650页。

③ 李富孙：《汉魏六朝墓铭纂例》卷四《宁朔将军司马绍墓志》，《金石全例》（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421页。

④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9～550页。

⑤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二《书王氏墓铭举后》，四部丛刊本。

撰，取洪氏之书为之条分而缕析之，间以后人祖述之由附识于后，魏晋六朝，上承汉氏而下启唐人者也，其有可采，亦著于篇，而唐人不及焉。”①冯登府则因《金石例补》“卷帙简略，渗漏尚多”，遂又撰《金石综例》。②李富孙称自己因“乡前辈朱竹垞检讨之言”而撰《汉魏六朝墓铭纂例》。③由此可见朱彝尊之论影响甚大。

刘宝楠并不认可唐代韩、柳的义例，他认为：“元潘景梁、明王止仲、国朝黄太冲，并纂录韩柳诸家文为碑碣例，世称‘金石三例’是也。夫刻石之兴，肇自皇古，梁甫弇山，载籍盖阙，琅邪碣石，巡幸偶经。降至东都，斯风乃炽，公卿贵人，下及一行之士，门生故吏，载笔贞珉，其书爵里姓名为传体，其书生卒年月为状体。魏晋以降，迄于唐初，谨守其法，韩柳上法庄荀，工于思议而体制寖失。余素喜东汉碑碣之文，甄而录之，为墓碑例百五十，庙碑例二十九，德政碑例十三，墓阙例十一，杂例三十二，总例四十八，为文之体略备于斯，魏晋以下，概从删佚。”④ 张穆对刘宝楠的看法深表赞同，也认为潘昂宵、王行、黄宗羲等只重视韩愈而忽略此前的金石文字，是错误的，所谓：“元潘景梁、王止仲，明黄宗羲太冲，递有所述，然取法不越昌黎，是谓昌黎以前之文皆犷语也。先河后海，岂其然乎！古人劀钟范鼎，义专褒显，面人偭事，不患本末不审，故款识流传，类皆隐括行能，文质究宣，但主铭勋，不关记事，变金为石，其义亦当犹是。秦汉以来，矩矱具存，可覆验也。自昌黎一变而为述事，后世史籍踳午，往往足资考证，故各家文集碑志尤为可贵，昌黎之功诚亦不细，然不得因后掩前，反疑古人浑噩为不达也。”⑤ 这种打通金石文历史发展的

① 郭麐：《金石例补》序，《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581～582页。

② 冯登府：《金石综例》自序，《金石全例》（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457页。

③ 李富孙：《汉魏六朝墓铭纂例》自序，《金石全例》（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页。

④ 张穆：刘宝楠：《汉石例卷首》，《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653页。

⑤ 张穆：《汉石例》原序，《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649～650页。

全过程而看待金石义例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

清代重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以前之金石文字，是与当时崇古的学风相一致的。如阮元就指出：“碑碣当以汉魏为法，六朝犹不失遗意，宜将原文及碑式趺寸并为载入，俾古制有所考。”① 鉴于元明金石学家只重视韩愈诸人之成就，阮元遂收罗两汉六朝碑版，以恢复古式，他说：“元潘昂宵《金石例》惟拘守昌黎一家之学，明王行《墓铭举例》虽兼取韩愈、李翱以下十五家，亦不过中唐以后体制，其余两汉南北朝制体修词之道，概未之闻也。余收获两汉六朝碑版甚多，思成一书，以复古式。”②

宗唐宋还是尊汉魏，吴镐有自己的看法，他提出墓志文应以蔡邕、庾信、韩愈三家为主，而不是如“金石三例”那样专以韩柳文为宗，所谓：“志墓之文，始自东汉，《蔡中郎集》中所见稍多，然叙事则失之太略，盖当时文体简朴，类如斯也。至子山庾氏，始成正格。厥后至唐，又失之太详，未免冗滥，赖昌黎崛起，力振衰靡，遂得复古。”③ 吴镐梳理了墓志之文的发展历史，然后作出评判，看法切当。

三、对金石义例的探求

从金石学家对金石义例的探讨来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给世人写作提供一套操作规范，也就是重在实用。如黄宗羲云：“碑版之体，至宋末元初而坏。逮至于今日，作者既张王李赵之流，子孙得之以答赙奠，与纸钱寓马相为出入，使人知其子姓婚姻而已，其坏又甚于元时。似世系而非世系，似履历而非履历，市声俗轨，相沿不觉其非。”④

潘昂宵的《金石例》，对碑文的基本体例进行了探讨，所谓“凡碑碣

① 李富孙：《汉魏六朝墓铭纂例》卷四，《金石全例》（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452页。

② 阮元：《定香亭笔谈》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

③ 吴镐：《唐人志墓诸例》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

④ 黄宗羲：《金石要例》，《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417页。

之制，始作之本，铭志之式，辞义之要，莫不放古以为准，以其可法于天下后世，故曰例"①。并以古文大家韩愈为标准，总结出了一系列的著文程式。柳贯高度评价潘昂霄《金石例》，认为："斯例也，先括例，次类例，取于韩氏者十尝八九，谓韩之钜文，起八代之衰茶，而反之于正，有《春秋》属辞比事之教焉，而例在其中矣。懿哉，公之用心也，肆今而后，冶金伐石，诔德铭功，示一王之制作，垂景铄于无穷，则斯例之传，其亦有功于韩者哉。由是而充之，虽至于《春秋》、《史记》可也。"② 王行的《墓铭举例》，在《金石例》基础上更进一步，扩大了取材范围，"取唐韩愈、李翱、柳宗元，宋欧阳修、尹洙、曾巩、王安石、苏轼、朱子、陈师道、黄庭坚、陈瓘、晁补之、张耒、吕祖谦一十五家所作碑志，录其目而举其例，以补元潘昂宵《金石例》之遗。"③ 还细化了墓铭的义例，分出了"正例"与"变例"，所谓："凡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其他虽序次或有先后，要不越此十余事而已。此正例也。其有例所有而不书，例所无而书之者，又其变例，各以其故也。"④ 黄宗羲认为潘昂宵之书，"大段以昌黎为例，顾未尝著为例之义与坏例之始，亦有不必例而例之者"，因此他"摘其要领，稍为辩正，所以补苍崖之缺也"，因著《金石要例》。⑤

《四库全书》将这三种书都归之于集部的"诗文评类"之中，还特别指出了《金石例》的应用价值，所谓"其书叙述古制，颇为典核。虽所载括例，但举韩愈之文，未免举一而废百。然明以来金石之文，往往不考古法，漫无矩度，得是书以为依据，亦可谓尚有典型，愈于率意妄撰者多矣"⑥。吴

① 杨本：《金石例》序，《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② 柳贯：《金石例》序，《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③ 《四库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六，《墓铭举例》条。

④ 王行：《墓铭举例》卷一，《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257页。

⑤ 黄宗羲：《金石要例》，《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417页。

⑥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六，《金石例》条。

镐也认为这三本书在指导创作方面意义重大，“志墓之文，欲传信后世，随事因人，本无定法。顾宋讫元明，习欲相沿，文体大坏，故三君不得不作例以匡救之”[①]。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为感于当时文风颓靡，卢见曾遂将三书合在一起以“金石三例”为名在扬州刊出，指出“曩病时贤碑碣叙次失宜，烦简靡当，盖未尝于前人体制一为省录耳。兹故汇刻以行世，俾后之君子晓然于金石之文，不异史家发凡言例，亦《春秋》之支与流裔，触类而长之，庶乎知所从事矣”[②]。《金石三例》刊出之后，世人如获至宝，将之抢购一空。后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郝懿行又促成重印，指出：“时贤之为八家古文者，极赏此书，且有购觅不获以为憾者。弟亲见其然，故商之雅雨，卢氏欣然出其所藏，而重付之梓。”[③]《金石三例》的多次刊刻，说明人们对金石义例具有浓厚的兴趣。

古代学者对金石义例的探讨从主观上说是为了创作，但在客观上却有益于金石学的研究，此即叶国良所言：“治金石文字，不详古人义例，则不知其要旨。必广求金石文字归纳分析之，括其常例、特例，以求通义、殊义，此治金石文字者必务之事，非特考证之需或撰文之资而已也。”[④]考证文献、撰写文章、研究金石之旨意，都离不开对金石义例的探讨。

由于金石义例之学受到社会的推崇，因而引起学者对该学问的普遍关注，取法对象随之无限扩展开来，并由重视文章形式向重视考证经史转变，正像有的专家所论述的那样：“清代碑志义例之学在发展过程中，受金石学主流的影响，出现了与辞章学、文体学渐行渐远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更倾向于运用金石资料为考据之资，或正讹误，或补史阙，或辨异同，或较优劣，整个金石学的发展格局是以考证经史为正宗，而视研究碑志义例以俾书学、

---

① 吴镐：《唐人志墓诸例·志墓例附论》，丛书集成初编本。

② 卢见曾：《金石三例》序，《金石全例》（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③ 郝懿行：《答张蒙泉重刻金石三例书》，《晒书堂集·文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

④ 叶国良：《石学蠡探》，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

辞章学、文体学为旁门别派。"[1] 这又直接促进了金石学的发展。

比如，刘宝楠《汉石例》"义士及弟子统名诸生服义例"条即是重在考"义士"之称，所谓："《金石录》曰：'汉时墓碑多门生故吏所立，往往各纪姓名于碑阴，或载所出钱数，其非门生故吏而出钱者，谓之义士。'《隶释》曰：'掾属曰故吏，占籍曰故民，非吏非民曰处士，素非所莅曰义士。'《金石文字记》曰：'处士者，德行可尊之人；义士则但出财之人而已。今人出财布施皆曰信士，宋太宗朝避御名，凡义字皆改为信，今之信士即汉碑所称之义士也。'案今之信士，贱民亦得称之，此义士在弟子上，又统名诸生，当是好义之士与今之滥称信士有别。又义士与义民同，但一称士一称民耳。所莅之民得称义民，义士亦然。洪氏谓'素非所莅曰义士'非也。义士为尊称，故诸碑书法与诸生别，此统云诸生服义，盖未受业，必是弟子行也。"[2] 这段话对"义士"的考证清清楚楚。又该书"铭词称嘆例"，释《隶释》"《李翊夫人碑》歎曰：阴阳分兮钟律滋，星月列兮有四时云云"中的"歎"字，指出："《说文》：'嘆，吞歎也，一曰太息也。歎，吟也。'段氏注曰：'嘆、歎二字，今人通用。'《毛诗》中两体错出。依《说文》则义异。歎近于喜，嘆近于哀，故嘆训吞歎，吞其歎而不能发太息。别一义与喟义同。《乐记》'一唱而三歎，有余音者矣'，又云'长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喟然歎曰'，皆是歎字。《檀弓》曰'戚斯嘆，嘆斯辟'，《诗》云'而无咏嘆'，'慨其嘆矣'，'忾我寤嘆'，皆是嘆字。案嘆歎对文，则别如《说文》及段氏所引是也。散文则通，如此碑及祝长严䜣碑是也。刘向《九歎》序云：'歎者，伤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歎息无已。'此歎可通嘆之证。"[3] 同样考证绵密，无懈可击。

---

① 党圣元、陈志扬：《清代碑志义例：金石学与辞章学的交汇》，《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

② 刘宝楠：《汉石例》卷三《义士及弟子统名诸生服义例》，《金石全例》（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106页。

③ 刘宝楠：《汉石例》卷六《铭词称歎例》，《金石全例》（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243页。

又如冯登府《金石综例》“郡国守相得称府君”条称：“（吴葛府君碑）额书吴故衡阳郡太守葛府君之碑，钱氏大昕云：‘衡阳，孙吴所置郡，汉世称郡国守相为府君，魏晋犹然。予收藏孙吴石刻如谷朗及此碑皆以太守故得府君之称，非如后世之泛用也。’余按汉梁相费汎碑亦以相而称府君，此汉例也。黄梨洲谓耆旧称府君，如昌黎董府君、独孤府君之例，盖未深考。又此碑楷书，孙氏星衍曰楷书之见于碑碣者始于此。”[1] 又“碑阴题名书字书名书郡不书郡”条称：“汉人碑阴皆门生故吏及同姓亲党，立碑附书于阴以传不朽，其官爵郡邑姓名字并书，亦有不全书者，有书出钱，有不书者，皆有义也。《隶释》云：‘汉人题名必书名字，否则各有说也。杨震碑阴孙定博诸人不名者，非其门生也。逢盛碑阴崔孟祖数人不名者，乃其父党也。题名于韩敕碑左凡八人，鲁之二鹿一传不名者，别守相之尊也。张纳碑阴主簿白文已下不称字者，示其其卑于从事季元也。史晨后碑五官掾孔畅六人不称字者，亦示其卑于长史李谦也。’余按有不书郡者，娄寿碑阴皆同郡之人也；有不书县者，州辅碑阴皆同县之人也；有每列人数后总书者，如殽阬神碑右郡吏名，杨震碑右沛相门生右后公门生，逢童碑右家门生，灵台碑右仲氏门宗前所会计从黄屋出钱名之类是也。韩敕碑阴独樊豹称府君，《隶释》云：‘当是鲁之前相也。’”[2] 如此考证，俨然是一篇有关“府君”的论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再如梁廷枏《金石称例》“兄弟之子称姪”条以为“按碑已缺其名，据《宗室表》定为李林甫。林甫，思训弟，思诲长子。又按《困学纪闻》引《通典》颜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则兄弟之子不得称姪。’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刘贡父刊《二程集》遂改姪为犹子。朱子谓：‘古人固不谓兄弟之子为姪，亦无云犹子者，从俗称姪亦无害于义理。’今据此碑及颜氏干禄字书鲁公之自称十三姪男，郑公德政碑之称犹子，则知

① 冯登府：《金石综例》卷一《郡国守相得称府君》，《金石全例》（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03 页。

② 冯登府：《金石综例》卷二《碑阴题名书字书名书郡不书郡》，《金石全例》（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11～512 页。

两称相沿已久，宋儒特偶忽之耳。”① 考证详备，一目了然。

第三节　与经史相表里

在文献学家、金石学家看来，金石碑刻之所以重要，首先乃在于它们可以用来考订经史，同时他们也认识到，由于种种原因，金石碑刻的可信度也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因此在利用它们时，往往也需要用经史考订金石。其次，认为器物——尤其是三代彝器中蕴含着有助于道德教化、经世致用的圣人之意，发掘、研究金石碑刻上所记述的大量体现圣人之意的文字，将会有助于道德教化，并对经世致用、济世救民产生重要作用。最后，认为金石碑刻有利于刊正文献中的文字。

一、金石与文献考订

钱大昕在研究金石学的发展历史时，对自宋以来的金石学流派进行了划分，他说：“自宋以来，谈金石刻者有两家：或考稽史传，证事迹之异同；或研讨书法，辨源流之升降。”② 梁启超论及清代金石研究，将其分为四派，顾炎武、钱大昕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同时有黄宗羲一派，从此中研究文史义例”，“别有翁方纲、黄易一派，专讲鉴别”，“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③ 梁启超所分四派，实际上还是两派，“鉴别”与“书势”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书法、美术研究，与钱大昕所论“研讨书法”庶几一致，“考证经史”与“研究文史义例”则看重考订文献，属于钱大昕所论“考稽史传”的范畴。朱剑心论及金石学，认为其价值体现在三个

① 梁廷枏：《金石称例》卷二《兄弟之子称姪》，《金石全例》（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735页。

②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郭允伯金石史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95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方面，“一曰考订，统经史小学而言；一曰文章，重其原始体制；一曰艺术，兼赅书画雕刻”。他尤其重视金石在考订经史中的作用，认为“金石之运用于考订，始于两汉，发达于宋，极盛于清。其学广，其业专……综其功用，可以证经史之同异，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考文字之变迁”①。

由此可见，在金石学发展史上，以金石考证经史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并在金石学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

欧阳修重视金石，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是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因此可以用来考订史传之讹谬，此即其《集古录目序》所谓："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② 吕大临称金石，可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③。赵明诚以金石来研史考经，所谓："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以广异闻，后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读而贤之，以为是正讹谬，有功于后学甚大。"④ 并称自己“每得前代名臣碑版以校史传，其官阀、岁月少有同者，以此知石刻为可宝也”⑤。李清照也称《金石录》所载“足以订史氏之失”⑥。足见有宋一代学者对金石在考订文献中的作用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顾炎武著《求古录》，原因之一是因为该书可以“备史乘之遗”⑦。由于顾炎武等的倡导，清代金石学遂以考经订史为圭臬。所谓“自国初顾炎武、朱彝尊辈重在考据，以为证经订史之资，此风一开，踵事者多，凡清人之言金石者，几莫不以证经订史为能事”⑧。在理论上，清代学者几乎都在倡言金石碑版在考证经史中的作用。钱大昕认为“金石之学，与经史

① 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 页。

② 《集古录》自序，见《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 1986 年版，第1087 页。

③ 吕大临：《考古图》自序，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④ 赵明诚：《金石录》序，见《金石录校证》，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5 年版。

⑤ 赵明诚：《金石录校证》卷十五《汉荆州刺史度尚碑跋尾》，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81 页。

⑥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见《金石录校证》，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5 年版。

⑦ 顾炎武：《求古录》自序，光绪十四年行素草堂金石丛书本。

⑧ 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5 页。

相表里”，因为“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钞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①。又称：“书契以还，风移俗易，后人恒有不及见古人之叹。文籍传写，久而踳讹，惟吉金乐石，流转人间，虽千百年之后，犹能辨其点画，而审其异同，金石之寿，实大有助于经史焉。”② 王昶称：“宋欧、赵以来为金石之学者众矣。非独字画之工，使人临摹把玩而不厌也。迹其囊括包举，靡所不备，凡经史小学，暨于山经、地志、丛书、别集，皆当参稽会萃，核其异同，而审其详略。”③ 他编《金石萃编》，目的非常明确：“夫旧物难聚而易散也，后人能守者少，而不守者多也。使瑰玮怪丽之文销沉不见于世，不足以备通儒之采择，而经史之异同详略，无以参稽其得失，岂细故哉？于是因吏牍之暇，尽取而甄录之。”④ 并进一步提出“金石之与史相表里也”⑤。武亿同样认为金石可以“与群史传记互为推稽”⑥。

金石碑刻在考证经史文献中具有重要作用，关键在于它的“当时性”，这使得金石文字有了作为第一手资料的可信性，赵明诚著《金石录》，认为“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⑦。他的这一看法得到后世学者的高度认同，钱大昕数次说：“史文转写，或失其真，惟石刻出于当时真迹，当据碑以订史之误”⑧。“惟石刻出于当时，最可征信尔”⑨。“史

---

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关中金石记序》，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96 页。

②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山左金石记序》，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98 页。

③ 王昶：《金石萃编》序，中国书店 1985 年版。

④ 王昶：《金石萃编》序，中国书店 1985 年版。

⑤ 王昶：《金石萃编》卷二十四《天发神谶碑》，中国书店 1985 年版。

⑥ 武亿：《授堂文钞》卷七《答王兰泉先生书》，道光癸卯年重刊本。

⑦ 赵明诚：《金石录》序，见《金石录校证》，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5 年版。

⑧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特勤当从石刻》，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76 页。

⑨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三《高平县石里村造桥碑》，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3 页。

文固多抵牾，此刻出于当时，宜得其实也”[1]。刻石乃当时所立，和其他纸质文献相较，有不易更改，不易毁坏的特点，所谓“金石不朽，信有征矣!”[2]可信度高，以之考证经史，自然能够找出错谬所在，从而得到历史的真相。

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学者们利用金石对传世文献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从而得出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大致而言，这种考订主要表现在两点上，一是以金石证文献之讹，二是以金石补文献之阙。这方面的例证之多，在古代金石学著作中摭拾即是，下面仅举几例。

以金石证文献之讹。如欧阳修以《孔颖达碑》所书孔颖达之字证《唐书》所书之字的讹谬，所谓：“其字不同，传云字仲远，碑云字冲远，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证传之谬。”并深有感触地说：“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幸而因余集录所得以正其讹舛者，亦不为少也。”[3] 赵明诚以《秦泰山刻石》证史书之误，谓：“以《史记·本纪》考之，颇多异同。《史》云‘亲巡远方黎民’，而碑作‘亲巡远黎’；《史》云‘大义休明’，而碑作‘著明’；《史》云‘垂于后世’，而《碑》作‘陲于后嗣’；《史》云‘皇帝躬圣’，而《碑》作‘躬德’；《史》云‘男女礼顺’，而《碑》作‘体顺’；《史》云‘施于后嗣’，而《碑》作‘昆嗣’；《史》云‘具刻诏书刻石’，而《碑》作‘金石刻’，皆足以正史氏之误。”[4]又以《汉国三老袁君碑》、《后汉书》考订《元和姓纂》和《唐书·宰相世系表》的相关内容，发现袁干封贵乡，“《姓纂》与《唐表》殊为疏谬”。并感叹说：“袁氏自汉以来，世为著姓，安与滂皆一时显人，而诸书于其族系错谬如此，以此知典籍所载，其失可胜道哉!”[5] 钱大昕根据《孝文皇

---

①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五凤二年刻石》，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② 王昶：《金石萃编》卷四《琅邪台刻石》，中国书店1985年版。

③ 《集古录跋尾》卷五《唐孔颖达碑》，见《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155页。

④ 赵明诚：《金石录校证》卷十三《秦泰山刻石跋尾》，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第241页。

⑤ 赵明诚：《金石录校证》卷十四《汉国三老袁君碑跋尾》，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254页。

帝吊比干碑阴》考证出《北史》所记北魏迁都洛阳年代的错误，所谓："《北史》太和十九年诏，迁洛人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又云太和二十年正月诏，改姓元氏。今此碑立于太和十八年冬，宗室已系元姓，代人并称河南郡。则史所载岁月，恐未得其实矣。"①

以金石补经史之阙。如赵明诚非常注意搜求为史传所遗漏的姓氏以补其阙，所谓："右《汉唐君碑阴》，载出钱造碑人，有故从事、故督邮、故吏、处士、门生、门童等姓名。案《唐君碑》云：'处士间葵斑等刻石树颂。'而《碑阴》又有'故吏间葵巴、处士间葵楚'。间葵姓不见于前史，而《姓苑》、《姓纂》之类亦皆不载，盖前代氏族，或因改易，或浸微不显，遂泯没而无传者甚众。今世所有姓氏书，类多简略不完，惟时时见于石刻者，余每记之，以裨姓氏书之阙云。"② 到清代，以金石补文献之阙，已成学界共识。钱大昕曾用《高阳王湜墓志》补《北齐书》之遗，他用该墓志"证之史传，事迹多合，其薨之月日，据《齐书》本纪，在正月癸亥，而石刻乃是二月六日戊子，当以石刻为正。王字须达，赠都督冀、定、瀛、汾、晋、云、显、青、齐、兖十州诸军事，冀州刺史，皆史传所不载，百药《史》残缺，神武诸子传已亡，后人取《北史》补之，故事多不备，此刻出于当时，可裨史家之遗"③。王昶曾据《杨从义墓志》补《宋史》等遗漏，杨从义为宋代将领，追随吴玠、吴璘，但《宋史》等文献既没有为杨从义立传，在吴玠、吴璘传记中亦无一语及之，杨从义还辑《兵事要类》30卷，《宋史·艺文志》亦失书，而《杨从义墓志》却非常详细地记载了杨从义的事迹，"凡此皆可补史所未备也"④。金石碑刻不仅可以补经史之阙，对于诗赋之遗，亦有补充作用，叶昌炽云："余所见石刻赋，

---

①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二《孝文皇帝吊比干碑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3～54页。

② 赵明诚：《金石录校证》卷十五《汉唐君碑阴跋尾》，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页。

③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二《跋高阳王湜墓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42页。

④ 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四十九《杨从义墓志》，中国书店1985年版。

惟楼异《嵩山三十六峰赋》，僧昙潜书，笔意逼肖长公。易祓《真仙岩赋》，在融县。梁安世《乳床赋》，在临桂之龙隐岩。并皆佳妙。此三人皆无集行世，赋选亦不收，赖石刻以传耳。”由此叶氏以为：“大抵石刻诗篇，颇有世所不恒见，可以补历朝诗选之缺。”① 金石碑刻的价值于此可见一斑。

叶昌炽对金石考订文献阙谬之法予以总结说：“撰书题额结衔，可以考官爵。碑阴姓氏，亦往往书官于上。斗筲之禄，史或不言，则更可以之补阙。郡邑省并，陵谷迁改，参互考求，瞭于目验。关中碑志，凡书生卒，必云：终于某县某坊某里之私第，或云：葬于某县某村某里之原。以证《雍录》、《长安志》，无不吻合。推之它处，其有资于邑乘者多矣。至于订史，唐碑之族望及子孙名位，可补《宗室》、《丞相世系表》。建碑之年月，可补《朔闰表》。生卒之年月，可补《疑年录》。北朝造象寺记，可补《魏书·释老志》。《天玺纪功》、《天发神谶》之类，可补《符瑞志》。投龙、斋醮、五岳登封，可补《郊祀志》。汉之孔庙诸碑，魏之受禅、尊号，宋之道君、五礼，可补《礼志》。唐之《令长新诫》，宋之《慎刑箴》、《戒石铭》，可补《刑法志》。古人诗集，凡有登览纪游之作，注家皆可题名考之，郡邑流寓，亦可据为实录。举一反三，角遗靡尽。”② 叶氏所言可谓详尽明了，对于人们认识金石碑刻的文献价值提供了极大帮助。

在以金石证传世文献的阙谬的过程中，学者们也认识到了金石文字不仅在叙事中存在着阿谀避讳之处，就是在其他方面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翁方纲就指出：“凡考订金石者，不甘居与鉴赏书法，则必处处捃摭某条某条足订史误；金石文足订史误，固时有之，然其确有证者，若唐年号‘大和’误‘太和’、辽‘寿昌’误‘寿隆’，似此之类，则无可疑者。至于一官一地，偶有□拄，苟非确有证据，何以知史必非而碑必是乎？”③ 钱

---

① 叶昌炽：《语石》卷四《诗文一则》，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3 页。

② 叶昌炽：《语石》卷六《碑版有资考订一则》，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0～171 页。

③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281 页。

大昕也指出，有些“碑出于里巷不学者之手，附会华胄，多非其实”①。因此对于金石文字，学者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大都抱着极为审慎的态度。如欧阳修称：“余所集录，与史传不同者多，其功过难以碑碣为正者。铭志所称，有褒有讳，疑其不实。至于世系、子孙、官封、名字，无情增损，故每据碑以正史。”② 在欧阳修看来，碑刻中所记世系、子孙、官职、名字等是较为可靠的部分，其他涉及褒贬之处，就可能会出现“不实”。清人洪亮吉也称他曾从毕沅那里借得碑文数百通，“校史传阙遗，其间得史之误者十之三，以史文正碑石之失者亦十之一”③。具体而言，学者对金石文字阙谬现象的考订可分为以文献证金石及以金石证金石等两个方面。

首先，以文献证金石之阙谬。这包括以文献证金石之疑及以文献补金石之阙。以文献释金石之疑如吕大临释鄦子钟，所谓：“按《史记》郑悼公元年，鄦公恶郑于楚，徐广曰：鄦音许，许公，灵公也。《左氏传》鲁成公五年，许灵公诉郑伯于楚，郑悼公如楚讼，不胜。以是推之，许灵公即鄦公，鄦、许，文异而音义同。”④ 东汉幽州刺史朱龟碑中有“蛮夷授首乞降”之语，赵明诚翻检史书，发现《后汉书·西南夷传》称：“熹平五年，诸夷反叛，执蜀郡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龟讨之，不能克。太尉掾李颙建策讨伐，乃以颙为益州太守，发板楯蛮击破平之。”同时“常璩《华阳国志》亦载其事，与史同”。由此得出结论：“疑碑所书非实录也。”⑤ 钱大昕据史书考证出《王颜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碑》之误，指出：“予向得此碑，考《晋书》纪传无王卓名，断为碑误。顷读《后汉书·顺帝纪》‘阳嘉三年十一月，光禄勋河东王卓为司空’。章怀太子注：‘卓字仲辽，

---

①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三《造太上老君石像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② 《集古录跋尾》卷九《唐孔府君神道碑》，见《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203页。

③ 洪亮吉：《关中金石记·书后》，毕沅：《关中金石记》，经训堂丛书本。

④ 吕大临：《考古图》卷七《鄦子钟》，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3页。

⑤ 赵明诚：《金石录校证》卷十五《汉幽州刺使朱龟碑跋尾》，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第330～331页。

河东解人。’乃知颜所称十八代祖者，盖即其人。然后汉之司空非晋之司空也。唐人重氏族之学，而叙述先世昧于朝代犹若此。”[①] 碑刻将东汉误为西晋，幸而得到文献校正。钱大昕还根据各种文献记载，考出《三藏无畏不空法师塔记》为伪碑，“该碑昔人未有著录，书法亦俗，其为后人妄托无疑”[②]。《隋樊尚造像》言：“开皇元年岁次戊寅正月辛亥朔五日，佛弟子樊尚上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造石像一区，上生天宫，下生人间，因缘眷属，等成正觉。佛弟子樊尚造托。”陆增祥以史释其为伪，指出：“按开皇元年岁值辛丑，不值戊寅，《隋书帝纪》开皇元年二月甲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则是年正月尚未有开皇之号。《通鉴目录》是年陈二月辛亥朔，隋三月辛巳朔，则正月朔亦不值辛亥也。或云正月系二月之误，然以本纪二月甲子合之，二月朔或是辛亥甲子为十四日，二月五日，亦未有开皇之号，伪造无疑。造讫，讫字作托，亦误。”[③]

以文献补金石之阙。如赵明诚考释《汉孔君碣》中阙字云：“右《汉孔君碣》，在孔子墓林中，其额题‘孔君之墓’，文已残阙。其前云‘元年乙未’，而‘元年’上阙二字。按东汉自建武以后，惟桓帝永寿元年岁次乙未，其他有三乙未，皆非元年，然则此碣所阙二字当为‘永寿’也。”[④] 王昶考释《折克行神道碑》，指出该碑“残缺过甚，全文不知若干字”，无法全面了解墓主事迹，遂根据《宋史》等传世文献，补足其事迹原委，所谓“得史而碑之缺者可考矣”[⑤]。

在用金石与文献互证的同时，学者们还以金石证金石。如吕大临释双鱼洗：“前一洗不知所从得，后二洗得于新郑，形制与大洗同而差小，皆有‘宜子孙’三字，旁有双鱼为饰……《唐会要》云上元二年，高宗命韦

---

①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五《王颜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碑》，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16 页。

②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六《三藏无畏不空法师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8 页。

③ 陆增祥：《金石祛伪》，续修四库全书本。

④ 赵明诚：《金石录校证》卷十五《汉孔君碑跋尾》，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71 页。

⑤ 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四十七《折克行神道碑》，中国书店 1985 年版。

弘机营东都上阳宫于涧曲疏建阴殿，掘得古铜器，似盆而浅，中有蹙起双鲤之象，鱼间有四篆字‘长宜子孙’，与此器同，皆汉洗也。”[①] 赵明诚《秦琅邪台刻石跋尾》“右《秦琅邪台刻石》，在今密州。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然亦残缺。熙宁中，苏翰林守密，令庐江文勛模搨刻石，即此碑也。从臣姓名，‘五大夫’作‘夫夫’，泰山秦篆亦如此。或以谓古‘大’与‘夫’同，为一字，恐不然。余家所藏古器款识，有《周大夫始鼎》及《秦权铭》，‘黔首大安’皆用‘大’字。盖古人简质，凡字点画相近及音同者，多假借用之，别无它义。东汉时碑刻尚多如此”[②]。又《汉卫尉卿衡方碑跋尾》“右《汉卫尉卿衡方碑跋尾》，有云：‘感昔人之《凯风》，悼《蓼仪》之劬劳。’以‘蓼莪’为‘蓼仪’，他汉碑多如此。盖汉人各以其学名家，故所传时有异同也”[③]。清人王昶所著录的《焦延昌造像碑》中有“父拔拔西夏朔方郡功曹”语，王昶所谓：“碑刻‘父拔拔西夏朔方郡功曹’，《吊比干墓碑阴》有‘拔拔臻’，知‘拔拔’是魏时名称也。”[④] 陆增祥考订韦载造像为伪作的理由之一是，“像刻无古朴之致”，又造像碑文有“香花供养，一心礼拜”之语，而这样的话在六朝的碑文中很少见，“二语不似六朝人笔墨，当是伪作”[⑤]。以碑证碑，可以考释其异同，印证其真伪，补充认识之不足。

二、金石与教化经世

学者们在研究金石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器物尤其是三代彝器形制的研究，认为其中蕴含着有助于道德教化的圣人之意。

宋人刘敞认为“三王之事万不存一，《诗》、《书》所记，圣王所立，有可长太息者矣”，因而主张关注金石的价值，因为金石文献可以使“礼

---

① 吕大临：《考古图》卷九《双鱼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0页。

② 赵明诚：《金石录校证》卷十三《秦琅邪刻石跋尾》，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页。

③ 赵明诚：《金石录校证》卷十六《汉卫尉卿衡方碑跋尾》，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页。

④ 王昶：《金石萃编》卷三十二《焦延昌造像碑》，中国书店1985年版。

⑤ 陆增祥：《金石祛伪》，续修四库全书本。

家明其制度”。[①] 皇祐三年（1051年）朝廷作《皇祐三馆古器图》，将秘阁及太常所藏三代钟鼎器“付修太乐所，参较昌量”，把金石彝器做成图录，目的是为了加强礼制建设。李公麟作《考古图》，亦重视金石对礼制的作用，认为圣人之旨正寓于器用之间，后人由器求象，由象求意，就可以得圣人不传之秘，所谓“圣人制器尚象，载道垂戒，寓不传之妙于器用之间，以遗后人，使宏识之士，即器以求象，即象以求意，心悟目击命物之旨，晓礼乐法而不说之秘，朝夕鉴观，罔有逸德，此唐虞画衣冠以国纪，而使民不犯于有司，岂独眩美资玩，为悦目之具哉”[②]。吕大临则认为由于古圣“可尊”、“可法”，因而“尧、舜、禹、皋陶之言皆曰‘稽古’，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所谓‘古’者，虽先王之陈迹，稽之好之者必求其所以迹也，制度法象之所寓，圣人之精义存焉”。所以“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③]《宣和博古图》亦云：“凡彝器有取于物者小，而在礼实大；其为器也至微，而其所以设施也至广。”[④] 金石彝器虽微小，但蕴含的礼乐制度至广至大。翟耆年称：“后世之士，识鼎彝牺象之制，瑚琏尊罍之美，发明礼器之所以为用，与六经相表里，以敷遗后学，可谓丕显文王之谟也。”[⑤] 在翟氏看来，金石与六经相表里，可以“敷遗后学”，“丕显文王之谟”。翟氏又说：“夫子之书，天纵之圣，忠恕之道，著于笔画之间，后之君子虽不得亲见夫子，闻其音声绪言，窥先圣之遗迹，得以心悟默识，笃事亲守身之大本，务道德仁义以修身，则此书（指碑文）与六经同为垂世立教之文。”[⑥] 金石碑刻与六经同为垂世立教之文，其有益于政教不言而喻。

郑樵在说明《金石略》的编纂宗旨时云：“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以后学跂慕古人之心，使得亲见其面而闻其言，何患

---

① 刘敞：《公是集》卷三十六《先秦古器记》。
② 翟耆年：《籀史》卷上。
③ 吕大临：《考古图·序》，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④ 《博古图录》卷十四《爵总说》。
⑤ 《籀史》卷上《徽宗圣文仁显孝皇帝宣和博古图三十卷》。
⑥ 《籀史》卷上《先圣篆延陵季子墓碑一卷》。

不与之俱化乎。所以仲尼之徒三千皆为贤哲，而后世旷世不闻若人之一二者，何哉？良由不得亲见闻于仲尼耳。盖闲习礼度，不若式瞻容仪，讽诵遗言，不若亲承音旨。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散佚无纪，可为太息。故作《金石略》。"[①] 在郑樵看来，金石能存古人之旧，可以使人们观金石犹睹古人，受到教化，是治学者绝不可舍弃的一门学问。

明人高濂认为："余嗜闲雅好古……先王之精义存焉者也，岂值剔异搜奇，为耳目玩好寄哉？"又认为博古"可以养性，可以悦心，可以怡生"。[②] 在高濂看来，金石蕴含"先王之经义"，是养性、悦心、怡生的最佳工具。

清人顾炎武称其著《求古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存前古之制"[③]。阮元所谓："形上谓道，形下谓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经焉。若器则罕有存者。所存者，铜器钟鼎之属耳。古铜器有铭，铭之文为古人篆迹，非经文隶楷缣楮传写之比，且其词为古王侯大夫贤者所为，其重与九经同之……器者，所以藏礼。故孔子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齐其度量，同其文字，别其尊卑。用之于朝覲燕飨，则见天子之尊，锡命之宠，虽有强国，不敢问鼎之轻重焉。用之于祭祀饮射，则见德功之美，勋赏之名，孝子孝孙，永享其祖考而宝用之焉。且天子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贵，则不能制其器；非有问学，通其文词，则不能铭其器。然则器者，先王所以训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习礼博文之学……故吾谓欲观三代以上之道与器，九经之外，舍钟鼎之属，曷由观之？"[④] 在阮元看

① 《通志二十略·金石略·金石序》，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43页。

② 高濂：《雅尚斋遵生八笺》卷十四，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万历十九年高氏自刻本，第384页。

③ 顾炎武：《求古录》自序，光绪十四年行素草堂金石丛书本。

④ 阮元：《研经室三集》卷三《商周铜器说上》，见《研经室集》（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32页。

来，钟鼎彝器，看似普通器物，实则蕴含着古代丰富的礼乐文化，是圣人思想的外在表现。

既然钟鼎彝器蕴含着丰富的礼乐文化和圣人思想，那么金石文字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就有了重要的作用。如李清照称《金石录》所载之内容，多“足以合圣人之道”①。叶昌炽也说：“碑版有资考证，非独补史阙也，盖于风教，亦有裨焉。”又说：“尊儒崇道，千古一时，区区片石，其有功于正学者，夫岂浅哉。”② 因此许多学者在他们的金石著作中都相当注意将有益于道德教化的文字录入。有的还借此发表议论，褒贬善恶，以金石文字来宣扬道德教化的目的就更明显了。如欧阳修就通过对三国时吴国的《国山碑》的评论批判了统治者迷信祥瑞的现象，所谓：“孙皓天册元年禅于国山，改元天玺，因纪其所获瑞物，刊石于山阴，是岁晋咸宁元年。后五年，晋遂灭吴。以皓昏虐，其国将亡，而众瑞并出，不可胜数。后世之言祥瑞者，可以鉴矣。”③ 为了劝世人远小人，赵明诚特详录《唐杨历碑》，所谓：“右《唐杨历碑》，题云‘义男光禄大夫、前中书令、上柱国、越国公、太子右谕德’。颍川钟绍京撰铭并书。历，中官杨思勖父也。绍京出于胥吏，无他才能，特以夤缘附会，致位宰相，固无足道者，然屈于阉竖，至以父事之，而又著之金石，略无愧耻，亦甚矣！书之可以为后来之戒，而新、旧史皆阙焉。故余详录之于此者，有以见小人苟可以得利，无不为也。”④ 在《汉州辅碑阴跋尾》中赵明诚又批评了那些热衷于攀附权贵的势利小人：“京兆尹延笃叔坚而下，题名者凡四十余人。自东汉以后，一时名卿贤士大夫，死而立碑，则门生故吏往往寓名其阴，盖欲附托以传不朽尔。今辅一宦者，而碑阴列名者数十人，虽当代显人如延叔坚亦预焉，有以见权势之盛如此。虽然，区区挂名于此者，亦可耻

①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见《金石录校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叶昌炽：《语石》卷六《碑版有资考订一则》，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

③ 《集古录跋尾》卷四《吴国山碑》，见《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136页。

④ 赵明诚：《金石录校证》卷二十六《唐杨历碑跋尾》，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第477页。

也夫！”①

金石学者们不仅认为金石文字有益于道德教化，还认为有助于经世。如欧阳修自述“余家集录古文，不独为传记正讹谬，亦可为朝廷决疑议”②。洪亮吉称毕沅撰《关中金石记》：“巡抚毕公再涖陕西，前又两摄兰州之节，凡自潼关以西，玉门以东，其道路险易，川渠通塞，及郡县之兴废，祠庙之存否，莫不画然若萃诸掌，今记中所散见是也。夫欧、赵、洪、薛之撰集金石，仅藉以考古，而公则因以兴灌溉之利，通山谷之邃，修明疆界，厘正祀典。既非若道元之注托之空言，又非若欧阳谙书仅资博识，则所得实多焉。公既尝以案部至咸阳，读周文公庙诸石刻，为守墓之裔请于朝，增置五经博士；近又欲考定临晋河伯之祠，郃阳子夏之墓，皆公经世之务之获于稽古者也，读是记，可以观其概焉。”③ 钱大昕在《隆安选公传戒碑》的跋尾中，对专制皇朝提出批评，云：“元之末季，中外多故，正宜纳谏以通上下之情，而设官以别择之，又命省臣提调之，谠言之得闻者，寡矣！宜乎不旋踵而亡也。”④ 他还根据《善才寺观音院碑》揭露盐税扰民，根据《提举常平司公据》揭露酷税扰民。钱大昕在考释金石碑刻之时，对“国祚”、“民忧”多发表看法，经世思想不言而喻。孙星衍更概括指出：“金石实一方文献，可以考证都邑、陵墓、河渠、关隘，古今兴废之迹，大有裨于政事，不独奇文妙墨，足垂永久。”⑤ 武亿认为“碑铭墓记，推显古人之功绪，上与史传相纠正，次与此方利病相考见”⑥。他们都把金石研究与生民利病联系起来。

金石研究既能补文献之缺，又能备朝章国故之选，意义非同寻常。欧

---

① 赵明诚：《金石录校证》卷十五《汉州辅碑阴跋尾》，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页。

② 《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盐宗神祠记》，见《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185页。

③ 洪亮吉：《关中金石记》书后、毕沅：《关中金石记》，经训堂丛书本。

④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二十《隆安选公传戒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2页。

⑤ 孙星衍：《京畿金石考》自序，道光七年抱芳阁刻本。

⑥ 武亿：《授堂文钞》卷三《偃师金石遗文补录序》，道光癸卯年重刊本。

阳修曾讲当时有一位叫张席的尚书郎曾为他言及“安邑、解县两池盐事。云夏月盐，南风来，池面紫色，须臾凝结如雪，士人谓之漫生盐。而两池岁役畦夫数百种盐，公私耗弊，而州县吏缘以为奸利，弃漫生盐不取，诬其苦不可食”。并称以前安邑、解县的盐都是自生的，直到唐朝开元年间盐池枯竭，才开始人工造盐。因此张席上书讲开采漫生盐的好处，建议朝廷罢除造盐的畦夫，以使公私具享其利。但是有人却提出异议，或说漫生盐味苦不能食用，或说漫生盐生成后很快就消散了，难以收集，这使一些人对张席的建议产生了怀疑，而欧阳修读唐朝大历年间任榷盐使的徐义方所撰的《盐宗神祠记》，见其论漫生盐“若阴阳调和，鬼神驱造，不劳人而擅其利，与夫凿泉煮海，不相为谋”，从而印证了张席所言确非妄语，所谓“由是知唐世盐非营种为决可信”，由此肯定了张席建议的可行性。[①] 光绪年间曹廷杰通过对特林的两块石碑《永宁寺记》和《重建永宁寺记》的研究，从而推翻了时人认为清朝东北边塞只到铁岭、开原的看法，得出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长期以来一直为中国领土的结论，所谓“史论家动谓明之东北边塞尽于铁岭、开原，是未睹二碑之原文也”。因此请求将两碑拓文“宣付史馆，一以补《明史》之缺，一以备国朝掌故之选，庶几边地沿革，足以传信后世”。[②]

三、金石与文字正定

学者对金石文献正定文字的功能也非常重视。早在宋代金石学兴起之初，刘敞就认为利用金石文献可以使“小学正其文字”[③]。清人段玉裁认为“许氏以后，三代器铭之见者日益多。学者摩挲研究，可以通六书条理，为六经辅翼”。又说：“六经以古文传，而所谓古文者，即如商周鼎彝之书，今世学者或未能知之也。”[④] 乾隆时期他在成都曾欲寻“孟蜀广政时所

① 《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盐宗神祠记》，见《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185页。

② 《曹廷杰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9页。

③ 刘敞：《公是集》卷三十六《先秦古器记》。

④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七《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写本〉书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刻石，及宋皇祐以前所补，以为能见残碑破字于荆榛瓦砾中，未必不可以为校雠之助也”[①]。孙星衍说：“经义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书，六书当求之篆籀古文，始知《仓颉》、《尔雅》之本旨，于是博稽钟鼎款识及汉人小学之书，而九经三史之疑可得而释。”[②] 翁方纲认为“且即以篆变隶、隶变楷以来，上下正变之概，岂易罄陈而可忽视之乎？正惟力穷书法原委而时或他有所证，则愈见金石文之裨益匪浅也”[③]。龚自珍《商周彝器文录序》也说：“凡古文，可以补今许慎书之阙。”[④] 都在说明金石碑刻对文字学研究所具有的价值。

宋人黄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汉彝器款识，研究字画体制，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书讨论备尽”[⑤]。清人王筠探讨字形演变时，常常用金石文字加以推演，如释“角”：“兽角也，象形。角与刀、鱼相似。鹿下云：乌鹿足相似，谓篆文下半相似，然则此亦谓三字之篆文，上半相似耳。许君所以言此者，《曹全碑》、《景北海铭》鳏字皆从角，知是时六书裂坏，故言之，《系传》曰：‘言似者，其实非也。’虽不悟许君措辞之旨，而适符其辨正之意。北齐《药方碑》‘療五痔方，用牛角鰓’，是又讹角为鱼也。虽非许君所及见，而鱼、角互讹可见矣。”[⑥] 又释“日”：“日形正圆，而石鼓文从日之字作三形，或上方下圆，或上下皆方，知此字变形已久。”[⑦] 段玉裁对“牙，壮齿也”注称：“壮各本讹作牡。今本《篇》、《韵》皆讹，惟石刻九经字样不误，而马氏版本妄改之。”[⑧] 又对“僰，键为蛮夷也”注称：“犍各本作键，今依

---

①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一《跋黄荛圃蜀石经毛诗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② 孙星衍：《问字堂集》卷四《答袁简斋前辈书》，见《问字堂集·岱南阁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91页。

③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81页。

④ 《龚自珍全集》第四辑《商周彝器文录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7页。

⑤ 《宋史》卷四百四十三《文苑五·黄伯思传》。

⑥ 王筠：《说文句读》，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4页

⑦ 王筠：《说文句读》，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4页。

⑧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汉碑从木。”[1] 又对“矜，矛柄也，从矛令声”注称：“各本篆作矜，解云今声，今依汉石经《论语》、溧水《校官碑》、魏《受禅表》皆作矜正之。”[2] 钱大昕以金石论文字，所谓：“汉时隶书多不正，啄琢本取豕声，而误从豕；蠡本取彖声，而误从豕。若娄机所举《韩敕碑》、《张公神碑》、《杨著碑阴》、《刘宽碑阴》，豕字皆从豕，亦以豕为豕之证也，故特于此辨之。以彘代豕，恐与豕相混，后人妄改豕为豕，而其义晦矣。”[3] 其《金石文跋尾》卷四《观音寺碣》条：“国字，《玉篇》、《集韵》诸书皆无之，读斯刻知以国为国，唐初已然矣。”[4] 又《金石文跋尾》卷六《兖公之颂》条“颜之推云‘孔子弟子虙子贱，虙羲之后。俗字亦为宓，或复加山。今兖州永昌郡城，旧单父县地也。东门有《子贱碑》，汉世所立，乃云济南伏生即子贱之后，是知虙之与伏，古来通字，误以为宓，较可知矣。今本《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密不齐’，此碑亦用‘密贱’字，正之推所讥为俗字也”[5]。以金石正定文字，是文献考证的重要内容。

第四节 金石证史的观念对20世纪历史文献研究的影响

金石学不仅在宋、清两代成为学术研究的显学，取得了足以让后世叹服的成就，而且影响了近代史学的发展，尤其对文献研究影响巨大，既推

---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页。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19～720页。

③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一《答问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④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四《历城县千佛崖石刻五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⑤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六《兖公之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

动了文献考订实践的发展，又丰富了文献学理论与方法的内容。

一、金石证史、考古资料与二重证据法

在中国古代，考古与金石总是联系在一起。宋代金石学发达，很多金石著作都冠以"考古"的名称，如程大昌的《考古编》、吕大临的《考古图》等，因为金石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古代"吉金"（青铜彝器）和石刻，故总是被冠以"考古"之名。20世纪初，虽然近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在中国得以诞生，但是，"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近代考古学的先声"[①]，则是不争的事实。

自晚清开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开始了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型。在这种学术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金石证史的文献考订思想和方法与近代考古学相结合，逐步演化、蜕变，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了近代史学的发展，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一生对金石碑刻及出土文献情有独钟，因为在他看来，新材料的发现是学术进步的重要条件，所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②]。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既是近代中西学术激荡以及甲骨文、敦煌文书、汉晋简牍三大考古发现刺激的结果，同时也是传统金石证史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

王国维认为，近代金石考订之学与古代金石学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③]。"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④]。他曾撰写《宋代之金石学》，对宋代金石学成就进行过总结。在他看来，有宋一代，金石文化别具一格，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搜集研究金石的风气，对金石器物的文字、形制、

---

① 王子今：《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②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见《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③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④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命名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①]。尤为重要的是，宋人“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其成绩实不容蔑视也”[②]。这种“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的金石考史的方法，正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雏形。换言之，这种以史传考金石，以金石考史传的二重证据法虽为王国维所提出，但实际在宋代乃至其后的考据史学中已多有应用。对此，王国维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故不自今日始矣。”[③] 可见，在王国维看来，二重证据法实际上早已有之，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宋、清两代的金石考史，人们只是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它而已。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考古大发现的时代，深埋于地下的金文甲骨、碑刻墓志、简牍文书等文献，纷纷重见天日。如何运用这些新材料来研究古代历史，就成了当时史家必须思考的问题。金石与史传互证的传统研究方法，启发了包括王国维在内的近代史家的研究思路。当然，毕竟时代不同，新资料的出现已非宋、清时期所能比，不仅“金石之出于邱陇窟穴者，既数十倍于往昔”，而且“洹阴之甲骨、燕齐之陶器、西域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出于近数十年间，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该之矣”。大量金石资料的面世使得传统金石学的研究方法仍然显示出自己独有的生命力，而金石之外的新资料的出土，“数量之多，年代之古，与金石同；其足以考证经史，亦与金石同”。[④] 这些又使得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要求。金石证史的研究方法要在新时代转轨，发展为古器物

---

①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5 页。

②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4 页。

③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见《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3 页。

④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八《〈齐鲁封泥集存〉序》，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56 页。

学、古文字学。

在王国维看来，金石及其以外的出土文献的发掘，必然使得传统的金石证史走向综合运用的道路，史学研究者不仅以金石，而且应以甲骨、简牍、玺印、陶器等综合应用于经史考证、古籍整理和古代文化的研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之“新”，便是综合运用出土文献证经考史的例证。

有鉴于此，王国维云：“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① “纸上之材料”即历史记载，也就是传世文献，“地下之新材料”即出土文献，包含金石甲骨。二者相互印证，即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不仅提出二重证据法，而且率先垂范，以史籍与出土甲骨、金文及简牍文书互证，不仅使历史事实得到清理，而且加深了对古代文献的解读。王氏所撰《流沙坠简》、《毛公鼎考释》、《殷先公先王考》等都是二重证据法的代表作。其《古史新证》则进一步阐释了二重证据法的价值。王国维之学源出于乾嘉考证学，因身处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时代，其治学境界又远远高出于旧经史考据学者之上，在运用甲骨、金石、汉晋简牍以及敦煌文书等新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证，并考释古史时，突破了旧金石学家器物著录、文字考释的研究范畴，目光远大，视野广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流风所及，俨然形成了一股学术风尚，成为近代以来文献考订的主流。人们开始超越文献考订从文献到文献的局限，继承自宋而始的金石证史的方法，结合近代以来考古发现之新材料，在文献考证方面，走着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相印证的路子，来解决文献整理及古史研究中的问题，形成了一套更加成熟的、超越传统金石证史的理念和方法。

从学科转轨的角度看，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金石学逐步被考古学代替。② 但是，这并不是说金石学就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

①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见《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② 查晓英：《金石学在现代学科体制下的重塑》，《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它的理论和方法对现代考古学依然有着重要的贡献。20世纪初期，一大批金石出身的学者如董作宾、马衡、黄文弼、徐旭生，他们以金石进入现代考古，自然将金石学的研究方法带进考古学领域，使得金石学以一种变化的方式存在下来，在现代考古学史上展现自己的风采。有学者指出，金石学对现代考古学的贡献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器物定名，二是青铜器的分期，三是古物证史，四是古籍校勘。[①]

从学术思潮流变的角度看，由金石证史和现代考古所启发的二重证据法对20世纪学术发展及学术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冯友兰曾于1935年撰文云：“中国近年研究历史之趋势，依其研究之观点，可分为三个派别：(一)信古，(二)疑古，(三)释古。‘信古’一派以为凡古书上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疑古’一派，推翻信古一派对于古书之信念。以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②] 以出土之新材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既不信古，也反对疑古过头，王国维云：“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亦《谍记》之流亚。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此信古之过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③] 王国维等人重视在恢复古史面貌过程中，地下文物（包括吉金、简牍、碑刻、帛书等）与传世文献的重要，既不认为古书所说全部为真，也不认为古书所载全部为伪，即不全然信古，也不全然疑古，在坚持“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的同时，广泛占有地上地下所有的资料，相互比勘，反复考证，从而得出结论，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恢复典籍原貌，建立科学的古史研究体系。

---

① 闫志：《金石学在现代中国考古学中的表达》，《华夏考古》2005年第4期。

②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见《冯友兰全集》第十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③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见《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求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更是文献研究的优良传统。求真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求文献之真，一是求史实之真。史实的载体是文献，只有保证文献的真实，才能保证史实的真实。有鉴于此，中国史学重视考证，尤其重视对文献真伪、正讹的考证，并由此出发，对史实进行考证。也就是在重视文献考证的学术氛围中，吉金碑石成了宋以后文献学家印证经史文献的有力手段。但是，古代金石学“涂术虽启，而流派未宏”，其所使用的方法和研究的范围都还很有限，近代以来的学者在传统金石学基础上倡言二重证据法，并身体力行，使传统金石证史的观念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二、简帛佚籍与文献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古代金石考史，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金石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比如清代乾嘉时期，金石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吉金、乐石，其他如陶器、瓦当、铜镜、古玉、玺印、钱币等都在研究之列。到晚清，金石学研究范围更加扩大，除上述器物外，砖、封泥、明器乃至一切有文字铭刻之物都成为金石学家的研究内容。也就在这一时期，甲骨文、敦煌遗书、汉晋简牍出土，被称为清末三大考古发现。这使人们的研究兴趣随之扩大到甲骨学、敦煌学和简牍学方面来，传统金石学研究体系已经不能包容如此之多的研究内容。随着更多的简牍和帛书的出土以及卓有成效的整理研究，简帛学走向了历史的前台，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堪称继甲骨学和敦煌学之后迅速崛起的举世瞩目的国际显学之一”①，成为20世纪文献研究史上最值得关注的话题。

晚清以来，简牍帛书出土数量惊人，有人统计，20世纪初至2003年出土的简帛共22万枚（件）左右，总字数约700万字，② 出土的简帛内容

---

① 谢桂华、沈颂金、邬文玲：《二十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② 张显成：《论简帛的文献学研究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1期。另外，谢桂华、沈颂金、邬文玲所撰《二十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认为截至2003年，已经出土的简帛总数超过24万枚。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等诸多领域。如此数量巨大的简帛为历史文献研究和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又翔实的资料，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文献学研究的局面。

20世纪的简帛学研究，形成了几个热点：西北简牍研究，主要成果有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黄文弼的《罗布淖尔汉简考释》、夏鼐的《新获之敦煌汉简》、陈梦家的《汉简缀述》、陈直的《居延汉简研究》等。云梦秦简研究，主要成果有高敏的《云梦秦简初探》、《睡虎地秦简初探》、中华书局编的《云梦秦简研究》、栗劲的《秦律通论》、高恒的《秦汉法制论考》、曹旅宁的《秦律新探》、刘乐贤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吴小强的《秦简日书集释》、王子今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等。尹湾汉简研究，主要成果有蔡万进的《尹湾汉墓简牍论考》等。郭店楚简研究，主要成果有丁四新的《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郭沂的《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李天虹的《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研究》等。张家山汉简研究，主要有高大伦的《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张家山汉简〈脉书〉校释》、彭浩的《张家山汉简〈算术书〉注释》等。上博楚简研究，主要成果有上海大学、清华大学合编的论文集《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等。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主要有大批研究论文发表。马王堆帛书研究，主要成果有李学勤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邢文的《帛书周易研究》、魏启鹏的《马王堆帛书德行校释》、马继兴的《马王堆古医书考释》、韩健平的《马王堆古脉书研究》、张显成的《帛书药名研究》等。[①] 可以说，无论是简帛的整理，还是研究论著的发表，都为20世纪文献学研究增添了新内容。

对于文献研究和古史研究来说，简帛与金石一样，都属于新资料。在这些新资料没有发现以前，历史研究主要围绕传世文献进行，对传世文献进行考订、辨伪、校勘、注释、补苴、辑佚等，以求文献之真，进而求得史实之真。但是，传世文献由于在流传过程中极易遭受破坏，且不断被传抄刻印、注释诠解，失真讹误极为常见。而出土文献深埋地下，保留了当

① 参见谢桂华、沈颂金、邬文玲：《二十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时的原貌，具有极强的“原版性”，故而被人们视为文献研究的至宝。

简帛佚籍中包括《诗经》、《周易》、《缁衣》、《老子》、《战国纵横家书》等儒、道、纵横等多家学派的著作，内涵丰富，价值巨大，对文献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首先，出土文献弥补了传世文献的缺佚。就先秦文献而言，由于秦始皇焚书等原因，流传至今的典籍数量有限。大量简帛佚籍的出土，使人们看到了许多没有看到的文献，填补了文献学史上的很多空白。许多见之于后世目录著作中的亡佚文献，也因出土而重现于读者面前。其次，出土简帛在古籍版本研究上有着重要参考价值。未经流传的出土文献，版本古老，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上古文献真实面目的极其珍贵的材料。第三，出土简帛可以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传世文献，难免被人篡改，出土文献没有经过后人传抄刊刻，保持着书写时较原始的状态，属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用出土文献校勘传世文献，有助于对传世古籍的校读。第四，出土文献有助于对文献形成过程的认识。不少传世文献经过后人不断编排，书成何时，殊难定论。出土文献成于当时，面貌原始，使得对一些重要典籍的成书年代的推断有了依据。第五，出土文献有助于古籍辨伪，可以为一些“伪书”正名。根据出土简帛考察，很多被判定为“伪书”的著作并非伪书，为人们正确认识、利用古代典籍提供了极大帮助。[①] 总之，出土简帛佚籍可以证传世文献之信，纠传世文献之误，补传世文献不足，扩充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内容。

由于简帛文献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中发挥了别种文献所不可替代的作用，解决了一些学术疑难问题，故而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对出土文献的盲目迷信，在理论与方法论上出现了偏颇。凡传世文献与简帛文献出现歧异，人们便认为简帛文献全是真的，完全可靠，而传世文献全是假

---

① 关于简帛文献的价值，有很多论述，代表性的论著有张玉春《略论简帛文献对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作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5期），廖名春《出土文献与先秦学术史的重写》（载姚小鸥主编：《出土文献与中国文献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尹振环《也谈帛、简〈老子〉之研究》（《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4期），张显成《论简帛的文献学研究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1期），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的，是靠不住的。再加上简帛佚籍研究的空前繁荣，有些学者甚至根据对出土简帛的解读，把“重写学术史”的计划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出土文献在古代学术史研究中熠熠生辉，而传世文献则黯然失色，这也未必可取。

传世文献固然因为自然或人为的原因而遭到过破坏，但很多传世文献能够流传下来，也绝非偶然，因为经过改朝换代、火烧水淹而能流传至今，必是古代典籍中的精品，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人为贬低，实不可取。而且，有专家经过深入研究，把传世文献与出土帛书比对，指出在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1] 推翻了唐兰、杨宽、马雍等人的看法。因此未必能说出土文献的可信性就时时处处都超过传世文献，传世文献时时处处皆不如出土文献。

传世文献在流传中难免造成讹误，但并非全属讹误。同样，简帛文献去古未远，甚至是当时产物，保存了古代文献的真迹，但不可否认的是，和传世文献一样，出土文献也有不少是抄本，其底本是否存在讹误，能否一味盲信，都是需要充分注意的。况且地下文献在出土时会有散乱、缺损等现象，需要释读、编联、补缺等大量整理工作。换言之，出土文献也有真伪相杂的现象，也必须进行一番去伪存真的清理工作，正如古代金石学家所做的那样，不仅以金石证史传之误，而且以文献证金石之误，不能一概相信出土文献为真，更不能有出土文献皆真的思维前提。传世文献的研究方法，诸如校勘、辨伪等，同样适用于出土文献的整理。简帛佚籍可以证明传世文献的可靠与否，同样，传世文献也可以用来考察出土文献的诸多问题。

就研究态度而言，在研究出土文献时，研究传世文献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同样值得提倡，陈垣特别强调怀疑精神在文献考证中的地位，他说：“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2] 出土文献同样需要考证，既然需要考证，就必须具有怀疑的精神，盲目崇信出土文献，失却了怀疑精神，就失却了文献研究的基本法则。

---

① 赵生群：《〈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②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60页。

第八章
数字化时代古籍整理的理论与方法

人类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人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古籍整理领域亦是如此。在这个时代，《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丛书飞入寻常百姓家已不再是神话，因为它们只不过是一摞薄薄的光盘；在这个时代，端坐书斋查阅、获取以前绝难见到的中华古籍翰典也不再是神话，只需你轻敲键盘、移动鼠标；在这个时代，从浩瀚古籍中查询所需要的资料，不再需要皓首穷经，只需数秒的时间。伴随着古籍的大量数字化，古籍整理已经不能拘泥于传统的观念、方式、方法，因为许多观念正面临着巨大冲击，方式、方法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可以说，在数字化时代，古籍整理工作正经历着一场革命。

第一节　数字化：古籍整理的新方式

何谓“古籍数字化”，这是近年来讨论很多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毛建军认为："古籍数字化就是从利用和保护古籍的目的出发，采用计算机技术，将常见的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从而制成古籍电子索引、古籍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用以揭示古籍文献信息资源的一项系统工作。"[①] 这一概念较为恰当地表述了古籍数字化的内涵，对探讨古籍数字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古籍数字化还处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之中，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但不可否认，它是 21 世纪古籍整理的主流，代表着未来古籍整理的发展方向。

一、古籍数字化成为古籍整理的必然趋势

1. 古籍整理工作总是伴随时代新技术的发展而进步。

新技术是一个时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纵观中国古籍整理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古籍整理工作总是伴随时代新技术的发展而进步。以古籍整理所依据的载体为例即可说明这一问题。

人们最早是将文字和符号刻在岩石、龟甲和兽骨上，但这种文献载体数量不多，而且无论是书写还是阅读都十分不便，因此这种文献载体并不发达。随着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将青铜器作为一种载体来记录文献，但青铜器体积庞大、笨重，刻写内容有限，传播十分不便。后来，文献又刻写在竹简或木牍上，中间用丝或革串联，这是书籍最初的形制。因每片竹简或木牍能刻写的文字非常有限，因此这种形制的书籍相当笨重，短篇文章就需"累牍"，不仅不便于阅读，而且不好携带。用于串联简牍的丝（革）容易断开，简册容易散落、遗失。帛书作为简册与纸质书籍之间的过渡形制，因其材料珍贵，不易保存，而使用范围有限。东汉中期，造纸术的发明在文献形制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到东晋，纸张已经取代简帛而成为书籍的唯一材料，而且直到现在纸质文献依然是古籍的主要载体。可见，从甲骨文献、青铜文献、石刻文献、简帛文献直到纸质文献，每一次文献载体的更迭都是技术选择的结果。

---

① 毛建军：《古籍数字化理论与实践》，航空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 页。

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丛书、类书越编越大，诸如《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之类的超大部头书籍并非一般书生所能拥有，自然会影响到人们对它的利用，而且其存放也存在问题。加之近代以来，各地图书馆非常重视古籍善本的保护，大量纸质古籍自然束之高阁而不轻易示人，大大影响到了人们对古籍的充分利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开始采用缩微技术来实现古籍文献的缩微拍照，不少国家都建有缩微胶片存放中心。缩微技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古籍的存储问题，而且借助于特殊设备实现了异地阅览的愿望。但是，并非各地都有特殊阅览设备，因此其局限性仍非常大。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个人电脑的普及和存储技术、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人们开始将古籍文献载体纳入数字化的轨道，电子文本版、图像版、网络版等形式的古籍载体形式纷纷出现。《四库全书》载体的变迁就是典型的例子。纸质《四库全书》共收书 3400 多种，79000 多卷，分装 36000 多册，总字数达 8 亿余字，当时抄成 7 部，分别建阁深藏，世人难得一见。而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将经史子集四库所有文献通过扫描录入，以图像方式存贮制成了 153 张光盘，可以装在一只塑料袋里；文本版只有 15 张光盘，更宜保存。在数字化背景下，个人拥有《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初编》等已不再是梦想。可以说，数字技术的应用，实现了文献载体的革命性飞跃。

在当今社会环境下，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科技已经广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就给古籍整理与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条件并增加了许多崭新的内容。古籍整理工作必然会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得到发展，这是新时代新技术的推动，也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

2. 时代发展亟须古籍数字化。

古籍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古籍具有不可再生性，很多古籍或因主观、或因客观的原因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流失，而保存下来的古籍大多封藏于高阁，这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是非常不利的。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对民族文化进行更进一步的弘扬。当今社会，数字化技术飞速发

展，借助它们可以迅速、准确地进行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我们可以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将纸质古籍转变成电子版本，以达到更大范围、更方便地保存和利用古籍的目的，进而对古籍进行整理和挖掘，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弘扬我们悠久的民族文化作出贡献。古籍数字化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很好的保存和传播古籍的便捷途径。

古籍数字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当今世界竞争归根结底是实力的竞争，除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之外，文化软实力也非常重要。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我们应该充分地加以弘扬和宣传，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为达此目的，除了需要在国外大规模建立孔子学院弘扬和传播中国文化外，我们还需要利用另一个阵地——互联网。互联网具有不受时空限制、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它可以使人类的精神文化宝库跨越时空，实现全人类资源的共享。将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瀚典搬上互联网，可以让古老的中国文化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再现辉煌，让世界感受到中华文化恒久弥新的魅力。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3. 学术发展亟须古籍数字化。

古籍数字化给研究者寻找古籍提供了极大方便。由于古籍资源的珍贵和稀少，使其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又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但因其获之不易，保存困难，一些博物馆、图书馆往往或拥书自珍、秘不示人，或查阅手续复杂、限制众多、费用昂贵，常让读者望而却步，使古籍的使用基本处于封闭状态。这一做法虽属无奈，但违背了文献存在的基本原则。比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有相当部分散佚国外，20 世纪 30 年代，王重民、向达等老一辈敦煌学家远涉重洋，亲赴英国和法国去查阅过这些文献，经历的艰辛非常人所能想象。而今，查阅敦煌文献就不用远渡重洋了，安坐家中，通过网络就可看到远在伦敦的敦煌文献。现在是个学术快速发展的时代，学术的快速发展要求书籍查阅的便捷化，数字化自然成了解决古籍不易找寻这一难题的极好方法。

学术研究，尤其是涉及古籍的学术研究，对古籍资料的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中国古籍可谓汗牛充栋，尽管有些古籍经过了系统整理，出现了

一些检索工具书，但毕竟是少数，因此，学者都将从古籍中爬梳资料视为学术研究的基础和重中之重。用传统的手工检索方式对古籍检索，不仅速度慢，而且难以查全。把古籍数字化，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学术研究者的研究效率，将学者的时间和精力从艰难、费时而繁琐的爬梳、翻检工作中解放出来，以用于更多的抽象思维活动，从而大大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电子版《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等的高效率检索已经带给了人们极大方便。相信随着学术研究的快速、深入发展，必将有更多的古籍会被数字化，从而嘉惠更多的学人！

4. 古籍数字化条件的具备。

随着IT产业的迅速发展，计算机性能越来越好，硬盘存储容量越来越大，网络技术、OCR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扫描仪、数码相机性能越来越好，这一切使古籍数字化具有了必备条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那就是古籍数字化的用字问题。这是古籍数字化的核心问题，直接涉及计算机汉字编码体系是否够用、是否能够国际共享。

为统一标准，我国先后公布了《通信汉字字符集及其汉字交换标准》(GB2312－80，收简化字 6753 个)、《信息技术多八位编码字符》(GB13000－1993，收录 20902 个汉字编码)、《汉字内码扩展规范》(GBK－1995，收录 21003 个汉字编码)、《信息技术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的扩充》(GB18030－2000，收录 27533 个汉字编码)。尽管依据以上字符集收字不少，但在整理古籍、辞书出版时还会遇到很多缺字，补字的工作量很大。更为重要的是，GBK 的编码体系是非国际标准的，无法在其他语言视窗平台下使用，如果采用它作为古籍数字化的字符集，势必会影响古籍数字化成果的国际共享。

20 世纪末，人类把迄今为止尚存的语言按照其文字统一编码，制定出全球通用的编码符集标准即 Unicode。Unicode 拥有充足的汉字编码，它的码位所容纳的汉字囊括《康熙字典》和《汉语大字典》，同时它还包含少数民族文字及其他多国文字。正因为这一特点，人们使用 Unicode 技术可以实现跨语境的应用，使数字化的古籍在中文简体、中文繁体、日文、韩文、英文等多种视窗平台上运行，以实现全球共享的愿望。

伴随着 Unicode 技术的运用，符合该标准的新的汉字 CJK 编码（收 4 万左右汉字）诞生了。但是实际使用的过程中，人们依然有用字不够之憾，于是超大字符集应运而生。经过探索和实践，目前国内学术界在字符集的采用上较为认同国际标准的 ISO/IEC 10646 超大字符集。缘何采用这一国际标准字符集呢？首先是因为它的结构体系能够同时处理多国文字，可以在不同的视窗平台上运行，解决了古籍资源全球共享的问题。其次是因为它包含了较为充足的汉字数量（7 万汉字，国际标准内码）。

尽管如此，人们在整理字书、韵书、佛典等特殊古籍时，超大字符集依然不能达到古籍的用字量。为了能够全部浏览古籍的内容，很多古籍数据库都要求下载相应的字库。常见的主要有如下几种：

甲骨文字库：主要有南京大学、河南大学、苏州大学合作开发的甲骨文字库，据说这个字库收入所有的甲骨文字形，可以像 GBK 的汉字输入那样用；北京师范大学的甲骨文字库，收约 7000 余字；香港中文大学汉达古文献数据库中心编制的汉达甲骨文字库，收甲骨文包括异体共 6400 余字，其字形编码为单独编码，不合通用规范，只能用该中心专用程序检索。

金文字库：台湾“中央研究院”金文字库收录《金文编》中的 3459 个金文。华东师范大学商周金文数字化处理系统的金文字库，收录金文原形字 14249 个、金文偏旁 539 个。

竹简帛书字库：汉达古文献数据库中心有竹简帛书字库。另外，华东师范大学的战国楚文字数字化处理系统带的战国楚文字字库，收录了迄今已发表的战国楚系简帛文、铜器铭文、玺印文、货币文文献，相关实物材料 2267 件，文献本体总字数达 56689 个。

小篆字库：小篆字库种类较多，其中最有研究价值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说文解字》小篆字库。为了兼顾专业用户与普通用户的需要，该字库既保持《说文解字》小篆的完整性，又保持其应用性，且实现了用篆字直接提示重码输入，解决了小篆字库的输入问题。

HTCJK＋字库：北京书同文公司为《四部丛刊》设计的专门字库，对

应CJK＋编码，是能满足古籍整理一般需要的非常实用的汉字字库。①

二、数字化时代古籍整理方法的变革

传统的古籍整理方法不外乎校勘、标点、注释、训诂、今译、辑佚、汇编等几种。其中，校勘和标点是任何古籍整理工作的基本工序；注释、训诂、今译是对古籍内容的研究性理解；辑佚和汇编是对古籍文本的再加工和重组合。数字化时代，一些新技术、新手段在古籍整理过程中逐渐加以运用，虽然有些尚处于探索阶段，但已经对传统古籍整理工作的方式、方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古籍文字录入方式的变革

当前，古籍文字录入方式已有了多种不同的选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键盘输入，用此方法数字化一二本古籍尚可，若数字化众多古籍，则工作量太大。另一种是通过扫描或照相技术将古籍原文转化为数字图形，再通过汉字识别将数字图形映射为数字元，转换成文字编码，这就是一般所说的OCR（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凭借OCR技术，古籍的输入可望摆脱手工逐字录入的方式，大大加快古籍数字化文字录入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OCR技术在多个领域的运用，专门针对古籍输入的OCR系统不断出现，而且也有了将OCR运用于大规模古籍输入的较为成功的范例。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在研制过程中开发的OCR系统，一次正确识别率平均已达92%，OCR引擎标识符典已拥有7000多汉字的多种笔迹，涵盖了古籍语料的99%。

目前，市场上的OCR软件有很多。其中，书同文公司的数码翰林系统是该公司在《四库全书》、《汉语大词典》、《四部丛刊》等文献工程中的实践成果，其嵌入的OCR引擎，不仅能识别印刷体，而且能识别手写体；不仅能识别简化字，而且能识别繁体字、异体字、讹字和俗字，是目前大规模古籍整理中OCR技术运用得比较好的输入系统。

当然，OCR技术也不是万能的，其识别率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

---

① 朱腾云：《汉字电子录入与古籍整理》，《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扫描数据的清晰度、古籍字体的复杂程度等都会对其识别率产生影响。即使是书同文公司的数码翰林系统，其对不同时期誊抄、手抄和不同朝代的那些古籍，其识别率仍然不够理想。

除了OCR技术之外，古籍数字化中的文字录入问题还与字库密切相关，大容量的字库是文字电子录入的基础。然而特殊古籍数字化过程中，常用的字库并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开发一些特殊字体、字形字库就成了必然趋势。这些特殊字库的建立，对于电子录入特殊字体、字形意义重大。

（二）古籍校勘方法的改变

校勘是古籍整理的基本工序，古籍数字化过程的特殊性使得这一工序更显必要和关键。

古籍数字化过程中，尽管使用OCR技术、特殊字库等方法，但由于OCR软件识别率不能达到100%以及底本本身的错误、古籍中存在的大量的异体字和避讳等文字现象，故而电子录入的文字依然存在不少讹误。面对繁重的数字化古籍校勘工程（如《四库全书》电子版之类），若沿用传统的校勘方法，势必需要大量的人力，耗费大量的时间，效率太低。因此，古籍的数字化必然催生校勘方式方法的变革。

电子校勘目前运用得最广泛、最成熟的手段是软件联机无纸校对。其基本原理是：电子校勘提供对同一种古籍的若干幅不同版本的全文书影①进行浏览，提供对同一种古籍多种不同版本中的一定数量的文字内容进行全文文本比较，也提供将古籍的书影与数码化的文字对照比较，对内容差异的部分，通过文字的不同颜色进行区别显示，还提供局部放大功能，协助研究者开展校勘工作。②

从具体校勘方式来看，大体可以分为图—文对比和文—文对比模式。

图—文对比是一种较浅层次的校勘功能，主要用于扫描图像和识别结果之间的对比。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开发出了对照校对、类聚校对、版面校对三种校对技术。对照校对工具用于字迹扫描图像与识别结果

---

① 用扫描仪扫描或数码相机拍摄的书的图像，叫书影。书影经过切分以后得到一个个字的图像，叫字影。

② 陈国庆：《数字技术在古籍整理中的运用初编》，兰州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的逐一校对，据介绍识别率可达98%。这是一种简单的比对行为，校对者甚至不必认识某些汉字，只需从形状上比对是否一致即可，大大降低了对校对人员的专业知识要求。类聚校对工具用于一定范围内编码相同汉字的图像与文字的对比校对。这种校对工具将那些难以辨识或容易致误的字类聚起来，在同一屏幕上加以显示，比较它们的相似程度和对应的汉字编码，进而发现错误并纠正。这种校对方法对校对人员的要求也比较低，而校对速度是对照校对的5倍以上。版面校对是将原文版面扫描图像与识别后复原的版面加以对照，主要解决缺字、字属性错误、字位置错误、字切分错误等问题。由于识别软件提供了待识别汉字的多个候选字，并建立了易混字字典，因此校对中发现错误时，校对者基本上不需要输入汉字，只需点击鼠标找到与扫描图像中的对应字就可以轻松完成修改。与传统的校勘四法相比，这三种校对方法还处在对校、本校层次，尚未达到理校和他校的范畴，但与“一人读书，校其上下”，“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式的传统校雠相比，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技术进步。①

文—文对比是一种深层次的校勘功能，主要用于几种不同版本古籍的电子文本之间的对比，其核心技术是中文文本自动校对和模式匹配。古籍自动校勘系统主要包括四个模块：自动校勘模块、校勘信息显示模块、辅助工具模块和数据维护模块。② 这项技术手段虽不十分成熟，但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肯定会日臻完善，也自然会成为古籍数字化校勘的必然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校勘方法如何精当、校勘软件功能如何先进、强大，都不可能将古籍中存在的文字讹误一扫而空。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校勘无误，不仅传统的古籍整理工作做不到这一点，数字化时代的古籍整理亦达不到这一要求，能做到的只能是最大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讹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求我们在数字化古籍的校勘工作中，一方面要充分使用先进的文字识别软件、校勘软件及校勘方法，另一方面也要求校勘者具备一定程度的古汉语知识、文献整理知识，而不能仅做一名简单的技术

① 李国新：《中国古籍资源数字化的进展与任务》，《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年第1期。

② 陈国庆：《数字技术在古籍整理中的运用初编》，兰州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校书郎”。

（三）古籍电子标点的尝试

标点古书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对古代汉语、古代文化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鲁迅先生说：“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几圈几点，就把真颜色显出来了。”[①] 因此，标点是古籍整理最难的工作之一。

利用计算机能不能进行古籍标点，这是目前很多人怀疑的问题。因为长期以来，古籍的标点工作都是由专家凭借手工做的，计算机进行电子标点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李铎的论述却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我为计算机标点设计的思路是这样的：我们有已经标点的文献一亿两千万汉字，把这些文献交给计算机去自学习，它会分析统计出字与字之间的亲和度，哪些字用作句首，哪些字用作句尾，哪些字永不连用，哪些字组不可分等等古汉语的规律；再加上如《诗经》、五言诗及成语、人名、地名、职官等众多专用词的数据库，计算机以此作为它自学习的基础并生成新的知识库；然后对未加标点的古籍全面扫描切分。于是当这些古籍中每一语句的前后句，都被计算机根据已有数据库的判定原则而断句标点之后，中间字数较少的字组就自然而然成了新的‘句’。尤其是这个标点的过程本身又是计算机自学习的过程，这样就可以不断扩展已有的知识库。以这种建立在计算机能力特点之上并且可以迅速生成和扩展的知识库为根据去标点古籍，不仅其速度人工不能比拟，而且可能比人的经验与知识更为准确。”[②] 他指出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项羽本纪》的“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一句存在严重的标点错误。认为如果是计算机来标点，它根据自己的知识库就会判定：“去”字后不再接实义动作字，也就是“去”和“学”属于永不搭配的关系，这样便会点成：“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③]

---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点句的难》，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74 页。

② 李铎、王毅：《关于古代文献信息化工程与古典文学研究之间互动关系的对话》，《文学遗产》2005 年第 1 期。

③ 李铎、王毅：《关于古代文献信息化工程与古典文学研究之间互动关系的对话》，《文学遗产》2005 年第 1 期。

需要注意的是，精标本信息既然可以作为计算机的学习源和知识库，那么精标本中存在的错误标点信息肯定会导致计算机的错误标点。人们需要做的是，将纠正后的结果及时添加到知识库之中，对知识库进行修改，然后再用新的知识库重新给已经标点过的内容标点。

对于特定文体的标点，在电子标点的过程中，除了需要注意古汉语的规律，找出字与字之间的亲和度之外，还需要让计算机学习不同文体的特点，并根据各自特点做出高质量的标点切分工作。如果仅凭字词之间的亲和度以及汉语构词法，对于用诗、词、曲这种文体写成的文本，便可能错误切分和错误标点。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在设计这类程序时，充分考虑各种文体的特点并做出有针对性的处理。[①]

（四）古籍电子注释的设想

注释是古籍整理中一件难度极大的工作，有人甚至说注释一本书比写一本书还难，可知这一工作的不易。从注释的内涵上分，传统的注释主要包括校字、注音、释文、释意、释理、释典、释史、释地、释物、补缺、辩误、评论、解题等方面，相当繁杂。注释者往往为注释一个字词或典故而翻阅众多资料，耗时多日，言其皓首穷经并不为过。而对数字化古籍进行注释时，若沿用传统的注释方法，则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况且在古籍数字化时需要处理的往往不止一种文献，而是一批文献，这就更需要我们采用新的技术来注释古籍。

随着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资料的查找、分析变得非常快捷，运用电子注释将成为数字化古籍注释工作的发展趋势。大体而言，利用计算机作为检索工具可以完成三方面工作：

其一，可以在古籍数据库中穷尽式地搜索与被注释对象有关的材料，然后利用计算机进行分类排列组合，从而使注释工作建立在穷尽式搜索古籍资料的基础之上。当然，注释对象的选取不是随意的，多为一些冷僻、难懂的词语和典故等。

其二，在由字典、词典、类书、专类辞典（如人名大辞典、地名大辞

① 郑永晓：《古籍数字化与古典文学研究的未来》，《文学遗产》2005年第5期。

典、职官大辞典）等组成的庞大的工具书数据库中检索与被注释对象有关的资料，并建立与被注释对象的链接，达到一点鼠标相关注释内容立即显现的目的。《四库全书》电子版所用联机词典已具有这方面的某些特性。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前提是必须建立一个由字典、词典、类书、专书等组成的能够检索的工具书数据库。这一工程的建设绝非朝夕之事，需要长期规划、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其三，利用已点校、注释的古籍整理成果建立同义词、关联词数据库，作为沟通不同古籍文本、现代文献文本的中介系统，而且这一个中介系统内容越全面、越丰富越好。

至于资料汇辑后的意断、取舍工作，就目前计算机的整体功能来看，还有相当大的难度，非人力定夺不可。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设想，尚不成熟，与实际操作距离甚远。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数据库建设的进步，电子注释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五）古籍电子翻译的展望

我们听说过英译汉、汉译英等电子翻译方式，但似乎很少听说过古籍电子翻译。不过，随着计算机人工智能和大型字、词典数据库的开发，古籍电子翻译绝非天方夜谭。

我们知道，人脑在翻译古籍时需要两样东西：一是词典，二是语法规则。与此相类，电子翻译系统也需要这两方面内容构成，一是字、词典系统，即所谓的文字信息库，二是语法规则系统，即所谓的知识机构库。因此，若想让计算机代替人脑执行古籍今译的工作，首先得将这两方面的数据信息输入电脑，建立起两大系统。

作为一种语言符号，古代汉语字形和字义有确定的一面，也有因长期演变而存在的不确定的一面。如何在这种复杂的确定与不确定并存的局面下决定字、词对应的正确义项，需要有一定的古汉语知识背景。而目前文言翻译软件的编制者多为计算机专业出身，对古代汉语的熟悉程度不够，在选义上无法做到准确，因此运用这些软件翻译出来的现代文歧义严重，错误很多，难以卒读。

另外，进行具体的翻译之前，译者一般都要对文言文的内容有一个整

体的理解和把握，而这一过程是计算机不容易模拟的。加之，在今译的过程中，译者还需要根据具体翻译内容，对译文进行语言、文字方面的调整，既做到准确，又做到通畅、有文采。而机器翻译则显得比较死板，即使语义和语法方面不出现任何错误，翻译出来的句子也存在过于工整、流于套路和缺乏文采的缺陷。

尽管目前文言翻译软件水平不高，机器翻译还没有进入实用阶段，但我们相信，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开发力度的加大，电子翻译并非不可企及的事。

（六）古籍电子辑佚的实践

辑佚工作大致包含调查、搜集、整理、编排、标注出处等多道环节，不仅工序复杂，而且需要极其扎实的文献功底，非饱读诗书之士不能胜任，非有长期治学经历不能胜任。即使在辑佚非常发达、成就非常突出的清代，也仅有马国翰、戴震、章宗源、王谟、严可均等数十人值得称道。但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进步以及数据库建设，现在实现了电子辑佚，使原本视为畏途的辑佚工作变得简单了。

传统的辑佚方法，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和脑力，可谓读万卷书才能辑一部书。而在借鉴传统辑佚学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运用计算机，输入相关检索词，从古籍数据库海量的资料中搜索，数秒即出结果。在解决了最费力的环节之后，剩下的工作就是拷贝资料、比较异同、整理、编排、标注出处了。原本需要花多年时间辑佚一本书，现在仅需数天的时间，事半而功倍！

当然，要做到快速而准确的辑佚，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其一，需要有收录海量古籍的大型数据库。随着古籍数字化的飞速发展，这一目标不难达到。其二，灵活设置检索词，增加搜索面。比如，我们辑佚一本书，除了要输入书名进行检索之外，还要尝试输入其作者名（甚至字、号）、所含篇名等检索词进行搜索。其三，对于搜索到同一条佚文，需要比较不同版本的异同，择善而从，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辑佚者具备一定的文献学知识，否则无法做到考证源流、辨析真伪。

随着古籍数字化程度的加深，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古籍会数字化，因

此电子辑佚必然会焕发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七）古籍电子汇编的运用

所谓古籍汇编，就是本着一定的宗旨，采取一定的方式，遵循一定的体例，抄录古籍原文，编纂成书。如《红楼梦园林艺术描写资料汇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等，即属古籍的汇编。此种工作，实质上是在不改动原文的前提下对古籍进行某种形式的改编，包括选编、节编、摘编、汇编、合编等。

用传统的方法进行古籍汇编工作，需要翻阅巨量的文献典籍，从中找寻出与自己汇编主题有关的资料，用大海捞针来形容这一过程并不为过。然而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数字化古籍数据库，只要设置好相关检索词，很快就能找到所需的大量资料。然后再进行编排、整理，大大缩短汇编编制的时间。随着大型古籍数据库的不断建设，将来人们制作诸如书目、年表、索引、资料汇编等会更加容易，而且科学准确，省时省力，意义十分重大，前景无限。

当然，运用计算机、大型可检索古籍数据库进行古籍汇编工作，并不是万能的，有些工作如检索词的科学设定、对检索资料的鉴别、验证、选择、排序、整理等，还需要有一定文献学、古籍整理专业知识的人士参与才能完成。不过，运用计算机搜索已经大大减轻了人们的体力劳动，缩短了工作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无疑是古籍汇编工作的一个变革。

要言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型古籍数据库建设的快速进步，网络技术的日益发达，相信计算机运用于古籍整理与研究的领域会越来越宽、程度会越来越深、层次会越来越高。当前，高科技在古籍整理方面的应用尚属起步阶段，不少方面还不成熟，尚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还需要相关部门统筹规划进行大型古籍数据库的建设，需要古籍整理和研究者、古汉语学者及 IT 行业的同志们通力合作，不懈努力，使古籍整理工作在数字化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古籍数字化需要注意的问题

古籍数字化在给我们提供极大方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

题，有因开发者自身知识结构的欠缺而导致内容不精、校勘不精等问题；有因各自为战而导致选题内容重复问题；有因数字化文件格式繁多而导致的阅读和资料提取麻烦问题；有因缺乏宏观规划而导致的产品开发连续性缺乏问题；有因版权意识淡薄而导致的版权问题和盗版问题等。但从古籍整理的角度来看，古籍数字化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古籍的保真问题，一是古籍的整理问题。

关于这两个问题，学界有一些研究，如有学者认为："所谓'保真原则'，是说数字化古籍产品应该具有'文物存储性'，具有重现作为历史文物的古籍原貌的功能，具体表现是数字化古籍产品应该形成数字图形版。数字图形版主要满足版本研究、文物鉴赏、书史研究、文字校勘、原件对照等特殊需要，可以认为是印刷版阶段'影印本'的数字化"。"所谓'整理原则'，是说数字化古籍产品应该具有'资料应用性'，具有超文本浏览阅读、全文检索、研究支持等功能，具体表现是数字化古籍产品应该形成数字文本版。数字文本版是数字化古籍产品的主要形式，古籍数字化过程中的'整理'工作，主要就是围绕着形成数字文本版而展开的"①。从上面对古籍数字化保真原则和整理原则的分析可以看出，实际上作者是将二者割裂开来。我们认为，古籍数字化过程中，既要坚持保真原则，又要坚持整理原则，二者密不可分，整理是手段，保真是目的，整理是为了高层次的保真。

保真有形式上保真和内容上保真两个层次。形式上的保真，图像版古籍数据库已经达到这一目标，学界所谈的古籍数字化保真问题多是指内容上如何保真。以内容整理为主要任务的数字文本版追求内容上的保真，而不是形式上的保真。因此，这就需要在古籍数字化的过程中，既要坚持传统古籍整理方法的基本原则，又要兼顾古籍数字化的特殊性。在古籍数字化过程中，要做到兼顾保真原则和整理原则，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古籍数字化版本的选择。选择好的版本是进行古籍整理的第一步，也是进行古籍数字化过程中保真的需要。古籍在传抄的过程中，往往

---

① 李国新：《中国古籍资源数字化的进展与任务》，《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 年第 1 期。

有多种版本，良莠不齐，择其善本而从之，不仅是传统古籍整理工作的要求，也是数字化古籍的要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古籍数字化并未对这一问题加以重视，开发者往往喜欢选择容易获得的文献，而不是以版本的优劣为原则来选择数字化底本。底本不佳，数字化后大规模传播的效果自然不会好。因此，今后的古籍数字化应该聘请专家对古籍的版本进行筛选，尽量选择好的版本进行数字化。[①]

（2）古籍数字化文本校勘问题。校勘是初步的古籍整理工作。校勘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消除文字讹误，实现文本的保真，更方便读者阅读。在古籍数字化过程中，因为涉及大量文献的文字转录，因而比单本古籍校勘的难度更大，不仅需要使用新的技术手段，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文献学知识。李国新说："作为数字化古籍的最终产品，应在数字图形版和数字文本版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使文本显示和图形显示能够灵活切换，并且能够迅速准确地定位转换，以便于利用者作文本间的比勘对照。"[②] 遗憾的是，目前开发的一些古籍数字化成果，有一些很注意文本校勘问题，但也有不少对此并不重视，讹误不少。

（3）古籍数字化过程中的字形整理。字形问题始终是古籍数字化工作的重点与难点，也是人们对数字化古籍能否保真持怀疑态度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知道，支撑电子版文本的字库容量是有限的，而古籍中由于用字不规范，存在着大量的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避讳字等，加之这些字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难以从字库找到与其一一对应的汉字字符。也就是说，"由于古籍用字的非规范性，决定了现代古籍整理在字形转换上的非完全保真性"[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简单地追求对所有这类字形的保真，汉字字库恐怕永远难以满足需要。实际上，改正错别字、恢复避讳字、整理异体字等工作，不仅是古籍整理工作的要求，更是古籍数字化的

---

① 陈力：《中文古籍数字化方法之检讨》，《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 年第 3 期。

② 李国新：《中国古籍资源数字化的进展与任务》，《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 年第 1 期。

③ 李运富：《谈电子版古籍的保真原则和整理原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 年第 1 期。

要求。"所以，古籍的数字文本版应该用'整理原则'指导保真，让保真服从整理，而不是以牺牲整理为代价去追求形式上的保真"①。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古籍字形的整理的确是个薄弱环节。从大量的实践中，我们已经明确地认识到，数字化工作需要的整理与古籍的传统整理并不完全相同。它对字形的要求更为严格、精确。因此，我们当前迫切需要树立新的整理观念，遵循汉字构形的基本规律，贯彻汉字构形的基本理论原则，有效地解决数字化工作中的字形混乱问题。②

总之，古籍数字化从本质上来说是古籍整理的新方式，它要求开发者保真与整理并重，将古籍完整、真实且以数字化的形式展现出来，方便人们查找、检索，进而达到保存、传播古籍，弘扬民族文化的目的。目前，国内的数字化古籍产品真正全面体现保真和整理相辅原则的还不多，大多还停留在单纯数字文本版或单纯数字图形版的阶段。因此，明确保真和整理相辅这一重要理论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它为今后的古籍数字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

第二节　数字化时代古籍整理观念及相关学科的新变化

数字化技术正在引起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这一点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受得到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人类利用文献信息的方式也相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古籍的数字化不仅给古籍文献载体带来变化，而且对古籍文献的阅读、检索、古籍整理的方式方法、文献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以及与古籍有关的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李国新：《中国古籍资源数字化的进展与任务》，《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年第1期。

② 由明智：《古籍数字化需要树立整理的观念》，《中国出版》2005年第10期。

一、古籍整理观念的新变化

（一）古籍文献载体：由纸质到数字

通常说的古籍，包括古书和古书之外的、未形成“书”的其他古代文献，如甲骨刻辞、金石刻辞、简牍帛书、敦煌卷子等。其中，纸质文本是古籍的主体，主要是指先秦至辛亥革命之前，用传统方式印刷、装帧的书籍，包括历代刻本、手抄本、活字本、石印本、铅印本和影印本等。也就是说，古籍的主要载体是纸质本。随着古籍数字化工程逐步推进，许多古籍被数字化后，以数据库形式或置于光盘，或置于网络。在这种情况下，古籍的载体亦不再限于传统的纸质版本，而以数字版本的形态在社会上广为传播。

古籍载体的由纸质到数字，对古籍存储和共享模式产生深远影响。原本藏之馆阁、视为珍品的古籍，现已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原来动辄数千册的丛书，已变成薄薄的光盘……如今，一个人拥有多套大型数字化古籍丛书已经成为非常正常的事情，一个文史研究者电脑中储存的数字古籍，虽不能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却甚于“汗牛充栋”的规模。原来人们为寻找一部古籍，可能会不远千里求之大型图书馆，甚至远渡重洋、漂洋过海求之于异域，而如今通过互联网就可能达到目的。

古籍载体形态的改变也对人们的古籍使用态度产生影响。以前，人们一谈起古籍，就立即联想纸本古书，在数字化时代，古籍载体除了纸质本之外，更有数字本，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而数字本以其超文本链接功能、强大的检索功能、研究支持功能、即时交互特征以及文字复制功能等更能赢得人们的青睐，若无特殊要求，人们在阅读和研究中一般会首选数字本。这是一个观念上的巨大变化！

（二）古籍阅读方式：由看书到看屏幕

在前计算机时代，学者们阅读纸质古籍，是一页一页翻检，遇有需要的资料，随时记在卡片上，所以傅斯年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之名言。只有当相关古籍全部翻检过之后，卡片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动手写作。许多文史名著都是这样写就的，钱锺书的《管锥编》、

《谈艺录》就是在积累数麻袋笔记、卡片的基础上完成的。

而在数字化时代，许多纸质古籍有了数字版，因此学者只需借助计算机阅读相关古籍的数字文本版、图像版，或图文版就可查到所需资料，尤其是手边没有或找不到纸质古籍的情况下。随着越来越多的古籍被数字化，学者们阅读古籍的方式也将逐渐从原来的看书而转以看电脑屏幕。而且，越是年轻的学者，越习惯于通过电脑屏幕来阅读数字版的古籍。与传统的阅读方式一样，在看屏幕的过程中，学者们也可随时在数字化古籍中摘录相关资料，做出电子资料卡片。这一过程，不需“动手动脚找东西”，只需轻按复制、粘贴键即可完成任务，效率大大提高，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古籍数据库容量的不断增加，尤其是可远程访问的数据库不断增加，这就使学者们进行远程阅读成为现实。远程阅读不仅扩大了人们的阅读视野，而且增强了人们查阅资料的能力，它标志着人们的阅读方式已开始从直接查阅本地资料发展到通过网络进行远程阅读。这样的阅读方式，无论是对自然科学工作者抑或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①]

（三）古籍资料检索：由人工到电脑

实现古籍资料检索的自动化是古籍数字化带给我们最大的好处。在数字化古籍出现之前，学者们研究某一问题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搜集资料，有时甚至为寻找一条资料而耗费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最为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清代考据大家阎若璩花费十九年时间查找“使功不若使过”一语出处了。《潜丘札记》云：“忆甲子初夏，自碧山堂移徐公健庵寓邸。夜饮，言今日直起居，上云‘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过’，此语自有出，既思不可得，又不敢上问，奈何？余对丙午、丁未间重策论，读宋陈傅良时论，有《使功不如使过》题，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发挥，应是昔人论此事者作此语，第不见出何书耳。公曰‘博’。越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高祖谓靖逗留，诏斩之，许绍为请而免，后

① 郑永晓：《古籍数字化对学术的影响及其发展方向》，《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6年第4期。

率兵八百，破开州蛮冉肇则，俘禽五千，帝谓左右曰：‘使功不如使过，靖果然。’谓即出此。又越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卢放谏更始使者勿斩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过。’章怀太子贤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处。甚矣，学问之无穷，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黄永年分析这段话说：“这里所说的甲子是康熙二十三年，阎氏已四十九岁，越十五年是三十七年，阎氏六十四岁，又越五年是四十一年，阎氏六十八岁，先后历时十九年到六十八岁高龄才找到‘使功不如使过’的出处，难怪阎氏要叹‘人尤不可以无年’。”①

而数字化时代，这些繁重、艰难的资料检索工作，可以借助计算机，从各种古籍数据库中轻易完成，不仅速度飞快，而且准确率高。可以说，数字化古籍的普及为整理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最便捷、最经济的资料检索途径，为他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它可以大大弥补人脑的不足，可以提供快捷、多角度、全方位的检索和资料比照，提供穷尽性的数据基础，缩短研究的周期，这对改变以往手工作坊式的学术研究模式无疑具有巨大的意义。② 我们相信，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进步，阎若璩费十九年功夫寻找“使功不如使过”一语出处的事例将不会再发生。

除了大大加快古籍检索速度的好处之外，古籍数字化后还有助于帮助学者排除冗余信息的干扰，更快地深入到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的内部。传统的资料检索方法要求学者必须通览几乎全文才能找到自己所需的资料，因此常有大海捞针之叹。在这一过程中，资料收集者往往被迫阅览到很多与自己研究主题无关的信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效率不高。而数字化古籍，提供给读者多种检索方式，如关键词检索、逻辑检索、条件检索、模糊检索、属性检索等，只要设定好主题关键词，我们就可以直接搜索到与主题有关的资料，直接深入到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的内部。如从《四库全书》电子版中查找某一历史人物的传记资料，就能比传统检索方式节省上百倍的时间，而且更准确、更丰富。

---

①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6～137 页。

② 郝继东：《古籍整理与研究现代化漫谈》，《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 年第 5 期。

另外，运用数字化古籍进行资料检索，还可以扩大学者的眼界、拓展他们的学术视野。我们在从事某个专题研究时，不仅能够通过查询、检索技术穷尽该领域内的所有资源，而且由于网络资源的丰富性和信息以几何级增长的特性，使得学者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发现大量有价值的、富有启发性的相关信息，学者的眼界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于得到拓展。学者眼界的扩大、学术视野的拓展、网络数据库群的广泛应用，毫无疑问将极大地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①

（四）古籍整理方法：由传统到现代

数字化时代，古籍整理的内涵仍没有变化，依然是对古籍原文的整理和加工。就古籍整理的具体工序而言，一般分为选择底本、校勘、标点、注释、今译、辑佚、汇编、索引、影印等。这些工序，按传统的方法完全需要整理者依赖自己的知识基础和手工操作，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劳动，工作效率非常低下，数年或数十年整理一部单本古籍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数字化时代，古籍整理的方式、方法，古籍整理成果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很多人工劳动已为或即将为计算机所代替，古籍整理的方式、方法也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人工走向智能。这显然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比如进行校对工作，采用传统方式，如刘向所言“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②，而有时甚至需要核对众本，左顾右盼，费时费力，终因人精力有限，不免出些差错。在数字化时代，可以用计算机进行电子校勘，既省时、省力，又提高了校勘的准确率。又如做辑佚、汇编，不仅需要人工翻阅大量的文献，搜检之苦自不必言，搜检完之后还得一点点抄录，制作卡片，再进行手工编排，其劳动量之大，耗费精力之多，令人望而却步。再如拥有《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电子版，我们就可以利用全文检索功能辑出多种散佚的古籍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类书、丛书及其他古籍被数字化，以及相应辅助系统的进一步发展，不少散佚的书可以很容易辑

① 郑永晓：《古籍数字化对学术的影响及其发展方向》，《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6年第4期。

② 《文选》李善注《魏都赋》引《风俗通》。

佚出来，嘉惠学林，功德无量。

总之，数字化时代的古籍整理，几乎各个环节都可以借助计算机，运用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软件技术进行处理，虽然这种途径还不尽成熟，但已经将人们从原来繁重、琐碎的资料搜检和抄录工作中解放出来，是一次古籍整理方式、方法的深刻变革。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会有更多的古籍文献以数字化产品的形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古籍整理已经走出传统观念，正在朝着现代化、电子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

（五）古籍整理人才培养模式：由单一到复合

尽管古籍数字化为古籍整理工作带来深刻的变革，为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便利，但计算机不是万能的，它的所有自动处理能力都需要我们预先提供知识和资料，编制好相应的程序。而且，计算机也有出错的时候，对这些错误的纠正也需要古籍整理者来做。另外，目前有些数字版古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版本选择不精、文字校勘水平不高等问题，与古籍整理的标准还有不少距离。因此，古籍数字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或轻视整理者的专业基本功和传统方法的训练。相反，古籍数字化对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的智力、能力和经验提出更高的要求，也给古籍整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曾经很长一段时期，古籍数字化工作多是由一些计算机专业人士在做，古籍整理专业人士很少参与。以《四库全书》电子版的开发为例，据李运富介绍："《四库全书》电子版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独立开发后，尝试聘用若干具有古籍专业知识者参与合作，起到积极的作用。笔者有幸参与其事，了解到该电子版本的开发情况，发现其中既有许多的成功经验值得吸取，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处理原则问题，因而劝导该工程作了一些调整。但由于我们是中途介入，工程技术人员跟我们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有些问题已积重难返，加之古籍专业人员太少，无法对整部《四库全书》的用字作全面整理，因而该电子版本的用字仍然难免存在混乱和错误。"[①] 实事求是地讲，"古籍数字化属于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或称校雠学）的范畴，

---

① 李运富：《谈古籍电子版的保真原则和整理原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1期。

而不仅仅是图书载体的转换或商业炒作的噱头。故必须以相关领域的学者（即内容专家，而非技术专家）为主导，才可能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纯粹的技术专家不可能将古籍数字化，甚至数字化图书馆领向一条康庄大道。技术是形式，内容是核心，内容决定采取何种形式，形式只能服务于内容，而不是相反。只有熟悉对象（古籍）内涵的主体，即内容专家，才有能力决定实现古籍数字化的基本路向和基本框架，技术专家的作用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如何最便捷、最优化地实现目标”①。由于内容专家和技术专家在专业知识背景、古籍数字化工程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如何实现两方面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有效地发挥各自的功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一背景下，就要求古籍整理者不仅要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经验，而且对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等较为熟悉。只有如此，才能在古籍数字化过程中一方面坚持自己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能与工程技术专家进行良好的沟通和合作，从而保证数字化古籍的学术质量和工程质量。

然而，传统的古籍整理专业人才培养却没有跟上古籍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高校和科研院所文献学专业课程，一般设置版本学、目录学、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文献学等，重视对学生古籍版本、目录、校勘及文字、音韵、训诂等基本功的训练。这一模式一直坚持了很多年，也的确培养出了很多颇有造诣的人才。然而，面对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一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着严重挑战。

为了适应古籍数字化的时代趋势，就要求我们古籍整理专业人才培养单位，在培养目标上进行重新定位，在课程设置上进行适当调整。可以考虑适当增设一些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等方面的相关课程，增强学生使用古籍全文检索系统、互联网搜集资料以及参与古籍软件开发和研制的能力。据说台北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最早着手培养中文文献数字化人才，大陆地区有些学校也开始进行尝试，但效果并不明显，需要进一步探讨。

当然，这一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时间，更需要一些

① 史睿：《数字化条件下古籍整理的基本问题（论纲）》，http://www.guoxue.com/gjszh/yjwz_010.htm。

探索的勇气。

二、古籍数字化与文献学相关学科的发展

古籍数字化促使传统文献学学科内涵发生变化，对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传统文献学相关学科都产生了巨大冲击，有着巨大影响。

（一）古籍数字化与传统文献学

文献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是20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但追本溯源，先秦时期就有了文献整理。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无数文献学家的努力，这门学科已发展得比较成熟了。但是，随着古籍数字化大潮的冲击，传统的文献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或压力。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传统文献学的概念及其内涵正在被更新、被丰富。有关传统文献学的概念、内涵等问题，学界涉及较多，[①] 此不赘述。随着古籍数字化的普及，文献的载体主要由纸本形态而转向数字形态，随之而来的是文献学概念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如数码文献学、数字文献学、电子文献学、古籍电子文献学等。“数码文献学是研究以数码技术为媒介，以传统文献学为基础，来保存、加工、整合、传播和利用文献的学科”。“数码文献学，也可以称为数字文献学、电子文献学，这里的‘数码’、‘数字’都是取义于英文的 Digital，‘电子’一词词义本身可能宽泛些，但在这里也约略相等。对这三种称呼，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偏好，为了简便起见……把这三种名称视为完全等义的范畴”[②]。古籍电子文献学与以上三种名称的文献学内涵相类，“它的知识结构是跨学科的，但在学科种属或级别关系上则分属于古典文献学之下。至少它可以成为一个学科发展的专业方向”[③]。这些概念是古籍数字化之前闻所未闻的，它们的

① 董恩林：《论传统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和体系诸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

② 如舸斋：《开宗明义：什么是数码文献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2990e1901008u9r.html。

③ 张三夕：《论电子文献的发展对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

出现是对传统文献学概念的时代补充。在具体内涵方面，随着古籍数字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传统文献学增加了有关数字古籍文献的相关内容，比如数字古籍的出版、数字古籍目录的编订、数字古籍文字的校勘、数字古籍版本问题、数字化古籍的存储、传输等问题。尽管这些概念的界定还不完善，涉及的内容及范围还有待充实和补充，但它们明显是传统文献学所没有包括的内容，是对传统文献学概念的更新、内容的丰富。

其二，传统文献学学科建设需要关注古籍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古籍数字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对传统文献学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关注古籍数字化发展的趋势。

在教材建设方面，文献学教材除了保留原有的体系之外，应适当增加数字文献学（或称其他名称）的相关内容。可喜的是，我们的文献学教材已经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张大可的《中国文献学》第十章谈到电子文献的检索与利用问题。[①] 王俊杰等编的《文献学概论》第八章谈到了计算机存储载体问题，第九章谈到了文献的数字化及网上传递等问题。[②] 同样由他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论》第十章谈到了电子文献的检索和利用问题。[③] 刘琳、吴洪泽的《古籍整理学》第九章《古籍整理手段的现代化》专谈运用计算机技术整理古籍问题。[④] 不过，目前的文献学相关教材对数字文献学关注的还不够，较为系统论述电子文献学（或古籍电子文献学、数字文献学）内容的教材还很少见，而以这些名称命名的专书尚没有出现。

另外，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者应该积极参与古籍数字化工程的开发与研制工程，并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不仅是古籍数字化具体工程在学术方面的要求，也是学术为社会服务的体现，更是文献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文献学专业的专家学者不应该关起门来做学问，而要以开放的态度积极投身古籍数字化发展的大潮，并以此为契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

---

① 张大可：《中国文献学》，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王俊杰：《文献学概论》，宁波出版社 2006 年版。
③ 王俊杰：《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论》，齐鲁书社 2006 年版。
④ 刘琳、吴洪泽：《古籍整理学》，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高校中的文献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应该积极建设自己的网站。一方面收录丰富的数字化古籍，向学生开放，以弥补图书馆某些纸质文献藏本的不足；另一方面作为展示自己文献整理与研究新成果及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如果全国文献整理与研究单位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并且实现友情链接，那么必将对整个文献学学科建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三，对文献学专业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数字化古籍的不断出现，尤其是具有全文检索功能大型古籍数据库的出现，对我们的文献学专业的学习和教学提出了挑战，学生会感到无所适从，教师也面临着很大压力。在数字化背景下，传统文献的概念、文献学的内涵、目录学思想与方法、校勘理论等传统文献学理论与实践面临着古籍数字化浪潮的冲击。如何将二十多年蓬勃发展的古籍数字化成果反映出来，如何对这一古籍整理新方式予以科学、合理的阐释，如何对新出现的数字化成果进行研究和探讨，数字化时代文献学该如何发展等等，都是教学活动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既要传授给学生传统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又要随时关注古籍数字化的新发展，并及时将新成果介绍给学生。同时，还要结合教学实际，积极探讨数字化时代文献学发展的趋势和路径，甚至参与相关古籍数字化工程。因此，古籍数字化要求教师必须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行更新或充实，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做到与时俱进。

（二）古籍数字化与传统目录学

一般认为，传统文献学的核心是目录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目录学，其功能并非简单地提供古籍书目，而是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对图书分类的同时，也是对思想史、学术史的归纳、分析、梳理和评判。然而，面临古籍数字化潮流的冲击，传统目录学的这两个主要功能都面临着弱化的态势。

首先，建立数字目录学成为古籍数字化发展的必然。中国最早的图书分类法是西汉时代产生的六分法，即刘向、刘歆父子主持国家图书整理时所分六艺类、诸子类、诗赋类、兵书类、数术类、方技类等六大类。再后

来便是魏晋时代产生的甲、乙、丙、丁四分法，即一直流传到现在仍在使用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尽管对于古籍数据库建设而言，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进行排列仍然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解决方案，[①]但对于普通读者和研究者来说，查找古籍往往不是首先去翻阅《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学著作，而是从古籍数据库中直接进行检索。比如，我们想从四库系列丛书中寻找一部古籍，看它是否被收录，具体收在哪部丛书之中、位置如何，如果去图书馆一一翻阅每部丛书的目录，那就有些落后了。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如何从古籍书目数据库中寻找线索，现在有复旦大学图书馆古典文献数据库四库系列图书综合索引[②]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非常方便。诸如此类的情况在我们的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中经常会发生，传统目录学的确面临着严峻挑战。

与此同时，随着古籍载体的转变，大量古籍数字光盘和网络古籍资源的出现，目录学研究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为了方便读者或研究者查找数字化古籍，也为了避免古籍数字化工程的重复建设，很有必要建立一门专门的目录学——数字目录学。实际上，柯平已提出了数字目录学概念，认为其功能在于“主要解决电子资源的分类编目与检索问题，包括数字图书馆目录、网络编目、联机编目、文后电子资源著录、网络资源分类、网络资源组织、网络信息资源的二次开发等问题”[③]。虽然这是从现代目录学角度提出的概念，但也是数字文献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传统目录学功能的弱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亦是目录编制的总体思想。翻开任何一部中国古代目录巨著，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一重要特征，学者们都是把阐明学术的渊源流变，考镜家法，熔铸于古代目录的编制中。[④]

---

① 郑永晓：《传统目录学与古籍文献数据库的开发建设》，http://www.guoxue.com/wk/000656.htm。

② 复旦大学图书馆古典文献数据库，http://www.library.fudan.edu.cn:8080/guji/。

③ 柯平：《中国目录学的现状与未来》，《图书馆杂志》2005年第3期。

④ 姚伟钧：《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论中国古代目录编制的总体思想》，见《三网集》，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然而，目录学的这一优秀传统，或者说重要功能，在数字化古籍纷纷出现的当今时代开始明显弱化。当前，各种类型的古籍数据库多具有强大的检索和查询功能，读者很快就能检索出自己所需的资料，除有专门任务外，古籍目录学著作已少有人问津。那么存在于“序言”、“解题”、“类例”等这些别白学术、揭示源流的内容自然也难以进入读者的视野，也就是说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几乎不复存在，这一优秀传统难以有效保持。

需要指出的是，古籍数字化所带来的强大检索功能并不能代替传统目录学这一功能和优良传统。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把中国传统目录学那种示人以治学门径的功能与数字化古籍数据库穷尽式的检索能力结合起来。而这一问题在建设大型古籍数据库和专题数据库时更显重要。在实际应用中，古籍类数据库也体现出检索功能强，而分类和导引功能较弱的特点，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学界进一步探讨。

第三，传统索引、引得编纂必要性的淡化。传统文献学中，文献检索的主要途径在于索引、引得。索引、引得编制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文献检索的速度。而“编制引得，是一种学术性兼技术性的工作，它既要求作者有丰富的古代文献知识，又要细心而有韧性，其间甘苦，非局外人可知”①。洪业从1929年开始组建从属于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编纂处，组织人力，前后历经21年，至1950年先后编纂出版了经、史、子、集各种引得64种81册。叶圣陶当年编制《十三经索引》时，全家齐上阵，花了很大工夫也只是编成了逐句索引，更别说实现全文检索了。

然而，伴随古籍数字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古籍实现了全文检索。既然数字化的古籍文献本身已经具备全文检索功能，谁还需要查看索引呢？因此，再为古籍编纂索引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比如过去哈佛燕京学社编纂过《礼记引得》等，而现在随便将《礼记》中的任何词语在《四库全书》电子版系统中搜索一下就能找到结果，不仅位置精确，而且速度飞快。

---

① 彭忠德：《洪业与中国的“引得”之学》，《福建论坛》，1999年第1期。

正如郑永晓所言："随着古籍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和学者年龄及知识结构构成的变革，传统文献索引这样的学科工具必将结束其历史使命。"[①] 古籍数字化之影响可见一斑！

（三）古籍数字化与传统校勘学

一般说来，校勘古籍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校异同，二是判是非。通常所用的校勘方法，是陈垣先生总结概括的校勘四法，也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陈先生的校勘四法使"中国校勘学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②]。长期以来，校勘四法因其科学性、系统性，一直被奉为校勘学的圭臬，然而在古籍数字化大潮中也程度不同地受到挑战。

其一，数字古籍校勘改变了传统的校勘方法，大大提高了校勘速度和准确率。校勘四法中受到挑战最明显的当属对校。目前，软件联机无纸校对是运用得最广泛、最成熟的对校手段。运用这种技术，只要设置正确，校对速度相当快，正确率也相当高。另外，如果古籍数据库足够多、容量足够大的话，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进行他校的工作。对校和他校重在校异同，而本校和理校则重在校是非。校异同较易，而校是非则难。尤其是随着大型古籍数据库的建立，囊括的古籍更多，被视为校勘最高境界的理校法大规模实施的机会将越来越少。

其二，数字古籍校勘在程序上增加了校祖本（祖本转换文字与祖本对校）的程序。我们知道，文字化是古籍数字化工作的基本目标，因此在他本与祖本对校（即传统的对校阶段）之后，我们需要先将祖本由图像版转换成文字版，然后再与祖本原本进行本校、用他书进行他校、用综合知识进行理校。这里就产生了问题，由祖本图像转换过来的文字是否与祖本完全一致，如果存在文字上的错、讹、衍、脱，那么就失去了作为数字版祖本的资格。前面已谈，由于多种原因，现行的 OCR 文字识别软件都无法做到文字转换的完全正确，因此将转换文字与多本对校后的祖本图像进行

---

① 郑永晓：《古籍数字化对学术的影响及其发展方向》，《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6 年第 4 期。

② 胡适：《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见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七）·说儒》，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7 页。

比校，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一步。这是传统的古籍校勘工作所没有的程序，姑且可以称之为“校祖本”，是对传统校勘四法的补充。

随着更多的大型古籍数据库的建立，随着校对软件的不断开发和升级，数字古籍的校勘工作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和方便。但是若想校勘出精本，则非古籍整理专业人士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才能不可，因为校异同易而校是非难。

（四）古籍数字化与传统版本学

传统版本学是指研究历代典籍雕版源流、传抄经过、纸地墨色、字体刀法、藏书印记、装潢形式以及内容校勘考订等问题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包括一切形式在内的各种图书：碑本、写本、刊本、印本、稿本、抄本、批校本等等。随着古籍由实物形态向数字形态转换，传统版本学亦面临严重挑战和冲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传统版本学概念、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数字化古籍的大量出现，书籍由原来的实物形态转换成以电子为载体、可以检索的数字形态。原来以写本、刊本、稿本、抄本等形式而存在的各式古籍，数字化后变成了电子格式；原来古籍的纸张、墨色、字体、刀法、装帧形式等特定形态，数字化后几乎全部失去。数字图像版虽然可以展示版本类型、版刻特征、字体、墨色等信息，满足版本研究、书史研究、文物鉴定等多种需要，但是它毕竟不是古籍数字化的最终形态。可以说，随着古籍数字化的发展，传统版本学的概念及其内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之相应，文献的版本著录不仅可以著录纸质文献的印刷版，也可以著录数字古籍的电子版。

其二，版本鉴定手段趋向现代化。版本鉴定是版本学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是一项对知识、经验要求相当高的工作，非专才而不能为也。这就给古籍版本鉴定工作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伴随着古籍数字化浪潮，古籍版本鉴定的手段也随之产生了一些新变化。一方面，对于版本信息的收集可以通过查阅数字化古籍书目及国家图书馆等藏书机构古籍目录即可轻松实现。另一方面有关古籍作者、刻者、藏者及所载内容等相关信息可以通过检索大型古籍数据库进行比对，从而达到辨伪求真的目的。一句话，

古籍数字化改变了古籍版本鉴定的手段，提高了版本鉴定的效率和准确性。

其三，版本学的新内容——数字版本学。随着数字古籍的大量出现，主要以纸质载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版本学已无法适应数字化发展的潮流，建立版本学的分支学科——数字版本学就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实际上，由于古籍数字化的标准并不统一，加之载体介质、格式及新旧版不同等因素，所以目前的数字化古籍已形成了不同版本。如同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数字化为选题，就有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推出的版本（1999 年），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岳麓书社、湖南华天集团合作推出的版本（1998 年），武汉大学出版社、济南汇文科技开发中心合作推出的版本（1998 年）等几家不同的本子，各个本子在载体介质、浏览页面设计、文字校勘、辅助功能、容量等方面各不相同，实际上已是不同的数字古籍版本。

另外，同一主题的数字化古籍版本也需要不断升级换代，而每一次升级换代，都较之前版有所改进，自然也与前版是不同的版本。如天津永川软件技术公司制作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阅读系统有 3.0 版与 2.0 版，台湾"中央研究院"瀚典全文检索系统也有 1.0 版和 2.0 版。制作《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电子版的各单位或企业也都不断推出新版甚至新的网络版。新版会纠正原有版本的错误，有的还会增加其文献内容。面对如此多的古籍数字化版本，如何鉴定其价值、区分其优劣，如何对其进行综合的归纳、梳理和分析就成为数字化时代版本学需要解决的新问题。目前，学界已有人开始关注电子版古籍文献的版本问题，李先耕已讨论了电子版古籍"善本"问题。[①] 至于数字版本学，更是有待研究的新课题，目前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想法，期待学界一起努力共同探讨。

总之，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古籍数字化已成为古籍整理的新方向，亦是古籍整理工作的新方式。它已经对古籍及其整理与研究乃至相关的学科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这个传统与现代结合，机遇与挑

---

① 李先耕：《谈电子版古籍"善本"》，http：//www.guoxue.com/wk/000650.htm。

战并存的大潮中，作为古籍整理与研究者来说，为顺应古籍数字化发展的趋势，我们需要及时更新思想观念，充分利用和推广优秀古籍数字化成果；需要不断提高驾驭新技术的能力，积极参与到古籍数字化工程的开发与研制中去；需要敏锐地把握数字化时代文献学学科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积极思考学科建设的新领域、新方向；还需要准确地把握我国古籍数字化发展的方向，为数字化时代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献计献策。这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要求！

主要参考文献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
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
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
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86年版。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
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新一版。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国书店1985年版。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版。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魏收：《魏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 1972 年版。
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 1972 年版。
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魏征：《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
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宋濂：《元史》，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董仲舒：《董仲舒集》，学苑出版社 2003 年版。
何休撰、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本。
袁宏：《后汉纪》，载《两汉纪》，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刘义庆撰、徐震堮笺释：《世说新语笺释》，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刘勰撰、刘永济校释：《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阮孝绪：《七录序》，载《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刘知幾撰、张振珮笺注：《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柳宗元：《柳宗元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吴兢：《贞观政要》，岳麓书社 2000 年版。
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广雅书局刊本。
释智昇：《开元释教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孙复：《孙明复小集》，光绪十五年问经精舍刊本。

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

吕大临：《考古图》，中华书局1987年版。

王俅：《啸堂集古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2000年版。

刘敞：《公是集》，广雅书局刊本。

翟耆年：《籀史》，守山阁丛书本。

洪迈：《容斋随笔》，岳麓书社1994年版。

王应麟：《困学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周密：《齐东野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

高似孙：《史略·子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朱熹：《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

朱熹：《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

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赵明诚：《金石录校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

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

郑樵撰、顾颉刚辑：《诗辨妄》，朴社1933年版。

吕祖谦：《东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范祖禹：《范太史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苏轼：《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苏轼：《商刻东坡志林》，载《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九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苏颂：《苏魏公文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

封演：《封氏闻见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

黄震：《黄氏日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方崧卿：《韩集举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杨万里：《诚斋集》，四部丛刊本。

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

谢枋得：《叠山集》，四部丛刊本。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岳珂：《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陆游：《渭南文集》，四部丛刊本。

张栻：《孟子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沈括：《梦溪笔谈》，载《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三册，大象出版社 2006 年版。

朱弁：《曲洧旧闻》，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朱翌：《潜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邹浩：《道乡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方回：《桐江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祁：《归潜志》，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潘昂霄：《金石例》，载朱记荣辑：《金石全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

宋濂：《诸子辨》，朴社 1926 年版。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

解缙：《文毅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文征明：《莆田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徐𤊹：《徐氏笔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俞汝辑等：《礼部志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丘浚：《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 1999 年版。

谢肇淛：《五杂组》，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
胡广等：《书经大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东阳：《怀麓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高濂：《遵生八笺》，巴蜀书社 1992 年版。
周煇：《清波杂志校注》，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郎瑛：《七修类稿》，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
罗伦：《一峰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王行：《墓铭举例》，载朱记荣辑：《金石全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
钱谦益：《钱牧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
李光地：《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圣祖仁皇帝圣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 1983 年第二版。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 1994 年版。
顾炎武：《求古录》，光绪十四年行素草堂金石丛书本。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黄宗羲：《金石要例》，载朱记荣辑：《金石全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
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朱彝尊：《经义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鸿绪等：《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御制文二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来保等：《钦定大清通礼》，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戴震：《戴震全书》，黄山书社 1995 年版。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钱大昕：《三史拾遗》，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鄂尔泰等：《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王昶：《金石萃编》，中国书店 1985 年版。

阮元：《研经室集》，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中华书局 1999 年版。

阮元：《定香亭笔谈》，丛书集成初编本。

顾广圻：《顾千里集》，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汪中：《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 2005 年版。

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梁玉绳：《志铭广例》，载朱记荣辑：《金石全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

郭麐：《金石例补》，载朱记荣辑：《金石全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

刘宝楠：《汉石例》，载朱记荣辑：《金石全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

李富孙：《汉魏六朝墓铭纂例》，载朱记荣辑：《金石全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

冯登府：《金石综例》，载朱记荣辑：《金石全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

冯登府：《石经阁金石跋文》，载朱记荣辑：《金石全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

段玉裁：《经韵楼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洪亮吉：《洪亮吉集》，中华书局 2001 年版。

黄丕烈：《黄丕烈书目题跋》，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

袁枚:《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毕沅:《关中金石记》,经训堂丛书本。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孙星衍:《问字堂集·岱南阁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

孙星衍:《京畿金石考》,道光七年抱芳阁刻本。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国书店1987年影印本。

王鸣盛:《西庄始存稿》,续修四库全书本。

武亿:《授堂文钞》,道光癸卯年重刊本。

武亿:《金石三跋》,道光癸卯年重刊本。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

崔述:《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焦循:《焦循诗文集》,广陵书社2009年版。

焦循:《里堂家训》,续修四库全书本。

严可均:《铁桥漫稿》,续修四库全书本。

江藩:《江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上海书店1983年版。

孙衣言:《逊学斋文续钞》,续修四库全书本。

法式善:《槐厅载笔》,续修四库全书本。

杭世骏:《道古堂集》,乾隆间刻本。

梁廷楠:《金石称例》,载朱记荣辑:《金石全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王芑孙:《碑版文广例》,载朱记荣辑:《金石全例》,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 2008 年版。

鲍振方：《金石订例》，载朱记荣辑：《金石全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

吴镐：《唐人志墓诸例》，丛书集成初编本。

郝懿行：《晒书堂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版。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陈澧：《陈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孙从添：《藏书记要》，载《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载《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曹溶：《流通古书约》，载《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叶德辉：《藏书十约》，载《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叶德辉：《书林清话》，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9 年版。

叶昌炽：《语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宋咸熙：《思茗斋集》，道光五年刻本。

吴承志：《逊斋文集》，求恕斋丛书本。

孙诒让：《札迻》，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王筠：《说文句读》，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朴社 1929 年版。

陆增祥：《金石祛伪》，续修四库全书本。

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载《饮冰室合集》（第 12 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王国维：《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

二、近今人著述：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曹书杰：《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曹亦冰主编：《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昌彼得：《中国目录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86 年版。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陈垣：《励耘书屋丛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 年影印本。

陈垣：《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齐鲁书社 1998 年版。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齐鲁书社 1998 年版。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齐鲁书社 1998 年版。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典藏编》，齐鲁书社 1998 年版。

戴南海：《版本学概论》，巴蜀书社 1989 年版。

戴南海：《校勘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董恩林主编：《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董洪利：《古籍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董莲池：《段玉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 2001 年版。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 2001 年版。

冯浩菲：《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冯友兰：《冯友兰全集》（第十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傅斯年：《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傅璇琮主编：《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出版社 2001 年版。

高崇谦、朱孟杰：《文献检索基础》，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年版。

高路明：《古籍目录学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顾颉刚著、印永清辑、魏得良校：《顾颉刚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河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管锡华：《校勘学》，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贺修铭：《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教程》，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版。

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黄宗忠：《文献信息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年版。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李更:《宋代馆阁校勘研究》,凤凰出版社 2006 年版。

李清良:《中国阐释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李希泌等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李学勤:《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

林艾园:《应用校勘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

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2 年订补本。

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 1995 年版。

刘建国:《先秦伪书辨正》,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刘琳、吴洪泽:《古籍整理学》,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刘乃和:《历史文献研究论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刘青松:《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要》,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刘文典:《三余札记》,黄山书社 1990 年版。

刘咸炘:《刘咸炘论目录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伦明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8 年版。

罗孟祯:《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重庆出版社 1983 年版。

吕斌:《胡应麟文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论》,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毛建军:《古籍数字化理论与实践》,航空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

牟玉亭：《中国古典文献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倪波主编：《文献学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潘树广等：《文献学纲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彭斐章：《目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钱玄：《校勘学》，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屈万里、昌彼得：《图书版本学要略》，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9 年版。

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邵东方：《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施蛰存：《金石丛话》，中华书局 2005 年第二版。

司马朝军：《文献辨伪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王桂平：《清代江南藏书家刻书研究》，凤凰出版社 2008 年版。

王记录：《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黄山书社 2002 年版。

王记录：《钱大昕的史学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王记录：《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王嘉川：《布衣与学术——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王俊杰：《文献学概论》，宁波出版社 2006 年版。

王欣夫：《王欣夫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王燕玉：《中国文献学综说》，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王余光：《中国文献学史要略》，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王云海：《校勘述略》，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王子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魏训田：《中国近代以来文献典籍散佚史略》，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4 年版。

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 1984 年版。

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 1981 年。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金卷》，黄山书社 2002 年版。

吴怀祺：《郑樵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 1992 年版。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2007 年。

吴孟复：《国学典籍阅读要义》，中国书店 2008 年版。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编：《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谢玉杰、王继光：《中国历史文献学》，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

熊笃、许廷桂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重庆出版社 2000 年版。

许凌云：《刘知幾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严怡民：《情报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杨燕起、高国抗：《中国历史文献学》，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 1998 年影印版。

叶国良：《石学蠡探》，台北大安出版社 1989 年版。

易漫白：《考古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

余敏辉：《历史文献学散论》，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余庆蓉、王晋卿：《中国目录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余英时：《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张大可：《中国历史文献学》，陕西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张大可：《中国文献学》，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张富祥：《宋代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张家璠、黄宝权：《中国历史文献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张显成：《简帛文献论集》，巴蜀书社 2008 年版。

张心澂：《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 1954 年版。

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张玉勤等：《实用文献学》，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郑良树：《古籍辨伪学》，台湾学生书局 1986 年版。

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周少川：《中华典籍与传统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周少川：《古籍目录学》，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周文骏：《文献交流引论》，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年版。

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后　记

几易寒暑，多番修改，就在2010年“两会”即将落下帷幕的时候，我也要为这部书稿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了。作品即将面世，心中不免惴惴不安。之所以不安，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文献大国，自古迄今，产生了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积累了丰富的文献整理的实践经验，孕育了内涵深刻的文献学思想。面对中国历史文献学丰富的思想内容，区区一部小书又如何能够反映出它的面貌和特征？短短几十万字又如何能够揭示出它的成就和内涵？好在任何事情都必须先有人来做，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读者诸君就把这本书看作是引玉之砖吧。相信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会有更多高水平的文献学思想著作问世。

本课题的研究起于2002年，当时吴怀祺先生承担了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的研究工作，要周少川师和我共同承担历史文献学思想的研究和写作任务，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研究，少川师拟出了本书的写作大纲，约定我们各写一半，并率先写出了文献典藏思想的部分书稿，后来因为少川师学术事务繁忙，研撰任务就落到了我一个人身上。经过七年时间断断续续的研究和写作，终于有了现如今的这部书稿。

本书第二章第一节是少川师撰写的，第二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也都参考吸收了少川师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少川师还在其他章节的研撰中给我多方面的指导，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使本书增辉。另外，青年学者

李峰博士撰写了第七章第一、二、三节，鞠明库博士撰写了第八章，然后由我统稿润色而成。两位年轻博士学术功底扎实，思维敏捷，见解独到，他们自成一家的研究心得为本书添彩。

本书的研撰得到吴怀祺先生的全面指导，无论是北京的当面晤谈，还是频繁的两地通话，吴先生都对这部书稿的撰写倾尽了心力。每每写作进入困境，都要和先生聊聊，先生三言两语，就能打开我的思路。可以说，没有先生的支持、督促、指导和批评，本书是难以面世的。赵振博士曾向我出借他多年的藏书，并就一些学术问题相互交流看法，使我受益良多。本书的责任编辑史霄鸿先生帮助作者删除繁冗，调整章节，亦付出了巨大心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中国人重“史”，记录历史，整理文献，传承文明，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在长期的文献整理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内涵丰富的思想和理论。但我们也应看到，就中国古代而言，除了少量相关的文献学理论著述而外，绝大部分的文献整理的思想观念都是寓于具体而琐细的文献整理的过程之中的，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有技术层面的操作而缺乏理论层面的思考。有鉴于此，本书尽力做到细致地发掘、梳理和解读资料，在繁富的文献典藏、鉴别、分类、校勘、辨伪、注释等工作的背后，发现零金碎玉般的思想因素，融会贯穿，归纳总结，庶几得到一个系统的认识。尽管我本人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吸收了不少前贤时哲的研究成果，并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帮助，但由于课题涉及面广，资料浩繁，加之本人学识有限，粗疏漏落、错谬讹误之处自会不少，还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王记录

2010 年 3 月 13 日于河南师大弄斧书屋